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诞生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

[英] 迈克尔·佩罗曼 著
裴达鹰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资本主义的诞生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

[英] 迈克尔·佩罗曼 著
表达鹰 译

F001/2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by Michael Perelman

©2000 Duke University Press

原书初版于 2000 年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0-04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的诞生/(英)迈克尔·佩罗曼著;裴达
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雅典娜思想译丛)

书名原文: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ISBN 7-5633-3270-7

I. 资… II. ①迈…②裴… III. 资本主义经济—
研究 IV.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40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电子信箱:pressz@public.glnet.gx.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深圳市(宝安)新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笋岗路华通大厦 1614 室 邮政编码:518008)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5.5 字数:367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绪论：暗影

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则，并不需要写出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对这些法则进行了正确观察和推理……总是会引向一些原始的等式……这些等式指向资本主义体系的过去。于是，这些迹象就……提供了理解过去的钥匙——这本身就是值得的。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在一个理论的确立过程中，一般来说，某一可见领域的隐性方面，并不是什么在这一可见领域之外的、不相关的东西。“看不见”由“看得见”所定义，是被限制的视角。因而，“看不见”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看得见”之外（让我们回到空间的比喻），也不是黑暗的外部世界，而是被包含在内的事物的黑暗，在看得见的事物本身内部。

——路易斯·阿尔素瑟《从资本到马克思的哲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政策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从威廉·配第到大卫·李嘉图时期的经济文献的核心，看起来很壮丽。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人物，在当时仅有的商人和道德哲学家著述的指导下，对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的经济问题，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思维方式。每一个人，从提出“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卡尔·马克思，到当代的保守主义者，都承认这些早期经济学家所取得的巨大的智力成就。

两个世纪以来,后世的经济学家绞尽脑汁,探求文本,想要知道这些早期理论家是怎样发现市场是组织生产的最有效方式的。从表面上看,古典政治经济学毫不妥协地宣扬自由放任政策。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大部分当代读者,都按照他们著作的表象接受了它们,认为这些早期作者都是自由放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在极大程度上,甚至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接受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种诠释。

除了在单纯的经济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还致力于一项并行的项目:强制推进社会的重组,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由市场引导的体系。虽然经济史学家对当时人们参与市场行为的深度有所争议,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当时英国的大多数人只要还有别的出路,所以并不热衷于雇佣劳动。

为了确保人们接受雇佣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积极地鼓吹一些措施,以剥夺人们传统意义上的谋生手段。表面看来,剥夺绝大多数自给自足者生产资料过程的野蛮行为,跟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放任”的名声似乎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剥夺绝大多数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与“自由放任政策”的确立过程结合得特别紧密,以至于马克思——或者至少他的解释者们——将这种对大众的剥夺贴上了“原始积累”的标签。

“原始积累”这个词本身,就浸透着对人类行为的痛苦影响。首先,“原始”(primitive)一词暗示一种在比较近代的更隐秘的剥削方式中所罕见的野蛮行为。它也暗示这种原始积累人们通常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那种积累之前。最后,它还暗示一些可能跟“原始”世界有关的东西,那里资本的积累还不像别的地方那么发达。

第二个词“积累”(accumulation)提醒我们,这一过程主要是社会的一小部分人对资本和财富的积累,或者像马克思描写的那样,是“社会财富对世界的征服。它是受剥削的人类物质领域的外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者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延”。至少在资本主

义的早期阶段,原始积累是积累过程的核心因素。

很多当代学者都承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写作的年代,原始积累无处不在。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意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原始积累的“同谋”。他们通常隐秘地支持能深化原始积累过程的政策。

在大力宣扬“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同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断地支持与他们的“自由放任”原则背道而驰的政策,尤其是跟他们对小生产者或乡村生产者的角色分析相悖的政策。我们将会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基本发展策略,与粗陋的前马克思主义(*crude Proto-Marxian*)的原始积累模型是一致的。这种模型的结论是,在加速乡村的资本主义同化作用过程中,非市场的力量可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模型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表明的立场,与我们归结于他们的理论大相径庭。

原始积累的秘史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农业生产传统体系的很多著作,与他们看起来似乎更加“耐久”的对纯理论的评论是分离的,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后世读者总是匆匆略掉了他们著作的这一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方面,看起来似乎不是他们理论的中心。但是我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干涉主义的建议,是他们整个著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宣扬限制乡村中传统工作的生存能力,从而迫使人们成为雇佣工人。

本书第一章讨论的是原始积累的历史,证明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下面这几点有浓厚兴趣:将乡村劳动者从农村驱赶到工厂,强迫他们给愿意出钱雇佣他们的人做工;消除任何懒惰的迹象。

这些乡村生产者的活力,一般依赖于把工业追求和农业追求

精细地结合起来。尽管这种安排很有效率,古典政治经济学却下定决心要扼杀小生产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用劳动分工的效率,来证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们提倡一些措施,积极推进农业和工业的分离。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分工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斯密考虑劳动分工的时候,总是强调“排他性”,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一个工厂内的工作安排。与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提议,我们也应该审视一下工厂与家庭之间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

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并没有关注劳动的社会分工。例如,斯密在他著名的别针厂例子中,详尽描述了那里的劳动分工。但他并没有花力气去扩展他的理论。别针工业要购买金属原料和燃料,而不是自己去生产这些原料和燃料,这样的社会分工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分工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即使科技水平没有提高,工业模式的这种变化,是否会使经济有所变化呢?

这些问题离古典政治经济学太远了。以至于两个多世纪以后,罗纳德·科斯^①将这些问题纳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注意范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一群现代经济学家仿效科斯,发展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他们认为,经济力量会自发地将自己按最佳模式配置。同很多别的经济学家一样,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斯密的思想——已经预见到了他们的理论,他们还为此感到骄傲。虽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关注劳动的社会分工,他们的理论对于分析原始积累的强制性一面,却没有丝毫帮助,因为这一学派觉得,经济是通过自愿的契约进行自我配置的。

^①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英国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1991年获诺贝尔奖。——译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此后略)

本书第二章集中讨论的是原始积累的理论。大多数关于原始积累的讨论,都将“原始积累”看成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残暴行为的代名词。本书第二章与它们不同,强调将原始积累看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念,用来分析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

我觉得,对于劳动社会分工的长时期沉默,可能会揭示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沿着这条线索,我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怎样看待农民和自给自足农业者”这一问题。这里的模式跟前面所说的也一致。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由市场力量决定劳动社会分工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发现,传统的乡村生产者有特别可恶的韧性。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干预这些人为满足自己需要进行生产的能力,而不强调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这些小生产者的命运。这些政策上的考虑,导致了对劳动社会分工的大胆人为操纵。

就效率来看,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政策是正当的。如果效率对他们来说很重要,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不可能会忽略《狩猎法》(*Game Laws*),那些法律允许贵族为追捕狐狸而践踏农夫的田地,却不允许农夫驱逐田地里可能吃掉庄稼的野兽。我们在第三章中将会看到,这些《狩猎法》破坏掉了农业总产出的极大一部分。

第三章描绘了《狩猎法》不同寻常的历史。虽然《狩猎法》起源于封建主义,它们的应用范围和残忍程度,在工业革命时期达到了顶点。它们是将乡村人口同主要生存资料分离开来的一种有效手段,为人们被迫接受雇佣劳动又增添了相当的砝码。它们也激起了许多乡村的穷人起来反抗。

第四章从自给自足的角度,讨论了原始积累和劳动社会分工的关系。

第五章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隐含的前马克思主义(*Proto-Marxian*)关于原始积累的理论。此外还讨论了以损害独立小生产

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劳动社会分工的具体措施。这一章还讨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怎样应用原始积累的计算方法。它详细分析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乡村人口的关系,关注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分工而作的努力。它证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认为,原始积累过程很重要。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秘史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劳动社会分工作为原始积累的一个方面,都没有被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注意到呢?在讨论有关纯经济理论问题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确通常对原始积累问题保持沉默——尽管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因为他们的理论的新颖性,这些学者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特别是,我发现,那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日记、信件,以及针对时事而发的一些应用写作中,非常公开、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存劳动社会分工的不满。这个发现导致我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待古典政治经济的历史。

在不经意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直觉促使他们公开发表了重要的远见卓识——这些见识,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也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因此,即使在理论色彩更浓厚的著作中,他们也让劳动社会分工这一观点不时地浮出水面。当他们认识到,市场看起来并不能紧密地把乡村人口结合起来,以迎合他们的需要,或更确切地说,人们拒绝接受雇佣劳动,这一典型问题就突然出现了。绝大多数这类讨论,都涉及我们现在所谓的原始积累问题。

这些“不慎之处”都是有悖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理论的,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文献的价值。的确,如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有意地努力面对并为正在出

现的资本主义力量辩护,那么它就远远不会引起当代人那么大的兴趣。

心理学家可能从病人的一句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话,发现至关重要的启示。同样,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时向我们揭示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自觉意识中是并不受欢迎的。这些认识会强化我们从他们的日记、信件以及应用写作中得出的结论。

《资本主义的诞生》在四个大的方面是有新意的。首先,它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什么决定劳动的社会分工;古典政治经济学怎样看待将社会分割成独立的工厂、行业。其次,它还发展了原始积累的理论内涵。再次,本书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阐述,证明这一学派是支持原始积累过程的。最后,它分析了原始积累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地位。把所有这些线索串起来,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在促进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扮演了什么角色。

关于解读古典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家有时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做指引方向的北极星,偶尔还能引导我们跨入未来。这种视角是不够诚恳的。通过学习古典政治经济学,我们的确能学到非常珍贵的经验,但经济学家很少带着面向未来或回顾过去的目的来阅读这些文献。

貌似开明的对过去的回顾,常常只不过是一种用来证明现在业已存在的看法是正当的手段。一些读者很高兴能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发现对当前技术改良的预期,例如关于“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另外一些人,用古典理论给他们的同时代人罩上了一层不受

欢迎的色彩。例如,凯恩斯就把重商主义的功利性,同皮古教授^①高高在上的高雅相对照。另外还有一些读者发现,古典理论对动态、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强调,很有吸引力。

在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原则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表现得好像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被所有人接受的统一理论。从空间上讲,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整体,而是在大约 100 多年的时间里写就的各类文献的总和。如果说这种“一致性”确实出现过的话,那它一定只出现在旁观者的眼里。很多读者都承认这些文献的多样性,但他们筛选出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作为明星。总体说来,他们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描绘成围绕着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某一点旋转的学说。有些人认为这个中心点可能离斯密近一点,有些说离李嘉图近一点。但不管中心是什么,关于什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人们的态度还是一致的。

实际上,在选择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明星时,我们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穆什·阿德勒曾经描述过明星是如何产生的,即使这些明星在才智上跟小牌人物并没有太大区别:

当消费需要知识的时候,明星现象就会存在……以听音乐为例,欣赏水平随知识水平而提高。但是人们是怎样了解音乐的呢?通过听音乐,通过跟懂音乐的其他人讨论。如果(我们)赏识的艺术家跟别人赏识的一样,我们的心里就会好受……明星现象是在知识上进行节约的一种市场手段。

在研究技术的筛选过程时,经济学家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在一项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件,能够决定人们在几种科技发展道路中如何进行选择。一旦一种行业被锁定在某

^① 皮古(Pigou):20 世纪英国最卓越的经济学家之一,以研究福利经济学著称。

个特定的技术标准内,它可能沿那条路线继续发展,虽然事后证实那些被忽略的道路可能更加出色。

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在才智方面有巨大差别,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类似的“造星过程”也在起作用。一旦一本书的地位首先被提升,学者们就不得不对它给予更深入的关注。围绕这本几乎被当做圣书的书籍,一项传统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这些经典著作的读者,被带入到一种多元对话之中,对话各方包括被研究的作者、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些著作的早期读者的集体经验。从这一意义上说,“一位作者的真实生活,是从他的读者、门徒、评论家、对手、批评家那里展现出来的。作者没有别的存在方式”。

通过一次次研究这些文本,历代读者都会发现新的意义层面。其中一些意义,也许连创立它们的那些政治经济学家都不曾想到。结果是,这些著作具备了一种累积的力量——虽然象征意义很强——要求后人再次面对它们。这一过程又强化了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地位,因而确认了他们的“明星”地位。而且,这种坚固的学问结构的建立,提供了这一领域的认知图,使分析变得容易,也允许将来的研究者以更大的信心来进行研究。

我们将会看到,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直到它出版后一代的时间,才成为一本特别有影响力的书。一旦领导潮流的人发现这本书对于推进他们所期望的政治结果很有帮助,它的人气就急剧上升。只有在那时,斯密才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泰斗,他的著作则成为评价他人的一个参照系。由于这一有缺陷的筛选程序,当时的大部分历史研究,都不遗余力地分析斯密和李嘉图,以及其他几个被认为是稍次点的人物。而其他一些同样该受重视的经济学家,则总的说来被完全忽视了。

本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阅读视角(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宇宙论)来重新描绘古典政治经济学。本书的中心点,更靠近詹姆斯·史都

华爵士^①和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②，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图。从这一角度出发，亚当·斯密看起来就更像是月亮，而不是太阳，他成了一个次要天体，主要靠反射其他光源发光。

这一与众不同的宇宙论并不是对明星的随机重组。它突出了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经验。在这一背景下，斯密就显得不那么具有独创性了。看起来，他的重要性来自他大力宣扬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阻碍能给这一意识形态罩上怀疑阴影的所有信息。其他人，比如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和约翰·雷^③，则能更实际地看待原始积累的本质。但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却把他们束之高阁，以便造成这样的印象——让人们觉得政治经济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人道主义的传统。

从经济思想史的文献来判断，这种历史观显然取得了极大成功。《资本主义的诞生》代表了一种想要纠正以往错误的要求。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很多样，它确实把当时的各种经验，都压缩成了一套能反映生产关系历史的紧凑文献。因而，学习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学习生产关系史提供了一个有利视角。

本书第六章分析了原始积累在早期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爵士、理查德·坎特龙^④和重农主义者——著作中的地位。

第七章则集中于史都华的著作。到目前为止，这是马克思以前对原始积累和劳动社会分工最有趣、最深刻的理论著作。史都华除了比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清楚地观察到原始积累的应用，还独一无二地对这一题目进行了坦诚、诚实的写作。这一特点

① 詹姆斯·史都华爵士(Sir James Stewart):即德纳姆(Denham),苏格兰经济学家。

② 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英国殖民者,经济学家。

③ 约翰·雷(John Rae):苏格兰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

④ 坎特龙(Richard Cantillon):18世纪爱尔兰经济学家和金融家。

能够解释为什么他的名气不太大。

接下来的第八章到第十章则专门讨论斯密。他尝试着建立能取代史都华的理论。根据斯密的理论,劳动社会分工无需求助于外界干预,就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发展。第八章说明了这样一点:即使是斯密最值得赞扬的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讨论,也是为了回避原始积累给他的体系提出的挑战。通过显示劳动社会分工可以不求助于外界干预而进行,斯密本希望将原始积累的问题置之不理。虽然斯密的理论貌似如此,实践却与此大相径庭。实际上,斯密自己也宣扬跟他的理论不符的做法。这一章也指出,同经济发展问题相比,斯密对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更感兴趣。

第九章审视了斯密怎样尝试去歪曲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来证实自己的理论,即劳动社会分工的自然进化论。

第十章继续讨论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理论的大部分是建立在殖民地经验的基础上的。虽然他充分利用了殖民地的经验,殖民地居民却并不像英国人那样敬仰他。其原因不难理解。斯密将殖民地的故事(story)拴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之车上,并没有正确对待殖民地的确切境况。通过探索他对殖民地的分析,这一章深入研究了斯密是如何有意模糊劳动社会分工的性质的。

第十一章把斯密与他的朋友本杰明·富兰克林进行比较,继续讨论斯密的理论和实践。富兰克林这位亲切的美国人是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但他务实的分析,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理论。在斯密的殖民地发展理论中,富兰克林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

第十二章进入了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时代,继续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原始积累的关系。按照跟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阅读他们以及当时人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阐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方法。这一章揭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尽管在理论上坚持自由放任学说,对深化原始积累的政策却保持着极大兴趣。

第十三章探讨了对斯密的反对意见。该章开头说的是罗伯

特·古尔利(Robert Courlay)不太出名的著作,以及他的思想在实用派的韦克菲尔德那里得到的发展。韦克菲尔德是一位系统的殖民者,他强调,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组织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章以约翰·雷的分析做结尾。

第十四章讨论了斯密与后来的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之间的共同之处。

暗 影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动荡时期的产物,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为标志。这一时期真正重大的变化,看来并没有在当时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得以体现。确实,对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巨大矛盾、资本与早期乡村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巨大冲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兴趣不大。然而,这些问题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却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中,偶尔才能看到关于原始积累的讨论。大部分时候,我们只能通过间接方法知道那些巨大冲突。我们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策略,类似于孩子们学习观察日食:把一张纸放在另一张纸之上,在上面那张纸上钻个小孔。出现在底下那张纸上的暗影,就是日食的阴影(但有了一定的折射)。总体说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成功地模糊了原始积累的作用,所以必须进行间接研究。然而,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当我们转向他们的信件、日记,还有政策导向的著作时,原始积累的重要性就变得更加明确了。

我们可以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日食的类比再推进一步。两者都代表了罕见的、引人入胜的事件。过去的人迷信地将日食理解为即将来临的划时代变化的先兆。同样,政治经济学的泰斗们被

认为能够站在同时代人的肩膀上预见未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理论预见即将来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两种现象，一种是万里之外的天体位置变化，一种是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以前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两种现象都反映了迄今仍塑造着我们生活的重要力量。具体来说，反对自给自足的斗争，并非只局限于遥远的过去，直到今天这种斗争仍然延续。结果是，我们大体可以用观察日食的方式，来观察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衰落。两者只有一个重要差别：在日食的例子中，强烈的阳光能破坏我们的视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例子中，光源则想模糊我们的视线。

修正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们的古典主义先行者可能聪明过人，但他们也是人，也容易犯错误。他们当然不是不偏不倚的观察者。他们的理论目的，在于发展他们自己的利益或他们所认同的集团的利益。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认识到这种影响，他们的著作都染上了这些利益的色彩。

就原始积累问题来说，这些作家似乎尽可能地有意掩饰，唯恐破坏了他们宣称的自己理论的普遍性。有关乡村居民自给自足的争论，只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投下了淡淡阴影——一种对被原始积累破坏掉的早已被遗忘的生活方式的怀念。结果是，原始积累这一过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读者忽略了。

虽然我们发现自己只能研究这一“阴影”，这一尝试仍值得我们去努力。的确，我们将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遵循一贯的方式，几乎总是支持能够将小农业生产者束缚到资本主义利益上去的立场。

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条件支持自由放任理论。本书反对这种普遍看法,因此可能显得有争议。对那位几乎受到普遍敬仰的斯密的相对重要性,本书表示质疑,并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斯密等古典主义作家试图推进原始积累过程。这种重新阅读认为,同人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标准解读相比,真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走的是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进入本书的正题之前,有关日食的比喻,我还想加几句告诫。在研究古典主义学家投下的阴影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这些影像跟我们的研究对象相比,维度更少。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忽视的维度之一,就是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社会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有舒适的社会地位,高高在上,因此在他们的写作中,仅仅将工人阶级的组织视为缺乏秩序。由于他们的这种不敏感,像本书这样的作品必然是不平衡的:对于资本是如何控制劳动力这一问题,本书给予了更多关注,而对于其反面则关注甚少。评价各派力量的真正平衡,这个任务就交给读者了。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表达以下三点。第一,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第二,原始积累不能被归结到前资本主义的过去,或者封建社会突然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假想时刻。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第三,原始积累的逻辑,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表面宣扬的自由放任原则,形成了直接对照。尽管如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却致力于推动原始积累,目的在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我承认,资本主义的种子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之前就种下了。但在那之前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资本积累都没有达到如此猛烈的程度。我希望《资本主义的诞生》一书,能多少揭示一下这一起源的实质。

目 录

绪论:暗影.....	(1)
第一章 原始积累的持久重要性	(1)
强制与工人阶级的诞生	(1)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向懒惰开战	(4)
原始积累和废除节假日	(6)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理想的工作日	(7)
边沁和自由放任的独裁主义	(9)
胜利	(12)
第二章 原始积累理论	(15)
分析序言	(15)
原始积累的历史基础	(16)
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同时存在	(19)
资本积累:《资本论》中的重要部分.....	(20)
原始积累的理论背景	(23)
确认原始积累的范围	(25)
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原始积累	(27)
第三章 原始积累和《狩猎法》	(30)
《狩猎法》的封建起源	(30)

苏格兰实验室	(32)
资产阶级《狩猎法》的压迫性	(36)
《狩猎法》和资产阶级霸权	(38)
《狩猎法》的毁灭性本质	(40)
亚当·斯密和《狩猎法》	(43)
《狩猎法》的消亡	(45)
资产阶级对《狩猎法》的认可	(46)
《狩猎法》的讽刺性	(48)
《狩猎法》和资产阶级对自然的幻想	(50)
第四章 社会劳动分工和家庭生产	(54)
商品生产和社会劳动分工	(54)
商品形式与社会劳动分工	(55)
社会劳动分工的有意建构	(57)
社会劳动分工的战略意义	(59)
社会关系与社会劳动分工	(62)
生产与社会劳动分工	(66)
强制、原始积累与两种劳动分工	(67)
生产的行为者——家庭	(69)
家庭的转变	(70)
创造新制度	(72)
家庭经济的节约问题	(74)
作为消费场所的家庭	(76)
家庭生产理论的演变	(78)
家庭与社会劳动分工的变化	(79)
原始积累与社会劳动过程简图	(81)
简单模型	(82)
模型与工作日	(84)

使模型复杂化的因素	(86)
模型的基本价值	(87)
古典主义: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	(88)
第五章 详细阐述原始积累的模式	(91)
原始积累的必要性	(91)
菜园生产和传统产业的效能	(93)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产业	(96)
创造不足	(97)
对原始积累经济学的偶然认可	(100)
市场的无声强制	(101)
自给自足作为资本的补充	(104)
对原始积累模型的微调	(107)
约书亚·塔克与上述模型的社会学	(110)
詹姆斯·安德森的另一种分析	(113)
小商品生产的保守影响	(115)
传统部门和对资本的地理扩张的抵制	(118)
重新夺回劳动时间	(120)
将上述计算加以扩展	(122)
关于政治经济学和贫困的最后结论	(123)
第六章 政治经济学的开端	(127)
一个伟大的开端	(127)
序幕:威廉·配第爵士	(128)
配第的构想	(130)
配第和社会劳动分工	(132)
理查德·坎特龙	(133)
法国经济	(135)

重农学派的经济观点	(137)
对劳动力的态度	(138)
净产品和毛产品	(139)
对重农学派的接受	(141)
第七章 詹姆斯·史都华描述的原始积累秘史	(144)
苏格兰封建社会的崩溃	(144)
苏格兰的原始积累	(147)
史都华笔下的苏格兰	(149)
智慧的根源	(151)
史都华要求土地改革	(152)
史都华对抗传统生产者	(154)
史都华为原始积累辩护	(155)
市场的奴役作用	(156)
史都华与组织经济发展	(158)
史都华对社会劳动分工的构想	(160)
史都华和家庭生产的辩证法	(162)
对史都华的冷漠	(164)
休谟和史都华的共同点	(168)
避开史都华	(171)
史都华与斯密	(173)
史都华和阿瑟·扬	(175)
知识界的原始积累	(178)
第八章 亚当·斯密聪明地掩盖了阶级问题	(180)
斯密——超凡脱俗的教授	(180)
斯密的方案	(183)
斯密经济学中晚了一步的“发现”	(185)

斯密的吸引力	(187)
斯密和史都华	(189)
阶级社会学和依附式的社会关系	(191)
斯密和贵族	(192)
依附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195)
斯密对自给自足农场主的敌意	(197)
依附性和城市的堕落	(198)
斯密著作中的社会关系和军事问题	(200)
斯密的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	(201)
斯密反对工人的传统观念	(204)
斯密惧怕工人阶级消灭一切差别	(205)
斯密和工人阶级的依附性	(206)
斯密对政府和商业的敌意	(208)
第九章 亚当·斯密教授对历史的篡改	(211)
斯密的意识形态背景	(211)
斯密认为的资产阶级典型角色	(213)
斯密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	(214)
斯密夭折的乌托邦演变	(216)
温柔的商业	(217)
斯密和小资产阶级的奇特英雄主义	(219)
斯密的被压迫感	(223)
斯密和民粹主义	(225)
斯密关于“和谐”的社会心理学理论	(227)
斯密的人类学观点:自我改进	(231)
斯密自相矛盾的阶级人类学	(232)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233)
虚荣心的政治经济学	(234)

劳动力的社会分工演化得有多快	(236)
劳动力分工的自然进化	(239)
“资料”和劳动的社会分工	(241)
资本的起源	(243)
社会劳动分工的两个原则	(245)
资本和向雇佣劳动的转变	(246)
评价斯密	(247)
第十章 亚当·斯密与殖民地的意识形态作用	(250)
斯密的北美实验室	(250)
斯密的殖民地发展理论	(251)
斯密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253)
关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学	(256)
斯密的重商主义	(259)
斯密的和谐经济发展理论	(260)
斯密学说的反响	(263)
政治领导人对斯密经济学的解读	(26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斯密	(266)
实践对斯密理论的否定	(268)
斯密和殖民地的奴隶制	(270)
斯密对奴隶制政治经济的歪曲	(272)
斯密理论的失势	(275)
斯密:要点回顾	(276)
第十一章 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斯密的奴隶制与雇佣劳动思想	(278)
富兰克林与北美	(278)
富兰克林的机会主义	(279)

斯密关于殖民地知识的来源	(281)
富兰克林对《国富论》的贡献	(283)
斯密和殖民地关系的思想	(285)
英国在北美之外的殖民统治	(287)
富兰克林与对殖民地工业前景的悲观展望	(289)
富兰克林、斯密和奴隶制	(291)
富兰克林对殖民地雇佣工人的看法	(294)
富兰克林的高工资经济观点	(296)
富兰克林的思想广为流传	(297)
快乐的中庸之道	(298)
商业化	(301)
富兰克林关于雇佣劳动的比较社会学	(303)
富兰克林与斯密	(306)

第十二章 古典学者作为武装警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	(309)
史都华和欧文的苏格兰	(309)
欧文的人道经济模型	(312)
关于土地改革的一段题外话	(314)
大卫·李嘉图	(316)
李嘉图论马和机器	(318)
马匹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子	(320)
李嘉图和折旧理论	(321)
李嘉图和机器	(325)
英国的《谷物法》	(327)
《谷物法》和小农场主	(329)
为富人生产的奢侈性农作物	(333)
《谷物法》和劳动力供给	(334)

李嘉图论爱尔兰	(337)
爱尔兰产粮区的原始积累	(340)
李嘉图的胜利	(342)
麦卡洛克和原始积累	(343)
马尔萨斯关于经济政策的观点	(345)
马尔萨斯对爱尔兰的观点	(348)
马尔萨斯的演变	(349)
罗伯特·托伦斯	(351)
拿骚·西尼尔和爱尔兰的原始积累	(352)
第十三章 反击	(358)
罗伯特·古尔利	(358)
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	(361)
韦克菲尔德的殖民地	(363)
美洲的教训	(365)
韦克菲尔德从美洲学到的教训	(366)
韦克菲尔德与自然的奴隶制	(368)
韦克菲尔德、澳大利亚和《狩猎法》	(369)
韦克菲尔德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内部被如何接受	(371)
现代经济学是如何接受韦克菲尔德的	(373)
韦克菲尔德与原始积累	(374)
韦克菲尔德与英国经济	(377)
约翰·雷：预备知识	(379)
关于雷的生平	(380)
资本的耐久性	(381)
雷论劳动分工	(383)
资本的效率与耐久性	(384)
雷的原始积累种族理论	(386)

雷与原始积累的道德价值	(388)
结论	(392)
第十四章 关于发展	(393)
列宁与革命性的斯密主义的形成	(393)
列宁和民粹派	(397)
再论列宁与斯密	(399)
列宁对小生产的重新解释	(401)
列宁论农村的分化过程	(403)
原始积累或资本积累	(405)
列宁部分地摈弃了斯密的论调	(407)
斯大林与毛泽东	(408)
阿瑟·刘易斯	(409)
结论	(412)
参考文献	(414)

第一章

原始积累的持久重要性

公共土地和牧场,在社区中维持了一种向上的合作精神。圈地运动扼杀了这种合作精神。在第一流的地区(引文原文如此),人们不得不友善地一起劳作,对庄稼的轮作、共有草场的放牧权的分配、牧草和草地的维护和改良、沟渠的疏通、用篱笆防护土地等问题,都要达成一致。在田地里他们并肩劳作。他们每天早、中、晚都一块儿从地头走向村庄,或从农场走向荒野。他们都依赖于共有的资源,以取得燃料、寝具以及牲畜的草料,那么多生活必需品都归拢在一起。他们从小就被训练,服从社区的条例和习俗。圈地运动以后,当每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一块地围起篱笆,并警告他的邻居离开,与邻居公平分享东西的原则就松懈下来,同时每个家庭都变成了一个孤岛。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次巨大革命,比圈地运动后所有的经济变化都更巨大。然而,在这个由圈地运动和变化了的农夫所传下来的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衡量出我们失掉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完全意义。

——乔安·瑟斯克《圈地和独占》(*Enclosing and Engrossing*)

强制与工人阶级的诞生

将人们同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分离开来的残暴过程,也就是所说的原始积累,给平民造成了巨大的艰辛。而这一原始积

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乔安·瑟斯克是早期英国农业问题上最博学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上面的引文中,他揭示了圈地运动带来的一些最残酷的社会变化和个人变化。

一些人反对这种剥夺。马克思赞同他们的观点,他抨击说:“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在最声名狼藉、最肮脏、最卑鄙、最可憎的欲望支配下,伴随着最无情的野蛮手段进行的。”

从形式上来说,这种剥夺是完全合法的。毕竟,从狭义上讲,农民并没有产权,他们只有传统意义上的权利。当市场发展了,首先是觊觎土地的贵族,然后是资产阶级,利用这种情况,创立了废除这些传统权利的法律框架。

简单地剥夺平民的土地是必需的,但这并不总能将农村人口束缚到劳动力市场上。即使在圈地运动之后,农民仍然保持着在“灌木丛、树林、下层灌木、采石场、采沙场的特权。他们从那里为做饭获得燃料,为人畜生存获得木材,从灌木篱墙处收获野苹果和榛子,从任何一小块荒地得到艾菊等野生草药……在他们地块上的无论如何微不足道的一点生物,都能够被节俭的农民劳动者或他的妻子有效利用起来”。

虽然失去了公共土地,但传统经济仍能保持完整无缺。如果这样的话,令资本满意的一个劳动力供给就不会来临。结果是,实际工资水平可能会更高,因而阻碍了积累的过程。不足为奇的是,这些传统权利也一个接一个消失了。在资产阶级的眼中,“财产变成了绝对财产:所有小农阶级所获得或保留的‘权利’……现在都被否决了”。

原始积累像剪刀一样,刺穿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第一刃削弱了人们自给自足的能力。第二刃则为了防止人们在雇佣劳动体系之外找到另一种生存策略,而制定了一系列苛刻措施。

即使在资本主义成为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之前,伴随着剥夺农民的权利,就出现了一系列常常很残酷的法律,目的是压制人们

对雇佣劳动需求的任何反抗。

例如,从都铎王朝开始,英国就颁布了防止农民流浪、仰仗福利系统的一系列严酷措施。根据 1572 年的一条法令,超过 14 岁的乞丐将会被严厉地杖责,并在左耳上用红热的熨斗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佣他们两年。超过 18 岁的惯犯将会被处决,除非有人愿意雇佣他们。而第三次触犯法律,则理所当然意味着被处决。16 世纪早期,类似的法令几乎同时出现在英国、一些低地国家以及苏黎世。最后,工人大部分无路可走,别无选择,只能为赚取仅能糊口的工资而工作。

紧接原始积累之后,雇佣关系看起来成了一种自愿的事情。工人需要职业,雇主需要工人。在现实中,内在的过程当然根本就不是自愿的。正像福柯所说的那样:

从历史角度来说,在 18 世纪期间,资产阶级变成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是掩藏在一个表达明确、形式上人人平等的法制框架之下的,议会以及代议制政体使这种法律框架成为可能。但是,强制机制的发展和扩大,却是这一过程的另一面,一个黑暗面。这一过程受到这些小的、日常的、物质的机制的支持,受到那些本质上不平等的所有微观力量体系的支持。

确实,招募劳动力的历史,是一篇连续的强制史。通过贫困的残酷力量,或者更加直接的法规力量,使人们不可能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当然,将平民从他们传统的、相对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抽离出去,使很多人保持在温饱线上,或稍微高一点。但对很多人来讲,市场是一种后退。市场中令人迷失方向的个人主义行为,切断了人们同传统关系网的联系,并使人产生一种非人的感觉。资本家需要纪律,并以此为借口产生了穷人必须忍受的很多苛刻措施。

确实,各种派别的作者都共同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制造一个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这些措施的支持者总是呼吁说,有必要对工人进行教化、驱除懒惰和游手好闲,以此来捍卫他们的立场。但是,资本需要这些措施来征服家庭经济,从而榨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实际上,几乎每一位贴近过原始积累过程的人,不论是劳工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同意查尔斯·豪的结论,“如果不是因为贫穷,他们不会屈从于雇佣”,至少不愿意接受低报酬的雇佣(这种雇佣能够产生巨大的利润)。

雇主很快就意识到,贫困与赚大钱的机会密切相关。例如,安布罗斯·克罗里(Ambrose Crowley)在北部而不是在中部建立了他的工厂,因为“那一地区非常贫穷,人口多,因而工人数量一定在上升”。这一过程是累积的。贫困的加剧招致了更多人口,反过来,又导致了进一步的贫困,等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注意到,英国农业区的工资水平根据特定条件而变化,农民就是从这些条件下从农奴脱胎而来的。农奴越贫困,他们后代的工资就越低。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向懒惰开战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加入了谴责懒惰的穷人和游手好闲者的行列。虽然他们为富人的消遣欢呼,对没有付出“最大工作努力”的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的一切行为,他们却都公开指责。

比如,让我们想一想弗朗西斯·哈奇森^①。他的学生亚当·斯密后来写给阿齐巴德·大卫森博士的一封信中,说他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哈奇森博士”。就是这位弗朗西斯·哈奇森,他的《道德哲学简介》(1742)(*Short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 in Three*

^① 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8世纪哲学家,伦理学家。

Books),似乎已经是斯密的格拉斯哥演讲的经济部分的雏形了。哈奇森后来的一部《道德哲学体系》(*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体现了他在高尚的道德哲学领域的贡献。关于提高价格的必要性简单说了几句后,哈奇森这样说道:“如果一个人没有养成勤劳的习惯,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就会怂恿懒惰。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对所有必需品的需求……懒惰至少应该用短期的奴役状态来进行惩罚。”这段引文中险恶的“至少”二字暗示,这位“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教授在脑海中,可能还有比短期奴役更严酷的方法。如果事实证明,短期奴役不足以将人驱赶到车间去工作,那么这位好博士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推荐给他道德哲学方面的热心学生呢?

当然,就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这种态度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能会问,有哪个国家的富人觉得穷人很勤劳的?举例来说,反对“懒惰和游手好闲”的普遍呼声,即使远在19世纪的日本也能听得见。但是看起来,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向懒惰开战。这一时期的作家抨击说,缺乏纪律是造成犯罪、疾病的原因。在18世纪晚期,即使是医院都被当做灌输纪律的恰当媒介。

托马斯·穆恩^①几乎充满诗意地批评了“我们在吸烟、喝茶、宴会和空虚、享乐中打发时光的普遍腐化行为”。约书亚·塔克采用了一个军事比喻,来表达与此类似的观点:

总而言之,防止一个竞争民族获得你的贸易的唯一可能措施是,不要让你的人民比对手更闲散和堕落……因而,在这方面能获得成功的唯一战争,就是对闲散和堕落开战。这场战争中用的不是军舰和武器,而一定要用巧妙的税收和明智的条例,以便将私人的自爱导入公共利益的渠道。

^① 穆恩(Thomas Mun):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

原始积累和废除节假日

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北欧居民,虽然生活标准可能不会过于奢侈,但像大多数传统居民一样,他们从空闲时光中得到了极大享受。平民保留了数不清的宗教节日,来打断工作的节奏。乔安·瑟斯克估计,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1/3的工作日(包括星期天)是在闲散中度过的。卡尔·考茨基提供了一个更加夸张的评估:在中世纪的下巴伐利亚地区,每年要庆祝204个节日。

尽管有这么多个假日,农民们仍生产出巨大的剩余价值。例如,在英国的封建社会,尽管强大的贵族能掠夺50%的产出,农民仍然活得下去。当市场发展了,对农民劳动的要求也增加了。例如,在法国南部,地租似乎从1540年占产出的1/4,涨到了1665年占产出的一半。

人们为满足非生产者日益增长的需要,不得不日益缩减闲暇时间。但是,很多观察家仍然对这种无节制的庆祝节日大加抨击。新教的牧师在这方面格外卖力。直到19世纪30年代,我们还能听到这样的抱怨:如果刨除所有假日,爱尔兰的每一个工作年就只有200天了。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时间就是金钱。正像亨利·普莱斯克芬爵士所计算的那样:“因为即使只有200万人口,每人每天制造出6便士的价值,那么,如果仔细算的话,每保留一个节日,国家都要损失50万英镑。”

热衷于抑制宗教节日,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的代表不看重工人阶级的宗教虔诚。在19世纪英国乡下的某些地方,在安息日去照料某人的花园,被看做是要受到惩罚的罪过。为了这一过错,很多工人还被关了起来。然而,虔诚是有一定限度的。同一位工人如

果喜欢在安息日去教堂,而不愿在需要他的时候去报到上工,可能就要被指控破坏契约。

在法国,资本取得控制地位的过程较慢,因而对节日的废除也同样比较慢。托比亚斯·斯摩莱特^①这样抱怨法国:“参加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区浪费了几乎一半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本可以用在有利可图的事情上。”伏尔泰呼吁把节日挪到下一个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总之是休息日,这样雇主每年就能多获得大概40多天的工作日。这一提议使幼稚的鲍杜神甫想到,农村已经人口众多、不堪重负,这时候加大劳动强度是不是明智之举呢?被剥夺了财产的人,怎样才能被雇佣呢?

当然,欧洲宗教做法的变化,不是由人员缺少引起的,而是因为人们愿意适应资本的需要。例如,那些以自己的理性为荣的法国大革命领导人,颁布每周10天,其中只有一天休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热情高涨地加入到反对庆祝过多节日的行列。对宗教节日的限制,只不过是巨大的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很小一部分。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理想的工作日

一旦资本开始驱逐社会中的传统做法,资产阶级就寻找每一种可能的机会,来使人们从事能够给雇主带来利润的生产性工作。与之相适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呼吁,在“积累”的逻辑基础上塑造社会,从而加强社会对雇佣劳动的依赖性。

在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乌托邦中,穷人在醒着的每一时刻都在工作。一位作者提议说,贵族的男仆可以早起,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和“复员士兵、贫穷的犯人、寡妇、孤儿、所有穷商人、手工业

^①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8世纪英国小说家。

者、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妻子、孩子和仆人”一起做鱼网。

约瑟夫·汤森提议说,当农夫晚上回家,从扬场和耕地中脱身出来,“他们可以梳理羊毛、纺线、编织”。很多人很担心孩子的时光会被浪费掉。威廉·坦普尔^①呼吁,让4岁孩子加入到劳动力的行列中去。坦普尔还预见到了现代斯金纳心理学^②。他推测道:“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希望这崛起的一代会适应持续的工作,以至于最终认为工作是有趣的、娱乐性的。”约翰·洛克常被看做是一位自由主义哲学家,在这一点上却也不甘人后。他呼吁说,在3岁的“成熟年龄”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还有人呼吁新的制度,来保证雇佣劳动力的稳定、渐增的流动。萨尔顿的弗莱彻(Fletcher of Saltoun)建议,对那些较为温和的措施没有反应的人,永久的奴役是他们最好的命运,从而将他们融入劳动力之中去。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哈奇森也追随这一观点。乔治·贝克莱主教^③是一位永远的理想主义者,倾向于将这种奴役“限制在一定的年限之内”。

所有劳动力资源都不应该被忽视。例如,在福柯称之为“大禁闭”(the great confinement)的一场运动中,建立了一些机构,不加区别地收容病人、罪犯、穷人。这些机构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善被收容人员的状况,而在于逼迫他们对国家的财富做出更大贡献。

这一时期的作家偶尔也观察到了进步的迹象。到1723年,丹尼尔·笛福^④很高兴地发现,在诺维奇^⑤发生了巨大进步,以至于“每个超过四五岁的孩子,都能自己养活自己”。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样有教益的艰苦劳动场景并不很

① 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9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

② 斯金纳(Skinner):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强调奖励和惩罚机制。

③ 贝克莱:爱尔兰哲学家、科学家和主教。

④ 笛福:18世纪英国作家,《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

⑤ 诺维奇(Norwich):英国一城市,在伦敦东北160公里处。

常见。让-巴普蒂斯特·萨依¹⁾一般说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值得赞扬的是,在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他对英国的事态提出了抗议,这样的抗议实在不多:

先生,我不想指出您的国家的一部分图景……但是,如果社会生活(这是萨依所用的几乎类似于“劳动社会分工”的一个术语)像一条苦役奴隶船,人们一天24小时中的16小时都在竭力划船,那也就难怪他们不喜欢社会生活了……我说,依据我们不得不支付的报酬比率,生产的效用低于人们提供的劳动性服务:我指的就是这一点。

遗憾的是,在这方面,别的古典政治学家都不愿意与萨依站在一边。

边沁和自由放任的独裁主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常用个人自由的花言巧语,来表达它的建议,但是它的自由观却远远不是兼容并包的。对于资本来说,自由依赖于平民的努力工作。

罗宾斯是市场社会的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也间接提到了自由主义独裁的一面。他说:“法律框架的必要性和执法的手段,对于自由社会的观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早些时候他还写道:“如果在一个非集体主义的秩序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也只是在一个精心制定的法律和秩序框架下发生作用。”在这一人为的法律和秩序之内,工人们发现,他们组织工会的权利,甚至采取政治行动的权利,都受到了严格限制。整个司法大厦是着眼于为资本拥

1) 萨依(Jean-Baptiste Say):法国经济学家,以其“市场说”最为闻名。

有者带来更大利润的。

马克斯·韦伯曾经注意到,理性计算法(rational accounting method)是和“一种叫做‘商场纪律’的现象、将生产资料据为己有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也这是说,与存在着的一个‘统治系统’联系在一起”(见韦伯的《统治关系》)。同样,政治经济学的理性计算法,也需要一个“统治系统”,虽然是个更大规模的统治系统。韦伯总结道:“不需特别证据就能证明,军事纪律对现代资本主义工厂是最理想的模式。”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可能会看到,边沁(而不是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型代表。边沁对自由放任教条的呼吁,远远超过了斯密。例如,斯密曾认为,政府在控制利率中应该扮演一个角色。边沁用下列的刻薄话来责难他:“为了防止我们互相伤害,给我们的嘴带上笼头简直是太有必要了。”

虽然边沁在自由的名义下从理论上支持自由主义,但他下定决心要让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服从资本积累的利益。边沁对自由主义的热切关注,只局限在那些符合资本主义社会标准的人身上。其他的人,则必然要跟国家力量发生令人不快的对峙。边沁认为:“财产——不是财产制度,而是财产的构成——自身已经成为一个目标。”

边沁非常清楚对这种“财产构成”的需要。他意识到,虽然对劳动力的控制是财富的主要源泉,但劳动力却顽固地拒绝资本主义者的意愿。用边沁独特的语言来说就是这样的:

“人”是最强有力的生产工具,因此每个人为了增加自己的舒适程度,都急于雇佣他们同伴的劳动。人们对权力都有热切渴望,但同样痛恨被人征服。因而每个人的意志都受到顽强抵抗,这自然就导致了对那些阻碍、抵触他们意志的人的反感。

边沁从没承认过,他对自由主义的号召与管理劳动力的建议之间

存在矛盾：对他来说，“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最紧密、亲切的。的确，它们是如此亲切，以至于即使在想像当中要将它们分开，也不是一件易事。它们彼此都是对方的生产工具”。

边沁明白，压制穷人的斗争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希望将这些斗争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东西。或者，从一个小的程度来说，转化成对他所属的阶级中的其他人有利的东西。假定劳动力天生就对为剥削者创造财富怀有敌意，不自由的劳动者对边沁有着明显的吸引力。他为他虚构的圆形监狱设计了详尽的计划。这所监狱对它的囚犯实行最大限度的控制，从而能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利。

1798年，他发表了圆形监狱设计的姊妹篇——《改进了的穷人管理》(*Pauper Management Improved*)。在此，边沁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模型，提议建立国家慈善公司(National Charity Company)，一个部分由国家资助的私有合股公司。它对“所有令人难以负担的穷人，拥有绝对权威”。公司中开始有250个习艺所，能容纳50万人。后来将发展到500个习艺所，能容纳100万人。

边沁计划从公司里的这些习艺人员身上，得到巨大利益，尤其是那些在这一机构中出生的人，因为他们将来不得不在该公司中做学徒。他狂热地描述道：“有那么多习艺所，经受过那么多的考验，以至于这些社会的残渣(穷人)都变成了金钱。”严格的起居制度，毫不松懈的监督和纪律，饮食、服装、住房上的节约，将使利益成为可能。边沁，这位大力提倡商业自由的人，梦想着通过使用劳教人员来增加利润。他是这样说的：

别的制造商对他的工人的控制，怎么能跟我的制造商对工人的控制相比呢？还有哪个雇主能让游手好闲的工人忍饥挨饿，又不让他们跑到别的地方去？还有哪个雇主的工人能从不醉酒，除非他让他们那么做？我的这些工人根本不能靠联合来提高自己的工资，而是雇主根据自己的利益，觉得该给

他们多少,他们就得接受多少。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所有社会状况、所有社会机构,都只应该按照它们对财富生产的作用来评价。在这种思想下,边沁建议,孩子们4岁的时候就应该投身工作,而不是14岁。他夸口道,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浪费“10年的宝贵时光,而这10年中他们无所事事,对工业毫无价值!对道德和智力的提高毫无用处”。

边沁甚至更进了一步,要让人类生存的每一方面都从属于利益的驱使。他甚至想推行“所有革命中最温和的革命”,也就是性的革命。在这一点上,边沁并不是对扩展人类的自由有丝毫关心,而是要确保“国家慈善公司”里的习艺人员有尽可能多的后代。边沁甚至想自称是“穷人的雷古卢斯^①第二”。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他的计划无疾而终。正像他在回忆录中抱怨的那样,“如果不是因为有乔治三世,多年前英国的所有囚犯就会处于我的管理之下了”。

哎,边沁的个人目标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也许他太贪心了,也许他的方法太野蛮了。我们下面将要看到,资本主义发现了束缚劳动力的更微妙的办法。结果是,今天我们记住边沁,是把他作为自由主义理想的一位勇敢拥护者,而不是穷人的“雷古卢斯第二”。

胜 利

一般说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目的,要比边沁来得更腴腆。尽管他们对无所事事、懒惰很反感,但他们用“天赋自由”这样的面纱来掩盖自己。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天赋自

① 雷古卢斯(Regulus):古罗马将军、执政官

由”比表面看来要灵活得多。让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弗朗西斯·哈奇森,是他教给斯密“天赋自由”的好处。他认为:“民法的一个重大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政治支持来强化几项自然法……民众需要被教育,受到法律的约束,学会处理自己事务、执行机械技术的办法。”实际上,哈奇森意识到,一旦原始积累发生了,对于正式奴隶制的需求就会逐渐减少。各式各样的市场外的力量,将失去用处,因为市场本身将确保工人阶级继续处于被掠夺的地位。帕特里克·考克豪恩——伦敦的一位警察局长,这样说道:

贫穷就是社会上的这样一种状态和情况:个人没有多余的劳力,或者换句话说,除了不断从事各种生计活动外,没有别的财产和生存手段。因而,贫困是社会中的一个必需的、不可缺少的因素。缺少了它,国家和社区就不能以一种文明的状态存在。这就是人类的命运,这就是财富的源泉。因为有了贫困,就不会有劳动力的存在,就不会有财富,不会有文雅,不会有舒适,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就不会有利益。

或者,像马克思所说:“在市场上,我们发现了一群拥有土地、机器、原材料和生存资料的买家(其中除了土地外,所有东西都是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一群卖者,他们除了劳动力、劳动的双手和头脑之外,别无可卖。”

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漠视了将劳动力驱赶到市场的强迫行为,愉快地假设说,单是市场就足以保证积累过程的发展,根本就不需要市场外因素的帮助。当时的工人总的说来,理解促进原始积累措施的战略意义。在这一思想下,托马斯·斯彭斯——一位工人阶级的勇敢支持者,宣称:“如果不推翻现存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那么,想不看到对穷人的最大限度的压榨和折磨……是幼稚的。”

然而,这一制度并没有被推翻,相反却更加壮大了。工人不得

不越来越牺牲他们的传统休闲时间。工作日被延长了。代表工人阶级的斯彭斯呼吁道：“我们不是每星期工作6天，而是被迫承担8天或9天的工作量，但还是难以糊口……老板不断叫着：干活，干活，你们太闲散了……上帝保佑我们，我们落入了自古以来最狠心的雇主手中。”这一声明在1803年发表以后，使它的作者受到3年监禁的处罚。对那些敢于向资本主义秩序提出挑战的人，这是个典型的命运。无论何时，当工人阶级和他们的盟友向资本主义提出有效控诉时，资本的无声强制，就变成了强迫工人“不要出声”。

强迫斯彭斯闭嘴，并不是完全有效。虽然一些人把他写成是“激进的怪人”，就这样把他打发了。但最近的研究证明，斯彭斯应该受到更多的尊敬。斯宾塞的传记作者声称，欧文主义和后来的英国社会主义，都直接来自斯彭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时的新闻记者也同意这一评价。不幸的是，这一世界上的斯彭斯们，却无力扭转或阻止原始积累的过程。

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在原始积累方面走得那么远。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方面今天几乎都被忘记了。相隔两个世纪后，当代的经济学家像弥尔顿·弗里德曼在宣扬处置个人财产的自由时，忽略了资本主义黑暗的一面，忽视了资本主义所必需的从属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在解释所谓的自由市场的发展时，犯了不小的错误。

第二章 原始积累理论

分析序言

虽然原始积累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但关于这一概念的研究,从始至终都不甚明晰。表面看来,“原始积累”这一说法是马克思提出的,实际上它出自亚当·斯密的一句断言,“资本的积累必然出现于劳动分工之前”。

斯密关于原始积累的解释,至少可以说很古怪。无疑,在整个历史上时时都有劳动分工。甚至昆虫社会中也存在分工。然而斯密却要我们相信,分工的出现需等到“资本积累”发生的时候。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怎能将蚁堆和蜂窝中的分工,解释成资本积累的结果?

马克思把斯密的“预先的”(previous)一词译成“原始的”(ursprünglich),而马克思著作的英语译者又将这个词译回“primitive”(原始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摒弃了斯密有关原始积累的不切实际的概念。他叱责斯密试图以一个想像的过去,来解释现存的阶级,而那个想像中的过去是我们无法考证和质疑的。马克思坚持认为:“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几乎等同于原罪在神学中的地位。”马克思的类比是恰当的。不论是原罪还是原始积累,都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现实世界转向一个假想中的过去,这样就在想像里解释了人们今天所承受的苦难。

换一种说法,任何构建于原罪或原始积累基础上的理论,都是既“过分历史”又“历史性不足”的。说它“过分历史”,是因为这一理论将主题置于一个遥远的过去,与现实社会相脱离。说它“历史性不足”,是因为它所依赖的那个过去是假想出来的。艾迭纳·巴里巴尔的表述,即“非历史的历史决定论,或者说马克思思想中没有历史的历史真实性”,是对马克思这部分著作恰如其分的描述。

为了强调他与斯密的距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部分的标题前加上了一个贬抑的形容词——“所谓的”,而这一部分即是他关于原始积累的研究。本质上来说,马克思抛弃了斯密假想的“预先”积累。马克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实际的历史经验上来。与“所谓的”原始积累形成对比,马克思详尽分析了实际历史经验中发生的暴行,并试图暴露资本主义体系的起源,即使人们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

原始积累的历史基础

斯密对预先积累极少提起,而马克思则对这一问题详加验证,两人对待原始积累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调查,引领我们走过一个长达几世纪的过程,其间一小群人野蛮地剥夺了全世界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的生产资料: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美洲大陆土著居民的被灭绝、被奴役、被埋葬于矿井,对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以及把非洲变成猎获黑人奴隶的商业保留地——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即所谓的田园诗式的原始积累过程,

马克思没有把他关于原始积累的解释,局限在世界上一个个孤立的地方。原始积累的成果是可以互换的。举例来说,他坚持认为:“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在英国资本化了的工厂儿童的血液。”

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经济发展是通过参与者的自愿行为实现的。与之相反,马克思坚信“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是血淋淋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由于受这些古怪、恐怖的法律折磨”,工人们“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斯密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出任何有关社会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却写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所谓的原始积累之间关系的详尽研究。

在其后数年间,马克思一直无法忍受那些未能采用具体历史分析手段对待原始积累的理论。例如,他曾严厉批评尼古拉·米克海罗夫斯基对原始积累的超历史描述。米克海罗夫斯基在自己的描述中,根据马克思关于欧洲原始积累经验的分析,机械地推断出俄国的未来。

如果承认原始积累是一段历史进程,而非一个假想的事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这一进程,或至少马克思关于它的大部分解释,到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之后似乎就戛然而止了呢?马克思本人没有给出 19 世纪殖民地之外其他地方发生的原始积累的例子。

在写给俄国一个编委会的信中,马克思似乎站在了斯密的立场上。他通过把原始积累置于遥远的过去,来弱化它的重要性。马克思甚至把他《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一章贬斥为“这一历史素描”,并坚持说这一章“只是追溯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途径,即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封建经济制度内部。因而,它描述了通过分离工人和他们的生产资料,把他们变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进程”。我们在读这封信时,必须考虑到它所包含的政治涵义。米克海罗夫斯基试图用《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一章,预测俄国的未

来将由资本主义“不可动摇的法则”决定,这一做法使马克思感到不安。马克思非常肯定地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的本质可能不会改变,但俄国和西欧的具体情况会很不相同。因此,马克思想要向米克海罗夫斯基指出,后者以为人们可以根据西欧的经验,机械地“预言”俄国的将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马克思有时的理论立场,似乎确实把原始积累的重要性局限于过去的历史。鲁西奥·克来提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挑出以下长长的一段:

那些造成生产中(资本的)出发点的条件——为了设想自己就是资本,资本家必须给流通带来价值,这些价值是资本家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或者以其他方式,除去业已存在的先前的雇佣工人的方式——这是资本的远古条件,属于它的历史前提。正因它是历史前提,所以这一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而它一点也不属于它(资本)的当代史,而属于它的形成史。也就是说,不属于由它控制的生产方式的真实体系。这就好像进城潮的迸发是城市化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但它不存在于发达城市,也不是现实中发达城市出现的条件。进城潮是属于发达城市过去的前提,是在发达城市形成前就已经停止了的。资本出现的条件和前提,表示它仍是并只是处于形成阶段。所以,当真正的资本出现时,这些条件就消失了。在其本身的现实基础上,资本设定了自己的实现条件。

在《资本论》里,相同的想法出现于类似的措辞中,只是丢弃了一些更为华丽的黑格尔式术语。简单看来,马克思似乎一直在暗示,工人和生产资料的最初分离是资本主义建立的一个必需的历史事件。简而言之,原始积累是被恩格斯称做“大量手工劳动工人和极少数指挥劳动的特权人之间的大分工”,但它与进行中的资本主义

无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基本上是把原始积累活动,局限在传统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小段时间内。正如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原始积累的不同时刻,多多少少可按照时间顺序确定分布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17世纪末的英格兰,这些不同的时刻系统地结合到一起。”

那么,是否斯密的做法(把原始积累纳入过去),至少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正确的呢?我们将看到答案是否定的,并且是一种需要强调的否定。

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同时存在

与马克思的表面措辞相反,整个《资本论》第一卷都表明,他是反对斯密的那种把原始积累归于遥远过去的做法的。而且,他在第八篇“所谓的原始积累”中用的材料,与前一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材料,确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当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研究最终涉及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时,他并不仅仅把自己对这位殖民地理论之父的欣赏之情,局限于将他的理论应用于过去的英格兰,而是坚称,韦克菲尔德的洞察力对马克思曾经居住和工作过的英格兰,也有重要意义。

根据这一点,可以看出马克思给米克海罗夫斯基的信也和这一思想一致,即原始积累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只是对落后社会的总结,而是关涉最先进社会的。尽管有些作者做出的推测与之相反,马克思本人在提及墨西哥社会机构时主张,“资本的本质,在其发展完全的形式与未发展完全的形式中,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资本论》就原始积累的初始阶段和资本积累时代之间的论述,仍然呈现出一段时间上的空白。其中,在原始积累的初始阶段,资本家以直接力量进行积累。而在资本积累时代,资本

家在市场上积累剩余价值。从我们的常识来看,这种二分法也许很有吸引力。但是,就其本身来讲,它是非历史的。

总结起来,在某些时候,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似乎原始积累从资本主义建立起就结束了。而还有一些时候,原始积累又似乎更多的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造成这一混乱的根源是什么?

资本积累:《资本论》中的重要部分

对原始积累的继续,马克思为什么没有给出更清楚的阐释?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溯一下马克思详细论述原始积累的目的。马克思试图在理论层面上,批驳斯密的预先积累理论。而斯密的预先积累理论表明,资本家的支配地位,根源于他们过去的积蓄。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努力想暴露市场关系的历史根源。他想要用这一历史分析,反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论点:因为有看不见的手把这个世界引向繁荣和更高层次的文化,所以可以认为市场是公平运作的。

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描述,给我们的感觉,“原始积累”完全是野蛮、不公平的行径。但是,这种描绘却与《资本论》的要旨相矛盾。毕竟,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表面看来公平客观的资本法则,事实上必然导致剥削。

马克思承认,就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来看,市场在长期上是向上发展的。但他也坚信,与野蛮并且专横的原始积累相比,被认为公平的市场影响力,实际上制造出了更加残忍的行为。如果强调原始积累,将会削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不想让读者们觉得,采取措施消除原始积累中的“不公正”现象,就可以带来一个好的社会。因而,如果过于强调原始积累的持续影响,就有将读者引离正题的危险。顺理成章地,马克思

不希望他的读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的不公正源于与市场社会本质无关的不公正行为。

相反,马克思坚持认为,应对工人阶级所经受的恶劣状况负大部分责任的不是原始积累,而是供求法则。因此,他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并把自己有关原始积累的观点摆在了一个次要位置。也就是说,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资本家即认识到:在剥削劳动时,单纯的市场影响要比野蛮的原始积累行径更为有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把原始积累归于过去的历史就显得合理了。通过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单一市场逻辑带来的后果,他再次强调了他的基本论点,即逐步的改良是不够的。在这一思路指导下,马克思写道:

在社会的一极,劳动条件以资本的形式出现,而在另一极是大量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单是这样是不够的,并且这也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产生了一个劳动者阶级,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等本能地接受生产方式的要求,认为它们像自然法则一样不言自明。一旦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它的机制就会粉碎一切反抗。不断产出相对过剩的人口,这就把劳动力的供求规律以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的限价需要相适应的范围内。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使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专制确定下来。固然有时还有另外的经济力量,但这只是例外情况。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让劳动者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一条件的保证,并由它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不能没有国家政权:它利用国家政权来“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适当的水平,以取得利

润、延长工作日,并使劳动者本身处于他们需要的从属状态。这是所谓的原始积累的一个基本因素。

“无声强制”比原始积累的粗野做法更加有效:

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正在发展,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有权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量……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劳动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

在描述资本的密集化时,马克思再次注意到市场力量是如何有效地替代了原始积累,“利润和损失由所有权的价格波动引起,另外,这些所有权在铁路巨头手里日益集中,它现在取代了作为资本所有权最初根源的劳动,也替代了野蛮的力量”。

在马克思讨论利润率的下落趋势时,他也把市场力量和原始积累联系起来:“这只是劳动条件与获得了更多力量的生产者的简单分离……事实上,正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这两方面的分离,使得随原始积累出现的资本概念得以形成。”

这里,马克思指的是“从那些仍然剩有少量东西可被剥夺的直接生产者那里,剥夺他们最后的剩余”。这一注释非常重要,因为它暗示,马克思已意识到原始积累本质上是不间断的,虽然如我论述的,他想要抑制这一点,以便强调市场的“无声强制”。

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判断,马克思同样注意避免把严格意义上的原始积累,同诸如“财政原始积累”等混淆。马克思写道:

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阶段尚有一定意义的概念,到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导致资

本集中化,继而导致最大程度上的所有权剥夺。这里,剥夺已从最直接的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产阶级自己身上。所有权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它的目标就是要使剥夺全部实现,最后甚至是剥夺所有的个体。

不管他使用这一策略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似乎对原始积累的作用轻描淡写,以便把重点放在现代资本积累上。虽然他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但这种非历史的做法却弱化了我们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的理解。

把原始积累归于资本主义之前的过去,使我们尤其忽略了原始积累的两重时间维度。首先,随着资本逐渐要求有更多的工人加入劳动力大军,一段时期里出现了把人们与他们的传统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现象。这一点后面我们还要强调。其次,原始积累的过程是一个“度”的问题。全部的原始积累,不会是资本的最佳利益所在。与之相反,资本会控制工人对自给自足的依赖程度,以使资本的优势最大化。

原始积累的理论背景

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表述有一负面后果,就是使其过程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彼得·克莱西和约翰·麦克因斯与我的观点相似:

马克思论证说,原始积累是政治经济学中不可去掉的一个过程,并且只有从斗争和终极力量方面,才能加以解释。乍看起来,原始积累的历史分析解释了劳动力最初的“正式”从属,因为工场资本家仅仅是(正式地)盗取了前资本主义社会

遗留下来的生产过程。(但最终)……劳动力的正式从属概念,如同斯密的预先积累概念,不是从历史中得来,而是来自于政治经济学。

巴里巴尔关于马克思对无产者一词使用情况的分析,使我们更仔细地看待原始积累概念。巴里巴尔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极少提及无产者,他通常称其为工人阶级。在第一卷第一版里,这一名词只出现在致威廉·伍尔夫的献词和有关“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最后两节中,这部分是关于人口规律和原始积累过程的。

在《资本论》中,“无产者”和“资本家”仅在一种场合下直接面对过对方。巴里巴尔得出结论说:“这些段落共同点是,它们都坚持无产者状况的一个特点——不稳定。”巴里巴尔称,在一个更普遍的层次上,马克思使用“无产者”这个词,似乎是想推断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不稳定的,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总是伴随着暴力,而且这种状况在历史上也难以持久。

遵循巴里巴尔的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无产者”这个概念: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用来描述那些因原始积累而被迫放弃原先生活的人们的情形。除去缺少生产资料这一点外,无产者这一概念是从所有影响这些人们的特殊情况中抽象出来的。并且,它为资本主义力量的引入做好了准备。

无论是巴里巴尔对“无产者”一词使用情况的解读,还是我个人对马克思的原始积累论述的理解都表明,马克思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到市场的运作上,模糊了原始积累现象。在把原始积累的适用性归于“无产者化”的历史进程时,我们忽视了这样一点:在决定无产阶级状况时,持续进行的原始积累起到了核心作用。

我深信,我们能从进一步了解原始积累中受益,同时,我们也不会忽略马克思有关市场力量的极具价值的分析。在研究这一主

题的过程中,我将尝试把原始积累重新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之中,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

确认原始积累的范围

在现实中,原始积累并不是突然出现于欧洲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之前的。而且,它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西欧的乡村。原始积累的出现,可以被视做大大早于资本主义时代。

比如说,对中世纪的大多数人来讲,土地已经是稀缺的。博斯坦说:

约有一半的农业人口没有足够的土地,因而他们无法在最低的生活限度上维持家庭。这就意味着为了维持生计,普通的耕种小块农田的农民,不得不通过其他方法增补他的收入……工业以及商业活动也许就可以养活一村一村的农民……当然,大多数雇佣机会必须存在于农业中……在几乎所有村子中,都有一些农民为其他农民干活。

另外还有其他因素,加剧了土地稀缺的压力。例如,12世纪的丹麦人从英国人那里索要贡物。这种强行索取不属于原始积累,因为它的目的并不是强制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继而促进市场关系的形成。但它确实促使英国采取某种方式使其经济货币化,这样它与原始积累就有了某些相似之处。同样,虽然中世纪时的高利贷常常仅被视做侵扰经济的寄生行为,但这种行为却也刺激了经济向前发展。

原始积累的过程并不仅仅向后延伸至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以前,它还持续到更加近代的时期。在英格兰以及其他先进的资本

主义国家里,从整个 19 世纪一直到 20 世纪,都有小规模 of 农民被转变为无产者。这种转变包含的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在美国摧毁小农业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发展的运输体系和研究体系,使天平向大规模农业倾斜。

原始积累的持续性,与它通常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形成了明显反差。人们通常认为,原始积累一次性地摧毁农业经济,其直接影响是建立起一个资本家、工人的两极社会。这一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会将人引入歧途。的确,在资本主义形成的前夕,大多数人是农民,或至少与农业有某些关系。

但原始积累并不局限于农业。它还延伸至其他许多经济部门,甚至可能是所有经济部门。原始积累既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乡村。毕竟,城里的人们有着比种粮食更多的方法来养活自己。剥夺人们的这些生产资料,必然使他们更加依赖市场,这与限制他们得到生产粮食的资料,后果是一样的。

现在来看一个更近代的例子。人们被塞进城市中拥挤狭窄的住处,连洗衣服的地方也没有。结果,他们开始依赖洗衣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典型的美国家庭自给自足的能力继续减弱,尽管诸如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普遍应用,本该使多种形式的自给自足更加简单。同样地,保罗·斯韦茨这样解释日本出现大型娱乐场所的原因:这部分是由于人们被迫住进狭窄的小公寓,无法在家中进行社交活动。

购买此种服务的需要,迫使人们出卖更多的劳动。我们看到,这种压力的影响,反映在近期女性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上。加比尔·科尔克曾做过统计:普通人一生进行雇佣劳动的时间,在他有生之年所占的比重,已从 1900 年的 39% 上升至 1970 年的 44.4%,尽管目前人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每周的工作日得到减少,而且我们有了更完善的儿童劳动法。从 1970 年起,每个家庭被工作占去的时间迅速增加。据朱丽叶·邵尔估计,1987 年平均每人比 1969 年

多工作了 163 个小时。

这一过程可以自我循环。要满足自己的某些需求越来越难,所以人们不得不去挣越来越多的钱。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做其他工作的时间就减少了,家庭把更多的家务劳动转给商业部门。托儿所的出现就是这一进程的明显后果。此外,在同一天里既要工作,又要做各种家庭琐事,这很有难度。因此,快餐业出现了。

上述讨论表明,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确实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要对其中一类劳动进行分析,就必须考虑到另外一类。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社会分工的概念使我们加强了对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现在我们只需记住当代的例子:那些曾经是家庭本身可以制造的东西、服务,现已成为商业公司出售的商品了。

至少,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新安排,与家庭对这些物品、服务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有关。从形式上说,失去对洗衣服地方的所有权,与失去一家人曾经耕种过的土地的所有权是一样的。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被剥夺了对特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会在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的组合中引起变化。

巴里巴尔警告人们不要草率使用“无产者”一词。如果不考虑这种警告,我们可以把这种现代家庭生活的重构,解释成原始积累过程的一个当代变体,而由于这种重构,通过劳动挣工资的人大大增加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原始积累概念与社会分工概念是紧密相连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原始积累

尽管马克思弱化了对原始积累持续性本质的分析,但他非常清楚,原始积累产生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建立资本

主义体系是最重要的。后来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未看到马克思的这一启示。他们满足于把工业革命仅仅当成是先进生产方式的引进。相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原始积累,视做彻底重新安排社会分工的一种方法。而且他们认为,这是无产者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就这一点,马克思在写原始积累部分时提出一个公式:“资本积累等于……无产者的增加。”

我们将看到,原始积累的古典理论可以表述为一个模型,一个与粗糙的、去掉了辩证法的原始马克思主义模型相类似的模型。在分析这个模型时,不要忘记马克思的研究是从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开始的。通过对它们的更全面研究,马克思赋予静态的、非辩证的典型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一种动态、辩证的性质。

我们将努力沿用这一传统,来研究原始积累的古典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使这项工作变得相当简单。与他们对利润与工资类型所做的分析相比较,他们在分析原始积累时采用了极为动态、几乎是辩证的方法。对原始积累的古典理论进行这样一种分析,具有双重意义:它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先前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它提醒我们,原始积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即使近代有关原始积累的评论,也没能完全正确地对待这个题目。除了非洲、亚洲、拉美那些较不发达国家中的无产者化之外,像马克思一样,大多数当代参考书都把“原始积累”这一概念归于遥远的过去。结果,工人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的分离,自然被假定为一个静态的、一次性完成的事件。

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原始积累的讨论,建立于一个动态的结构中。既然如此,那么,与更现代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评论相比,从对古典理论的仔细研究里可以得到更多。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现代评论的缺陷也许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本人在著述原始积累问题时,也常常以一种已成定局的语气,甚至可能使用了一点斯密的方法论。比如说,对原始积累概念的第一次提及出现在《资本论》的

第二十三章“简单再生产”。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资本和劳动力体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他的回答是:“从目前的立场来看,资本家似乎很有可能在过去通过某种形式的原始积累,占有了金钱。”

“在过去”不是马克思的典型语言,而且听起来就像斯密想像的过去一样不真实。他的这一说法显然是暂时的。“从目前的立场来看”这个短语也暗示着,即将会有一个更彻底完善的分析。但由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原因,马克思从未给出那一彻底的评论。而我们看到的只有历史。

但原始积累仍然是理解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概念——不仅仅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那段特殊时期,而且是资本主义本身。原始积累是一个延续至今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使原始积累的历史,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继续下去,并把这一概念同马克思的社会分工概念联系起来。

第三章 原始积累和《狩猎法》

《狩猎法》的封建起源

前文已提到,我们不应将对原始积累的理解局限于农业方面。作为例证之一,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众所公认的《狩猎法》(*Games Laws*)的模糊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狩猎法》持缄默态度。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沉默是完全恰当的。毕竟,《狩猎法》起先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狩猎法》是封建体制中最为人所憎恨的。是它们将传说中的罗宾汉引入犯罪歧途,这也是它们至今仍为人所知的最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它们为最终瓦解英国社会中封建贵族的霸权统治创造了条件。

保护森林中封建特权的法律,在欧洲很普遍,有些还一直延续到19世纪。以德国为例,就连采摘浆果也被认为是犯罪。马克思曾谈到,最初正是那些在树林中非法砍伐木材者受到的苛刻惩罚,使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这些禁令和古代封建社会中为维护主人门的特权地位而禁止人们在家中从事某些特定工作的法令,几乎如出一辙。

英国的《狩猎法》最初也是一种封建制度。但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它们也逐渐失去其重要性。到16世纪末,英国政府已不再实施这些法规了,尽管它们还存在于法典中。国王查理一世曾在

1630年企图恢复这些法律,以增加国家收入,但议会和内战的情势都阻止他这么做。

英国现代意义上的《狩猎法》开始于1671年。《狩猎法》导言中的措辞,使它听起来更像是那些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贪婪资本家的杰作,而非对封建传统的呼唤:

那些置生意和工作于不顾,一味沉溺于打猎、钓鱼等活动,以至于既毁了自己又连累邻里的下层生意人、学徒、挥霍之徒,必然造成巨大危害。有鉴于此,如果他们中有人敢于去打猎、放鹰、钓鱼或抓家禽(除非是有资格的学徒,并且是陪主人同去),他就应当……受到其他惩罚。

事实上,这些《狩猎法》的基本精神,和先前那些《狩猎法》一样,都具有封建性质。尽管听起来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这一立法反映的主旨却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它旨在促成阶级关系中等级的建立,本质上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在为数不多的几本关于这方面的书中,有一本写道:“内战后,为了提高乡绅们在困境中的地位,《狩猎法》便应运而生。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即土地高于金钱。”

尽管《狩猎法》也完全可能是反资本主义情绪的产物,但事实上,它们是对乡村的贫苦民众拒绝承认内战后地主们声称的财产所有权的一种直接反应。毕竟,这些新的所有权是以乡间贫苦百姓丧失其传统所有权为代价的。

这些传统权利对乡间的穷人来说,绝非无关紧要。对他们来说,打猎是维持自己和家庭生计的重要手段之一,而非简单的娱乐。从这个意义上讲,《狩猎法》是使众多农民脱离传统生产方式的更大运动的一部分。

一旦英国统治者意识到《狩猎法》所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利益,当权者就不再满足于现有的法规。很快地,更具限制性的《狩

猎法》相继出笼,处罚也更不人道。逐渐地,英国的《狩猎法》成为世界上最苛刻的法规。

尽管《狩猎法》的精神可能和现代资本主义相符,但英国司法体系执行这些资产阶级《狩猎法》的方式,却绝对是封建性质的。理查德·代勒斯的案子,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根据猎场看守人和一个佣人提供的信息,白金汉公爵判代勒斯有罪。当公爵在客厅里主持审判时,他告知不幸的代勒斯,如果他胆敢有什么无理的语言,他就会被送到监狱。1828年,英国公众对代勒斯一案还记忆犹新,那时亨利·布劳汉谈及此案时怒吼道:“世界上再找不出比这更差的法庭了,连土耳其的伊斯兰宗教法庭都不如。我们这些法庭中,常有基于《狩猎法》所进行的草率判决。我指的是,几个(或说一小撮)草菅人命的法官。”

尽管现代《狩猎法》的实行和其目的都是封建性的,但是它们成功加速了原始积累进程,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无疑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苏格兰实验室

苏格兰的原始积累进程要快于英国,这部分是由于原始积累在苏格兰开始得比较晚。因此,理解狩猎在苏格兰扮演的角色,具有特殊意义。

丹尼尔·笛福在他的苏格兰高地之旅中发现,“尽管这个地区看上去荒凉而多山,但人们的生活却很富足。”他写道,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野味很丰富,不论老幼,人们一看到就用枪猎杀,一年四季都如此”。后来到苏格兰去的人感到焦虑,他们认为狩猎

是扩充雇佣劳动力的障碍。植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①的《苏格兰之旅》一书,提供了关于狩猎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他被认为是苏格兰社会的极具同情心的解读者,比塞缪尔·约翰逊更甚。但他对那些靠狩猎而不是雇佣劳动谋生的人,还是持有偏见。

例如,彭南特在爱丁堡附近时写道:“据说劳动力在这里非常昂贵……普通百姓还未适应靠工作谋生,因此很少为工资而工作。”一旦到了高地区,他就抱怨说:“高地居民的习俗可用如下字句来概括:极度慵懒,只有在投入战争和参加娱乐活动时例外。”

彭南特认为,高地居民在狩猎中投入的精力,和他们对雇佣劳动的缺乏热情,形成了不相宜的反差。“当地居民生活很穷苦……男人们都长得很瘦,但很强壮;若不是狩猎或参加别的娱乐活动,便整日懒散,游手好闲,满足于艰难的生活,一旦有了他们所认为的生活必需品,便不愿再作任何努力。”彭南特对高地居民的描述和亚当·斯密对野蛮人的刻画十分相似:“远观之,野蛮人的生活似乎无外乎两类:不是沉溺于极度慵懒,就是进行惊人的冒险。”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古典模型所强调的问题:人们更愿享受闲适、安逸的生活,而不愿为一点小收入而长时间从事雇佣劳动。

彭南特在阿伯丁附近的海边渔场所看到的情景,给了他一些希望。在那儿,妇女们肩上扛着一筐筐沉重的大马哈鱼来卖。“当她们把鱼卖完后,又在筐内装上石头,扛到16英里外去卖,或用它们换鱼。她们喜好华丽的装饰。尽管足不履屐,但手上却常常戴满不值钱的戒指。”可以想见,她们需要做多少小时的苦工,才能换来珠宝工匠1小时的劳动。

从对高地居民生活的大多数描述来看,他们大多不愿参加雇佣劳动。例如,据塞缪尔·约翰逊所说,在家做一双传统苏格兰粗

^① 彭南特(Thomas Pennant):18世纪的威尔士博物学家、旅行家。

革皮鞋只需1小时,而一双商品鞋要卖12.5便士。亚当·斯密对爱丁堡周围地区劳动工资率的统计数字表明,该城的一个居民需工作3整天,才能买得起这样一双鞋子,而当地工人的工资无疑是高于乡村地区的。假设人们能弄到便宜的皮革,那么商品鞋的确需要有很大的吸引力,才能使人们愿意用3天的工作来换一双鞋,而不是在家自己花1小时做。

由于工资和购买的商品之间存在这种不合理的交换关系,高地人大都愿意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而不愿进行雇佣劳动。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个问题,彭南特赞成一切可以限制人们自给自足能力的措施。例如,他十分推崇布特伯爵的做法,“这位伯爵的农场里,原先人们同时从事农耕和捕鱼,结果却都不尽人意。于是伯爵大人在这两种不一致的工作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安排雇农们各自从事其中一项”。

彭南特对穷苦农夫的反对,并不基于任何技术因素。他承认:“为了对农民公正起见,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们早在蛮荒时期就已精于耕种。笔直的犁垄和他们的耕种布局都证明了这一点。”彭南特的考虑都是非技术性的。他所想要的是一种新的依附体系。因此,他对布雷多尔本^①庄园的管理表示赞赏。在那儿,佃户们“如果进行一定的贸易活动”,就可以免去地租,这就使布雷多尔本“拥有的各行业工人优于王国境内其他任何庄园”。为了建立这样的依附体系,彭南特认为,对人们为获取食物而进行的狩猎活动进行限制,是很有必要的。

正是带着这样的情绪,詹姆斯·史都华在苏格兰写作时,拐弯抹角地这样称赞对狩猎的压制,说这样的压制“增加了内陆对农产品的需求”。

苏格兰贵族凯姆斯勋爵,对《狩猎法》所要建立的社会进行了

^① 布雷多尔本(Breadakbane):苏格兰一历史地区,现属于格兰扁地区。

探究,并将这一社会的本质解释如下:

渔民和猎人的生活虽然为简朴的家庭成员所接受,但与社会是格格不入的:牧羊人的生活则能促进社会向更大规模发展,如果这能称为社会的话,因为它们与外界很少有联系。但在出现农业之前,人们并不知道社会的真正精神应包含诸如互惠,即使个人的产业对己对人都有利等方面。农业需要来自其他许多行业的帮助。木匠、铁匠、泥瓦匠和其他工匠都做出各自的贡献:这就将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个互助的社会中,而这个社会又将他们挤凑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内。

凯姆斯认识到,这种新的社会必然导致阶级的形成:

农业导致了由众多个体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团体的形成。在这些团体中,人们意识到了一些他们先前所不知的责任和义务。这些义务理所当然会被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惩罚是这些法规实施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要使上述这一切运作起来,就必然会有一个或一些人,被赋予一定的权力,以实施各项决议,并动用全社会的力量。简言之,这可以说是一种普遍规律,即在所有社会中,政府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与社会向更紧密团体发展的过程,是完全同步的。

对凯姆斯来说,尽管这种安排会导致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其结果却是为了朝最好的方向发展。他问道:“如果命定的财富对每个人都一样,那么还谈得上什么慷慨、仁爱、慈善呢?”

资产阶级《狩猎法》的压迫性

乡村社会关系的改变,影响着《狩猎法》的发展。尽管封建《狩猎法》是苛刻的、带有镇压性的,但那个社会仍希望贵族们履行家族式的义务,这就使那些严厉的限制显得温和些了。一般来说,最穷的人可以依靠上层社会的某些施舍。但是,如今社会风气已经变化了。

随着封建关系的衰落,土地所有权更多地带有商业性,而不完全是一种生活方式。土地的经济价值增加了,贵族们也更加资产阶级化了。地主和土地租用人的关系疏远了,也更具剥削性了。租期逐渐缩短,而地租收入却渐涨。佃农逐渐消失。长工和仆人逐渐为短工所替代。一切友好和善意,在乡村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种环境下,《狩猎法》变得越来越残忍。1722年的《沃尔瑟姆·布莱克法案》(*Waltham Black Acts*)是严厉惩罚偷猎者的最初措施之一。这些立法,正当鹿肉成为昂贵的美味之时,这或许是因为养鹿所需土地花费巨大之故吧。逐渐地,偷猎者把猎物看做一种商品,而非直接消费品。一个世纪以后的1826年,一位记者哀叹道:“当一夜偷猎所赚的钱,比工作几星期还多,这就很难让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尊重猎物是神圣的私人财产了。”

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猎捕小动物的惩罚,比猎捕鹿要轻。直到后来,地主开始采取措施,增加自己土地上鹿的头数。相应地,《狩猎法》的范围也大大拓宽了。比如,在18世纪的头60年,只有6个法案是针对猎捕小动物的偷猎者的。此后的56年中,则颁布了33个这样的法案。结果,“肉几乎从农村穷人的饭桌上消失了”。

人们对待偷猎的态度很严肃,有时甚至将它等同于叛国罪。英国政府在实施下述法律时的残暴性是很令人吃惊的。有几个偷猎者依据著名的《布莱克法案》而被叛处了死刑。

在晚近时期,人们仍然由于违反所谓封建《狩猎法》而受到严厉惩罚。对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这似乎不太正常。然而,《狩猎法》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乡村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一本小册子的作者惊呼:“关于狩猎的这个条款,比王国境内任何一项法律都易引起不安、普遍的不满和局部的仇恨。”

从定罪的比率可以看出矛盾的尖锐化。1816年,也就是有全国性统计数据的第一年,868人因违反《狩猎法》而入狱。到1820年,人数已上升为1467人。在威尔特郡(Wiltshire),1812年至1813年冬天,有8人依据《狩猎法》被监禁,到了1817年至1818年冬天,数量上升为85。在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有7人在1813年被监禁,1819年则为77人。到19世纪20年代前5年,平均每年有65人因违反《狩猎法》被捕。仅在威尔特郡,1815年滑铁卢战役后的15年间,就有1300多人依据《狩猎法》被捕入狱,这一数字是前50年的两倍多。这些无疑是保守的数据,因为这类案件过于频繁,治安法官常有遗漏未记的。

尽管《狩猎法》在1831年作了修订,因偷猎而被定罪的人数仍急剧上升。19世纪40年代,在一些乡村郡县里,男性罪犯中有30%到40%是因为违反《狩猎法》。1831年9月19日,里士满公爵在上议院提到,英格兰1/7的犯罪案件是因违反了《狩猎法》。

从英国发配到澳大利亚的罪犯,大多数被认为是犯了偷猎罪。罗伯特·休斯对我的观点持有异议,他认为大多数偷猎者轻易就能获释。不管怎样,确有相当部分的偷猎者遭到了流放。

此外,政府还对偷猎者判处其他一些罪,例如拒捕等。休斯想证明,大部分人是因为一些更严重的罪行而遭流放的。即便如此,他还是说明了当局是怎样利用《狩猎法》,将那些他们认为不受欢迎

迎的人赶出劳动力市场的。

当时犯罪率上升的原因,是经济现状,而不是封建历史。例如,哈蒙德兄妹断言,高失业率会使偷猎更为严重。1812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大约有25万至40万人复员。在战争期间,脱粒机代替了农村大部分传统劳动。人们赖以维持生计的方式和工作机会都在减少,同时,在市场上购买食物的开销却有了大幅度增长。这使工人陷于残酷的境地:因此,很多失业工人就去偷猎以维持生计,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狩猎法》和资产阶级霸权

为什么封建《狩猎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得更为苛刻了呢?答案是,《狩猎法》体现的是资本家和贵族的共同利益。贵族们可以享受打猎的特权,而资本家则能享有那些被禁止以打猎为生的人的劳动力。

《狩猎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都揭示了逐渐出现的财产关系中的霸权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财产关系逻辑所支配的政体进行辩护,而《狩猎法》则定义了财产的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狩猎法》代表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坚固壁垒。狩猎其实是一种对财产所有权的挑战,因此它理应受到严厉惩罚。贵族和资产阶级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能够看到,《狩猎法》在法国为人所不满。法国大革命的最初法令之一就是废除《狩猎法》。当时,阿瑟·扬大声说:“人们会以为,普罗旺斯的每枝生锈的枪都被派上用场了。”

贺拉斯·瓦尔浦^①在记录《狩猎法》在法国消亡的速度后,向

^① 贺拉斯·瓦尔浦(Horace Walpole):18世纪英国作家,首相罗伯特·瓦尔浦之子。

奥索里夫人透露道：“我从来都不欣赏《狩猎法》令，但我并不希望看到所有人手中都有枪，因为除了野兔和山鹑外还有其他野生动物。尽管现在整个欧洲都在赞赏并引用我们的宪法，我却希望它保持现在的状态。”

1791年，弥尔顿勋爵在和肯庸勋爵的谈话中，表述了相似的观点：“共和党已将《狩猎法》作为他们辱骂和憎恨的对象；在法国，一旦他们开始推翻宪法、消除差别，《狩猎法》是他们最先摧毁的。在我看来，它们应该受到尊敬与保护。”

这些现代《狩猎法》成为原始积累过程中有效的政策工具，因为它们禁止贫苦的乡民拥有武器，以及相应的阻挡冲击的能力。正如威廉·布莱克斯通^①所写的：“解除人民的武器，可以防止起义和抵抗政府活动的发生。虽然森林规则或《狩猎法》制定者很少承认这一点，但这通常是他们的意图所在。”后人在研究中发现，拥有武器的难易程度决定了剥削的程度，从而证实了布莱克斯通的论点。

从另一方面讲，《狩猎法》是一种很有效的惩戒手段。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只要人们还能打猎，他们就会拒绝从事乏味辛苦的工作。一位美国早期作家曾警告他的读者：“一旦成为猎人，也就告别了犁。”当时著名的辉格党慈善家约翰·拜勒斯也有过类似表述：“我们的森林和大片公共土地（使那些依赖于它们的穷人变得和印第安人一样），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孳生了懒散和傲慢。”

布莱克斯通也认为，我们应该从维持劳动力内部纪律的角度来看待《狩猎法》，“将违反《狩猎法》的人定罪的唯一理性根据在于，狩猎使下层贫苦人民萌生懒散和傲慢之心，从而放弃正当的职业”。威廉·皮特^②也对此表示赞同。

《狩猎法》不仅仅起到促进原始积累的作用，还是维持劳动力

① 威廉·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18世纪著名的英国法学家。

②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8世纪英国政治家,两度成为首相。

秩序的重要手段。我们无法获知这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因为我们很少能同时听到来自斗争双方的声音。但至少它似乎使一方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威廉·科贝特在1823年3月29日的《政治纪事》(*Political Register*)中记载，萨里^①的一位绅士向一个年轻人问及如何靠2.5个先令度过一星期。他问道：“我无法做到这样，而你是怎么做的呢？”那个年轻人回答道：“我呀，我就偷猎呗。吊死总比饿死好。”

《狩猎法》的毁灭性本质

《狩猎法》有另一层面的问题。受法律保护的一些动物大大毁坏了全国的庄稼。而另一些被疯狂捕杀的肉食动物，诸如幼年的狐狸、貂鼠等，则是有益的肉食者，可以防止啮齿类动物的过度繁殖。更糟的是，即使那些未被猎物毁坏的植被，也葬身于猎人和他们的马蹄下。1757年的《伦敦杂志》收到了一封来信，信中写道：

在英国的很多地方，农民都看到他们的辛勤劳作因那些专注于打猎的人而毁于一旦。这正是造成目前社会供给不足的原因所在。王国内无数教区和各地至少1/3的小麦等作物，都被野兔吃了。

研究《狩猎法》的一位当代学者指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更具破坏力的话，那就是野鸡。”

农作物被动物毁坏，这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例如，法国大革命前夕，人民获得机会，可以说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农村的

① 萨里(Surrey)：英格兰南部一郡。

大多数人都对猎物和猎人造成的损失表示愤怒与不满。在了解《狩猎法》在法国所引起的不满情绪后,革命政府将废除《狩猎法》列为首批颁布的法案之一,这就不足为奇了。

英国农民无疑遭受了跟法国农民同样多的不平与委屈。仅一次打猎活动就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以一次猎捕狐狸的活动为例,猎人们所经过的英国乡村地区可绵延达 28 英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除了谷物被践踏外还有其他损失:

据说很多狩猎者一直在不停地毁坏篱笆,踏倒未成熟的谷物,践踏芜菁,骚扰怀孕的绵羊等。通常,当追赶猎物时,他们很少会想到这所造成的损失。从这些不满和抱怨的数量和强烈程度,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这种行为有着普遍的、严重的愤恨情绪。

上层阶级对狩猎所造成的破坏普遍视而不见。从这方面考虑,有必要详细引述一下安东尼·特罗洛普^① 1865 年最初发表于《培尔美尔街报》^② (*Pall Mall Gazette*) 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冬季那几个月中,在英国有二三百人声称有权进入所有人的土地!……每次打猎活动中,都不时会出现把自己的领地用铁丝栅栏围起来……公然违抗周围世界的人。他们通常是一些新兴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那些决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与土地相抗争的佃农。仅这样一个人,就能给人带来很多烦恼,并使人们无法享受在当地打猎的乐趣。

①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英国小说家

② 培尔美尔街:英国伦敦以俱乐部多而著称的一条街。

特罗洛普又继续解释道：

通常,农民们对他们的小麦并不怎么看重。当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希望人们能只在犁沟地头上骑马,但他们不会因小麦地里有马匹经过的痕迹而感到伤心。我实在怀疑这是否的确对小麦造成了损害。

或许这点损失并不会给大农场主们带来什么严重后果吧。对一个大农场而言,马匹所造成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在特罗洛普写这些的时候,有关《狩猎法》的争论早就平息了,但他反映了普遍存在于早期的一种心理。一位无名作者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深感绝望：

有些人坚持认为,与猎取狐狸所带来的乐趣相比,国家的富裕和耕作的发展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也有人认为农民和佃农更应该跟着猎犬跑,而不是去犁地,尽管这样不仅会使他们自己的土地荒于耕作,而且会使他们邻居辛勤劳动的成果毁于一旦。跟这种人再怎么理论都没用。

19世纪40年代,在白金汉郡估计有1/4的作物毁于狩猎活动。议会只有一次对此表露了一点兴趣：“对大多数狩猎者来说,9月1日的打猎山鹑活动,标志着狩猎季节的开始……但由于1795年收成不好,议会于1796年初投票决定,将打猎山鹑推迟到9月14日。”第二年议会沿用了这一决议。

从1776年(也就是斯密发表《国富论》的同一年),到19世纪40年代,是《狩猎法》实施最为严厉的时期。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与经济运行相关的一切问题都表示关注。虽然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都能敏锐地发现一丝一毫的经

济增长,但对《狩猎法》引起的持续的粮食损失,却未做任何评论。

例如,政治经济学不遗余力地抗议《谷物法》^①所带来的后果,但却全然忽视了《狩猎法》。为什么古典政治经济学要如此关注社会琐事,却完全遗忘了《狩猎法》造成的巨大影响?这一系列《狩猎法》给无数人造成了实质性的困难,许多工人因此而被关进监狱或遭流放,而对谷物造成的破坏却未加追究。然而,尽管《狩猎法》造成的危害面极广,从总体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一立法所带来的后果却不加理睬。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怎么可能从未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保护猎物而使农作物遭到践踏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由此而产生的对收成的不利影响,与《谷物法》造成的农业生产的扭曲,是具有同等意义的。然而这些判断功效的人,却对此保持沉默。

“人的代价”这一概念,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必定知道。即便对农村生活一无所知,他们也一定知道在19世纪早期,流放是对偷猎者的一种很普遍的处罚。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人的代价”持缄默态度。弗兰克·费特对政治经济学家在议会中的出席、投票情况进行记录后说:“流放并不是很多政治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

三缄其口,并不能为这些经济学家开脱。他们对与《狩猎法》相关的镇压和破坏,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沉默就意味着事实上的赞同。

亚当·斯密和《狩猎法》

很多观察家都把《狩猎法》看做仅仅是古老的封建制度的丑恶残余,和现代资本主义无关。例如,布里安·因格里斯(Brian Inglis)

^① 《谷物法》:指英国历史上任何管理粮食进出口的规章。

声称,《狩猎法》是保留在法令全书中的封建制度中唯一带有压迫性的部分。往常都很精明的雅各·维纳对此也持相同观点。

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护教大家的亚当·斯密,也把《狩猎法》归为封建主义。不管怎样,他毕竟还是注意到了《狩猎法》。就这点而言,他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比,算是与众不同的。但斯密这么做,并非是为穷人争取更多的平等。相反,他只是为了贬低贵族们的地位,从而提高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斯密将这一立法中所有的罪恶之处,都归咎于封建压制:“公正公平不会导致这一切……他们所给的原因是,这一禁令是为了阻止下层人民在这类不能获利的工作上浪费时间;但真正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喜欢打猎,并想从下层人民手中夺取一切。”

斯密的解释并不符合事实。正如前面谈到过的那样,对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限制,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出现。斯密又补充说,封建贵族禁止使用手工磨坊,从而迫使人们去用贵族们所拥有的那些磨坊。尽管有上述这些例子,但是没有哪个阶级在迫使工人们和他们的生产方式分离时,比资产阶级表现得更残忍、更有效率。

斯密也注意到了狩猎所造成的资源挥霍和浪费。他抱怨说:“无论就人口还是农作物而言,大片王国的土地都已成为荒地。”他的建议是出售这些土地,这个建议的前提假设似乎是:私有土地能受到“很好的耕作从而提高土地质量”。但他没有提及这一事实,即很多这样的土地很有可能仍被留做私人打猎之用。

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真正提到《狩猎法》。他似乎认为,这一法案相对而言并不太重要。他把狩猎的经济意义的衰退,归功于经济的自然发展。他说道:

渔猎在社会初级阶段原本是最重要的两种工作,但到了社会的高级阶段,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生存的需要变成了对快乐的追求。因此,在社会的高级阶段,只有穷人还

把别人当做娱乐的东西作为一种行当来干。

他接着又说：

英国各地的偷猎者都是穷人。在严酷的刑法不容忍偷猎者的国家，有执照的猎人的生活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对狩猎等的天生爱好，使更多的能赖此而舒适生活的人，都参加了进来。他们的劳动产品在市场上数量太多，因而价格很低，只能维持劳动者最节俭、最简单的生活。

尽管斯密拒绝承认《狩猎法》和资本家利益之间存在任何联系，他提出了这一话题进行讨论，还是值得赞赏的，毕竟别的政治经济学家完全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

斯密正确指出了贵族总是想把别人手中的所有东西都占为己有。但和他所在阶级中的其他人一样，除了谈到资产阶级时偶尔顺带提及外，他没有作任何其他努力去揭露《狩猎法》迫使穷人们接受它这一事实。

《狩猎法》的消亡

最终，《狩猎法》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到1827年，《布莱克法案》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1831年，又有其他一些条例、措施被废除。在接下去的20年中，更多有争议的东西都被废除了。

偷猎者已经不再会受到绞刑的处罚。但在这之后的很长时期内，法律仍然支持那些同样苛刻的庭外惩罚。例如，人们布置了弹簧枪和捕人的陷阱，粗心大意的猎人往往会因此而致残，甚至丧命。记者威廉·科贝特曾愤怒地抱怨说：“我曾看到过好几份传单，宣布一个即将

举办的农具交易会。在别人给我的一张传单上,在一堆农业生产资料中,我看到了一辆消防车和几个铁制的捕人的陷阱……它们居然也成了农业劳动工具中的一部分,可见当时的时代有多么凄凉。”法院则认为,这些野蛮的装置依据当时的情况是合法的。1827年,这些装置最终被禁止使用。但这一禁令的颁布,是因为这些装置给猎场看守人和孩子们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它们对偷猎者造成的伤害并非考虑因素之一。正如爱德华·苏菲尔德(Edward Suffield)男爵记录的那样:“几乎只有偷猎者,逃开了遭弹簧枪射死之厄运。”

《狩猎法》中其他一些因素的根除,显得更为困难。直到1880年,议会才允许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射猎野兔,而无须经地主的同意。

即使苛刻的《狩猎法》在英国已不再那么重要时,它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影响力还一直存在。当西欧各国逐渐将他们的统治延伸到外围地区时,《狩猎法》很快大行其道。例如,在法属赤道非洲,曼德加人(Mandjas)被禁止打猎。这些人几乎不养任何家畜,因此狩猎是他们肉食的主要来源。这一禁令对迫使曼德加人到法国人的棉花农场去工作很有效。

我认为,只有原始积累的逻辑性可以解释这一问题,即为什么在更加重视人类自由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升发展时期,却是《狩猎法》的实施力度“渐强”的时期。

资产阶级对《狩猎法》的认可

现存《狩猎法》的野蛮性,似乎给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带来了某种尴尬。既然原有的《狩猎法》已经完成了任务,从很多利益的角度,资产阶级倾向于用一种不那么原始的方式,去实现同样的目的。支持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人,基于殷实的农场主和

其佃农的利益,大声疾呼对《狩猎法》进行改革。总而言之,这些“改革者”出现的同时,约瑟夫·汤森牧师也提出了他的观点。他主张用“和平、安静、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不是用直接的武力形式。这种改革旨在减少偷猎,因为《狩猎法》中所体现的贵族要求和意志,煽动了很多大胆的人去偷猎,尽管其中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将猎物定为私有财产,是最常被提到的一项改革。在被认为是崇高、神圣的贵族特权面前,资产阶级的这一观念变得支离破碎。约翰·克里斯蒂安·科尔文是19世纪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他曾在1796年要求议会遵照俄国的做法,用狩猎税来代替《狩猎法》。他说,这种税更可取,因为有了它,“各种限制就不再有必要了,那些错把时间花在狩猎上而使自己和公众都受害的人,也就没有能力狩猎了”。他的建议并没有使对偷猎的惩罚得到减轻。事实上,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一建议还使惩罚加重了。

锡德尼·史密斯很具有同情心,他希望能保护“基督教的山鸡,永生的野鸡,理性的山鹑,或者是有责任的野兔”,并用同样精力去“保护上帝创造的最卑微的生命”。即使他,也只能加强对富有地主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从而使人们不再将猎物和其他商品相区分。

将猎物视为一种财产,这对斯密式的世界观也有吸引力。例如,一本未署名的小册子提出:“将猎物看做是财产,这一体系的自然结果便是,维持和谐的纽带变得更持久,各部门之间也有了相互交流。”由于英国的《狩猎法》限制性很强,只有大约1%的人被允许参加狩猎活动,因而改革者们不时提出建议,要求降低对所有权的限定标准,从而使中产阶级的人们也能享受打猎的乐趣。这一建议也能使中层农场主像贵族一样,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打猎。这使任何有足够的钱去买得狩猎权的人,都有可能享受打猎的乐趣。

这些资产阶级化了的《狩猎法》的提出,对下层人民来说意义并不大。尽管这些改革给了普通工人正式的打猎权力,但是打猎的花费却使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有些人认为,这些改革也能让

穷人受益,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去当猎场看守人。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法律对穷人来说是一种倒退。只要《狩猎法》是建立在传统权利基础上的,地主独占狩猎权就会遭到某些质疑。在这种《狩猎法》下,穷人可以诉诸于自己的传统权利,或可以指出法律中的不明确之处。但在改革后的法律中,穷人的传统权利变得无关紧要了。

小农场主可以保护他们的作物,算是获了点利。但狩猎始终是富人的特权。另一方面,殷实的农场主却能雇人看管农场,使其中的猎物数量有所增加。事实上,专门的狩猎地很快就成了地主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狩猎法》的讽刺性

18世纪晚期,议会只有几次注意到《狩猎法》。当时,统治阶层对这一立法的辩护很是奇怪。打猎不被认为是穷人的一种恰当的消遣方式,议会成员们却对富人去打猎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对农业生产的一种鼓励。但是马和猎狗在地里到处跑,践踏农作物,毁坏篱笆,这又怎能促进农业生产呢?

要记住,贵族的生活是很悠闲的,他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享受城市生活的乐趣上。打猎似乎是使这些富人们和他们的土地有所接触的唯一途径。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贵族站出来,反对这种对他们与土地之间关系的刻画。

1830年,议会再次就《狩猎法》展开讨论。这时,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中,没有人呼吁废止《狩猎法》。相反,罗伯特·皮尔^①(他的家庭财富主要来自雇佣那些将要和土地分离的人)警

^①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9世纪英国首相,保守党创始人

告议会,不要匆忙行事:“我们喜欢过于乐观地期望某一具体的变化能带来多少好处。他担心我们会忽视了对胆量和娱乐的热爱,正是这两点使狩猎对普通老百姓那么有吸引力。”1826年,一位著名记者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认为贵族属于“最有用、最有价值的阶级”,因此他们“有权在完成了公众职责后,适当地娱乐轻松一下”。此外,贵族偶尔去乡间旅行,也被认为有助于“英国农民的道德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贵族在军队服役,也被看做是他们对社会的一种贡献。不少人认为,打猎是培养他们的军事技能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考茨基所说:“战争和贵族的联系越紧密,狩猎也就更是贵族的活动了。”统治阶级的很多成员都不愿使这些技术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传播。

1756年左右,英国在七年之战中经历了几次军事失败。直到这之后,决策者才开始对原本广泛认可的贵族的军事能力有所怀疑。当时,中产阶级的人想重振民兵的力量,来重申他们的公民道德。哎,可惜,资产阶级社会认为封建勇士和中世纪工匠一样,都是属于朦胧的过去。未来战争的胜负,将取决于船只等战争固定资产,以及动员社会中更广泛的人。在战场上,资产阶级军官们指挥各种军事活动,这和资产阶级工业家们管理他们的工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这种战争观念下,熟悉火器的农场主们就很有用了。在这种环境下,有人问那些贵族,问他们是否把国家看得跟他们的山鹑一样重要。甚至连一贯尊重封建勇士的詹姆士·史都华爵士,也和他的大对头亚当·斯密一样加入了扑克俱乐部(Poker Club)——这个组织是为了支持苏格兰民兵而建立的。

斯密经常强调乡村工人懒散而没有生气一面。但当他讨论需要空闲时间以训练民兵时,他的观点就不同了。此时,他不得不承认,农业取得进步,或许是以牺牲农村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农业进步是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使农民和工匠们一样很

少有闲暇。”

正是对军事精神衰败的关切之心、而非对工人的同情，引出了斯密那段著名的对磨灭人性的劳动分工的谴责：

在劳动分工进程中，大部分雇佣劳动力都局限在几个简单行业中。但是，大多数人对事物的理解力，只能从他们的日常劳动中得到。有些人一辈子干的都是几项简单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的结果总是一样的，或几乎总是一样的。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发挥理解力，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难题，让他有机会施展他的创造力，找出解决的办法。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变得要多愚蠢无知就有多愚蠢无知了……在任何一个文明进步的城市中，除非政府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否则劳动力阶层，也就是人民的主体部分，都会后退到那种情形的。

斯密对上述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人们对《狩猎法》的另一种更常见的观点：新的军事图景，的确使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开始重新考虑乡村穷人的生活条件。但是，没有任何人将这些现象和《狩猎法》相联系。

《狩猎法》和资产阶级对自然的幻想

通过对人们认为动植物扮演何种角色这一问题的考察——这是一个有用的手段——可以透视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社会组织形态。例如，英国的精英们认为应当保护猎物，使其免遭下层民众的伤害；但是，有教养的狩猎者们组织的大规模屠杀，却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防止对动物的残忍行为的皇家协会，完全没有提及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被猎杀的狐狸。与之相反，它将注意力集中到下

层社会人民常猎杀公牛和熊、猎杀供人们杂耍的獾和狗,以及虐待在城市里服役的动物(其中最主要的是马)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上。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动物扮演的角色改变了。现代的狩猎方式也已出现。以下是威廉·比迟·托马斯爵士对这一变化的描述:

的确,猎杀狐狸在英国已有很长历史,在14世纪就盛极一时,或许从此就没有间断过。但是,从本质上讲,我们现在所知的狩猎始自18世纪的现代英国时期,当时英国还到处是树篱、灌木和小树林。《围地法案》(*the Enclosure Acts*)消灭了其他的狩猎项目,尤其是猎鹿,从而鼓励了对狐狸的捕猎。

《狩猎法》也适应了当时消费方式的改变。乡村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好客”观念的改变。在1761年的《年度纪事》(*Annual Register*)中,一位作家解释说:“贵族再也无法假装出那种传统的好客,也无法忍受食客将一切吃光,他们不再维持那些为所有来客提供酒食的场所。”根据其中的说法,那种有“法式食物和精选游伴”的“上流社会的娱乐”也已定型,成为了一种模式。事实也的确如此,食物总是限于法式的。一位作者在1815年声称,野味成了“任何一个想要显出上流品位的娱乐活动的必不可少部分”。

逐渐地,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实现了越来越有效的控制,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自然”形成了新幻想。上流社会不再崇尚经过人为修饰的风景。自然景色必须看上去的确是自然的。据说,亚当·斯密在这方面颇有影响。似乎正是他的《修辞学和文学演讲录》(*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掀起了人们对被称为“鹿苑”的严格管理的猎物保护区的狂热。后来,斯密对人们逐渐增长的对看上去更为自然的居住地的偏好,表示了极大赞赏:“几年前,人们认为的时尚是用紫杉和冬青树雕成的金字塔、柱子、花瓶、方尖

塔来装点他们的花园。现在的时尚则是将几年前的那些做法讽刺嘲笑为做作。”

的确,斯密对“自然”风景的这一幻想,与资产阶级的世界很相符。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皮尔在为《狩猎法》辩护时提到的关于“胆识和娱乐”的比喻。约翰·拉什金¹⁾对这一资产阶级的幻想,做了更为细致的描述:

我认为你理想中的生活可能是这样的:生命应该在一个优美、地势起伏、底下到处蕴藏着铁和煤的地方度过。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快乐岸边,都将有一幢漂亮的宅第。它包括两个侧楼、马厩、拉马车的马、一个大小合度的园林、一个带温室的大花园,还有蜿蜒于灌木丛中的舒适的马车道。宅子里住着为命运女神所青睐的人:一位英国绅士和他优雅的妻子以及漂亮的孩子们。他总是有能力为妻子提供闺房和各种珠宝首饰,让女儿们穿着各式漂亮的裙子去参加舞会,给儿子们准备好猎犬,而他自己则可以去苏格兰高地射猎。河岸的尽头则会有一座工厂,不少于1/4英里长,两头各有一台蒸汽机,中间则有两台,还有一个300英尺高的烟囱。工厂长期雇佣的工人就有800到1000,他们从不喝酒,从不罢工,星期天总是去教堂,而且总是用充满敬意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并不是所有资产阶级都能使这一梦想成为现实,但是那些能够使之成为现实的人已足够多了,他们使整个国家的风景都改变了。

托马斯·杰斐逊注意到,在法国由于大量土地资源都被用来饲养猎物而造成的变化。值得称道的是,他在1785年10月28日从枫丹白露(国王的狩猎地)给詹姆斯·麦迪逊(不是后来成为总统的

1. 拉什金(John Ruskin):19世纪英国美学家

那个麦迪逊)的一封信中承认,保护枫丹白露以供狩猎之用,这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他写道:“在欧洲,土地无外乎两类。不是耕地,就是那些圈起来禁止人们耕作的土地。因此人们不得不求助于制造业,这不是选不选择的问题。”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走得像英国那样远。根据恩格斯所写,在英格兰被圈为耕地的土地数量,和在苏格兰被改为鹿苑的土地之比是1:3。马克思也说:“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森林。园子里的鹿像家畜一样娴静,养得和伦敦的市政府参事一样胖。因此,苏格兰就成了‘贵族激情’的最后避难所。”

马克思对鹿苑的探讨,有一点上是值得注意的。在《资本论》第八部分中,提到政治经济学时代结束后英国家庭经济的状况。将森林转变为严加看管的鹿苑的做法,代表着小农阶级旧有的封建权利的最终消亡。

在同一章节中,马克思对以鹿代羊的做法也进行了研究。与上述情况相反,这代表着对食物和衣物生产的限制。这种做法可以用需求和供给理论进行全面解释。如果贵族选择在自己的土地上狩猎,那么他们就没有对人们构成直接威胁。如果羊毛或羊肉因此而变得昂贵了,我们也无法责怪任何个人。但对受到损害的人们来说,情况并不会因此有所缓解。

我并不是想将“鹿羊之换”硬加到原始积累的定义中去。我只是希望能把对单个家庭的自给能力产生直接影响例子加进来。但鹿苑的例子确实说明,广义上的原始积累不通过暴力手段就出现了。

第四章

社会劳动分工和家庭生产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可以概括为这种城乡对立的运动。

——马克思《资本论》

商品生产和社会劳动分工

我们对《狩猎法》的考察,使我们开始关注马克思对社会劳动分工所下的定义。与斯密关于最初积累的观点正好相反,马克思不仅发展了他自己关于原始积累的想法,而且对社会劳动分工的种类,也做了与斯密相反的归纳。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不赞同斯密在劳动分工上的观点的。他甚至在1862年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希望用《资本论》来说明“亚当·斯密所描述的构成生产基础的劳动分工,在手工工场中是不存在的”。

斯密将劳动分工描绘成在一间私人制针厂中的劳动安排,而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分工则是指将经济划分成各个独立的企业和产业。换言之,传统的社会劳动分工是在一间工厂内部,由雇主给被雇主分配工作而完成的。而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分工的想法,体现的则是劳动在不同工厂之间进行的分配,这种分工是由市场关系协调,而非单个工厂内部的某个权威人物来进行协调。

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是使经济被分割成单独的实体,这些实体专门从事某些产品的生产,如制钉、冶铁和生产食品等。这种社会劳动分工包含了当代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工业组织”的含义,只是它的范围更广,并不仅仅局限于商品生产。

在斯密著名的别针厂例子中,那只看得见的手操纵着一切,安排每一个工人去做某一项特定的工作。而那只看不见的手则决定着这家制针厂该用多少煤和机器。马克思认为,资本自觉地操纵着经济分工。他对社会劳动分工所下的定义,使一个经济中工业组织的决定力量,像上面制针厂内分配劳动的那只手一样明显。

在他出版的著作中,马克思对社会劳动分工用了相当的笔墨,这可以追溯到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早在一年前马克思就注意到,“从一开始,劳动分工就意味着劳动的条件、工具和材料的分化,以及资本积累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分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之作了深入阐述:“社会劳动分工构成了所有商品生产的基础。”

这个“所有商品生产的基础”,如列宁在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开头所讲的那样,被前马克思时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文小心地隐藏起来。在发掘这段历史时,无论是小商品生产还是封建形式生产,都必将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的根基也将显露无遗。

商品形式与社会劳动分工

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基础。在分析马克思为何有这种理解之前,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传统经济学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总的来讲,那时的传统经济学家往往忽视社会劳动分工的存在,因为他们认为,从技

术上来讲,这是由商品的属性所决定的。约瑟夫·洛尔在他的《英格兰现状》(*The Present state of England*)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如格雷先生所言,在伦敦,鞋匠被分为不同等级,包括为男人做鞋的鞋匠、为女人做鞋的鞋匠和为孩子做鞋的鞋匠;或者分为裁靴匠和缝靴匠。甚至在大家看来,活都是自己一个人干的裁缝,也被分成了做外衣、马甲、短裤、绑腿的师傅。”洛尔所强调的区别,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劳动分工很相近,虽然他不可能预见到当今社会如此纷繁多样的商品。洛尔的看法忠实于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有一本当代的书,将这一观点概括为,就中间商品而言,“投入就是生产出的商品,它应是变量,而非参数”。换句话说,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构是预先确定好的,而不是个人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如洛尔所列出的一套预先存在的商品,给社会劳动分工的形成圈定了一个基本模型。

事实上,社会劳动分工变化相当多,但要理解这种现象,需要对商品的真实属性做出重新估计。几十年前,有谁会想到现在的消费者会面对着这样的选择:是买烤好的面包、冻的生面团还是涂好黄油的面包?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罗伯特·特里芬觉得,经济学不应该只以一个行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本人坚持认为,应该把一系列不同的商品与社会劳动分工建立联系。他指出:“商品市场通过社会劳动分工而发展;不同的生产劳动,使各类产品转化为商品或其等价物,也使这二者互为对方的市场。”马克思在提及商品与社会劳动分工时指出,“生产的产品成为了商品,这正是相互独立的劳动之间的纽带”,金钱仅仅是“社会纽带的客观化”。

为了使这种关系更为清晰,我们必须采取另外一个步骤,即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商品之间究竟有何共同之处?答案在于:它们是在市场上用于出售的劳动产品。换言之,商品是能够以商品形式出售的产品,如果未经出售则不能视之为产品。那么何为

产品(product)?

马克思曾以美国的制伞业为例来考察这个问题。内战前,制伞商们仅仅是组装伞的零件而已。因此,这些伞柄一类的单独零件就成了商品。如果造这些伞柄的工厂也自己组装伞的话,那么伞柄就不可能以商品的形式存在了。

内战期间,美国国会采取了征收资金周转税的制度,由此扩大了商品零件和非商品零件之间的区别。当生产者将生产的零件出售给组装者时,必须交纳一定的税款,而组装者又必须为最终产品交付额外的税费。国会不理睬产业方面对这种复合税的抗议。马克思对国会的最终裁决表示赞同:“当一件东西被制造时,便被生产出来了,当它准备被出售时,才算制造出来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释中也提出过类似观点,“若要成为一件商品,产品应该通过交换的媒介转移到另一人手中,并对那个人具有使用价值”。我们还可以在《剩余价值论》中看到:“就价值而言,商品具有社会意义。价值实际上暗含着交换之意,但交换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事实上,‘价值’这一概念是以产品‘交换’为先决条件的。”

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个问题吗?当然不是。上面关于国会立法的引证提醒我们,商品所表现出的形式可以是不确定的。当美国制伞商仅仅组装那些用来制造伞的零件,那么每一个零件均是一件商品。但举个例子讲,如果伞柄制造者接管了组装过程,伞柄就不会再在市场上流通了。

社会劳动分工的有意建构

亚当·斯密曾有一次偶尔提起社会劳动分工:“不同行业和工作之间的分离似乎已经发生,这是由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所带来的分化。”但他并未将这一思想推向深入。虽然他用了一整章的篇幅

去阐述“劳动分工必然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他对市场力量如何产生这种分化，却只字未提。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有效地教会后代的经济学家去避免思考社会劳动分工这一问题。在社会劳动分工这个问题上，后世的经济学家总体上甚至比斯密做的还少。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忽视，给现代经济学理论留下了严重缺口。

除了马克思之外，几乎只有卡尔·罗得贝尔图斯^① 承认社会劳动分工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没有对社会劳动分工的预先认识，想要得出对国家经济基本分类的正确认识，是不可想像的。他觉得，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只不过是对个人行为的分析。因此，他认为斯密的方法是不全面的。概言之，社会劳动分工必须放到资本这一背景下才能被把握。但遗憾的是，很少有经济学家采纳他的这一观点。

马克思在这方面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值得庆幸的是，马克思不愿轻信表象，这种倾向远比洛尔更要强烈。他不会因为一件东西是马甲或是儿童靴，就将之视为商品：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社会性，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体现出来。也就是说，私人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

与洛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引发了对“工业”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建立在商品形式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

^① 卡尔·罗得贝尔图斯(Karl Rodbertus):19世纪普鲁士经济学家。

产机体分散的各部分,统一在劳动分工的体系之中,这种量的关联和质的关联一样,都是偶然的、自发的……发展起了一整个自然发生的社会联系网,全然超出人力控制之外。”

现代经济学家与马克思不同,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热衷于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这一观点对他们而言更为熟悉。包括现代经济学家在内,经济学家们很少涉及社会劳动分工这一领域,以至于在思考生产的社会关系时,社会劳动分工被完全排除在外。即使像尼古拉·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on - Roegan)这样卓越的经济学家开始讨论社会劳动分工问题时,对他的研究工作也完全忽视了。

社会劳动分工的战略意义

依据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史,重商主义^①者想要采取办法,来组织、控制经济活动,这暴露了他们对市场力量的无知。古典政治经济学则很明智,选择了服从市场。事实上,这种二分法是一种误解。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活动的分工。

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甚至那些大张旗鼓反对重商主义的人,也倾向于认为,利润最大的活动应该在英国进行,或至少应该在有利于英国的地方进行。以拿骚·西尼尔对《谷物法》的攻击为例。他反对这一法案,不仅是诉诸于跟自由贸易有关的那些普遍理论。相反,他攻击《谷物法》,是因为该法案对英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造成冲击。西尼尔警告说,如果英国坚持实行市场保护政策,反对进口食品,美、德等国将会转而追求工业发展。按照西尼尔的看法,放

^① 重商主义:一种经济学说和经济实践,16到18世纪风行于欧洲,它主张应由政府控制国家的经济。

开英国市场,实行谷类自由进口,将会使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忙于原料的生产,进而维护英国的工业霸主地位。

有一个辉格党人,对这一逻辑做出了相当详尽的阐述。1846年议会讨论《谷物法》时,他解释道,自由贸易是一项有利的“原则”:通过自由贸易,“外国可以成为对我们有价值的殖民地,而我们却不必为统治他们负担责任”。用一位现代学者的话讲,《谷物法》的流产,可被视为“给外国的谷物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英国市场,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上的农业化国家在英国这一自由贸易王国中人人有份”。

西尼尔发表这些话的同一年,弗里德里希·里斯特(Friedrich List)从一个德国人的角度,表示赞同英国人对自由贸易的看法。他说,自由贸易将永远使德国做英国的农业供给国,处于从属地位。他谴责英国人图谋将德国作为英国的附庸。英国人(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对德国自由贸易商的慷慨,里斯特对此表示尤为担忧。

路西尔·布洛克维更强调了英国在建构国际性劳动分工方面的努力。她尤其细致地阐述了,在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植物探险家所起的作用。乍一看,达尔文等英国植物学家的探索,似乎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不相干,但他们却肩负着重大的经济使命。布洛克维表明,即便是看似无辜的科学活动,实际上也是建立世界性社会劳动分工的一致努力的一部分。

拉丁美洲幸运地拥有当时世界上已知的最多的物种资源,但那里的人口密度很低,因此要利用这些潜在资源的花费巨大。为了开发拉美的香蕉或金鸡纳树,殖民者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拉丁美洲收割作物,雇用很少的拉美人或进口很少的劳动力;要么在其他地方种植这些作物。

亚洲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于是英国选择了后者。他们把赤贫的印度人带到马来西亚、锡兰、毛里西斯的种植园去工作。虽然

英国人也将一部分印度工人运到西半球的种植园,但让这些劳动力深入到南美,价钱就太昂贵了。因此,英国人宁愿将这些物种资源,运到离廉价劳动力聚集地很近的地方。但这又存在一个小问题:英国人缺乏繁殖这些作物的手段。不过这个技术性问题没有吓倒他们。

英国人交付给他们的种植园主这样的使命,即尽可能找到可以在英国的亚洲殖民地繁殖的作物。大体而言,他们是成功了。英国断然拒绝承认周边国家人民甚至是统治者的任何可能的正当权益,并且从拉美走私了许多经济作物,从中国走私茶叶,连一点儿补偿的念头都没有。这是一种极典型的对生物资源的原始积累行为。紧接着,他们让这些作物在新土地上得以种植,这一招使英国能够重建热带农业的国际结构。

热带农业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关键部分。英国对热带农业的重新组织,大大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正如里斯特所言:“可以说有这样一种规律,即一个国家越富有、越强大,就出口越多的制成品,进口越多的原材料,消费越多的热带商品。”英国抱有这样的念头已有一些时候了。还是在1774年,塞缪尔·约翰逊就曾反问道:“为什么国家想要它本可以拥有的东西?为什么香料不能移植到美洲(英国的殖民地)去?为什么茶叶还是要继续从中国进口?”

詹姆斯·安德森谈到过移植有用的香料有什么好处:“虽然多疑的荷兰人一心想独霸香料业,法国人还是尝试着从荷兰引进香料幼苗,并且成功了。”他没有说印尼等地的土著人在香料问题上也有份。

在塞缪尔·约翰逊考虑把茶树移栽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后两年,亚当·斯密就请读者注意,生产一件羊毛衫所需的复杂社会劳动分工问题:“为了凑齐染匠所需的不同的、通常是来自世界上最边远角落的染料,多少商务和海运,多少造船人、水手、制帆人、制绳者需要被雇用。”很明显,斯密没将种植染料作物的人的福利考

虑在内。政治经济学家的良心,很少受到这类问题的困扰。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形成世界社会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呢?难道他们真的完全不知道,社会劳动分工才是商品生产的基础吗?

绝对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巨著中,并没有完全忽视劳工的意愿。他们意识到,同移栽、培育几个种子或插枝相比,工人大众是个更难对付的问题。与植物不同,工人有自己的思想,他们能抵制资本积累的命令。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试图找到能够操纵社会劳动分工的战略,以此来扩大资本与劳工的力量对比。

社会关系与社会劳动分工

在划分两种劳动分工的同时,马克思又发展了另一种区分方法。他把工厂中受雇于一特定雇主的劳动力称作“可变资本”。与之相对,他把雇主购买到工厂中的、体现在中间商品生产中的劳动力,称为“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之所以“可变”,是因为劳动力——工人的劳动能力——彻底被雇用后,会在最终产品中体现一部分剩余价值。而不变资本仅仅将事先存在的价值转移到最终商品中,而没有创造剩余价值。

马克思单单选择“可变资本”作为剩余价值的源泉,理由很充分。雇主必须要求工人在生产时,节省地使用原材料,以便赚取利润。购买中间商品,有助于雇主从工作场所雇用的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但中间商品本身并不产生剩余价值——至少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从购买商品的厂商的立场上讲,生产不变

资本的劳动力,才是不变资本。换句话讲,不变资本所代表的原料,对于购买它们的资本家而言是无利可图的。处于另一种社会劳动分工位置的其他雇主,却从同样商品中获得利润。因此,劳动力并没有为购买它的产品的厂商生产出剩余价值,而生产不变资本的同—劳动力,对于本身的雇主而言却是可变资本。由此,那个劳动力对那个雇主来说,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

按照这种说法,所有雇主都必须寻找能提供潜在利润的市场机会,然后为了赚取潜在利润,而选择适当的不变资本去雇用。在这个过程中,雇主可以对工厂内的工人行使直接权力。而对于生产中间商品的其他工人,他们只行使是否选择购买该商品的间接权力。

当雇主调整他们所购买的不变资本的成分时,他们也改变着社会劳动分工。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变化,同一个物品或体现为“不变资本”,或不体现为“不变资本”,这取决于它是在市场上流通,还是在工厂生产过程中被使用。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在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存在的物质形式”可能会改变。

就社会劳动分工来说,马克思同当代经济学相比,迈出了重要一步。现代经济学家认为,技术革命必然导致新产业的产生,消灭别的产业。他们从未意识到,在一套固定不变的技术框架内,社会劳动分工还可以发生变化。乔治·施蒂格勒^①可能是唯一的一位注意到社会劳动分工的不明确性的经济学家。直到最近他才注意到:“在一特定单位内所进行的生产过程的比例,是一种偶然因素。”之后他暗示道,社会劳动分工的大规模变化,反映了市场应付变化的能力。他以英国枪支和珠宝工业为例,说明社会劳动分工的这一流动性。伊丽莎白·贝利和安·弗里德兰德还认为,爱德华·

^① 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美国经济学家,他因为对市场行为和政府调节效果的深刻而非正统的研究,获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宾逊业已观察到,价格的变化可以改变社会劳动分工。现在商业广泛采用了从外部引入资源的做法。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工厂的界线可以改变。但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不确定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全部意义。

让我们回到那个制伞业的例子,来解释一下社会劳动分工变化的实质。在这个例子中,不变资本,即制伞者购买的柄,被转化为另一种不变资本——伞柄,并最终组合到完工的伞之中。如果该行业合而为一,制伞者也自己生产所需的柄,那么伞柄就不会是商品了。因而,何为商品,何为非商品,取决于社会劳动分工的划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明细。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①所说:“功能划分得越来越细,或者说‘越来越分化’,这说明工业机体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牢固。”同样的,瓦斯里·里欧提夫对输入、输出结构方面的分析,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越庞大、越发展,它的结构就会越完备、清晰。美国和西欧的商品和服务输出量,分别占全世界总量的1/3和1/4,因此,它们的输入输出一览表上呈现相同的三角形结构(输入—输出结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克思就曾指出,单伯明翰就生产多达500种的锤子。一种产品多样化的这种现象,反映了社会劳动分工可能存在多种不同模式。比如,每次一个工厂在生产过程中用一种锤子取代另一种锤子,就改变了社会劳动分工。施蒂格勒的证据,证实了马克思的假设:现代工业既发生了纵向组合,也发生了重大的纵向分化。

关于正在进行的社会劳动分工重组,马克思是这样认识的:

^①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主要创始人之一

举个例子来说,较大的英国玻璃制造商,自己制造陶器熔炉,因为它们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生产过程的成败。在这个例子中,一种生产资料的制造,是跟产品的制造统一的。另一方面,这种产品的生产又与其他制造过程相关(那些制造过程以这些产品为原材料),或是与其他产品相关(最初的产品混合在那些产品中)……组合在一起的不同产品,通过这种形式或多或少地构成一个完整产业的不同部分,但同时它们又是相互独立的过程,各自有着自己的劳动分工。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结果不可能是确定的,因为存在着无限多个安排方法。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劳动分工演变得非常剧烈,它不同于马克思所指出的那些印度村舍,在那里劳动分工是“固定的,并最终由法律确定下来”。

马克思也不是一贯遵从他自己的逻辑。他不时也表示赞同工业技术宿命论,他承认对大机器的不断依赖,最终决定社会劳动分工。他写道:“尽管生产的联合体现出许多优势,但它不可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获得完整的工业统一。只有当它转变为机器化工业的时候,这种统一才会出现。”当然,马克思没有条件看到今天很普遍的商品和服务的快速组合与分离。比如,在现在,我就不清楚到底电话是电脑的延伸,还是反之。

综上所述,区分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与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分工观点,对于理解商品生产的实质是尤为关键的。在这方面,马克思坚持说:“尽管二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与联系,但社会内部的劳动分工与一个工厂内部的分工,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更有实质上的差别。”对马克思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社会劳动分工的无政府状态,与工厂中劳动分工的专制状态,是相互制约的”。

生产与社会劳动分工

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探究他们命名为“范畴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cope)的命题。这一理论描述的是,一个工厂为达到竞争目的,如何决定在多个已存在的社会劳动分工中运作。这并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产生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模式,那么社会劳动分工本身是如何改变的。

在马克思的制伞商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生产规模的大范围变动如何让伞柄不再成为商品。如果将这一演变转向另一方面,那么伞柄能在瞬间变成商品。更为普遍的是,生产过程几乎可以在任何一点中断。也就是说,一个工厂可以不把自己的产品做成成品,相反可以将未完成品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市场。其他厂商可以推出一种新的产业,来完成生产的全部工序。

遗憾的是,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分工不确定性这一发现。事实上,他们甚至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社会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的分析很少能深入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秘密所在”。而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家也时常像在刻意回避生产的所在地——工厂。

这种习惯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总的来说,经济学是遵循着斯密的假设的,即除非一个工厂能利用垄断地位,否则,工厂只不过是被动的导管,用来帮助资源在各种活动之间进行流动罢了。

在一定限度内,社会劳动分工是按照自身的特殊规则展开的。但马克思认为,它最终取决于生产的社会关系。下面这段话是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在写给康拉德·史密特的信中提到的:

只要有社会范围的劳动分工,不同的劳动过程就会彼此独立。最终说来,生产是决定因素。但一旦产品贸易独立于真正的生产时,它就会拥有自己的运行方式。虽然贸易的运行方式还或多或少受控于生产,但在细节上,在大的附属关系之下,它可以遵循自身的内在、本质法则。这种运动有它自身的阶段性,反过来又作用于生产活动。

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社会劳动分工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演变。但他们观察到的这种自发性,并不是一种自由。相反,它是一种无序状态,导致了人类的巨大痛苦。尤其是,市场关系的自发性,被用于强调工厂内部的独裁状况,以及强迫工人屈从工资劳动的那些压力。

强制、原始积累与两种劳动分工

在谈到强制力与两种劳动分工的关系时,马克思这样写道:“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普遍法则:社会内部控制劳动分工的权威越少,工厂内的劳动分工就会越发展,越受制于单个人的权威”。我们在“权威”前面加上“公开”二字,就不违背马克思在后期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了。这段早期的引文还弱化了对社会分工的有意控制,以及这种分工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阶级的影响。

尽管有许多局限,这段文字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突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包括上层特权阶级的个人权威)决定着社会和工厂内部的两种劳动分工形式。这种传统最极端的例子是印度的等级制。人们一般继承父辈的职业,因此说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劳动分工。

在早期的工场中,是没有以阶级为基础的权威的。相反,工场

主受到习俗的约束。尽管师傅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学徒,但学徒却能理所当然地设想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师傅。

对马克思来说,原始积累反映了传统工作组织方法的迅速崩溃。通过操纵社会劳动分工,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可以强迫工人在资本主义的专制权威下,为了工资去工作。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劳动分工是现代劳动分工的前提。

最初,传统力量仍很强大,对很多人来说,原始积累似乎是反常现象。工人们声称,根据传统的财产权,他们有权控制自己的劳动。例如,1823年棉花纺织工对他们的工作重组提出抗议,称:“纺织工的资格,应被视为他的财产和生计来源,就像土地和房屋是其他人的财产一样。像它们一样,它也消耗了时间、努力和金钱。”在某种意义上,纺织工们是对的。事实上他们的说法表明,原始积累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一场大变革,其范围远比将农民从土地上正式赶走广得多。

将人们从在乡村的传统土地上驱逐,就开始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通过重新组织劳动过程,最终摧毁了纺织工的生产资料(由他们的技能带来的生产能力)。原始积累向雇主提供了似乎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并且,一旦机器取代了手工劳动,就可降低这些劳动力的价格。

纺织工把棉纺业中的重组,看成另一种原始积累,其表现是偷窃了我们今天所称的“人力资本”。虽然纺织工们的逻辑可能有些幼稚,但至少他们意识到,原始积累与日益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近期,哈里·布拉维曼竭力提醒读者注意工作场所的劳动分工与强制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将现代劳动分工的演变,归因于日益增强的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后者又是由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导致的。虽然纺织工缺少布拉维曼将社会劳动分工与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相结合的理论深度,但他们有一点是超出布拉维曼的。

生产的行为者——家庭

让我们更清楚地看看新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变化。我们要记住,政治经济学是在社会劳动分工尚不太发达时诞生的。马克思是这样描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实体,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如果我们引用马克思这段话来描述政治经济学诞生时的经济环境,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也八九不离十。

约翰·雷描述了19世纪加拿大边境的生活,揭示一个典型的农场能在何种程度上达到自给自足。在那里,农场主之间用牲畜换取天然羊毛衣和鞋子。很明显,雷所说的人并非再现了前资本主义时期英国式的生活方式,但他的描述文字的确体现出自给自足的家庭生活风情。

同样,封建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中世纪时只有修道院才登录农业的账目。凯斯·特莱伯的农场管理账目史很清楚地反映出,人们市场问题是逐渐地关注起来的。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家庭对现代意义上的消费结算,的确还没有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之前,人们不可能清楚地区分,到底哪些活动是为了生产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哪些活动是为了自己。

例如,17世纪伦敦的面包师向地方当局申请提高面包价格。当时,他们提交的是面包房一周的花费,包括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四名付酬雇员、两名学徒、两个女佣和面包师的三四个孩子的花费。这个生产数千条面包的作坊,就在面包师自己家里。工人的衣食住行,包括面包师自己的家人,都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把商业经济和家庭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最多见、最现代的情况,可能就是寄宿制度了。在19世纪的美国,根据劳动局的研究结

果,几乎 1/5 的工人家庭招寄宿房客。寄宿房客对移民家庭来说非常重要。1908 年的研究发现,在宾夕法尼亚的斯拉夫人中,有 43% 的家庭有寄宿房客。有半数以上家庭的全部家庭收入的 25%,来自寄宿房客。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家庭与工厂的分离。这种家庭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分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显著(虽然这种生活和工作的分离,更多的是表面现象,而不是真的分离)。但就整个再生产过程来说,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用马克思的话讲:“工人阶级的维持和繁衍,是资本再生产的必然条件。但资本可以将这一任务,安全地托付给工人自己的自我保存和繁殖动力。”因此,在考虑家庭生产时,必须将其与大的社会劳动过程相联系。如马克思指出的,虽然“工人的生产性消费(在工厂中对不变资本的使用)与他的个人消费是完全分开的……但在个人消费(活动)中,他在生产过程之外生产出极为关键的产品”。

家庭的转变

在此,我想扩展一下对社会劳动分工的想法。前面说过,马克思对社会劳动分工的分析,似乎是指将商品生产过程划分成各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工厂)。由于我们关心的是工资劳动与非工资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将超越直接商品生产的范畴,对生产过程进行诠释。我要用社会劳动分工概念,来涵盖从经济角度看的所有有用劳动,不论此劳动有没有工资报酬。所有在家庭中进行的促进经济再生产和生产发展的劳动,都与社会劳动分工的定义相符。至于“再生产”一词,我指的是对为工资而工作的人进行补充,以及培养新一代工人之类的活动。

要分析家庭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需要强调两个要点。第一

个要点跟进行中的原始积累的重要性有关。第二个要点是,这种分析提供的一种理论模式,有助于澄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社会劳动分工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立场。

在这个已经转变了的体系中,资本要求家庭发挥与工厂一样的功能。从再生产角度看,家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工厂,专门从事工人的生产,而“这些工人与他们所控制的大机器上的部件又是类似的”。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都从属于这个目的。

工厂为了生产可供出售的产品,而将活的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不变资本)相结合。同样地,一个工人的家庭也要将活的劳动力与其他商品(可变资本)相结合,以此来生产出畅销产品——劳动力。因而,“消费不仅仅是物质资料(或服务)的消费,更是消费本身”。

最终,家庭所消费的东西,被用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在这方面,马克思把读者的视线,引导到家庭所扮演的生产行为者这一角色上来。他写道:“从社会的观点看,工人阶级,甚至是那些并不直接参与劳动过程的人,充其量仅是像普通劳动工具一样的资本的附属物。”对马克思而言:“劳动力首先是将物质性注入到人的机体中”,这个人的机体注定要成为雇佣劳动力。萨依甚至将这种观点提高到逻辑的极限,把一个“成年人”定义为“一种积累资本”,其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

家庭和工厂都为了生产出最终产品,而将劳动力与其他物体相结合。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们是相似的。但二者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却是不同的。正如马克思解释的:

纺锤和纺织机,先前散布在乡下,现在却与工人和原材料一起,被挤放到少数几个大工棚里。作为纺织业者独立生存工具的纺锤、织机和原材料,现在却转变为控制他们、从他们身上榨取无偿劳动的工具。

但人们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因为“可变资本”通常被描绘成工人获得的价值,而“不变资本”常常指他们在工厂中所用的东西。事实上,进入工厂或家庭中的东西,都是通过交易的途径进入的。但在家庭里,工作者拥有生产资料。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金并没有进入中间产品生产过程,但却进入了整个生产关系中”。

因此,我们必须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统一体系来理解家庭,虽然这样做不是一件易事。在资本主义家庭中,我们既可以发现相互支持的手段,也可以发现相互压制的手段。法国的“限制”经济流派(regulation school)对于理解家庭的复杂性很有帮助,它使我们注意到新的社会消费准则,这些准则被用来推行“看不见的线”,将劳动力束缚到资本之上。

恩格斯正确地评论道,随着资本的发展,家庭作为一个自主单位的地位在相对下降。不管怎样,对建立在工资劳动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讲,家庭的生产能力仍然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即使它的具体功能已发生变化,我们也不应低估家庭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作为一种生产场所的持续重要性。

创造新制度

当资本主义将独立的家庭劳动过程转变为统一的社会过程之时,它也使工厂与家庭之间产生了空间距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使各个独立的工厂结合成更大范围的一套市场关系。用西尼尔的话讲,“自然似乎已经打算好,要用相互依存关系,将地球上所有居民统一到一个巨大的商业家庭之中”。

这个“巨大的商业家庭”的建立,要求瓦解各个家庭的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使家庭加倍地具有依赖性。第一,家庭开始依赖商

品,这些商品通常是由雇佣劳动生产的。第二,为了获取商品,家庭成员必须向市场提供雇佣劳动力。

当然,就一般情况而言,家庭与经济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例如,史都华提醒他的读者们,希罗多德曾用胡萝卜和洋葱来计算金字塔的造价,但法老们更可能用实物来给工人付酬,而不是用现金。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有责任通过劳动去赚取工资,然后用所得去交换生存必需品,最后有效地将这些商品与家庭劳动力结合起来,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从这种意义上讲,再没有哪种社会组织能如此将“人生转化为劳动时间”的了。

家庭经济对资本需求的适应性,并不总是一个没有痛苦的过程。马克思描述过由于缺乏哺乳时间,人们广泛使用鸦片,还有,家庭成员由于缺乏足够的休息,不得不让小孩子去做饭和缝衣等。他辛辣地讽刺道: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为了追求自身物价的稳定,是如何侵占了消费所必需的家庭劳动。这种危机(美国内战时期英国纺织工业所经历的棉花匮乏)也被用来教工人的女儿们如何缝补……需要一场美国革命和一个全球危机,来让工人家庭的女孩们学会为全世界缝补!

如 E. P. 汤普森指出的:“工业分化和专门化的每个阶段,都对家庭经济造成冲击,扰乱了夫妻间、父母与子女间的习惯关系,也使‘工作’与‘生活’区分得更明显。”传统家庭的这种变异,似乎是为资本主义而付出的一个小代价而已。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未涉及过家庭的变异。当讨论贵族家庭时,一些人明确地视家庭内部的活动为“非生产性劳动”,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抬高上层人的消费模式的身价(上层人通常是雇仆人

来做家务的)。下面在讨论斯密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很明显,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可能也这样看待工人的家庭劳动。如马克思曾指出的一样:“社会最大的一部分,也就是工人阶级,必须偶尔地也为自己干一下这种活。”

这种回避家庭本质问题的做法,是非常不合适的。它模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范畴。我们下面会看到,工厂内的商品生产与家庭提供的劳动力之间建立的联系,是最为有利可图的组合。即使是这样,许多人仍希望家庭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以使雇主支付尽可能少的工资。

家庭经济的节约问题

贫困的家庭却能够以更低的花费得以维持,这种方法很有吸引力。尼尔·斯梅尔斯指出,从18世纪最后10年开始出现了:

大量小册子,劝说工人阶级用蔬菜、印度玉米、竹芋等,取代家庭开支中更贵的食物。与此同时,一些宣传性小手册还探索出减轻高额食物开支负担的办法。伊顿在他对穷人的研究中,用了40页篇幅来叙述北方人如何节俭。在1806年,考克蒙恩说,“对劳动人民来说,没有比全面教他们经济烹调法更大的恩惠了。”

逃亡的美国人朗福德爵士^①根据他为巴伐利亚军队和巴伐利亚贫困人家的住院者供应食物而获利的经历,猜想说:“任何一国,需

^① 朗福德(Rumford)爵士;即汤普森(Thompson, 1753 - 1814),曾抛下妻女,逃出美国;曾任巴伐利亚的军务和警察总监。他提出了许多社会改革方案。

用国内生产来供养的居民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其农业状况,也取决于这一国的烹饪手法。”这个绅士对烹饪学的主要贡献,就是他所做的经济汤的配方,这种汤的制作运用了他的一个发现——水是取代食物的好东西。

如果人类机器能自我维护,那就可以节约,因此,雇主也对大部分雇员的个人行为产生了积极兴趣。美国钢铁学院的福利秘书敦促人们加强对工人的指导和管理,包括:

工人三餐的量、风味和咀嚼方法,饮料的数量和口味、休息、睡眠的时间,房间的通风……饭前洗手、每天洗脚、穿合适的鞋子、衣服的数量和样式、保护眼睛、耳朵和鼻子,刷牙以及定期检查内脏。

这些能力使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时,工人仍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这对资本而言,利益是巨大的。甚至当没有外来收入时,工人也能管理、安排自己的事务,这也会大大减轻资本所承担的责任。事实上,在斯密的“劳动工资”一章中暗示说,就是这个因素使雇佣劳动制比奴隶制优越得多。

但是,也不应将雇佣劳动制和奴隶制之间的区别过度夸大。奴隶同样需要利用自由时间去种食物和完成其他工作。实际上,罗德尼·希尔顿甚至提出,欧洲农奴制是在分给罗马奴隶们的那些土地上起源的,那些奴隶被认为可以养活自己。其实,许多观察家都曾归纳出雇佣劳动制与奴隶制之间,在运作上的相似点。例如,詹姆斯·密尔说过:“一个人通过雇佣工人来运作(和通过奴隶来运作),有什么区别呢?……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购买方式的不同。”另外一些人认为奴隶与雇佣工人不同,但觉得这种区别对奴隶有利,认为奴隶比自由工人的境况好多了。这一思想在现代的《十字架上的时间》(*Time on the Cross*)一书中,取得了共鸣。

从一个方面来看,奴隶比赚工资的人更幸运。一些奴隶主觉得有义务照顾生了病和上了年纪的奴隶。而劳动力的雇主们则大都没有这个概念。用一位直率的美国经理的话讲:“我看待给我工作的人,就跟我对机器的态度一样……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就像我自己照顾自己一样。当我的机器变得老而无用时,我就丢弃它们,再买新的,而这些人是我整台机器的一部分而已。”

最后,家庭生产的经济作用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且退到了次要地位。人们不再强调家庭内部“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相反,人们普遍强调“交换价值”。从资本的角度来讲,工人家庭只是出卖劳动力,以购买商品(那些商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推销的)。

作为消费场所的家庭

现代经济学一般不把家庭看成生产场所,而是消费的行为者。这大概是被摈弃的“非生产性劳动”理论的一个遗物。即便如此,对家庭经济的关注从未完全消失。有一本叫《实用家庭理财》(*The Practical Housekeeper*)的书主张:“既然以赚钱提供舒适的生活手段,是男人的事,那么精明地安排这些财产,保持井然有序与和谐,就是女人分内的事了。”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对维克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主妇提出了一大堆批评意见,说她们不会精打细算。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怨声不迭。他批评说,英国和美国的家庭主妇不如法国的家庭主妇“花钱经济,倒不是她们不懂如何买东西,而是她们不会把廉价的骨头关节、蔬菜等原料做成好商品。家庭经济通常被称作是一门消费科学,但只说对了一半。在一部分严肃的英国工人阶级中,家庭经济中最大的错误出现在生产上,而不是消费上”。马歇尔在两个方面是与众不同的。首先,极少有经

济学家会留意真实的消费过程的重要意义,除非那些批评工人的过度消费(尤其是酗酒)的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马歇尔将家庭消费与整个生产过程联系在了一起。

菲力普·威克斯第德^①是少数间接提到女人的生产劳动的经济学家之一,但对此涉及的大部分是如何分配资源问题。在《政治经济学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他详细阐述了家庭主妇在购买、分配食物中的作用。之后他又提到给鹅填塞过量饲料、招寄宿房客的例子。但所有这些例子都包括在一个冗长的条目中,该条目中还包括家庭祷告、对大家审美趣味的培养。即使在这些方面,他也仅仅是想证明他的主观化观点,即“当总满足量上涨时,‘总满足’的边际意义在下降,这一原则仍未改变”。

马歇尔和威克斯第德在女人劳动问题上的明显不同见解,对马歇尔有利。马歇尔可能只是在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运动,那就是为促进资本积累而提高家庭生产效率。虽然如此,至少他承认家庭是生产活动的行为者,而不是将家庭局限为消费的场所。

马歇尔区分了家庭中的消费效率与生产效率。这种区分与传统经济理论是不一致的。今天占统治地位的关于家庭的新古典理论,是以现状为基础来进行论述的,即家庭是消费者,资本主义以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形式,满足了家庭的最大利益。因此,教师们希望学生能应用“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工具,去解释种种现象,如食物浪费的程度、读书程度、睡眠程度,甚至是家庭的大小等。

当然,工人家庭的个人满足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们最不曾想过的问题。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在研究家庭时,任何把“满足”问题当做基本分析范畴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并不能因为驮运东西的牲口喜欢它所吃的东西,就认为它的食物消耗不是生

① 威克斯第德(Philip Wicksteed, 1844 - 1927):英国经济学家、古典学者。

产过程的必要部分。”西尼尔也阐述了类似想法：“劳动者消耗食物，与蒸汽机消耗煤有何区别呢？很简单的一点是，劳动者从他消耗的食物中获得快乐，而蒸汽机则没有。”

没有注意到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的联系，还不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也遭到了批评。在女权主义者的关注下，近期的著作较少犯这个错误。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常常依赖于一个僵化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前资本主义的结构被等同于生产“使用价值”，与之相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只是商品生产。

家庭生产理论的演变

大家注意，我们似乎提出了看似互相矛盾的关于家庭生产地位的两种说法。先前我们强调，原始积累的作用是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推动作用依靠剥夺家庭的生产资料、限制家庭生产的效率而达成的。本章强调的重点，则是资本所关心的提高家庭生产效率这一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从最明显的层面看，对家庭生产的看法，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处的阶段。每当自给自足经济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严重阻碍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会对维持工人家庭自给自足能力的条件，不断表现出敌意。一旦政治经济学确认家庭经济发展几近停滞，家庭作为生产者的地位将从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学家就似乎对社会劳动分工的演变完全失去了兴趣。相反，他们力劝家庭应成为劳动力的更为有效的生产者。最终，当有效需求问题得到更多关注后，经济学家就将家庭看成了消费场所。结果是，家庭作为生产场所的作用被普遍地遗忘了。

现代政治经济学，受到家庭是消费者这一想法的限制，把自己

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建立在“效用最大化”这一核心概念上。受这一狭隘观点的蒙蔽,现代经济学就无法理解,家庭生产的作用随着时间发生了怎样变化。更糟糕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工人阶级私人生活的控制与管理问题很感兴趣,现代人对这个问题却保持沉默。

家庭与社会劳动分工的变化

20世纪早期,美国的工业把自己推销的家庭用具,与提供给工厂的工业装备,看成类似的。从这方面讲,工商业试图通过发明新的家庭用具,将家庭劳动的生产潜力革命化,以此开拓新市场。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用具的所有者或操纵者,适应从手工技术到机械化的转换”。例如,在“泰勒制”盛行时期,家用工具的生产者雇用时间专家、运动专家去设计厨房,想将资本主义工作节奏带入家庭。

在今天,我们把这些家庭用具看成消费的一部分,而不是生产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属于工业范畴)。事实上,“美国工人在家中,与在受雇用的工厂中相比,拥有更多资本储备可供使用”。许多因素导致我们没有去关注家庭的生产性作用。如此众多的商品能减少家务所花费的时间,任何观察现代家庭的人对此都会深有感触。食品是被加工过的,衣服也是现成的,而与此相反的重要趋势则被忽略了。

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日益复杂化,对家庭的要求也复杂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更新工人能量的过程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尽管现代家庭表面看来是节约了劳动力,但依然保留在家庭经济领域中的那些任务,却变得越来越费力了。制定预算、购物,就是明显的例子。“女人的事”在许多

方面都比以前更费时了。

这种不付酬的家务劳动的重要性,绝不是微不足道的。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 640亿美元,据对美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估计,家庭产值就占2 120亿美元。当然,关于家庭生产的这种数字是不够准确的。例如,罗伯特·艾斯那就估计说,家庭产值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到50%。即使是再低一点的估计,也反映了家庭生产对我们生活水平的重要贡献。不仅如此,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估计说,非市场消费与市场消费的比值正在扩大,从1929年的3:5扩大到1965年的3:4,虽然这种估计由于缺少一些未记录的商业交易数据,会有所偏差。

一些家庭的消费正好不利于生产,如吸烟过度和酗酒。但即便消费与工人生理能力的补充没有直接联系,消费仍可以促进生产。举个例子来说,一些年轻人有无休止的好奇心,这驱使他们由玩电子游戏,改为自己创造电子游戏。反过来,电子游戏的发展商所发明的技术,对促进计算机制图又有很高价值。

如果家庭是一个关键的消费者,我们就能很容易发现,新商品是如何影响社会劳动分工的。正如前面所讲的,美国家庭过去是自己洗衣服。到了20世纪,商业已经从城市家庭接手了大部分的洗衣工作。随着洗衣机的发明,许多家庭开始自己洗衣服(或是在家,或是在自助洗衣店)。格雷·贝克对修面的历史,也做出了类似描述。

这些例子表明,家庭可以再度成为商品生产的中心。随着信息化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更多商家通过给工人家中装上计算机终端,来节约昂贵的城市办公空间。这一体系在其他方面也很有利可图。工资不必再包括工人往返的交通费。此外,工人彼此分离,也减少了他们组织起来的危险。

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资本对家庭在经济中的地位并非不关注。我在别的地方曾经用这种分析方法来解释,社会劳动分工的

变化,悄悄地推动了农业的积累过程。

原始积累与社会劳动过程简图

在这一部分,我要用一种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家庭劳动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留意过这种模式逻辑,但他们没人曾做过像下面图表类似的工作,以明确的形式使之成为系统的整体。事实上,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将生存经济排除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之外,但他们却敏感地注意到它的实际分支。

当论述家庭经济受控于资本需要这一过程时,他们通常忙于讨论实际政策问题,如爱尔兰政治或济贫法。在这些理论性较弱的著作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直提倡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将影响生存经济,从而促进新的社会劳动分工,使资本能获得更大利润。一旦我们意识到,家庭是商品生产体系中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这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论表述和实际应用中暴露出的自相矛盾,就显而易见了。

在这一模式中我们观察到,典型的工人家庭将它的一天分为“为工资而工作的时间”和我们所称的“家庭生产”时间。“家庭生产”包括自我供给的生产,也包括向市场提供食物和手工制品的生产。虽然家庭在整个商品生产过程中仍是一个重要部分,但家庭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分:用于自我供给的家庭劳动并不具有价值。

根据马克思所言,我们通过衡量再生产劳动力过程所消耗的商品的价值,来衡量劳动力的价值。商品价值是由直接作用于生产的劳动,与消耗于折旧过程中的非直接劳动的总和决定的。商品只有在市场上出售才具有价值,因而这些价值忽略了用于再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那部分家庭劳动的价值。

马克思在他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中,没有阐明这一点,但他的论述中似乎的确对此有过暗示,即劳动力价值等同于“可变资本”价值,“在物质上包括工人的生存资料与他们的产品的一部分。但这一价值是用金钱一点点支付给他们的”。换句话说,工人的实物形式的消费,似乎被排除在“可变资本”之外。

单个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在工业生产中是不同的。同样,工人家庭内部劳动力价值与所消费商品的价值也可不同。一些家庭会采用不典型的消费模式。但总的来讲,如果我们处理大量家庭的平均值,这种反常情况就可排除在外了。

应该注意的是,家庭劳动与工资劳动之间的社会分工变化,会影响到劳动力的价值,进而影响到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例如,如果一个典型家庭开始不再买面包,而是自己做面包,商业面包师的劳动就不再被计算到家庭劳动之中了。既然过去家庭内部用于烤面包的劳动不计入价值,那么扣除掉原料的那部分价值,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幅度,等于以前购买面包的价值,减去配料的价值。

与之相对照的,让我们考虑一下,当一个工厂把多个生产流程吸纳进来,以此来减少其不变资本消耗量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减少的劳动力(劳动力以前是工厂投入,是一种购买的产品),会平衡工厂多雇用的劳动力。因此,“该工厂所生产的价值并未发生改变”。

简单模型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图,把家庭与整个生产过程的关系表达得更清楚。图1表明,在商品生产的简化体系中,家庭并不以生产者的角色出现。不变资本(C)与劳动力(LP)相结合而产生出商品

(W), 商品取代了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 或者被用于资本主义消费或积累, 如图中 W 所引出的箭头所示。图 2 承认家庭是生产者, 家庭的劳动时间被分为家庭生产(H)和商品生产, 由 V 和 S 的大小来体现, 而后者(S)指剩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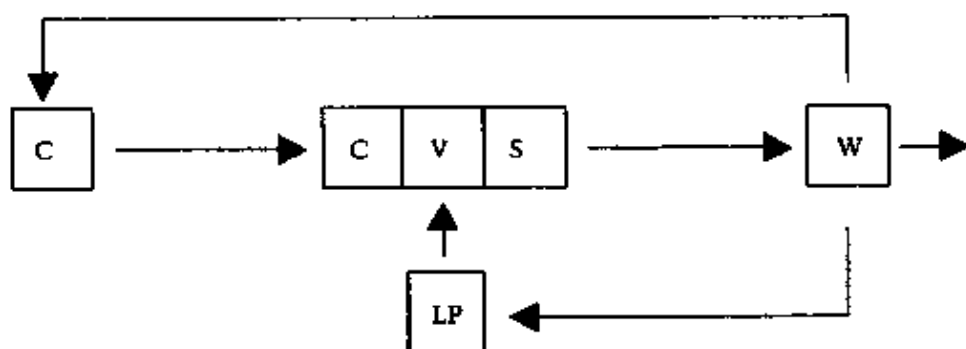


图 1 生产过程简图

我们把一个完整工作日分为三部分:(1)家庭由于自身原因而进行生产的时间;(2)为工资而工作的时间,这部分工作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是家庭要以商品形式来购买的;(3)为工资而工作的时间,但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将为其他阶级所购买。为方便起见,假设第二类时间用于生产必需品,第三类时间是为资本积累而生产的奢侈品。第三部分可估量剩余价值的大小。

另外,假设工人消费了所有必需品,其他阶级也消费了所有奢侈品。既然我们的模型是静态的,假设资本货物维持不变,无需被替换,那么我们就可视资本货物为奢侈品。最后,这一模型采用了另外一种简单模式,此模式常常让人想起马克思,但实际上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全部家庭可合起来视为一个单一实体。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这个简单模型。按照古典政治经济的典型手法,我们的模型假设工人的生活水平代表正常的生存水平。为了生产这些生存所需品,我们假设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是一定的,而不论工作是在家中还是在工厂进行。这就暗含了这样一个假

设,即家庭或商品生产部门所用的技术是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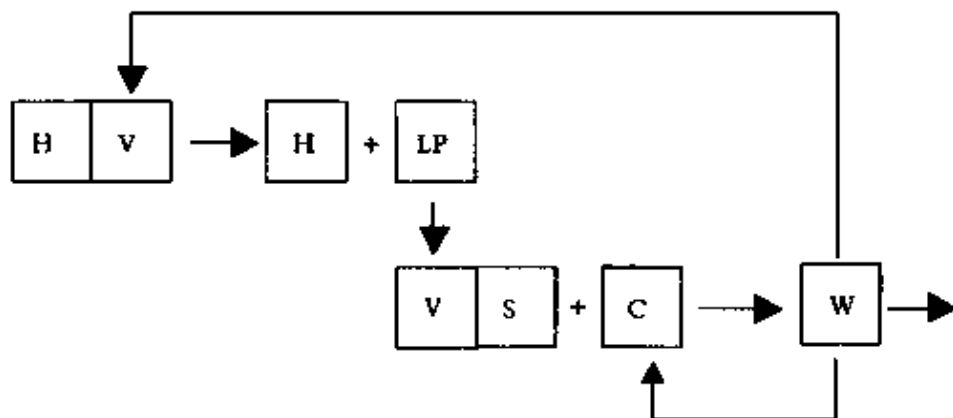


图2 将家庭包括在内的生产过程

模型与工作日

在今天看来,工厂和家庭运用一样的技术,这种假设似乎不合理。但至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工人无论在工厂做工,还是为自己做工,都差不多,用的技术也基本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资本对传统生产者的早期控制,视为仅是“形式”上的:

在这一简单过程中,很明显资本家既没有准备原材料、机器,也没有为织工提供生存资料。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步步把他们(职工)限制在一个工种上,让他们开始依赖销售、买主、商人,以至最后只为他而生产,通过他才能生产。他最初只是以购买他们产品的方式购买他们的劳动。

既然整个工作日确定了,用于生产工人的消费品的时间量也确定了,生产奢侈品的时间也就确定了。家庭为自己生产的必需品越多,他们对满足正常生活水平的工资的需求量就会越少。我

们应该记得,虽然雇佣劳动的时间是可变的,生产奢侈品的时间却是不变的。这个特点是此模型的核心。因而,家庭中生产必需品的时间,与为工资而生产必需品的时间——这两种时间的分配,成了这个体系中的唯一变量。为什么资本家们会关心如何把工作日在家庭劳动(即自我供给)与雇佣劳动之间划分呢?毕竟,无论如何划分,奢侈品的数量都是相同的。

这一模型的基本假设与工作日的长短有关。全工作日并不代表社会中的普遍状况,而是资本积极寻求的一种理想状态。要达到这一状态,资本家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工人阶级忙于雇佣劳动。这个目标并不简单。只要工人还保留着家庭经济,他们就不必花时间和精力去生产奢侈品或是剩余价值,而同样可以享受到一样的生活水准。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需借助外力将工人推入雇佣劳动。假定正常工作日是10小时,其中5小时用于奢侈品生产。另外,假定家庭10小时都从事工资劳动。由此,每工作1小时,家庭部分就获得一定的工资,这些工资可购买的商品,需要半个小时来生产,也就是说剥削率为100%。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条件,让家庭为自己工作2.5小时。由于为自己生产了一些产品,家庭现在只需一半的工资,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但不管怎么说,用于生产奢侈品的时间并没有减少。因此,为工资每工作1小时,家庭仅得到相当于一个工时的1/3报酬,结果剥削率增至300%。我认为这个模型捕捉到了发生在这段时间内的大部分阶级斗争状况,而且,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围绕这种斗争而建构的。实际上,当工人阶级不得不用大量的劳动,去换取相对较小价值的商品时,他们就会尽可能多的为自己生产,以此来抵制雇佣劳动。这样的话,工人就可以缩短工作日(如果工人不得不既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又要为非工人阶级成员生产奢侈品,工作日就会长)。

当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创造出比传统生产方式更优越的技术,

那么,要产生剩余价值,就依赖于资本是否能够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创造出绝对剩余价值。结果,更多的社会成员开始强烈谴责所有那些仍忠实于前工业时期生产方式的人。

使模型复杂化的因素

虽然这个模型相当简单,但它仍在相当程度上澄清了家庭生产的矛盾倾向。第一,当家庭更多地从事自给生产时,资本家所需的货币资本就会减少,因为雇主需支付的工资降低了。第二,越依赖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在提高剩余价值率时,就越成功。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一些复杂因素。首先,如果依赖家庭生产的过程被推向极致,可变资本的价值就会消失,工资劳动也就不复存在。其次,即使是部分的自给生产会提高潜在剩余价值率,每个工人要购买商品,也必须付出更多劳动。这种情况与塞缪尔·约翰逊的评论很相似。他说:虽然一个匠人可以在1小时内做好一双鞋,但他必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购买一双鞋。

因此,自给生产越多,剥削率越高。但是,它将人们更紧地束缚在传统行业上,实际上能限制剩余价值的产生。结果,潜在的剩余价值率上升,而实际的剩余价值的数值却是下降的。

这个模型没有说明当原始积累开始之时,有多少劳动会随之而来。实际上,原始积累者们必须小心地使用他们的策略。如果压力过大,会使人们从为生计大量外流,导致无法雇佣到工人。如果压力过少,则会使太多人留在传统行业中,难以满足雇主对劳动力的要求。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模型在现代条件下是不太适用的。最初,工业与家庭生产所用的技术是一样的,但工业技术最终还是比应

用于家庭的传统技术更有效率。可是,即使资本家的技术水平发展到这样一个高度,即自给生产的技术效率已低于雇佣劳动时,工人们仍常常厌恶从事工资劳动。相反,他们通常选择保留他们的劳动力,宁愿闲暇,也不愿做工来换取购买商品的能力。

即使更为现代的技术最终可提供富足的经济,传统的家庭生产,仍能节约相当可观的资本消耗。做这一课题的一个学者注意到,“棉花产业中的雇主(即商品的制造者),不拥有固定资本。棉花工人是他的机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他们,而不必花一分钱”。

最终,我们生活的时代,直到最近仍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统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或许该注意一下这个模型中需求的一面。日益增长的可变资本加强了对商品的需求。更高的需求虽然也暗含了潜在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但却为资本带来了相当大的益处。因此,缩小家庭生产的范围能够为资本提供机会。

模型的基本价值

尽管这一模型存在多种复杂因素,我们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转移到家庭里做的事越多,剩余价值率就越高。这一点非常关键。以家庭劳动代替工资劳动,降低了劳动力价值,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如果忽略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区别,那么家庭为自己工作得越多,雇主每个工时所要支付的报酬就越少。

各方面的人似乎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例如,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强制工人阶级完成必要劳动之外的劳动,以此来满足资本家自己的需要。在1784年7月26日的一封信中,本杰明·富兰克林写道:“一些政治算术家已经计算

出……如果每个男人和女人一天花 4 个小时来生产有用的东西，劳动将足够所有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所需。匮乏和贫穷将从世界上消失，其余的 20 小时可以用来消遣和娱乐。”

李嘉图学派的许多社会学家，也试图用经验估计出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比例。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这一课题，但被指望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工人们，却明白什么是得失攸关的事。

古典主义：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

综上所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了这样一种理论：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自给程度越高，剩余价值率越高。当分析抵制工资劳动这一实际问题时，他们含蓄地应用了这一模型。

原始积累的古典模型，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分析很相近。在有限的范围内，这个古典模型可以改造成《资本论》中某些与之相似的东西，而不会破坏其他细节。不过，我必须强调，它并不是马克思的模式。它过于僵化。它不是马克思的范畴，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不过，原始积累的古典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即家庭如何根据劳动力生产这一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在这一新状态的产生过程中，传统经济的参与者也是斗争过的。

从 17 世纪末的配第到他 19 世纪中叶的后继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建议实行符合这一模型的政策。至少他们对社会劳动分工的问题，有浓厚兴趣，目的显然是为了促进雇佣劳动制。

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很多现代学者来说，政治经济学家会极其关注社会分工问题，这似乎看起来有些奇怪。单是“有目的地组织社会劳动分工”的想法，就与他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普遍理解大相径庭。但是，学习一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理论性不强的著

作,我们就会看到,在资本生产与家庭生产(包括简单商品生产)的冲突中,早期的经济学家也是经济的参与者。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似乎常常竭力回避这个模型。例如,就这个问题来说,亚当·斯密视劳动分工为自由人的自愿选择。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如果我们把斯密的著作看成一个整体,我们就会发现,他也倾向于用非市场的力量来操纵社会劳动分工。尤其是,我们会看到,亚当·斯密与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是原始积累的热情提倡者。

在说明这一模型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时,我们对现行的解读古典文献的方法,提出了质疑。现行方法总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很关注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一个要全面加速积累过程的公式。在这一点上,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资本依靠高的剩余价值率而获利),家庭生产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假想一个人,他要选择是否从事劳动。当然,模型的目的是为限制这类人的选择,而不是为了显示个人“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正确性。

不过,从个人的角度分析,的确有助于解释这一模型。工人接受雇佣劳动这种现象之后,个人选择的确可以解释现存社会分工是如何演进的。但从模型上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某种强制,就不会有雇佣劳动。所以,在讨论是什么首先导致了社会分工时,个人选择不是一个正确解释。如该模型所示,在人们可以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产品的条件下,他们的劳动价值将会相当低,因此他们更不想以劳动去交换工资。

即便高的剩余价值率也没有妨碍人们接受雇佣劳动,个人由于缺乏第一驱动力,仍不可能选择雇佣劳动。毕竟,资本主义不是在百货商店里开始的,而是在自足程度相当高的经济中萌芽的。除非其他工人选择提供其他物品,否则,一组工人不可能用全部时

间来专门从事鞋、衣服、食物的生产,他们不再生产的物品,由其他工人补充。在后面章节中详细讨论史都华时,我们还会说到这个问题。

即便我们承认,结构上的这一障碍能够被及时消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仍不可能将资本主义的命运,交给工人,让他们自由地选择。毕竟,在高等人看来,工人阶级一般显得缺乏理性。工人不能遵循资产阶级认可的规范,这常被看成是对他们是多么缺乏理性的有力证明。

第五章

详细阐述原始积累的模式

原始积累的必要性

马克思之前关于原始积累的简单模式虽然具有一些辩证色彩,但许多人都偏向于将自己的观点绝对化,仅仅强调家庭生产的一方面作用。人们最关注的是工人能在何种程度上,拒绝成为雇佣劳动力。既然人们普遍拒绝成为雇佣劳动力,资本主义发展的许多早期拥护者就特别倾向于人为地创造物质匮乏。例如,几乎所有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一直认为,较高的食品价格能促使雇佣劳动力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产生良好的效果

同样地,威廉·坦普尔爵士建议:当收成很好时,如果食品征税,公众就会得到很好的服务,除非整个工人阶级懒惰和堕落了。大卫·休谟甚至断言,这种政策对穷人也是有益的。他说:“在荒年(如果饥荒不是太严重),经常可以看到贫穷的劳动者日子过得更好。”

原始积累的拥护者代表了有影响的势力,但并不是全权的势力。许多人仍然固执地依恋着土地,讨厌成为雇佣劳动力。早期的原始积累者发动了一场针对传统产业的邪恶战争。他们的结论是:只要人们还能依靠“自然经济”(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来代替,有人就用了这个词),什么也不能强迫他们参与社会劳动分工。当

然,只有不择手段地操纵市场,才能有效地迫使自足的农民加入劳动力大军。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抬高食品价格,才能使自给自足的农民成为雇佣劳动力呢?

许多观察家意识到,“自然经济”是个概括性很强的观念。除了耕作和打猎之外,人们在当地市场出售他们剩余的农产品,以此来维持生计。即便如此,许多农户固执地坚持早期的自给自足不放,普遍地不愿意成为雇佣劳动力。罗莎·卢森堡曾经坚持认为,“自给自足的生产处处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是它并不会自己崩溃。

即使在某些地方,雇佣劳动的工资比自给自足的农民收入多得多,传统产业工人仍然拒绝成为雇佣劳动力。例如,在工业革命期间,爱尔兰妇女能在家中做同样的劳动,她们宁愿拿只有工厂工作的一半薪水。手织工人的事例更广为人知:

手织工人不愿进入工场和工厂,这在整个行业都广为人知。工场里的整齐划一和严格的规定,使已习惯于独立工作的织工们厌恶在工厂工作。她们不愿放弃她们假想中的独立,情愿选择贫困,而不愿选择被工厂雇佣禁锢和忍受一成不变的日常工作。

爱德蒙·摩根注意到,在殖民地弗吉尼亚,尽管经常存在饥饿和营养不良,人们宁愿选择更悠闲的经济方式来维持生计。我们应当承认,各地收入状况不同,所以进行比较时,情况可能会复杂。

亚历山大·歌什可隆根据他对革命之前的俄国的知识,总结出一点:“工业劳动力指的是一个稳定、可靠、有组织性的团体,它已剪断了与土地的脐带,变得适合在工厂利用。在落后国家,这种工业劳动力不是太多了,而是极其缺乏。”即使雇佣劳动力显得收入更高,当时农夫仍然明显地不愿意在自家的一小块地之外工作。

资本家坚信,为了控制积累的过程,他们必须亲自出马。只有更加残酷的原始积累,才能提供足够的工人。通过削弱家庭产业——剥夺它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就能使刚刚产生的无产阶级除了成为雇佣劳动力,没有别的选择。

当然,雇主们除了进行原始积累外,还有别的方法。有的不同寻常的雇主,花费很多钱,创造一个相对诱人的环境,例如罗伯特·欧文的村庄或者马萨诸塞的洛威尔的纺织工厂。在洛威尔工厂,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没有多少自主权的年轻姑娘们,对能有机会在工厂工作很热心。除了不再受到父母的限制外,她们还有可能支配自己的收入。一位妇女回忆她 19 世纪早期在洛威尔一家纺织厂工作时的情景:

在此之前,妇女总是社会中攒钱而不是挣钱的一员,她的劳动仅能得到很少的回报。如果她外出当仆人,或者帮工,一周的报酬是 50 美分到 1 美元。如果她挨家挨户地纺织或者做裁缝,她能得到 75 美分和伙食。想做个教师就没有人会要她了。差不多所有手艺、所有职业和工商业部门,都是对她关着大门的。

不幸的是,能或者愿意花钱为工人创造诱人机会的雇主很少。大多数人意识到,如果不能为自己生产足够的产品,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成为雇佣劳动力。因此,雇主就可以榨取剩余价值。

菜园生产和传统产业的效能

愿意选择旧生产方式的那些人,可能有他们的理由。或者他们意识到了依赖雇佣劳动所获得工资要付出的最终代价。或者,

这些人可能仅仅想避开工业雇佣的闹哄哄步子。或者,最终他们厌恶了对雇佣劳动力的不断监督。这种对雇佣劳动的拒绝,使许多现代理论家们很困惑,他们习惯性地假定雇佣劳动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许多现代文献都将任何拒绝雇佣劳动的人,描绘为阻碍进步的敌人。传统产业的感染力在这些作品中似乎是不理性的。例如,圈地运动通常形成了原始积累传统故事的背景。许多经济史家称赞“圈地运动”推进了一场农业革命。这样,那些与原始积累(其形式是“圈地运动”)对抗的东西,就成了徒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东西。

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完全如许多作家们描绘的那样低效率。例如,司各特·彭斯出版了一本有用(尽管并不科学)的小册子,其中列出许多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农户们可以满足许多自身的需要,而且比通过商业购买要省钱得多。

菜园生产是许多有效的自给自足方式中的一种。甚至是提倡大规模商业化耕作的重农主义者,也承认生产食物的传统方法的效率。他们估计,农民用锄头精耕细作,产出的作物可以是播种下去的 20 到 30 倍,而用犁耕作只能产出 6 倍的谷物。

米拉波说,巴黎郊区的农夫从一亩地中一年能赚 28 镑。园林工人的有形产出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位巴黎的菜园工人庞斯每英亩生产了 44 吨多蔬菜,此外还有 250 立方码表土层。反之,在美国,今天的商业生产者只能生产 19 吨洋葱或 33 吨供加工用的西红柿,这些都是产出量最高的蔬菜。其他作物,如菠菜或胡椒,在美国每英亩只能产 4 到 5 吨。

尽管这些菜园都进行了商业运作,它们仍然表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效率。按照威廉·皮特的说法,在英国人口密集地区周围的园艺工人,每英亩得交纳 11 镑 7 先令的税。很显然,他们必须能至少挣足这个数目,才能继续从事这一行。

即使在现代市场社会,自给自足也是有效的。约翰·杰文斯率先在园艺技术中采用科学方法。他声称,他每天只用花 28 分钟,就能在面积 2 800 平方英尺的边缘地上,产出每日所需的所有食物,无须再为食物花费多少。尽管许多菜园工人都无法与杰文斯匹敌,但司各特·彭斯估计,在种植蔬菜上花费一小时,平均价值是 10 美元,比同时间内的典型劳动力价值高得多。

自给自足的优势,部分在于它不必运输和推销农产品。在农场上种蔬菜,比在农户菜园里种蔬菜需要的劳力要少些,但当我们考虑到推销的复杂、农场上实际包含的投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也许就会显得更优越。佩里·杜依说,19 世纪末,在芝加哥城区,由于缺乏冷藏和有效的运输系统,菜园种植成为一种有效的提供食物的途径。这些地方的位置优势是巨大的。比方说,虽然城市租金偏高,但直到 1870 年,伦敦的牛奶生产仍然绝大部分是自给自足。

的确,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在菜园里种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即使在已经改变了的社会关系之下,市场化的菜园生产技术仍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换句话说,在雇佣劳动变得普遍时,传统的农户生产也是一种选择。即使在美国,大萧条到来时,穷人就不得不回到菜园里去。正如杜依观察到的,“对穷人来说,有时菜园种植是每日生存所必需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或者爱好。即便是擅自占地的人,也要种几棵蔬菜以补充他们的粗茶淡饭,不过这些努力与发生在 1893 至 1897 年的大萧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时失业大军在全国游荡,都想找份工作”。在大萧条期间,也有更多人在菜园里种养食物。我们也许注意到在苏联的早期,基于苏联共和国头两年的经验,布哈林与普乐布拉陈斯基预测了市场化菜园技术的重要前景。另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保存资源,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广“胜利”菜园。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产业

并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商业与家庭产业相比有绝对优势。尽管如此,人们对土地的普遍依恋,还是引起了当时无数作家的义愤。许多人甚至把拒绝成为雇佣劳动力说成一种道德缺陷。这些评论家经常说,除非有外部力量迫使人们同土地分离,否则那些潜在的雇佣劳动力还是会拒绝被雇佣。霍布斯也表现了对克服穷人抗拒心理的担心,他写道:

对那些身体健壮的人……必须强迫他们去工作。为了避免他们找借口不工作,应该制定能鼓励人们从事技术劳动的有关法律,例如航运、农业、捕鱼和所有需要劳动力的制造业。众多的穷人,包括日益增多的壮劳力,应该运到人口稀少的国家。但是他们不应该消灭那里的原有居民,而应限制他们集中居住,不让他们形成一大片居住区,攫取他们找到的东西。但是他们要靠技术和劳动在各自分配的土地上求发展。我们在规定的季节分配给他们食物。如果该地区人口密度太大,最后的解救办法就是战争,每个人要么是胜利,要么就是死亡。

苏格兰皇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爱丁堡学界的知名人物威廉·罗宾逊有一部作品,被说成是基于斯密当时未发表的《法学演讲录》(*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在这部作品中,罗宾逊谈到自然发展的市场关系:“在原始和最简单的社会形态下,人们对劳动力的需要是很小的,他们的愿望也有限,只要能给原始产业增加一点点,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没有多余的农产品去支配,也不需要很多

日常必需品。”同样的,詹姆斯·安得森断言:“如果没有商业和技术,农夫们有什么耕种的动机呢?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只希望种植他生存所需的农作物,不会更多了……因此,一个依靠农夫的国家一定是懒惰和悲惨的。”

威廉·坦普尔说得更坦白。他估算道:“如果人们只按他们自己生活的需要生产,那么十有八九的人会无所事事,或者所有人大部分时间都无所事事。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无节制,会暴饮暴食、酗酒无度。”最后,让我引用令人尊敬的约瑟夫·汤森在《对人类怀有良好祝愿的人》(*A Well-wisher to Mankind*)一文中说的话:“有社会地位的人,可以有动力使自己表现傲慢,有荣誉感,有雄心壮志。穷人对这些动机却知之甚少。一般情况下,只有饥饿能促使他们劳动;但是我们的法律却说,他们永远也不会挨饿。”

在有些人看来,当时的思想形式是不成熟的,但是今天它仍然能引起共鸣。例如,在里根执政期间,乔治·吉尔德大胆地重新采用了原始积累家们的思想。他声明:“要想成功,穷人最需要的是用穷困来鞭策他们。”不过他本人拒绝这种鞭策。近年来,克林顿政府成功地“改革”了福利制度,这届政府的逻辑足以让原始积累家们感到骄傲。

创造不足

为了不让人们生活舒适,关键在于在乡村的穷人中,人为地制造不足。1771年,阿瑟·扬观察到:“除了白痴外,每个人都知道,必须让社会地位卑微的人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变得勤劳。”穷人能使用公共土地,这尤其让那些大地主紧张不安。马克思引用了一位亨特博士的话,说他担心“农民有了几英亩地之后就足以经济独立了”。

这种担心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是常见的。1794年递交到施罗普郡农业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公有土地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人们认为它是经济独立的象征。”其他人则注意到，圈地能“保证现今所急需的社会底层劳动力处于从属地位”。用一位18世纪圈地运动提倡者的话来说就是：

拥有一两头母牛、一头公猪、几只鹅，自然会使农民得意洋洋——每日赶着牲畜闲逛，就会使他染上懒惰的习气。每天的1/4、半天或者有时一整天的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他开始讨厌白天劳动。并且，因为没有任何约束，他对劳动的厌恶就更深了。最后他不得不卖掉饿得半死的小牛犊和公猪，这让他又多了个游手好闲的借口。

约翰·亚布斯诺特是一位大农场主。他对圈地之前的农场雇工不屑一顾，这种态度在当时是很典型的。他对导致农民堕落的因素的攻击，预见了现代社会保守派对社会福利的异议。用他的话说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能从公有土地里所得到的好处实际上是名义上的。更糟糕的是，我知道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好处成了他们游手好闲的借口，所以反而害了他们。除了少数人外，如果你让他们干活，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得照看羊群，采割荆豆，把牛从牛栏里放出来，或者说他们要去给马钉蹄铁，因为他要带着马匹去参加赛马会或板球比赛。

由此，亚布斯诺特组做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清楚分析。他建议“（通过圈掉公有土地）把小农户变为一群不得不为他人劳动的人，从而

制造更多的雇佣劳动力,这就是这个国家所希望拥有的优势”。

汤普森引用了一位温齐尔西勋爵 1796 年的观点:“到中部郡去过的游人,如果不嫌烦问一下的话,人们就会对他们说,以前那里曾经有许多养奶牛的农户,但现在那片土地已经全成了农场主的财产”,不是因为农场主想经营农场,而是因为农场主“想让农户更加依赖他们”。威廉·科贝特发现,当他建议给每个雇工一英亩荒地(条件是他把这块地圈起来开垦,并以此为生),雇主的态度差不多都是反对的:“巴德说,给雇佣劳动者一点儿土地就会让他们‘有恃无恐’;柴多说,那只会让他们生养‘更多的孩子’;斯提尔说,那会使他们要求‘提高工资’。”

马克思说道:“(资本)把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力,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变成了资本中的物质成分……以前,农户生产出生活资料和原材料,其中大部分被他们自己消耗掉了。但是那些生活资料和原材料,现在已经成了商品。”

在把农民变为雇佣劳动者的计划中,原始积累家们仍然注意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效率。为此,他们想允许工人们为自己生产,但是他们能得到多少土地,则完全取决于拥有那些土地的农场主的意愿。亚布斯诺特解释说:

我的计划是分配给每家农户三四亩地,他们获得这些土地的同时,并不拥有转让权,也不用付地租,但是必须签订保留草场的契约(除了一小部分可以留作菜园),这样就可以让农场雇佣工人比其他工人有更充足的生活资料。他和他的家人必须开垦菜地,否则便会挨饿。为了避免他们说缺少柴炭,必须让他们把菜园围起来,栽上椴木和其他长得快的树木,这些费用应该让将要取得公有土地的人支付。

当这场造就无产阶级的斗争加剧时,工人们日益丧失了自给

自足的能力。外国游客对这一进程的最终后果感到惊讶。他们注意到：“成千上万的英国工人都没有一小块哪怕在他们失业后没有收入时能让他们种点食物的土地。”的确，到19世纪，英国“在好奇的外国人面前展现了独特的令人吃惊的场面——这里没有农民”。但是，原始积累并不像这些游客想像的那么彻底，也不如他们想像的那样迅速。例如，马克思就曾提醒读者：“这种变化在封建生产方式下就已经部分地开始了。例如，手工作坊不允许它的工人再依附于地主。”

对原始积累经济学的偶然认可

大约1830年以后，我们就越来越少地听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谈论原始积累的迫切性。马克思把这种沉默解释为，他们不懂原始积累的重要性。他揭露说：“从原则上讲，政治经济学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私有财产，一种是生产者自己所有的，另外一种则是靠剥削其他人的劳动得到的。”为了方便，经济学家们忘记了“后者不仅仅是前者的对立面，而且是随着前者的消失而渐渐增加的”。

马克思太低估政治经济学家了。他们其实一点儿也没糊涂。只是，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不愿公开谈论这个话题。在曼提福特·朗费尔德(Mountifort Longfield)根据爱尔兰的实际情况所写的一例中，1833年，那里的资本家仍然不得不与欣欣向荣的自耕自给农业竞争。朗费尔德采用了“不拿工资的工人”来自圆其说，这和李嘉图“无地租土地”的概念很相似。

按照朗费尔德的叙述，自耕农的生活水平决定了工资水平，而在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工资水平又决定了利润率。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明白地阐述自耕农业的关键作用。

约翰·拉姆瑟·麦卡洛克在利润率和自耕农业的关系上，也犯

了错误。他说,农民的贫穷程度决定了工资水平。这是在李嘉图观点的基础上做出的。按照他所属的学派的一般观点,工资水平又决定利润率。但在他的实际行动中,他没能把对现实世界的洞察转化成系统分析。

这样的人,并不只麦卡洛克一个。抽象地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自耕农业特别关注,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却一般不愿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立关系。而且,在它的理论作品中,一般也不承认自耕农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有增加利润的作用。

一旦政治经济学被迫面对这一矛盾,它就有意地含糊其辞。不过,西尼尔的观点与一般情况有所不同。他把这个问题看做文化现象,嘲笑那种“社会的原始状态,每个社会成员拥有各种工具,而且能够使用它们”。他提倡基于更加复杂的劳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并不经意地指出,“间接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明的结果”。

西尼尔关于间接劳动的概念,在尤金·冯·伯穆·巴威克关于“曲折道路”的复杂理论中重新出现了。但此时,与“间接劳动”有关的那些社会关系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尽管西尼尔还有许多别的不足,但他的见解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他把一个跟“社会分工”差不多的一个概念,几乎上升到了抽象理论的高度。

市场的无声强制

更实际的原始积累家,不知疲倦地梦想着穷人会被迫“一年到头每天都劳动的世界”。这种幻想很有吸引力,能让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都全力支持圈地运动。罗伯特·华莱士超越了人们通常说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观念。他提出,创造剩余产品、创造更详细的社会分工,最终可能为整个社会带来有形利益:

如果土地被划分为非常不均匀的份地,并且总的说来,这些土地能生产出比维持土地耕种者的生计所需多得多的产品,那么尽管国家可能人口众多,但如果科学得到鼓励,剩余产品就能分配给改进技艺和技术的人。

原始积累家为了让自己更安心,经常想像自己帮助穷人,实际上却将那些人逼入了穷困的深渊。例如,威廉·坦普尔是这样算计的:

如果王国的所有土地都被分配给人民,每人还分不到4亩地。一个人的贫穷,不是因为技艺、政策和生产方式的改善使他失去土地……他贫困,是因为他把从技艺改进中获得的,稀里糊涂挥霍掉了;或者出于懒惰,而未能恰当、小心地利用那些先进技艺。

坦普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工业最好的刺激是需求”。按照这一结论,当时一个编写小册子的人写道:

如果一块地在很大程度上自发地生产出生活物资和食物,气候良好得几乎不需考虑穿衣和保暖,那么,我觉得,对一群人来说,再没有把他们投到这样一小块地上更残忍的事了。

同样,休谟也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所以贫穷,是因此那些地方气候温和、土壤肥沃。

坦普尔和他那个阶级的人,一心想着如何限制普通百姓利用自然资源,制造出人为的不足,残酷地征服自然经济。因此,他们无暇顾及复杂的理论细节。但一些富有经验的原始积累家已经意识到,一旦原始积累的工作结束,马克思所说的市场的“无声强制”

远比原始积累的野蛮暴力获利更多。让我们再回顾一下约瑟夫·汤森的观点：

（对劳动的直接）合法的限制……伴随着太多麻烦、暴力和喧闹……然而，饥饿不仅是平静无声的、不断的压力，也是工业最自然的动力，它能带来对劳动力的最大程度利用……饥饿能使最凶猛的动物变得驯良，使最野蛮、最顽固、最堕落的人变得端庄、懂礼貌、百依百顺。

德国社会党和政府部长罗得贝尔图斯并非彻底的原始积累家，但他也做了类似的声明：

最初是由奴隶制度来进行这种强制，从人类开始耕种土地和土地私有起，就有了奴隶制……当一个国家的所有土地都私有了，当所有土地的地契都落入了个人手中，资本对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工人使用了同样的强制手段……只不过，现在奴隶主的命令，已被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合同所代替。这种合同形式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却不是。饥饿几乎是皮鞭的最好替代品，以前被称为草料^①的东西，现在被叫做工资。

亚当·斯密对这种无声的强制，添上了自愿的色彩，这应该是不出我们所料的。他将原始积累归因于封建贵族阶级的贪婪，而不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时，他也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之所以产生这种贪婪，是因为贵族也开始披上了资产阶级的外衣：

但封建制度用它的全部暴力都没能做到的东西，对外贸

① 草料：指喂牛羊等牲畜的饲料。奴隶主把奴隶看成会说话的牲畜。

易和制造业的不易察觉的安静活动却做到了。这逐渐使大地主们有了一些可以用来交换土地上全部剩余农产品的东西……而不必与佃户或侍从分享。所有东西都留给自己,不给别人——看来,在世界的各个时代,这都是人类中的能人们的邪恶准则。

按说,随着市场关系的出现,这种邪恶准则就会消失。

自给自足作为资本的补充

总的说来,原始积累是成功的。一旦工业技术比自给自足更有生产能力,家庭经济就更加不能威胁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分。在这一点上,资本可以利用自给自足的经济,只要家庭劳动不影响雇佣劳动就行。

与古典的原始积累模型一致,许多资本家很快发现,一旦工人们成为挣工资的劳动力,家庭劳动就可以派上用场。资本可以利用家庭经济,为工人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以这种方式,家庭产品可以使货币工资下降到低于自给自足经济的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实际上,家庭经济有利于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反映的是劳动力在生产中的效率),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本利润率。资本利润率依赖于工作日,即劳动力工作时间的残酷延长。

能达到自给自足的贫困农民,简直少而又少。小户人家的收入降得特别低,以至于 1788 到 1803 年被称做“手织机的黄金年代”,因为许多小农夫如果不用手织机增加收入的话,就没法生活下去了。

虽然小生产者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他们仍可以为自己提供大部分的基本生活物资,使他们能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下生存下去。

蒙提福德·朗费尔德说,小生产者决定预留工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应对费力斯·迪恩的发现感到惊讶。他发现,在1770到1800年间,英国的实际工资是下降的,至少是停滞的。

即便在城市环境中,许多工人在接受工业雇佣的同时,也从事农业活动。例如,在美国,直到19世纪,城市工人还经常种植很多自己食用的作物。伦敦也广泛地存在着后院农业,包括地上或地下的鸡笼、羊栏和猪圈。

工人在工作之余,大量从事食物生产活动,毫不在意与动物住得如此之近会产生不良的环境后果。这些活动要么可以表明人们对自给自足的依恋,要么可以表明从劳动挣得的工资收入不足。两种情况都暗示了原始积累的胜利。

许多作者都承认,这种部分的自给自足,与更完全的程度上的自给自足相反,非常有利于雇主。例如,威廉·索恩顿观察到,中世纪时期劳动力的货币工资非常低,因为那时工人的货币需求很小。工人们可以利用被弃置的土地,可以从事园艺,放牧牛羊,养鹅或其他家禽,养猪,筏木或捕鱼。这样,家庭生产的下降,将导致工资上涨。

亚当·斯密曾提到过,从事农业或园艺活动的工人,会要求更少的货币工资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一因素在英国并非不存在。在英国,工人们的小房子与园子相连,园子里产出的物品是对工资购买的商品的重要补充。

其他学者似乎认识到,工业和农业的这种结合,在农民很贫穷的地方最有效果。例如,丹尼尔·笛福注意到,加工业已经占领了诸如德文郡的哈利法克斯那样“狂野、荒凉、贫困的乡村地区”。在那里,土地被分割成许多小块,这可能是由于自给自足使雇主可以少付工资。同样地,阿瑟·扬在法国旅行中也发现了相似的模式。

詹姆斯·史都华爵士是对家庭自给自足经济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尽管如此,他也认为,应允许挣工资的工人“在乡村从事他

们的制造业,同时利用适宜园艺的小块土地、适宜牧牛的草场,甚至可以种植生活必须的某些水果”。这里用的技术,仍是曾经支持了自给自足家庭经济的技术,但在当时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却起到了促进原始积累的作用。史都华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仔细区分了这种形式的家庭生产: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农业形式……在这里,居民主要是从事他们的主业,农业只是处在附属地位,并且只有在主业以外不会占用很多时间的情况下,居民们才会去做农业。但是这种方式可以将小块土地分散成小额财产,对于改良贫瘠土壤而言,是一种理想的体制安排,在工业精神没有受到遏制的前提下,对全体居民也是有利的。

威廉·科贝特的《家庭手工业》(*Cottage Industry*)是一本指导家庭制作自用食物的自助类现代书籍的先驱。在对这本书的一个匿名书评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家庭劳动与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这位为著名的《爱丁堡评论》写书评的评论家,首先使自己与作者的危险政治观点拉开了距离。他可能是弗朗西斯·杰夫里或亨利·布劳汉。他解释了向工人阶级灌输自给自足精神的特别好处:

让我们记住,在得到衣物和栖身之所之后,每个社会里大众的几乎所有时间和注意力,都必须用于获取食物。他们的舒适与否,实际上依赖于所获食物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因此,无论食品供应量有多么小的一点增加,从而提高了食物的质量并改变了它们的组成,都会给他们的生活条件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并有助于他们整个一生中的大事业。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提示他们注意一件特别重要的东西。但是,尽管贫困的劳动者从事这些手工业活动可以带来许多的生活改善,

却无法避免紧随其后的工资下降的副效果。谁要是告诉收割者只用一半时间工作,谁就是在同时告诉农场主只付给收割者一半工资。不,在农场上的一般做法是,额外工作两到三个小时也并不会增加工钱,就好像他酿酒、烤面包、长时间照料有用牲畜的时间,都花在了小酒馆中一样——他的工钱是不增多的。

我们几乎不能期望有比这更生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逻辑的表述了。这些言辞并非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名人之笔,但的确来自《爱丁堡评论》的编辑之一。他的职位使他这位书评人成了一个有高度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传播者。这样的人物明白,家庭生产的结构并非小事一桩。家庭劳动力能节省下来的钱,数目可以非常庞大。科贝特这本书的评论人认为,工资水平的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史都华提供了这一原理的例子。他估计在18世纪的苏格兰,一个纺纱工人一天需求的食品,要纺纱两天的工资才能买到。

对原始积累模型的微调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很快认识到,一旦人们不再能自己种植食物,他们至少可以变得部分地依赖市场,以获得食物。正如我们在前马克思的原始积累模型中看到的那样,这种依赖性并不一定是绝对的。

当时的作者相当注意的不同依赖程度(或者说“相对原始积累”)会产生不同效果,即他们试图证明,工人们可以自给自足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他们既无足够的独立性以拒绝雇佣劳动,又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这种对适度的家庭生产程度的计算,在18世纪十

分普遍,正如 1800 年的《商农杂志》(*Commercial and Agricultural Magazine*)所显示的那样:

1/4 英亩的菜园,就足以使农民自给自足。但这一良好设想却不能走极端,否则我们可能会把劳动者都变成小农,从对工业最有利,变成对工业最无益。当一个劳动者占有了超过他和家人晚上能够耕种的土地时……农场主就不能指望他能来好好做雇工。制干草和收割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有时会给整个国家造成不利。

罗伯特·古尔利是阿瑟·扬的一个朋友。他也有类似观点:

半英亩土地被认为是最合适的,贫困者可以在这样大的土地上充分利用他的闲暇时间。如果能在公共草地上自由放牧,他还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以饲养一头奶牛。但是,由于某原因,公共放牧地和菜园地的面积都应缩小。1/4 英亩是菜园地的合适面积,公共放牧地的面积不应是 50 英亩,25 英亩就足够了。1/4 英亩的土地,在精心管理下,可以生产出足够数量和品种的蔬菜,除了供应家庭需要外,还可以饲养一头奶牛和一头猪。我们的目的可不是要把劳动者变成专职的园丁或农夫!而是对他们恰好合适,不能再多。给劳动者太多土地的负面效应,早在 30 年前就已为人们所发现。在苏格兰低地……对爱尔兰种土豆的小农户的负面效应也是众所周知的。在苏格兰高地的克罗夫特斯,人们见到的只有肮脏和悲伤。一个整洁的小菜园,再加一块保护得很好并且用栅栏精心围起来的地(可以养一头奶牛),实在是可以造成另一种与它们很不同的效果的。

温齐尔西伯爵 G. 费斯提供了另一个计算原始积累的例子。在一封写给约翰·辛克莱爵士的信中,他写道:

土地根据情况不同,要么用于放牧奶牛,要么用于从事园艺,没有比这对劳动者和地主双方都更有利的了……利用这些优势,劳动者及其家人可以生活得更好,结果是更适合从事劳动;这使他们更满足,更看重自己的地位。这给了他们某种独立性,使他们对自己给予更高评价……当劳动者获得了一头奶牛,并且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这头牛,他所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攒钱再买一头。

伯爵估计,花在园子里的劳动量,4/5 来源于“额外的时间,并且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不这样做就会闲着无事”。可以推测,他反对劳动者拥有甚至几英亩的可耕地,因为太多的土地“会占用太多时间,这种占用总的来说对他有害”。

“微调”必须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纺纱业从传统上来说,是农业的附属产业。纺纱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扩大织布的能力。因此,纺织工业就需要将更多的人从兼职务农变成全职纺纱工。

由此考虑,英国农业委员会尝试着让雇佣了农业劳动力的人,能从更自给自足的劳动力中获益。这个委员会“给五个人”每人一枚金牌,这五人应该“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经过实验证明农户可以仅用铲和锄耕种一块土地,土地的产出足以养活一两头奶牛”。

我们可以相信,委员会并不想回到前资本主义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时代。委员会主席约翰·辛克莱爵士表示过,希望小规模农业活动按以下三项原则开展:

1. 农户应该靠自己的劳力,生产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最重要的某些产品;

2. 他应该能向邻近的市场提供小农产品；

3. 他和家人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长期协助邻近的农民,如同这些邻居自己没有土地一样。

辛克莱的头脑中有两个目标,两个目标均与原始积累有关。首先他认为,给农民小块土地可以使农民更坚定地安于现状。其次,粗看一下辛克莱的三点原则就能看出,他认为,如果小规模农业比例合理的话,农业雇主们可以从廉价的劳动力中获利。辛克莱算出,农户的工资可以占他们全部收入的一半多一点。剩下的收入,预计来源于农产品的出售。此外,超过 $1/3$ 的货币工资,应该支付他们那小得可怜的土地的地租,以这种方式回到地主手中。

辛克莱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实施。直到19世纪,大多数农民仍是挣工资的,并依靠从事农业活动提供补充收入。即便如此,像其他原始积累主义者一样,辛克莱一直认为,资本应谨防工人成为“小园丁而不是工人”。

约书亚·塔克与上述模型的社会学

当然,关于自给自足的程度,资本家也并不能达成一致。某些类型的劳动力与其他劳动力相比,更适合强大的家庭经济环境。然而,正如我们根据古典原始积累模型所推测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旦原始积累的初始任务完成,就应该强化自我供给。

自然,这种对自我供给的态度改变,并非一帆风顺。宏观经济周期条件,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影响了对自我供给的立场。例如,当相对发达的经济进入衰退时,农业就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缓冲,节省了福利需求的成本。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本书先前关于萧条时期园艺业复活的讨论。一旦经济活动的步伐加快,资本主义者就会把自我供给视做稀缺的劳动力资源的不受欢迎的竞争者。

马克思曾经通过几乎不经意的观察,已接近这个问题。他说:“英国在某些时期主要是一个玉米种植国,在另一些时期则是家畜饲养国。这些时期交替出现,并且这种交替,伴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而波动。”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沿这一思路继续探讨。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更加复杂的因素,我们就明白,不能机械地运用原始积累的简单模型。实际上,资本的拥护者在谈论自我供给时,语气很少是简单一致的。那些自认为是进取的中产阶级下层的人,他们关心的东西,就与那些自认为农业人员的人不同。

让我们看看,约书亚·塔克对约克郡——在那里家庭经济仍很重要——的经济与“西部地区”经济是如何区别的:

在约克郡的许多地方,羊毛纺织业是由小农场和世袭地的保有人开展的:他们买一些羊毛,养一些羊用来剪毛,他们的妻子、女儿和仆人在漫长的冬夜和没有被农场和牛奶场雇佣的时候就纺线,户主要么在毛线市场上出售这些线,要么自己织布。

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工人和雇主的地位没有多大分别。塔克写道:

(工人)在等级上和身份上与雇主相差无几,并且,如果他们勤劳节俭的话,很可能在几年后就能自己开业……也就是说,工人阶级通常是有德行的、清醒的、勤劳的;产品质量很好,并且非常便宜;骚乱和暴动在他们之中几乎很少听到。

与此相对的是,在“西部地区”,工厂体系更加发达。根据塔克的说法,那里的情况如下:

勤奋、节俭、严谨的动力,全部变为一个这样的考虑,那就

是：要把他们(织布工)一直绑在一根绳子上，他们将永远都是技工……约克郡的产业之所以兴旺，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格洛斯特郡的产业之所以日渐凋敝，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有一个人，有大量资产和良好的信用，买羊毛、花钱纺纱、织布、压布、染布、剪毛、整理(使表面光洁)等等。就是说，他是这整个行业从头到尾的管理者，他手下或许雇佣了1 000个人。他是被其他人视做老板的织布商。但是他们难道不会有一天把他视做压迫者吗？并且，由于他们大多数在同一个作坊中共同工作，这样他们不就更彼此施加恶的影响，纠缠在一起，共同反对他们的管理者，并且利用每个机会发动骚乱和暴动吗？……此外，由于管理者的地位高于技工的地位如此之多，他们的地位关系，非常接近我们美洲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与奴隶的关系，超过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可以想像得到的关系。种植园主和奴隶的关系，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两种情况下的邪恶与愤懑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程度稍弱而已。管理者，无论他自己主观上多么小心谨慎，很自然地受到他所处的地位的诱惑，因而行事高傲专横，把工人视做下等人，以为自己可以尽量压榨他们；以为他们应该始终低贱，而不会起来反抗地位高于他们的人。另一方面，技工们也同样地受到他们地位的诱惑，嫉妒他们的管理者所拥有的地位和财富；当他们发现，不论他们怎样勤奋工作、拥有高超的技艺，都被剥夺了提高地位以达到与管理者相同地位的机会时，他们就愈加嫉妒管理者。这样，他们的自爱拐错了弯，变得对他们自己和别人都有害了。他们认为拿再多的工资也不为过，尽可能地少干活、撒谎、欺骗，还干其他坏事，只要对管理者不利就行。他们把管理者看成共同的敌人，对他没有诚信可言。……他们唯一的欢乐就是酗酒，尽可能地什么也不想，就这样让生命流逝。

塔克似乎预见到了现代文献对意大利北部工业区的赞美。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与塔克一样，对散布全国的独立小生产的经济发展充满热情。

詹姆斯·安德森的另一分析

与塔克不一样，詹姆斯·安德森更喜欢让工人集中在城市中。他说，城市化引导人们向更好的德行发展。安德森是农业问题的一个有影响的作家，可能更关心世俗问题，而不是工人的德行问题。他担心的是，贫困工人从家庭工业中获得的可用于消费的货币太多，会使乡下的社会风气恶化：

（如果）制造业在全国分散的、孤立的房子里开展，并且可以由任何一个人独立地从事的话，那么，付给这些外省东西的全部货币，就会无一例外地直接流到下层民众手中，通常是到了那些年轻妇女和儿童手中。他们会变得轻浮、虚荣。他们通常把这样挣来的钱，大部分用来购买精致的衣物，或其他吸引他们奇思怪想的华而不实的俗气东西。

更糟糕的是，这些工人也许不愿意被迫从事低工资的农业工作。

另一个作者比安德森更直率。在他关于道德和劳动力市场的双重考虑中，他警告说：“一个家庭的女儿被单独留在家中，为一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奶牛挤奶，她面对如此之多的诱惑，很快就会沦为娼妓，成为一个悲伤、无知的母亲，而不是成为一个有用的好仆人。”

安德森担心家庭手工业可能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小农户拒绝与农业分离，他们比规模大一些的农户更愿意支付

更高的租金。安德森估计其后果是：“所有富有、殷实的佃农，会被全部消灭，整个国家将被分成许多块面积狭小的土地，这就称不上是农场了。”因此，他鼓吹一些工业，它们可以为农业提供市场，又不会诱使劳动力从农场离开。这种安排将保证城市工人的依附地位：

因为，如果手工业需要人们相互协作来开展的话……如果从事此工作的人们必须彼此协作，必须由许多人在同一地点开展的话，那么，这个行业就会注意促进农业进步，而不是阻碍农业的进步。

塔克和安德森都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这样一点，即原始积累的结构如何影响到乡下人的社会学特征。但是，他们的分析都不完全。他们都各自发展了一种关于原始积累的观点，但都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些观点背后的逻辑。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道高尔德·斯图亚特——试图整理出对家庭手工业的不同观点。他说：

对于主要依靠农场产品维持生计的人来说，家庭手工业始终是一项最无利可图的工作。

一个人，如果从事的工作需要占用他每天的时间，他肯定会不再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农业工作——农业工作需要持续地、集中注意力才能从事。但有一点不是这样明显，即国家的发展如何受到农民在自己的几英亩土地上从事几小时消遣的损害……看起来，他偶尔在田中劳动对他的职业技能和产业造成的损害，比起那些无事可干的工人易于沉溺其中的各种无节制行为，似乎也不会更大。

斯图亚特对“有利于农业的一般言论的泛滥”颇觉反感。他对阿

瑟·扬尤其严厉——阿瑟·扬曾轻率地宣称：“手工业中存在对农业有害的东西。”尽管如此，史都华承认：“很多东西可以支持扬的体系。”他还补充说：“事实上，在所有人类制度中，我们都会发现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唯一的问题是，两面中哪一个居于主要地位。”

小商品生产的保守影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安德森·塔克提出的问题。他关心的是，在德国一些地区，工人在很大程度上用自我供给来补充他们的工资，这加强了他们的保守主义倾向。有些问题连塔克也没有意识到。

恩格斯注意到，自我供给加强了德国资本家的力量。首先，正如科贝特一书的评论家注意到的那样，雇主因为能“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雇佣工人全家从自家菜园或田地中获得的那部分”，他们能因此获利。小商品生产除了能提高剩余价值率之外，还给资本家带来了另一份红利。恩格斯说，工人拥有一点财产，会进一步降低工资水平，因为财产会限制工人的流动性，他们只会在离土地很近的范围内工作。此外，恩格斯在1881年11月给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信中写到，贫穷让像萨克逊手工纺织工人那样的群体，更愿意参加长期斗争，而拥有少量财产的工人则不是这样。

在家庭手工业中，家庭成员为商人进行计件加工，以此来补贴他们微薄的农业收入。这种家庭手工业导致了德国工人的赤贫，至少它是德国工人赤贫的部分原因。针对德国的状况，恩格斯认为，菜园种植和家庭手工业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有力的杠杆”。

恩格斯反对的并不是家庭手工业和家务劳动本身。他认为，基于家庭手工业和菜园种植的传统经济，使穷人丧失了文化权利。

对此他不乏微词,但他意识到,这种结构在此前造就了一定的繁荣。然而,在他所处的时代,这种工作形式的影响无疑是消极的。首先,“正是因为旧有的农村手工纺织工人的菜园种植和农业耕种,手工织机和机械织机的斗争才旷日持久,在德国至今仍然没有结束”。

恩格斯的意见,看来也同样适用于弗兰德斯。按照富兰克林·门德尔斯的最新证据,家庭手工业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最初是因为一些可怕因素,家庭手工业才渗入农村,但家庭手工业却会让这些因素继续存在下去”。

当然,恩格斯不是说消灭手工织机就足够了。他当时关心的是德国的政治形势。当时,许多工人不愿意放弃菜园,所以不得不接受雇佣,在家庭手工业里干活。而这时候,机械化早已使这样的劳动力大大贬值了。不仅这些工人的生活降到了很低水平,而且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把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也都拉了下来。列宁也看到,在他自己的祖国,很大程度上也在发生同样的情况。

即便当这样的农民工人在现代工业中找到了职位,他们也经常拒绝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因为他们指望着,自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职农民。德国工人们,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正在忍耐难以忍受的苦难:但是他安慰自己说,当压力变大时,忍耐将很快变成反抗。

恩格斯反对依赖家庭手工业。而德国的资本家和那些他称为“资产阶级社会慈善家”的人,却认为“家庭手工业是治疗农村贫困的唯一良药”。他指出了这种情况的反讽意味。反对资本家的人,要求更快采用与现代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新技术。但是资本家本身——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类似原始积累的简单模型——却更愿意选择更加原始的方式。

在美国,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亨利·福特还在要求他的雇员

种植菜园。而且,还有一班检查员向福特公司报告,哪些工人懈怠了他们的菜园种植职责。那些菜园被评价为“不合格”的工人会被解雇。虽然福特也许希望他的工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但是,他知道他们并不总是会有工作干。菜园会加强工人们与福特公司的联系,也可以减轻在工人的周期性失业期间,人们对工人的贫困生活的责难。

恩格斯对家庭生产的批判,在今天的第三世界仍然适用。请想一想,在玻利维亚一个贫困矿工家庭中的妻子,她的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家庭劳动来维持生计:

矿工难道不是被双重剥削吗?在这样低的工资下,妇女不得不在家里干更多的活,这难道不是我们不拿工资地为老板干活吗?……我们在家里干的活应该挣的工资,同厨师、洗衣妇、看护孩子的人、侍者的工资相比,应该远远高于在矿井中的男人们所挣的工资。

这个妇女的推理过程看上去如此简单,似乎没有多少分析的成分。但我们不能被表象所误导。例如,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个没上过学的玻利维亚妇女有洞察力的观点,与托马斯·C.史密斯的观点(史密斯是个对日本土地制度发展有深刻见地的学者)。史密斯反复提到,19世纪支付给日本工人的工资比较高,老板对此常有抱怨。他注意到了工人丧失了利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因此不得不从市场上购买更多产品。虽然如此,他却没能认识到,可变资本的增加和自足经济成分的下降之间的联系。

德国的家庭手工业、玻利维亚的家庭劳动的例子,说明了资本怎样从高程度的家庭自足经济中得益的。显然,其他因素也必须加以考虑。恩格斯指出,在德国,有弹性的家庭经济阻碍了技术进步。但在日本,农民在业余时间里所从事的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

主要力量。在台湾也是这样,只不过程度要轻些。在这些情况下,家庭生产最终成为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真实的情况是,东亚的社会生产关系与西方农场农民有实质性区别。

总之,恩格斯的分析指出,家庭劳动和工资劳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适比例,取决于既定技术条件下对阶级斗争情况的复杂计算。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对家庭生产的分析,与古典模型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是有明显差别的。

传统部门和对资本的地理扩张的抵制

恩格斯所在的德国、列宁所在的俄国,都处在资本主义堡垒的外围。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小农场和手工业之间的相互支持更有效。两种生产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独自面对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竞争压力都有困难。但是,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就显示出了可观的弹性。正如亚当·斯密观察到的那样:

因为食物的货币价格在印度远低于在欧洲的水平,那里劳动力价格从双重意义上比较低,这不仅是因为需要用货币购买的食物数量较小,而且是因为食物的低价格。但是,在手工艺和工业比例相当的国家里,大部分制成品的货币价格,是与劳动力的货币价格成比例的。在手工艺产品的生产技艺和产业上,中国和印度虽然落后,却似乎不比任何欧洲国家落后太多。因此,在这些地方,大部分制成品的货币价格,自然就大大地低于欧洲任何地方的价格。

即使加上运输成本,直到1780年,印度出产的棉白布和平纹细布纺织品的价格,与英国产品相比仍有60%的成本优势。就中国的

情形来说,马克思引用了 W. 库克先生(曾在上海和广东担任《伦敦时报》记者)的话,来证明小规模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很有效率。根据库克的说法,中国的成本太低,英国出口的产品常常不得不在中国以仅仅够弥补运费的价格出售。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重复了同样的思想,他写道:“实物经济,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一段时间后提供的积蓄,对大工业产品竖起了一道坚固的壁垒,因为大工业的产品价格,包括了推广产品的流通过程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早些时候,在 1859 年,马克思将印度经济与中国经济进行对比,谈到了印度经济的本质:

正是同样的农业和手工业的这种结合,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抵制了并且仍然在抑制英国产品向东印度的出口。但是在那里,那种结合是建立在一种独特的土地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在这种制度下,英国人是这个国家的大地主,他们利用这样的权利进行破坏,因此强制性地把印度的一部分自给自足的社区,变成了一个个生产鸦片、棉花、靛蓝、大麻等原材料的农场,以此来换取英国的东西。在中国,英国人从没获得这种权利,因此就不太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

在更早一些时候,亚当·斯密就已经注意到了类似的现象:“在苏格兰的许多地方,长统袜的成本,比其他任何地方用织机织成的都要便宜。这些产品是仆人和劳工生产的,而他们的大部分生活来源,是从其他一些雇佣的报酬中获得的。”

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的效率,并没有给它的实践者带来财富。在卡尔·威特福格的生动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传统经济的命运是“饥饿的小农户手工业扼杀了大工业”。

马克思在写有关中国经济弹性的文字时,还把传统经济部门

的反抗,与农业的规模联系在了一起。拉加特·康塔·雷依最近指出了同一点。他说:

同时兼做手艺活的农民,和兼做农活的工匠,联合起来抵制着工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曼彻斯特和孟买都不能达到它们长期渴望的目标,即独占印度巨大的布匹市场。只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晚期(1929年),手工纺车才与工厂生产同步。

在中国和印度曾出现的情况,一度也在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出现过。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注意到:“只有摧毁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一国的国内市场才有广度和稳定性,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例如,据说19世纪在缅因州波特兰附近的一个棉纺厂主,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收任何费用,直到这里的人们对他的服务依赖起来为止。

最后,资本主义领域的技术能力突飞猛进,尤其是在化石燃料被开采利用之后。但是,一些传统的生产方式即使在现代,仍然可能比较经济、有效。这种相对的有效性,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时代里一定更加显著。这一深刻看法更加深了我们的这样一个认识:圈地运动和其他形式的原始积累,都不是起源于技术目的。原始积累之所以对统治阶级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更加有利于控制工人阶级。

重新夺回劳动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自给自足经济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发生了变化。昂贵的资本主义产品的积累,要求工人把全部时间贡献

给雇佣劳动。

花费在家庭经济中的劳动,会限制用在雇佣劳动上的时间。人们对自给自足经济难割难舍,最终对雇主来说是很不方便的。工业界并不想调节自己的节奏,以便跟农业周期相适应。比如,在18世纪的英国,当资本主义农业越来越依赖专业化劳动的时候,农户家里的纺纱和织布活动,有时就被禁止,以免这些活动影响农业劳动力的供应。正如一位英国实业家爱德蒙·阿什沃什告诉19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西尼尔的那样:“如果一个劳动力……放下他的铲子,他就使当时值18便士的资本没有产出。如果我们一个工人离开工厂,他就使价值100英镑的成本没有获得产出。”

虽然雇主们都更愿意雇工能全职为他们工作,但在工业革命早期,根除这种传统经济残余的成本过高,因此,大西洋两岸的许多雇主不得已雇佣的工人,都是在除了农闲时节外,还在自己的农场里干活的人。

事实证明,这种安排会造成麻烦。我们听说过,一个辉格党商人在七年战争期间为延期交货道歉说:“我们的制钉工们在收割季节大都不干活。”再则,家庭经济似乎也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技术要求。例如,纺纱能力的进步,就没有跟上不断扩大的制衣能力(从传统上来说,纺纱就是农业的一种副业)。

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一些工人仍保持着对农业活动的偏爱。直到20世纪早期,比利时的煤矿工人仍抽出时间照料他们的土豆地,这被称为“土豆罢工”。一直到1925年的时候,J. 罗素·斯密斯讲到,美国南部的工人看不起挣工资的农业工人,因为他们自己通过“狩猎、捕鱼或采浆果,就能获得同样多的食物——这些情况,对阻碍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更晚的一些时候,列维·斯特劳斯运动服部门的合同管理人和产品品质指导人罗伊·卡文德还抱怨说:“很多时候,秋季在农场地区因为收割农作物,旷工的情况就会增加。”

来自列维·斯特劳斯的报告,在现代经济中是很少见的。随着技术变得更加密集,公司不再能忍受把设备闲置下来、忍受损失,为他们从事农业的雇员提供方便。结果就是,必须有完全靠挣工资生活的劳动力。

将上述计算加以扩展

殖民地经济清楚地证明了我们的分析:资本家需要原始积累。资本家可以赞赏殖民地社会中家庭所做的工作,但是,这仅仅是在原始积累进行到足够的程度,足以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之后。考虑一下一个布尔^①农场主 1852 年的经历:“我曾经让卡菲尔人^②……来帮我干活,他们就说,他们靠卖木头等东西,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何必来给我干活,每月就挣 5 英镑。”

一篇殖民地报告提出这样的建议:

应该鼓励本地劳工在干完通常的服务期后,就回家去。维持这样的体系,能够使矿山以较少的成本,获得非熟练劳动力。否则,工人补贴生活的其他手段就会消失,于是劳工就更可能成为常住居民……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这种制度安排的后果之一就是,现代南非的采矿业支付的工资,连管理者自己都承认“不足以满足一个人及其家庭的需要,除非再加上来自他家乡的一小块土地的收入。比如,一个家在约翰内斯堡的人,不能指望仅靠我们支付给他的工资过活”。

① 布尔: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

② 卡菲尔人:白人对非洲黑人的贬称。

在19世纪晚期的尼日利亚,执行总督邓顿使用了同样的逻辑,来为继续实行奴隶制辩护:“一旦取消了对家庭奴隶制的限制,他们(奴隶)没有工作后,能够找到就在手边的工作以维持生计,这样的话,我恐怕他们就不会再做耕地之类的事了。”

当代发展研究又回到了这一主题上来。世界银行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撰写的报告写道:

用增加商品作物或增加生计作物种类的办法,来改进传统农业,其前景很难评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生计农业的特点是它的高产。自然的慷慨使农民可以用比较少的努力,生产出足够自用的农产品。在这一点上,巴布亚新几内亚超过了许多国家……除非有相当多自给自足的农庄因为新的消费需求的发展,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则,生产传统食物相对容易这一事实,就可能阻挠对新作物的种植实验。

最后,我们应该说,计算什么样的自给程度算是合适,这种计算也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一位16世纪的波兰作家劝告说:“农民必须的土地数量,应该能够保证在年景不错的时候,一个好工人用不着买面包。”当然,这里的背景与我们所说的大不相同。

关于政治经济学和贫困的最后结论

詹姆斯·凯·夏特沃什控述说,在英国,“贵族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贵族都更富有、更有权势。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贫困者更受到压迫、更加贫困、人数更多……”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富有和有权势者几乎没做什么事情,来改善为数众多的贫困者的生活。毕竟,一个集团的胜利是以另一个集团的失败为代价的。

无论是《狩猎法》还是原始积累的其他方面,都没有在政治经济学的编年史上占据显著位置。传统政治经济学也几乎没有直接关注过贫困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相当多的英国社会成员更愿意安逸地生活在认识上的不和谐音之中。正如亚当·斯密解释的那样:

穷人进进出出无人问津。他在一大群人中,和被关在自己简陋的小屋中,是一样的不起眼。那些处境类似他的人生活中充满着卑微、痛苦的琐事,对奢靡、放荡的人们来说,算不上什么消遣。他们从他身上移开目光。即便是当穷人的极度困苦强迫他们把目光投向他时,那也仅仅是鄙视他们中一个令人如此不快的东西而已。幸运儿和骄傲者惊诧于人类的不幸居然敢在他们面前出现,似乎穷人生活的可恶、悲惨的一面,就是想打破富人的安宁幸福似的。

实际上,富裕的人们尽了很大努力以避免面对贫困。例如,恩格斯注意到,曼彻斯特的城市布局是如何为保护资产阶级的敏感神经而服务的:

布局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那些金钱贵族的成员,可以从所有工人聚居区中间,取最短的路线穿过,到他们要去的地方,而用不着看到潜伏在他们左右的严酷的苦难。因为,从交易所到城外的所有大街的两边,都林立着几乎连绵不断的商店,这些商店是由中小资产阶级掌管着的,而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保持着整洁、体面的外表。

人们希望,英国的穷人能被挡在视野之外。如果他们胆敢纠缠,即使他们人数再多,也会激起愤怒的反应。英国资产阶级通常在日

常生活中不会直接遭遇到贫困。他们常常是在访问欧洲大陆或爱尔兰时,才第一次见识什么是肮脏。在那儿,贫困表现出某种异国情调。见识到贫困之后的震惊,更坚定了英国资产阶级关于英国制度优越性的信念。

城市里的贫困,吸引了那些胆敢研究市场经济的偏僻角落的年轻人的目光。那里的肮脏条件,使那些不小心闯入贫民区的各种敏感的人都感到震惊。研究狄更斯的一位学者斯蒂芬·马尔库斯认为,19世纪早期曼彻斯特城里悲惨之极,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其他作家,都无法真实地描述他们看到的景象。

对某些人而言,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虚假的指望,那就是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例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就曾写道:

我读米勒的政治经济学时很激动。我的不满并不是针对物质享受的不平等,而是针对机会不均等。于是,我在假期里访问了几个城市里最穷困的区域,看着那些最贫困的人们的脸,走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然后,我下决心用尽我的全力,全面研究政治经济学。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也表示了“对河岸与河流之间的黑暗通道的好奇”。但是,不管是杰文斯还是马歇尔,一旦成为成熟的经济学家后,似乎都没有继续研究他们第一次邂逅贫困时所问的问题。

类似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我们几乎没有听人提过一些人遭受的苦难(正是这些人,使市场社会能够成功)。这种无知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接下来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学毫厘不爽地准确运用了原始积累的经典理论。在每一种情况下,古典政治经济学都要求对自给自足经济采取措施,以便使剩余价值

最大化。

自给自足家庭情况的恶化,到 20 世纪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被剥夺财产的人们,蜂拥到了那些过分拥挤的工业化城市中,贫困问题才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第六章 政治经济学的开端

只有当阶级差别已经出现,当贫富差距已经相当悬殊,并且当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为数众多的人的需要,不再能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得到满足时,一个真正的国家和一个真正的政府才能产生。

——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演讲录》

一个伟大的开端

正如我已经提过的那样,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不愿意完全依靠市场来组织生产。古典政治经济学要求采取措施,强迫那些自给自足的人,融入到货币联系网中去。本章将说明,这一观点正是威廉·配第、理查德·坎特龙^① 这些重农学派,以及其他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看法。

对于大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自我供给不过是野蛮的过去的残存物。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没有把自我供给当做一个理论范畴来对待。相反,他们把对自我供给的敌意,隐藏在一种理论工具背后,这一理论工具否定了所有不符合雇佣劳动生产规范的活动的合法性。

^① 坎特龙(Richard Cantillon):17世纪后期,爱尔兰经济学家,曾撰写最早的现代经济学著作。

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背景,也隐含了对非市场活动的判断。例如,斯密与杜尔哥的著名的“四阶段”理论提出,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从狩猎和采集食物,发展到饲养动物,然后是农业,最终是商业社会,这一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经典理论,已经预见到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这种经典理论代表了在对过去的认识上,人们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但这也是为意识形态目的服务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通常认为,工人阶级与野蛮人并无二致。例如,约翰·雷认为,野蛮人和工人阶级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没有有效地进行物质积累的足够愿望。两年后,西尼尔用他关于“节制”的分类,表达了完全相同的观点。

此外,把靠狩猎谋生与野蛮人联系到一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社会强加的对狩猎行为的限制,不可能表现出足够的敏感。的确,让·巴普蒂斯特·萨依谴责原始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回顾政治经济学先贤祠中主要人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对自我供给的持续不断的敌意——至少当自我供给影响了雇佣工人的招募时是如此。

序幕:威廉·配第爵士

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的时候,焕发出一种少年人般的光彩。或许没有一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者在成就方面,或是在不成熟方面,可以与无可比拟的威廉·配第相提并论。马克思慷慨地称他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

配第是个博学之士。在他赢得政治经济学家的名声之前,他作为一个著名的医生,已经声名远扬。他还当过音乐教授,并涉猎过船舶设计。

配第的科学活动使他对技术非常乐观。他热情地预测,有朝一日,“野猪和其他更不驯服的野兽会学会劳动;所有邪恶的东西,都会被用于高尚的用途”。通常情况下,配第还是控制着自己生动的想像力的。他的想法主要来自他敏锐的认识能力和对市场社会的远见卓识。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看到,1666年伦敦大火灾后的财富重建过程中,资本显示了多么大的积累能力。

配第也认识到,通过改变社会组织体系,可以实现未来的前景。他不仅意识到更合理地组织社会可以增加劳动力数量,他似乎还第一个描述了工场里的劳动分工如何可以提高效率。他举的是制表厂的例子——制表业是英国作为技术发明国而不是模仿国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配第的航海经历可能有助于他看到这种新生产方式的战略重要性。他旅行到荷兰时,亲眼见到了荷兰造船厂里醒目的工人专业分工。配第对船体结构的兴趣,就像他对社会劳动分工的兴趣一样。恩格斯推测,劳动分工起源于军队。配第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恩格斯的推测。

对其他从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而言,劳动分工主要是一个理论问题。配第与他们不同。他是爱尔兰土地大调查的组织者。在这项活动中,他从劳动分工理论中收获颇丰。在被任命为克伦威尔的军队在爱尔兰的首席医务官之后,他又获得了在这片新征服的土地上进行土地调查的合同。

有钱的个人对克伦威尔军队的资助,在全部经费中占很大部分。克伦威尔向他们保证,让他们分割英国准备没收的250万英亩爱尔兰土地。克伦威尔必须在没有耐心的征服者瓜分战利品之前,完成土地调查,所以调查的速度必须特别快。

配第雇了1000个未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做这次任务的调查员。他首先教会他们关于专业调查的各种基本知识。配第的工作做得很彻底。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为自己谋取了13000英镑现金和18000英亩土地,直接违反了最初协议的条款。

配第的构想

配第的分析具有独特价值。他有广泛的经历,使他与他那个时代一些最活跃的力量一直保持接触。再加上他在爱尔兰进行的土地调查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以研究整个爱尔兰民族的社会、经济条件。

配第早期做船舱服务员的生活和他在爱尔兰的军事使命,预示了英国在将来会成为一个海上强权。这一视角为他提供了一个分析原始积累的与众不同的背景。大多数观察家因为农业社会能够提供比较廉价的步兵,所以不太愿意太快地反对农民社会。但配第已经坚持认为,英国军队的未来必须依靠强大的海军,而不是陆军。当然,英国的地理位置使英国的海军势力,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英国因此可以牺牲部分农民的利益,以形成一个新社会,该社会主要依靠海军的防卫力量。

按照配第的看法,海员既是战士,又是手工艺者和商人。他用下述的计算来说明他所暗示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优点:“在英国,农夫每周只能挣到4先令左右,但是海员得到的工资、食品(还有免费居住)和其他日常消费品可以多达12先令,因此一个海员相当于3个农夫。”实际上,海军的确成了不列颠帝国体系的基础。

在英国创立一个新的劳动社会分工的想法,与配第的使命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他甚至试图设计一些能够最好地支持这一想法的舰船。虽然他的航海设计并不成功,他的社会计划却非常成功。配第预想的海军,只有在人们能生产出足够多的出口商品之后,才有经济上的意义。既然人们对步兵部队的需求逐渐减少,出口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所以配第要求原始积累加紧进行。

配第在荷兰的经历,印证了他关于一个新的社会劳动分工的观点。事实上,阿斯普罗木格斯认为,配第作品的中心特点,就是试图以他本人在爱尔兰和荷兰的生活经历,来解释为何贫困的爱尔兰与成功的荷兰有如此大的反差。配第宣称,荷兰依赖国际经济,以获取食物和出口商品,虽然事实上荷兰主要出口的是服务而不是有形产品。

配第明显关注革新英国的经济结构,这引起他注意到劳动社会分工的改变。他观察到:“食品生产业分为谷物耕作和放牧家畜,服装贸易分为织布、修补和裁缝、制鞋业、皮革业,建造房屋又分为铁匠、泥瓦匠和木匠。”农民并不是想当然地接受雇佣劳动,不大可能完全接受配第关于新的社会劳动分工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将消灭他们的生活来源。

也许是因为家庭经济如此根深蒂固,配第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诱使人们放弃为自己的需要进行生产,进入特定的专门行业。但对配第而言,这根本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他把创造新的社会劳动分工的职责,赋予了政府。

配第使用了“金元主义”的语言,来为他的社会劳动分工设想提供理论支持。他说:“每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在于它同整个世界进行普通的肉类产品、酒类饮料、服装等等的对外贸易的份额,而不是国内贸易的份额。对外贸易会给国家挣得一些黄金、白银、珠宝以及其他种类的世界通货。”配第的通货不过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源自国家经济力量的发展。因此他估计,英国比它最大的对手法国要强大得多。

配第将新的社会劳动分工与世界通货紧密联系。他在类似的一段文字中,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联系。那段文字,就在他估计了海员的优越生产能力之后。

配第和社会劳动分工

配第一生都对这样一件事感兴趣：鼓动政府采取行动，减少家庭生产的活力。尤其是，他认识到了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战略重要性。在他的《举一反三》(*Verbum Sapienti*)中有一章，题目是“怎样雇人及其雇人的目的”。其中，他解释说，一个高效运行的社会必须让人们“用少量的人手为全体国民提供食物和必需品”。

配第希望让每个人都去工作，这在当时是个普遍的想法，这些人包括“小偷、强盗、乞丐、神学院里浮夸无用的祈祷人……讼棍……江湖郎中……和乡村学校里迂腐的语法学家”。配第建议，法律“应允许劳工仅依靠必要的资金生活；因为如果你允许劳工有双倍的资金，那么他就会只干一半的活，如果你不给他这么多钱，他就能尽全力干活了”。为了这一目的，他坚持认为，食品应该保持在有效短缺状态，多余的谷物应该存入粮仓，而不是让这些谷物“被恶意、野蛮的人滥用，这会对国家不利”。

当时的许多其他作者主张，食品应该定高价，虽然他们使用的言辞并不总像配第那样激烈。配第以他特有的大胆，热情地希望“(爱尔兰)那个巨大多山的岛屿能沉入水中”，这样就剥夺了爱尔兰居民的土地和赖以维持生计的东西，并强迫他们移民到英国，他们就可以在这里高度实现“一个愉快、有利可图的梦”。配第还更加脚踏实地地呼吁政府，为加快培养出一个工人阶级，从爱尔兰移民 100 万到英国，让剩下的人来管理作为家畜养殖场(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工厂”)的爱尔兰。

对配第的社会观点唯一充分的评价，可能来自于乔纳森·斯威夫特那支尖刻的笔。他的《温和的建议》(*Modest Proposal*)一文，建议食用儿童的肉。乔治·威特考斯基发现了文体上的大量一致性，

可以证明一个观点：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主要是以配第的作品为原型的。格列弗描述了“一种奇怪的计算方法……用我们中几个教派和政治派别的人数，来计算我们国家的人口”，这似乎也是在影射配第。并且，斯威夫特用仿戏诗来嘲笑配第，嘲笑他将爱尔兰变成家畜工厂的主张，以及上文提过的配第开列的可投入生产性劳动的职业表。

由于当时的数据只能是胡猜乱碰，所以配第的方法有时的确易于受到嘲笑。例如，盖·罗斯是这样评价配第的方法的：

在将荷兰和西兰岛^①的富庶程度与法国相比较时，他引用了另外两个人的猜想，结果他不喜欢这两个结果，于是他就提出了他自己的猜想。他从两本书的内容来推测法国的人口数量，其中一本说法国有27 000个教区，另一本说如果一个教区有600人，那就非常之多了。因此他假设法国每个教区平均有500人，以此算出法国人口为1 350万。他就是这么干的。

虽然他的预测离奇、猜想大胆，虽然他因在爱尔兰攫取土地，引发官司，消耗了大部分聪明才智，但威廉·配第爵士仍然为政治经济学开创了一条道路。在他之后的三个世纪里，政治经济学一直在遵循这条道路。

理查德·坎特龙

理查德·坎特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二号重要人物，但却不是大名鼎鼎。在经济理论的严密性方面，坎特龙超越了配第，取得

^① 西兰岛：在丹麦东部。

了巨大进步。实际上,坎特龙曾两次公开对配第的著作表示轻蔑:一次说它们是“离奇的,远离自然法则”;另一次说它们“纯粹是想像,是随随便便得出的结论”。

在研究原始积累问题时,坎特龙与我们碰到的其他作者不同。他超越了呼吁加强原始积累进程这一层次。的确,他抱怨乡下人享受的假日太多,但当时的经济学家都这么说。坎特龙还写道:“人们生活依靠的,不光是土地上的出产。耕种这些土地不仅对地主有利,同时对这些地主也有害,因为人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从地主的财产中分割出去的。”

我们对坎特龙生平的了解,大部分来自法庭记录。配第经常因为他的土地投机,而被强行召到法庭。坎特龙则深深陷入了关于他买卖信用的司法纠纷中。具体地说,坎特龙借给别人钱,用以购买约翰·劳的股票^①。作为抵押,他要求由他来保管股票。他预计到这支股票会下跌,就把股票卖掉了。那些向他借钱的人控告他违反了他们之间订立的信托和约。他们认为,准备购买的新股票,不能完全等价于原来作为抵押物的股票。

事实上,如果股票价格上涨,坎特龙可能就要破产,使他无法买回股票。向他借款的人们,就会失去自己投在这些股票上的资金。如果股票价格下降,坎特龙就获得了双倍的利润,部分来自于贷款的利息,部分来自于股票价格的下跌。坎特龙愤怒的客户起诉了他,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安托恩·墨菲重新描述了坎特龙的离奇故事,包括艰难的官司、他充满丑闻的家庭生活、他可能的假死和他可能最后默默无闻地在南美的丛林里度过余生。虽然个人经历也许引人入胜,但坎特龙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他在理论王国做出的贡献。

^① 约翰·劳的密西西比规划,是一个殖民地开发项目,未能取得投机商们所哄抬的利润,坎特龙从该计划的破产中发了财。

在他著名的《一般商业之性质》中,坎特龙实际上对经济理论做出了几个关键性的贡献,虽然他可能只想对他律师的文件夹有所贡献。首先他指出,土地产生剩余,超过并且多于耕作土地的人生活所需。对坎特龙而言,这种剩余代表了其他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这一洞见为法国的重农学派开辟了道路,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讨论。

更为根本的是,坎特龙远远超越了配第对经济进行重新组织的实用号召。坎特龙把这种分析植入到他著作的结构之中去了。他的著作分三卷。第一卷说的似乎是爱尔兰的封建世界——他就出生在这种环境中。接下来的两卷,说的是他移居到的这个货币世界。

按照坎特龙的观点,他在著作最后部分描述的经济中的价格体系,可以与典型的封建经济制度下控制劳动力的手段,达到同样的效果。实际上,坎特龙第一个意识到,市场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因此,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法国经济

几乎所有观察者都一致认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传播到法国时,法国的经济正陷入功能紊乱之中。马克思谈及了“法国农业人口难以名状的苦难”。托克维尔宣称,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农民的生活处境甚至比他们13世纪的先民还要艰难。一个18世纪去法国南部的旅游者宣称,他没有看到鸟,因为农民已经把鸟吃光了。沮丧的弗朗索瓦·费奈隆^①警告说:“法国正在变成一所绝望和饥饿的穷房子。”

^① 费奈隆:18世纪法兰西天主教大主教。

由于法国的形势朝革命方向发展,受过教育的公众开始对经济问题有了浓厚兴趣,尤其当关系到农业经济时。杜邦·德·内穆尔说:“我们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是在这个时代(1750年)开始的。”伏尔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写道:“在1750年左右,这个国家看够了诗歌、悲剧、喜剧、歌剧、小说、浪漫故事、比浪漫故事更浪漫的道德反省、关于圣恩和灾难的神学冲突,它开始思考关于谷物的问题。”米拉波伯爵走得更远。他宣称:“所有政治都源自麦粒。”我们似乎可以大致将米拉波的意思理解为,法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中心是农业危机。

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观察家都同意,法国的困境源自以下原因:过重的税赋——法国的税收体系大量免除贵族和上等人的税收;农民太穷,以至于不能承担必要的投资;教堂支持过多的假日,助长了农民的懒惰。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伏尔泰关于改变假日的建议。坏脾气的英国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显然同意这一观点。他抱怨说:

大量假日不仅助长了他们的懒惰习惯,实际上还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本可以生产出的产品……他们全部时间的几乎一半,本可以用来干活,却都用在参加各种愚蠢而无意义的宗教仪式中,没有给自己和社会带来好处。

萨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唯一的一个对英国经济的巨大优越性持反对意见的人,但并非所有人都承认法国经济像这些评论家说的那样糟糕。更晚的时候,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认为,法国经济比英国经济更好一些。罗伯特·阿尔德里奇总结了这些研究:“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法国经济转型为工业社会的过程可能更加人道,而且效率也未必低。”

一句话,法国的发展道路也许与英国的不同,但并非比英国的

差。农民虽然贫困,他们的境况也许不比英国那些不熟练的城市工人更差。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化的道路,比英国的道路更加人道。遗憾的是,人道的转型,同强迫工人服从而挣得的巨大利润比起来,就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了。

重农学派的经济观点

在法国有一群经济学家,被称为重农学派。他们的目标或多或少是要赶上英国的体制。正如我们可以猜到的那样,他们与那些可能因为他们的建议而得利的人们站在一起。用诺曼·威尔的话说,“重农学派不是职业经济学家,而是法国官僚阶层产生出来的各种官员,他们爬上了土地拥有者的行列,甚至贵族的行列”。

这些官员想不再是资产阶级,也没那么容易。他们太穷,不能像贵族那样拿土地当儿戏。他们必须挣得收入。毫不奇怪,他们的理论论证了新的生产体系的合理性,并要求改革过时的、给他们以沉重负担的财政制度。

例如,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在购得一大块地产并且成为贵族之后,在1756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论文。按照他的经济表(一种对新的社会劳动分工进行表式分析的理论),农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在250%到300%之间。难怪加布里尔·邦诺·德·马布里深有感触地写道:“现在,魁奈先生完全被这个新题目迷住了。他的第一个发现就是,如果地价上涨,他的新领地的产出就会同样上涨,因此他的这笔买卖的确不错。”

重农学派在坎特龙的分析基础上,建立了他们以地租为中心的理论。米拉波是魁奈的忠实信徒,宣称曾把坎特龙的著作收藏了16年,并计划把它作为自己的作品出版。实际上,他听说别人也有一份复件,并准备以原作者的名义出版。结果,米拉波终于在

1775年把他收藏的作品作为坎特龙的作品出版。

重农学派的“剩余”和“地租”概念，反映了法国中产阶级中流行的观念和坎特龙的理论。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还不能想像到除了地产之外，还有财富和权利的其他来源。例如，他们的法律框架显示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资本扩张的潜力。

尽管重农学派狂热地支持大规模农业，他们也知道，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业，实际上可以有更高的产出。请回忆一下第五章讨论过的庞斯和巴黎市场化的园艺工的成功。

这些市场化的园艺工人，在工作上真是花了很多时间。米拉波甚至说，大多数巴黎园艺工在睡觉时，也在床边准备着一桶水。夜里当他们的植物发出声音说它们渴了需要水时，他们可以方便地浇灌。但是，即使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一半，他们的产出仍将是相当高的。

对劳动力的态度

重农学派将英国视做运转良好的社会的最成功范例。但他们仍然在一个方面，与英国式的基本劳动社会分工保持了距离：他们要求最初的雇佣劳动力从事的是农业劳动，而不是工业劳动。事实证明，不受欢迎的纺织业会与他们争夺农业劳动力（纺织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流），因此，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纺织生产。与此相反，英国人更担心的是，农业活动可能会与工业活动争夺劳动力。

重农主义运动与英国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关键区别。虽然几乎文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法国农民很懒惰，重农学派对农民们并没有这种明显的敌视态度。英国人在谈论普通人时，其典型口吻在最好的时候也是有争议的。法国人与英国人不同。法国

人常常考虑他们的乡下伙计的生计问题。

当英国人强烈反对下层人民狩猎的时候,法国人则在担忧,他们的人民不得不满足于用栗子之类的粗糙食品果腹,甚至连栗子都成了昂贵的奢侈品。图卢兹的议会对妇女们的辛酸命运表示伤感:她们晚上纺纱,白天操起铲子,甚至犁地。随着形式更加自由的商业活动的展开,这些妇女们得到保证说,她们的工作负担一定会减轻。甚至连圈地也被提出来,作为一种扩大劳动力需求的办法。

说到底,这样的区别仅仅是方式上的区别而已,因为重农学派对工人阶级的态度可以像任何人一样残酷:米拉波将农业劳工视为跟用于耕作的家畜毫无二致。当然,魁奈在写下面的文字时,也没有表示出对工人的同情:

让人们习惯于以太低的价格购买谷物,是非常有害的。其结果是,他们会变得不再努力工作;他们只花很少时间挣够面包钱就是了,而且会变得懒惰、自以为是;农场主们会很难找到工人和仆人,而且在丰年时找来的人也不好好干活。普通人应该挣更多的钱,而且应该激励他们挣更多钱,这是很重要的。在上个世纪里,面包很昂贵,人们习惯了面包与他们的收入相比价格很高,结果他们工作更努力,生活也更好。

净产品和毛产品

那么,大规模农业的新技术优势在哪里呢?法国人早先从英国学到的关于新农业的答案,看上去似乎已经很清楚了。在重农学派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发表的一篇文章,揭示了英国人的观点:

我们可以设想,在旧制度下种地的地主被迫养 10 匹马, 10 个劳工来犁地、播种和收割, 10 个妇女来梳棉和纺纱。在现行制度下,为了连续供应不同的谷物,我们估计 5 匹马和 5 个劳工就足以胜任一个农场的工作,并且在梳棉、纺纱和织布工程中,机械的使用可以使两个妇女足以制造出以前需要 10 个工人才能完成的制成品。

波义德·希尔顿将以上的文字归于爱德华·爱德华兹所作,就是那个被约瑟夫·多尔夫曼认为是以皮尔西·拉文斯通为笔名的两本书的作者。这两本书通常被认为是两本最著名的关于“李嘉图社会主义”的著作。但是,拉文斯通反对获取利润,但上述引文的作者并不怎么反对以地租形式表现的利润。这种区别支持了皮埃罗·斯拉法的观点,即拉文斯通作品的作者是理查德·普勒。

不管作者是谁,这段文字揭示了新农业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虽然这些技术看上去节省劳力,但经过仔细考虑后,这些节省就会显得不明确了。首先,劳动力的节省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不是因为用更少量的劳动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这不过是劳动力更加密集的结果。

新体系不仅加快了劳动速度,而且还重新引导劳动力,以适应资本的需要。在旧体制下,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是不定期的。某些特定的农活,诸如种植、收获,需要大量劳动力。在劳动力需求不大的其他时候,农业工人有更多的时间,为自己的需要而从事生产活动。上述引文的作者认为这种活动是资本的流失。他建议说:“任何一个将土地租出去的人,都应该在他自己的家里,至少在他自己的农场范围内,保持足够的人手,不仅可以完成耕地任务,而且还可以制造他自己、他的家人和他的工人们需要的所有衣物。”

从长期角度来看,伴随着新型农业技术的出现,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发生了深远的扩张。但是看来,在当时最有吸引力的,是在农业工人以前用在家庭生产上的那些漫长时段,降低工人的成本。以前,工人把他们的时间,分为生产谷物的时间和生产家庭用品的时间。现在,他们就被要求多多少少更加专门地从事谷物生产了。农场里需要的专门直接从事谷物生产的人数减少了,其结果就是净产量增加。

因此,米拉波这个自诩为“人民之友”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农业能迫使人们不再依靠地主生活,所以是正义的。在重农学派的方案中,正如 L.P.阿贝尔在他的《谷物自由贸易原理》(*Principles sur le liberte du commerce des grains*)一书中所建议的那样,工人被视为与其他商品类似的商品。为了在理论上支持他们的观点,重农学派们从国家财富中扣除了耕种者消费的谷物(并且按说也扣除了其他为自身消费而生产的所有产品)。

重农学派认为,农业的成功应该用净产品来判断。这一观点并非无人反对。其他人,比如弗朗索瓦·弗布奈就反对说,养活人民,这本身就是目的。实际上,重农学派希望把传统农业生产,变成创造剩余价值而进行商品生产的产业。批评他们的人,从使用价值生产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简而言之,被重农学派们所大加推崇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成功,不光是个技术进步问题。

对重农学派的接受

重农学派激起了广泛的反感。例如,大卫·休谟在给他法国朋友的信中写到:“我希望你能严厉地训斥他们,捣毁他们,给他们以持续的打击,直到他们变成灰尘。他们是、真的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人性、最傲慢的一伙人。”格林男爵是重农学派最严厉的批

评者之一,他对他们的主张嘲笑道:

他们先饱餐一顿,然后开始干活。他们砍,他们挖,他们排水,不放过法国的任何一寸土地。他们白天在迷人的冬暖夏凉的沙龙里工作,晚上离开时洋洋自得、心满意足,以为自己使这个国家更繁荣了:

让·巴普提斯特·安希恩·胥阿于1770年8月6日在一封给阿贝·加里安尼的信中写道:“我真是烦透了那些经济学家、出口学家和自由放任主义者之类人的术语和烦人的重复!但是,我还没等写完(《对话录》的)的头四页,就被他们裹挟走了,一直到最后都无法做别的任何事情。”

如何解释这种敌意?部分原因在于,重农学派挑战现行制度的行为,吓坏了那些保守的人。例如,托克维尔警告说:

我们的经济学家对历史极为轻视……从这一基点出发,他们开始工作,无论法国的什么制度,无论它多么值得尊重,有多么良好的基础,只要这制度哪怕在最轻微的程度妨碍了他们,或者与他们精心设计的政府框架不符,他们就没有不对这制度大叫大嚷的……

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说法,国家的功能不仅仅在于统治这个民族,还在于按照既定的模式重塑这个民族,按照预定的模式塑造人民精神上的认同,并且向所有人的头脑中一点一滴地灌输他们认为需要的思想和情感。

最后,托克维尔批评说,重农学派们呼吁经济自由,却不呼吁政治自由。当然,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害怕普选权。对重农学派更具有毁灭性的是,托克维尔将他们对国家的依赖,说成是一种社

会主义。但我们在本书中会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通常呼吁国家行动起来,扫除对资本主义贸易的障碍,虽然他们这样做时通常很谨慎。

更近一些时候,泰伦斯·哈奇逊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重新提及了对重农学派的批评,说他们是现代共产主义的精神先驱,虽然前者勉强认为他们“也许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少一些对独裁的专注”。哈奇逊所采取的立场让人颇觉奇怪,因为他也反对他所谓的“柯尔贝尔^①—斯大林主义(Colbertist - Stalinist)”运动——重农学派也坚决反对柯尔贝尔体系。

但是,亚当·斯密这位自由放任政策的守护神,采纳了重农主义的大量分析,只有一点除外:他们强调只有农业生产具有生产能力,这一点特别具有法国特色,被斯密摒弃不用。他在模糊原始积累的重要性的过程中,还让自己的理论不像重农学派那么抽象。事实上,斯密把重农主义教条改头换面,使斯图亚特——在介绍他对家庭经济的各种理论的清晰分类时,我们已经遇到过他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重农主义比斯密更加科学。但是,斯图亚特认为,斯密的理论对政治家和商人“非常实用,鲜有例外”。

当然,就原始积累而言,斯图亚特的意见是正确的。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重农学派将此问题放在了更加理论化的基础上去分析。但是,他们分析得太露骨了,因而不受欢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更愿意以隐蔽的方式行文,似乎所有苦难都要归因于市场的无声强制,而不是一些经济之外的行为的结果。

概言之,从重农学派身上,正如从威廉·配第爵士身上一样,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创造新的社会劳动分工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有何关联。这种关联,通常体现为对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的敌视。

^① 柯尔贝尔(Colbert):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致力于建立法国的经济霸权。

第七章

詹姆斯·史都华描述的原始积累秘史

一个民族要自愿采取一种不同于现有制度的农业,就像河水倒流一样困难。

——史都华《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

苏格兰封建社会的崩溃

本章讲的是詹姆斯·史都华爵士对原始积累的贡献。史都华或许已被人们淡忘,但他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一。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得益于他在苏格兰受的教育。苏格兰是个神秘的国度,即使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的来访者也这么认为。在18世纪早期,笛福就说过:“我们的地图绘制学家几乎不知道如何绘制苏格兰的地图,就仿佛那里被罗马人征服了一样。”18世纪晚期,塞缪尔·约翰逊回想起他的高地之行:“这趟行程使我学到了许多,实际上比我以前学到的任何东西都多。我见识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苏格兰高地,部族价值观仍很盛行。所有评论家都认为,在农村地区,家庭经济仍保持着高度的自给自足状态。早期的资本主义热情预言人笛福说,尽管环境不理想,苏格兰的崎岖高地上的人们还是能够安逸地自给自足。他说:“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狩猎……不管这个国家看起来多么多山,多么野蛮,人们却是衣食无

忧的。”他特别提到了这里有鹿和鲑鱼。

在1707年和英格兰合并之前,部族首领统治着苏格兰高地:人们交纳实物代租,且服兵役。习俗确定了一定数量的租金,或是一只羔羊,或是一只绵羊。詹姆斯·安德森是这样描述的:

一个部族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一直到最近,部族首领都一直和自己的臣民生活在一起,共同分享物质生活资料。他们不知道商业给(大不列颠)岛上的其他地方带来的奢侈品,还安稳地过着简朴的生活……这很自然的在族长和族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温暖关系,而在市民社会发展的任何其他阶段,几乎都没有这种关系。

亚当·斯密找出了这种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外贸易或任何技术精湛的制造业,那么即使是百年难遇的人才,也不能很好地利用他的收入。他只好用这些钱来维持大约1 000个家庭的生活,这1 000个家庭自然都听他调遣。”

合并到大不列颠王国之后,地主们都看到,打入赚钱的英国市场,可以提高他们的主要产品牲畜的价格,从而大捞一笔。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苏格兰从与英格兰的联合中得到的所有经济好处中,也许牲畜的提价是最大好处。这不但提高了高地地区所有地产的价值,而且,也是改善低地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赚钱的好机会出现时,一些地主开始转变他们的观念。他们开始把他们的参照点,从自给自足的部族经济,转向低地和英国的贵族世界。对钱的欲望被充分擦起来。托马斯·塞尔扣克伯爵^①恰当地描述了这种关系:

^① 塞尔扣克伯爵(Thomas Selkirk, 1771 - 1820):苏格兰慈善家,他建立了一些加拿大殖民点。

通过让佃户低价租他们的农场,他们可以随时得到所需的东西。他们有权解雇任何不服管束的人,从而保护他们的君主一般的权力。经济上的损失似乎倒不重要了……高地的绅士们似乎在这个问题上过于小心,以至于他们从不敢冒险提高租金。

1745年,卡洛登战役^①的失败粉碎了苏格兰的独立梦,也结束了苏格兰高地的传统经济结构。詹姆斯·安德森说道:

政府由于一些明智的理由,觉得有必要解除族长的权力和权威……许多留在当地的族长,发现自己的权力在削减,他们逐步适应了文明生活的快活,越来越讨厌原来习惯的生活方式了。

一旦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成了不争的事实,族长们就不怎么需要族人服兵役了。这种情况就为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转变,找到了好借口。苏格兰地主们不再是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头儿,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主,他们的土地能为他们赚取租金。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话来说:“现在被剥夺了职权的族长们……渐渐从族长,堕落成了贪婪的地主。”结果,在19世纪50至70年代,高地的租金涨了4倍。

类似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73年说道:“有些苏格兰族长似乎不再靠自己的庄园为生……而是想要一种奢华的生活……他们最近大大提高了租金,以支付自己昂贵的开销。”

尽管他们的收入不断增加,地主还是背负重债。J. H. 格雷·格

^① 卡洛登战役:“1745年叛乱”的最后一战,标志着詹姆斯党人企图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努力彻底破灭。卡洛登在苏格兰境内。

林说：“这已经成了一个传统——当苏格兰议会结束时，卡农格特监狱就塞满了人。这些人的豁免期一到，他们的债主就会死死抓住他们不放。”亚当·斯密轻蔑地指出，虚弱无力的贵族争相用能够供养上千男丁的钱，来买一个钻石带扣，这就是没落的征兆。

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拿史都华时期的苏格兰，与正在由部族社会转向文明社会的古雅典相比较。像雅典那样，苏格兰成了学者聚集的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体系。同样地，他们也成为先进军事邻国的猎物。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史都华更认同斯巴达，而不是雅典。

苏格兰的原始积累

为了满足对奢侈品的新欲望，地主们抛弃了他们对氏族的传统责任。他们原先拥有土地，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身为族长，但是后来，他们却宣称土地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以令人生疑的“所有权”为基础，以发展农业为由，把大批人赶出了土地。事实上，第一批在土地上养羊的地主，得到了丰厚的利润。

侵吞氏族财产，是原始积累的最典型例子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引用了 1773 年的《爱丁堡新闻报》(*Edinburgh Courant*)说：在两年的时间里，有 1 500 人从苏格兰萨瑟兰郡移民出来。许多年后，在 1814 到 1820 年之间，史都华妻子的亲戚苏格兰萨瑟兰郡女公爵的后裔，采取了强硬措施，又赶走了 15 000 位居民。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

所有村庄都被毁了、烧了，所有土地都成了牧场。英国宪兵执行了这次驱逐令，赶走了居民。一位拒绝离开的老妇人被活活烧死在她的小屋里。结果，这位妇人留下的 794 000 英

亩的土地过了一段时间就成了族长的……。到 1825 年,这里的 15 000 盖尔人就被 131 000 只羊替代了。

尽管这种方式看起来特别粗暴,但我们仍应注意,地主们最近又把这种方式施加到了他们在印度的佃农头上。

为了避免对被压迫阶级的同情心过多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应该注意一下,西斯蒙第几年后说,这些不幸的土地所有者那时非常担心失去他们的财产。另外马克思在《纽约论坛》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责这些把农民赶出去的行径。在该文章中有一个错误的引用(这在马克思是极为少见的),把史都华也列在被谴责者的名单中了。他引用说,史都华说了这样的话:“苏格兰高地一小块土地喂养的人口,是土壤最肥沃的省份中同等面积农场喂养的人口数的 10 倍。”史都华实际上是写的是同等“价值”(value),而马克思错引成了同等“面积”(extent)。

如苏格兰萨瑟兰郡发生的那种圈地运动和驱逐活动,可能显得有利于苏格兰的长期发展。但是,对那些被动深陷原始积累中的人们来说,它的后果是毁灭性的。甚至那些所谓的长期利益,也都是值得怀疑的。让我们回想一下,牧场增加之后,养鹿场也扩张了(见第三章)。

地主们驱逐人们,同样有政治动机,毕竟农民们都是英勇的斗士,他们期望地主尊重传统的权利。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的苏格兰游记中抱怨道:“为了阻止叛乱,可以赶走人民,为了和平统治,可以不要国民,这是一个并不深奥的政治伎俩。”

对苏格兰发生的大规模原始积累活动,其他人的态度则更温和。例如,托马斯·彭南特激动地说:“就让我们在一些过火行径上罩上一层面纱,一直到让联合王国大大受益的那一天吧……平静的时期就要来了:压迫将导致人口锐减,人口锐减又将给我们带来代价高昂的平静。”几年后,善良的西尼尔在写到有关苏格兰萨瑟

兰郡女公爵的做法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仁爱的居民转移”。难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会自称有仁爱的美德。

在第一次詹姆斯党人叛乱和卡洛登战役之后,这些被迫离开家园的移民,变成了一大批穷人,可以作为雇佣劳动力。地主们迫切地想利用这种局面。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采集海草灰,这项劳动力密集的工作。仅这项工作就雇佣了5万人。

海草灰工业在工业革命早期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原始工业的兴旺,为纺织工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碱。若没有海草灰,为了提取钾,本来就很匮乏的木材也将会被烧成灰烬。

似乎所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都已到位,但不幸的是,苏格兰的制造业并没有在苏格兰站稳脚跟。英格兰的竞争,使苏格兰的羊毛业和其他工业都陷入了困境。苏格兰的繁荣仅限于格拉斯哥一带,并没有超过这个范围。格拉斯哥的繁荣并非得益于本土经济的发展,而是得益于《航海条例》^①扩展到苏格兰。

简而言之,苏格兰农村人口的减少,导致了新兴资本主义者的繁荣,也导致了收集海草灰的工人未来的必然贫困。如托马斯·彭南特所言:“这些伟人一开始就犯下了错误,他们在帮穷人填满口袋之前,就已经通过工业把穷人的口袋给掏空了。”

史都华笔下的苏格兰

詹姆斯·史都华爵士不愧为苏格兰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他的家族地位很高。他祖父是爱丁堡市的市长。他父亲一生坎坷

^① 《航海条例》:英国史上主要是在17到18世纪生效的、规定由英国船只从事航运的一系列法律。1664年,英国殖民地所需的货物必须由英格兰转口。苏格兰被当做外国对待,直到《联合条约》(1707)给予它与英格兰平等的权利为止。

曲折,陷入了苏格兰的政治漩涡。然而,史都华最终当上了苏格兰的副检察长。

从个人来说,史都华体现了传统家庭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冲突。而且,他表现出一种罕有的感觉,感觉到了“生产方式的历史差别”。除了理查德·琼斯之外,任何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这种感觉。马克思详述了史都华在这方面的重要性:

他对资本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告诉人们,作为特定阶级的财产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如何分离的。他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资本的这个起源,尽管他还没有把这看成资本的起源,而是看成大工业的条件。他尤其在农业方面观察了这个过程。他正确地想到,只是因为农业中出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这种分离,工业生产才真正出现。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认为,这个分离过程已经完成了。

凯斯·特莱伯错误地认为,史都华有一种“前商品经济”的理解。的确,史都华一只脚还站在旧的生活方式里。史都华的家乡拉纳克郡离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不远,但其周围是笛福在苏格兰游记中所描述的“最为荒凉的乡村”。

然而,史都华的另一只脚又在试探着新的生存模式。我们已讲过这块土地上发生的驱逐人口的事件。事实上,史都华对市场经济的本质,显示出了锐利的直觉。他不仅跟传统的苏格兰社会模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从苏格兰高地的有利观望点,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他自己也与近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紧密的个人联系。比如说,据称他的母亲“为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做起了煤矿业”。

史都华喜欢到处旅行。年青时,他参与了导致卡洛登战役的詹姆斯党人暴乱。结果,他被流放到欧洲大陆足有14年之久,这

种经历对敏锐的经济学家来说价值不菲。配第在荷兰和爱尔兰的经历,都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同样,坎特龙也受益于他亲身感受到的爱尔兰和法国之间的差距。

史都华本人也意识到,他不在苏格兰时积累的实际信息,对他了解苏格兰本土经济有着非常实际的用处。在他 1759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中,他说:“我觉得保持客观公正的最好方法,是在讨论普遍问题时,不去关注我生存的地方,用‘不在场’去比较‘不在场’。”通过这种方法,在他回大不列颠之前,他预感到了在苏格兰本土发生的事的特殊本质。

智慧的根源

安德鲁·斯金纳认为,史都华的思想,很多是来自米拉波的《人民之友》(1756)。相反,保罗·坎姆利提出,史都华的想法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还有另一种可能:不论是史都华的书还是米拉波的书,都与理查·坎特龙的著作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史都华与坎特龙的联系是间接的。没错,他曾两次引用了菲利浦·坎特龙著作的英译本。但他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在 1759 年就已经完成了(菲利浦·坎特龙的著作也是在那一年出版的),其中跟坎特龙的相似点更加明显。但在那本书中,并没有引用坎特龙的原文。

史都华在坎特龙的著作出版之前,可能就通过特殊渠道看过他的书。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猜测。众所周知,史都华 1759 年那本《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的手稿,是献给玛莉·安·沃特莱·蒙太古夫人的,1758 年他在威尼斯遇见了这位女士。这位才华横溢的英格兰女人经常陷入丑闻中,而且这些中伤不仅仅是关于文学的。

25 年前,玛莉·安·沃特莱·蒙太古夫人与理查·坎特龙的夫人玛莉·安·麦宏尼结为密友。她在写给她妹妹的信中说坎特龙夫人

“会让众多的伦敦美女失色”。1741年，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坎特龙与驻那不勒斯的英国领事夫人之间有染。在那篇文章中，她似乎说坎特龙是“我所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那时，她本人就呆在那不勒斯。20年后，当她对史都华的著作深感兴趣时，可能建议他读坎特龙的书（史都华是受她保护的一个人），以免史都华不熟悉以前最重要的到处漫游的经济学家的理论。

虽然史都华没有亚当·斯密那么迷信书，但他也借鉴了前辈们的经验。史都华对休谟著的《历史》，做了大量笔记，并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发行之前，把它拿到休谟那儿让他提提意见。另外一个给史都华较大影响的人是罗伯特·华莱士，他写的《论人口》（*A Dissertation on the Numbers of Mankind*）出版于1753年，在休谟出版了《政论集》一年之后（休谟的书直接刺激了华莱士书的发行）。

史都华的著作也和詹姆斯·哈林顿^①的有共同之处。像史都华一样，哈林顿也反对小规模占有，宣扬提高租金以刺激劳动力，并试图让各阶级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让贵族阶级去监督农业并携带武器。

史都华要求土地改革

史都华清楚地认识到，贵族应该顺应时代潮流而动。他相信未来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他认为，贵族们不会靠买卖来养活自己。首先，他们缺乏必备资金。更重要的是，对贵族来说，沦落成一个小店主是绝不可能的。对贵族来说，正确途径应该是首先成为富有的资本主义农场主。

在1777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这一过程，这

^① 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 1611 - 1677）：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是《大洋共和国》。

些话听起来很像是出自亚当·斯密之口：

利益的诱惑不久就会使每个人都去从事最有可能使自己成功的那项工作。这样的话，人们大都会弃农从工；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在乡下从事生产，同时得用自己的那份土地去种菜、开辟成草场养牛，甚至种某些水果以维持生计。

史都华自己似乎很精通新的耕作农业。当时有一篇关于他的农业做法的报道，是这样说的：“任何了解詹姆斯·史都华爵士的人，都会赞叹他在农业方面的天才和热情。”然而他在农业上的成功，也使他在与佃农权利的斗争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史都华主张贵族致力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这无疑是吹响了打破传统的号角，要求把大批人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分离开来。在这个过程中，农场主不一定非得受传统租金的限制。史都华承认说：“有人认为，提高租金无疑是掠夺现在租土地的那些人。”但是，他最终还是欢迎这种新的耕作方式，因为它能提高租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新的耕作方式是很成功的。

史都华认为，提高租金是因为“农场主获得的盈余可以去养活别人”，他还加上这样一句，“我说的盈余就等于租金的价值”。高租金同样也能促进仍然租地的农民，想方设法提高农业产量。由于这种“无声的强迫”，市场的力量将迫使农民为市场从事专门的商品生产，而不是生产那么多只有使用价值的产品。

史都华对租金的态度，和重农学派是相似的，但又有明显的区别。虽然重农主义者呼吁在广大范围内实施新农业，但他们说，由于法国有大量未开发土地，农业的商品化可以增加食物供给，尽管他们最后关心的是净产量，而非总产量。

史都华没有提出这样的主张。相反他认为，用牧场代替农场就是进步。事实上，他公开承认，如果发生了他主张的那种变化，

粮食产量会下降。扩张牧场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增加盈余。当种庄稼时,种植庄稼的农民同时也消费了一定数量的粮食。而畜牧业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因此,地主几乎能得到所有收入。

史都华对抗传统生产者

对史都华来说,大范围的劳资关系的产生,与社会劳动力分工之间,应该建立联系。他完全明白,他的计划要求摧毁传统农业。在这方面,史都华也表现出了跟重农主义者的相似之处。1737年他正式开始学政治经济学之前,在一封信中,他对“人的惰性”表现了深深的关注,尤其是他见过的西班牙农民的“惰性”。

史都华甚至觉得,那些自给自足的农民在没有改进的土地上垦作是不值得的。他问他的读者们:“怎样提高空地的产量呢?只有分成10、15或20英亩一份,让农民租用,让他们靠受雇佣来生存。”他认为,土地“显然”应该划分成很小的块,不能让“租种土地的人既能维持自己的生计,还能用农产品付租金。土地要用来维持他家人的生计,工业收入则用来辅助家用、偿付租金”。

就史都华而言,传统农业的模式仅适用于“原始的不文明的社会”。只要他们还可悠闲地以大地自己生产出来的食物为食,他们就会需求很少,过无所事事的生活,还很满足。

因此史都华提倡将“土地和人分开”,使他们不再“游手好闲”,否则,“谁愿意自己多干活,去养活那些不为自己干活的人呢”?据他所言:“如果仅为糊口而劳作,那每个人都会有大量无所事事的时间,但问题是在较好的经济结构下,一个人是不是更应该满足他人的需要,而不是花时间在别的事情上。”因此,农民不能按自己的需要选择生产和生活。

史都华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休谟的影响。休谟主张让过

剩的劳动力去充军,扩张国家的势力。从他的同胞休谟身上得到启示,再与杜尔哥和重农主义者协调一致,史都华于是也呼吁消灭土地上“游手好闲”的人。W.阿瑟·利维斯最近使这种看待农业发展的方法,再一次流行起来。

在史都华看来,这些过剩的劳动力就像一副极重的“担子压在农场主肩上”。他认为这些人是“多余的嘴”。他甚至说,如果一个人从事农业“只是作为一种直接的糊口方式……那么,如果他和他的土地被地震吞没,国家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在没有地震的时候,离开这块土地的人们会怎么做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史都华对原始积累进行了最精辟的剖析,这在整个政治经济学界是无人能及的。

史都华为原始积累辩护

史都华担心,由于资本主义能释放出民主的可怕力量,那么,人口大量从土地分离,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威胁。更为麻烦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高地地主的财产是不合法的。

史都华认为“现代国家的没落”,主要原因是“自由”,因此他认为穷人是不能自治的。他说,莱克格斯^①时期的斯巴达共和国,提供了“最完美的政治经济方案”。在某一点上,他似乎拿自己跟莱克格斯比较了一番,说莱克格斯是“一个有深度的政治家,为发掘统治科学的奥秘而环游世界”。

史都华对奴隶社会的偏爱,可能会吓倒现代读者。但他在写书时的情绪,却是当时比较常见的。当宗教在某些阶层中已失去吸引力时,许多作家把斯巴达当成合理社会的楷模。例如,塞缪

^① 莱克格斯(Lycurgus):传说公元前9世纪斯巴达的制定法典者,其法典很严厉。

尔·亚当斯就把美国的将来设想成“一个基督教的斯巴达”。

斯巴达被如此称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卢梭。他极力提倡斯巴达的“集体主义”和“反对商贸”。对斯巴达的认同，成了公民人道主义传统的一个普遍特点。这种人道主义认为，财产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财产让财产拥有者独立地实施公民的美德。高朗·斯伯恩也这样说道：

启蒙运动被传统所吸引，尤其是集体主义传统。它转向古代的异教传统，而不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斯巴达、罗马共和国，甚至顶峰时期的罗马帝国的那些严肃的公共美德，是许多哲人心目中的社会典范。随意放任的个人主义并不被人接受。卢梭欣赏斯巴达，在他的《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中，把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克格斯说成是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政治家的楷模。

许多苏格兰作家也赞赏斯巴达，包括亚当·斯密说的“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哈奇森博士”。哈奇森在《公民法的特点和实施》一章中，把莱克格斯推荐给现代立法者们。

史都华欣赏斯巴达，并不在于他对极权主义的认可，而是他直接认识到，极权主义方法可以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承认，要重建一个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斯巴达，来支撑一个由节俭的武士构成的商品社会，这个指望是不可能实现了。

市场的奴役作用

史都华说“奴隶制度是一种让人卖命去生产粮食的暴力手段”。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计划得当的市场，同样也能实现斯巴达

奴隶制所承诺的目标。他说：“过去的人被迫劳动，是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现在人被迫劳动，是因为他们是自己的需求的奴隶。”

史都华所说的“需求”是指什么呢？他写道：“谁为食物而成了仆人，谁就将很快变成奴隶。”因此，这些挣钱维持生活的人们，尽管形式上完全自由，与奴隶不同，但史都华明白，工人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束缚。从这一方面看来，除了奴隶制外，资本主义就是第二个最佳选择了。

虽然没有别的政治经济学家这么直率，但有这种想法的却不只史都华一个。比如，米拉波的著作在很多方面与史都华不一样。但米拉波也说：“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整个秘密在于，每个人都以为是在为自己工作，实际上却是在为别人工作。”坎特龙对封建社会和市场何以能达到同一结果的分析，跟史都华更接近。

不出所料，史都华直白的话语，并没有得到多少掌声。例如，一位评论家是这样批评史都华的：

用直白的英语来说，政治家一手炮制了奴隶，让那些有用的人去养活那些无用的人。这就是目前英国所谓的自由。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自己欲望和需要的奴隶。因为欲望和需要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如今，他们为现实所迫不得不工作，就像以前的奴隶被监工强迫干活一样。被雇佣的农夫的确只有一个欲望在迫使他成为奴隶，迫使他工作，那就是对饥饿的恐惧，驱使他没有任何其他愿望地辛苦劳作。

我们不应该把这篇评论看成是驳斥史都华，而是对他的观点的澄清。评论者的用词强调说，人们劳动是因为饥饿和贫穷，而不是欲望，这的确比史都华的说法更有启发性。但是，史都华的用词，则使我们意识到市场的无形强制力量。

史都华认识到，同单纯的斯巴达式体制相比，市场有许多好

处,但他也明白它可能走向反面。他说“斯巴达模式可比拟为楔子……现代国家则可比拟为手表,总是出毛病”。

结果,史都华想找一个政治家,来领导这种体制。这个想法让他集中地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应该怎样制造一种需求结构,以便能有效地奴役人们呢?”

这就是史都华著作的中心内容了。史都华发现,当时的劳动力没完全受资本支配。他在农业方面的经验,使他完全有资格成为原始积累方面的理论家。他知道,传统的高地人都有需求,但他们还不是史都华所说的成了需求的“奴隶”。这个问题上,史都华比其他任何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想得更深,他试着找出一个把传统产业融合到经济中去的方法。

史都华与组织经济发展

史都华希望把不劳动者从土地上赶出去,还有他对自给自足农业的敌意,这些显然是跟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如今,生存必需品的频繁交换,使居民发生了分化,一些成了劳工,另一些则成了我们以前说的‘闲人’。劳工生产生活必需品;‘闲人’则是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人。”史都华意识到,仅仅把人们赶走,并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道路。他看清了原始积累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正在进行的这个重要转变的特殊性。

不像其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史都华强调我们不能忽视变化的速度。突然引入的东西恐怕后果不佳,而如果慢点步上轨道,收益或许匪浅。用史都华的话说:“突然的革命一向有害,一个好的政治家应该知道如何一步步地逐渐实现自己的计划。”前苏联在最近时间的经历,显示了突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有多困难。

原始积累尤其需要谨慎。史都华提醒人们说:“在给小马上鞍

前要先摸摸它的背。”因此，他主张将农田逐步变为牧场。遗憾的是，很多现代经济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废除传统农业时，虽然本来应该有点先见之明的，却没有考虑到按步骤行事。另外，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顾问，也可以从尘封已久的史都华的著作中受益。

史都华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想法。他很清楚，尽管苏格兰贵族能把大批人驱赶出土地，但光靠驱逐，是不能使人们成为雇佣劳动力的。史都华一次次地强调，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想了解人们怎么才会自愿服从权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从”就意味着接受雇佣关系。

还有一个想法与第二个十分接近。第一个资本主义工厂，比如一个鞋厂，是怎么从非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的呢？既然我们假设这工厂是第一家资本主义工厂，那儿的工人就不可能用工资换到日常所需要的其他东西（只有鞋子是他们能换到的）。工人们可以花些工资直接买鞋。但为了盈利，老板们会确保工人们能生产出更多的鞋。

而且，工人们除了鞋以外，还需要其他东西，但却没有其他工厂卖鞋厂工人想买的东西。所以，鞋厂存在的前提，就是已经存在生产其他消费品的工厂。这种现象在1800年的英国更加重要了。在那时的英国，没有小面值的货币，所以人们的“工资”就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他们还得把它们拿到市场去卖。

那么，第一家工厂是怎样产生的呢？当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在二战的废墟中写作时，他考虑着，有没有可能在饱受战争创伤的东南欧重建市场，这时，他也把这个问题带给了现代经济学家们。努克斯后来说了一个答案，并把这个答案称为“大推动”（big push）。他把这个答案跟斯密式的传统联系在一起，但它其实正是斯密的计划的反面。

我们早已提过亚当·斯密的基本回答，我们会进一步检验它（见第十章）。按照斯密的说法，第一批工厂不是大工业，而是一些

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小作坊。遗憾的是,关于工匠如何变成了雇佣劳动力这个问题,斯密的方法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但这却是史都华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最关注的。

史都华对社会劳动分工的构想

史都华明确地说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的目的,是找出一种把没有工作的人集中到一起、发展其他行业的方法。通过彼此满足对方的需求,使社会生活更加安逸。”在史都华看来,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期,决定社会劳动分工的基础因素是政治,而不是市场。特别是,史都华希望国家来保证适当的社会劳动分工:

我认为,让一个自由社会有凝聚力的最好方法,是增加社会成员的相互义务,让成员彼此依赖。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一部分居民去为所有人生产食物,把剩余的人分配开,分别去干其他活,来满足其他各项需求。

史都华相信,那些有巨大能力的政治家,将会使人们产生互惠、互相依赖的心理。他说:

对一个精干的领导人而言,没什么不可能的。当一个人宁愿杀妻灭子、自焚而死也不愿向外敌投降时;当他们为赞助一项公共事业宁愿把最珍贵的金银饰物都拿出来时……我觉得我敢说,只要控制了人的思想,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如果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人们能被鼓动起来做到这些,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就不能引导社会呢?因此,造成一个社会

劳动分工,对有能力的领导者来说不是什么麻烦事。

史都华希望政治家可以“制定一个政治经济学计划,拟出居民的分配方案”。他还更具体地说过,要求政治家“调整各层人民的分配”。他强调了这个目标的重要性。

为了建立一个需求互补的社会体制,史都华几次回到合理分配社会劳动这个主题上。

在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过程中,史都华建议政治家扮演“公正的角色”。这也许是想到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那个不偏不倚的著名旁观者。

史都华甚至表现出了某些人道主义考虑。例如:他反对“让穷人过分穷困”。他对人道的标准其实并不太高。比如,他认为工资的高低,可以根据医疗费、住宅费的高低来确定(那些住宅是贫苦人的居住场所)。

但史都华也认识到,有必要抑制人道主义冲动:“我多么不想见到任何勤劳的人为衣食而忧呀……但我认为……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人民生活越艰苦,我们的产品就卖得越便宜”。因此,他建议:

如果一个国家的奢靡之风,使人们不愿在为国家有利的行当工作,反而对那些工作的人心怀不满,那么政治家就应该把穷人的孩子都送进福利院,作为雇工抚养长大,采取的各项制度都应该能节省下每一个子儿。

史都华的计划有更深层的含义,即“儿童工业”。如果没有史都华提倡的保护措施,人们可能猜到穷人注定会落到什么下场。简而言之,史都华支持没有奴隶制的奴役。

史都华还认为,政治家有责任把利润的增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在回到这个问题时他警告说:“只要一个政治家冷静地袖手旁观,他就会发现,无须插手,熟练工人的工资自然会上涨。”

史都华和家庭生产的辩证法

史都华是唯一一位阐述了家庭经济辩证性的古典经济学家。他把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给自足所扮演的辩证角色,刻画得栩栩如生。他还提出了一个改变劳动条件的方案。他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只能选择雇佣劳动,此外别无选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工人作为独立的阶层是没什么力量的,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外,他们是无法生存的”。

史都华很想剥夺大多数人的传统自给自足手段,以确保他们“自愿服从”。但如我们所言,他明白这种转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有时候,史都华从食品价格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也明白,如果粮食太贵,工资也得随之增长,以满足人们的糊口需要。他还意识到,自给自足能降低谷物价格。这样的话,雇主就可以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赚取更高的剩余价值。我们要注意,许多重商主义者,包括大卫·休谟,都觉得当粮食太廉价时,就算那些还未达到自给自足程度的人,也没有劳动压力(见第五章)。

史都华看到,在苏格兰,低粮价没给老板们造成什么严重威胁,因为被从土地上赶走的人,经济状况很糟糕。比如说,史都华估计了一下,按照生存所需的谷物价格,一个雇工一天的工资应该是多少。他发现,纺织工人工作两天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天的生活。

根据史都华所言,这种被迫的贫困对劳工有益。他肯定,游手好闲的时间会减少,劳动会更密集。具体而言,他料想,一旦工人们停止生产各种只有“使用价值”的产品,一个“好经济”时代将会来临。

但是,一家人要怎样生存?假设一个人有一个菜园、一块土豆

地和一头牛,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就能养活一家人。史都华认为,妻子纺织获得的微薄收入,足以应付其他开销了。

简言之,史都华反对家庭经济是有条件的,因为他认识到,家庭经济是早期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一根支柱。我们要记得,他只是当小农户已经开垦了一些荒地之后,才把他们赶出土地去。在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中,史都华认为,只要变化不是太突然,高度自给自足的小农户经济,是更好的方式。史都华推荐的生产体系,跟强有力的家庭经济并行,这样可以使工厂企业一开始的时候,只需在厂房和设备上,投最少的钱。如史都华所说:“人们……在大规模收割之前,必须先去拾麦穗。”

斯图亚特预见到,当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开始定型时,市场会把童工有效地动员起来。在市场经济中,孩童不会在诸如放鹅一类的非生产事务上,花大量时间,他们可以 and 妇女一起当纺织工。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史都华估计,由于效率的提高、工人的更加努力,经济将会更繁荣。他预计,一般的农场将被经济化:“牲畜消费必需的饲料,多余的饲料就是钱,多余的蛋也是钱,多余的车、马、时间,对农民来说都是钱。”

史都华还似乎预见到现代的劳工经济理论。他意识到,随着发展,“时间将变得越来越宝贵”。但他没指出,工人会不会喜欢他们的生产率越来越高。最后,他指望工人阶级会发展出一种最好的品质,就是“热爱劳动”——这都是一个秩序良好的市场的必然结果。

根据史都华的观点,这种转变将会带来大规模的资本积累。经过一段时间,随着家庭因素的减少,每个工人的资本会增加。增加的大量劳动力,以及劳动力的高生产率,都要求资本家付出更多的工资。除此之外,随着更多的商品进入市场,罗森斯坦·罗丹所担心的问题,会随之消退。

但是,史都华并没意识到资本的全部潜力。像重农主义者一

样,他仍习惯站在资本主义化的农场主的立场上看问题。另外,史都华过高估计了当时的资本对苏格兰高地的控制能力。比如说,半个世纪后,萨瑟兰郡公爵的代理人,试图让纺织厂的老板们在他主人的土地上投资工厂,他坦率地说:“佃农都有一点土地,他们是相当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们还是不想把赌注压在苏格兰高地的劳工身上。

史都华的著作,对理解资本积累的早期历史是极有价值的。的确,在解释工业为什么在苏格兰高地出现得如此缓慢时,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我们的理解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罗伯特·厄克尔特对史都华的评论,就史都华对原始积累的分析来说,当然是对的,“史都华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最后一位投身到复杂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政治经济学家”。与史都华同时代的人中,还有一个人和史都华一样清楚、深刻地看到了早期经济发展的特点。但即使如此,这个人却把这一见解都掩盖了起来。

对史都华的冷漠

善于阅读晦涩历史文献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史家,对史都华了解得不多。只有几个例外,他们是 S.R.森、保罗·坎姆利、安德鲁·斯金纳、米切尔·哈德森等。其他学者都刻意回避史都华著作的社会内容(关于这个问题的有限书目,见阿客塔。我查了一下JSTOR(jstor.org)上的所有经济杂志,史都华的名字只出现了 83 次,而亚当·斯密却有 1 669 次。

虽然赞同史都华的作者很少,但不少作者过去却间接地从他的书中受益。P.多克斯认为,冯·屠能^①只不过是史都华的传声

^① 屠能(1783-1850):德国农学家。

简罢了。事实上,史都华在描述菜园和田地的划分时,明显地预见到了屠能的理论。既然经济学家有时候认为,屠能预见到了后来成为“边际分析”的那种理论,那么传统经济学理论常常因为斯密偶尔透露一点现代性,就对斯密大加赞扬,这些赞扬很多应该是属于史都华的。

考虑到史都华是当时一位重要经济学家,这种忽视让人惊讶不已。毕竟,他是第一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论著的作者。而且,除了《国富论》外,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之前,再没有能跟史都华的著作相比的著作问世。

那么,为什么世人对史都华的成就会如此缄默呢?一部分原因是史都华选择的阶级立场与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亚当·斯密嘲笑贵族的虚饰,赞美节俭。史都华跟斯密不一样,他认为贵族是将来领导阶级的合适人选。例如,史都华抱怨说,除了战争时期外,中产阶级非常不尊敬贵族。他强调说,在军事危机发生时,那些阻碍贵族在平庸的中产阶级世界中取得胜利的态度,会突然变得充满敬意。

史都华不是那种把理论建筑在虚幻的社会契约上的人。相反,他很坦率地写出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本质,找出了迫使工人为别人创造剩余价值的真正力量,其中一个重要力量就是家庭自给自足经济的瓦解。

同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用浪漫的自然法来描述历史进化。而史都华宁愿找出导致“人……屈从于劳动”的真正原因。他精辟地应用古典的原始积累理论,使主流政治经济学家陷入了尴尬境地——他们都伪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自愿的事。这样看来,他比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诚实得多。

从一开始,史都华就清楚自己的特殊性。他说道:

在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问题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是什么

影响了人口增长,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劳动分工,以便能最好地促进每个特殊社会的繁荣……关于这些问题,我还没有发现谁能给出令我满意的答案,我自己在这方面也不令我满意。

史都华是对的。在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只有他强调创造一种社会劳动分工。的确,马拉切·波斯勒兹维特涉及到了社会劳动分工问题,他说“一个商业民族的繁荣,在于有多种新行业,也就是说,机械业、制造业和工业的种类很多”,但是他顶多只不过是个二流人物。

史都华没有得到公众的赞扬。实际上,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逆着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潮流而动。他问他的读者们:“我们难道不应该诚实地检验一下那些过程吗?就是通过这些过程,整个欧洲陷入了一种政策体制,这种体制遭到普遍指责,跟我们听到的最佳体制也恰恰相反。”

史都华认识到,他本来可以换种方式来减少异议,可以“防止某些表述方法给敏感的读者留下太深印象”,但是:

没有比缓和语气更容易的了,只要政客从平民手里拿一支笔用用就行了。可是,每当我为那些和我思想相近的人写东西,试着解释所有的质疑时,我特意不做什么改动,而是继续用很强的色调画我的画。

史都华错误地判断了读者的反应。虽然评论界敬佩史都华的独特眼光,评论者却否定了他的结论。《苏格兰人杂志》上的一位匿名评论者就这么认为。按照斯密式的思维模式,该评论家辩驳道:“服从法律是为了公共利益;在不涉及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每个人的个人问题应该由自己去决定。”

该评论者批评史都华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凄惨的场面——

为了满足少数人,成百万人受到奴役。”然而该评论家并不能简单地将史都华全盘否定:

他在旅欧期间观察到的东西、获得的智慧,为他的论据提供了最真实的事实。他在哲学方面表现出来超常天分。只要你能读懂他的文章,你就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但是,在某些方面,这种敬仰类似我们对一个设计精良的武器的敬仰——那个武器既有保卫能力,也有摧毁能力,就看它落在谁的手里了。

这个机灵的评论者说得没错。史都华的著作就是“一个设计精良的武器”。史都华直率地说出了政府在刺激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无论是评论者还是公众读者都不欣赏他的这一点。上流社会的人们更喜欢把经济发展说成是市场引导的自然结果。

与史都华同时代的读者们知道,他是个中心人物。有一位尤其不赞同他的评论者不承认史都华是个“有深刻见解的天才”。一个更不赞同他的评论者,称他的著作是“未来政治家和官员们的行动指南”。这两个评论家中的后者对史都华的态度是非常典型的。他假装不知道国家在经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假装惊讶地声称:“我们没想到政治家会与经济方面有什么关系,但我们认为,英格兰现在在全世界享有的经济优势,是因为它把国家政府官员与经济隔离开来。”诚然,东印度公司征求了史都华的意见,后来给了他一枚钻戒,作为对他努力的回报。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听不到有关詹姆斯·史都华爵士的别的消息了。

还有一个疑惑:大卫·休谟在《论商业》(*On Commerce*)中说的内容几乎跟史都华一样,为什么单单是史都华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呢?

休谟和史都华的共同点

爱德华·吉本曾经说过,大卫·休谟是苏格兰的塔西陀。塔西陀写的是征服蛮族的历史。不同于塔西陀的是,休谟跟那些“不开化”的农民属于同一个民族——那些农民屈服在当代凯撒——资本的铁蹄之下。尽管休谟建议他的朋友在写和说方面尽量英国化,他自己却带着极重的苏格兰口音。

休谟有这样一种能力:在同一个段落中,他能既像史都华,又像斯密。这说明,史都华和斯密之间所谓的两级对立,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毕竟,从许多方面来说,史都华只是道出了事实,而斯密爱把这些事实用沉默遮盖起来罢了。

然而,我们无法直接评价休谟和史都华的关系。根据传闻,史都华在1749年写《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第一部分时,是早于休谟的著名论文的。在史都华的那个著作发表之前,休谟的确也对其表示了肯定。

我没有读到史都华作品的早期版,所以我不能断定,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有多少是由于休谟的影响,有多少是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

休谟在《论商业》(1752)中解释说:“每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可以分成农民和工人。”他接着说:“时间和经验能改进技术,使土地除了养活直接耕种土地的农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工人外,还有剩余。”因此,社会就有了“多余的劳动力”,这些人可以用来生产奢侈品,也可用来充军,“加强海外统治,提高国家的国际声望”。

休谟发现:“只有让所有剩余劳动力都投身于公共事业,国家才能无比强大。”然而,关于是否可仿效斯巴达体系,休谟说“我认为不可能;因为古代的政策体系是野蛮的,不符合事物的本能性和

一般发展规律”。这时,休谟说:

在机器制造业未产生之前,大多数人们只能从农;随着他们的技巧和勤奋程度增加,除养活自己外,他们还会有许多剩余产品。他们别无所求,也就没有进一步改进技巧、提高勤奋程度的动力了,因为他们的剩余产品只能滞留家中,又不能换别的商品——换来的商品本可以满足他们的快感,或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于是人们自然懒惰成风。

休谟写道:“世界上所有事物都由劳动购买;我们的欲望是劳动的唯一原因。”

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休谟认为,资本家得益于这种欲望:“人们对工作的渴望和需要,比对任何事物都要持久和难以满足;这个欲望,似乎是我们大多数需求、追求的基础。”

一旦劳动力受制于这些欲望,农夫就会生产出剩余产品来,用来交换奢侈品。用休谟的话说:“当一个国家有丰富的手工制品和机械制品时,从农业劳动中产生的剩余产品就没有了;它们被用来跟制造业换取那些商品——人们的奢侈生活,使他们渴求那些商品。”

休谟和斯密对奢侈品的分析角度不同。对斯密来说,是要在奢侈品和面对大众市场的商品之间进行选择。休谟则关心如何让剩余劳动力生产奢侈消费品,而不是让他们无所事事。“奢侈如果过分的话,是很多罪恶的根源。但总的来说,奢侈也要比懒惰、游手好闲强”。

斯密认为,国内市场的大批量生产,是经济成功的关键。但休谟不同意,他认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对外贸易在任何方面,都要比国内制造业高级,是国内奢侈之风的主因。”

休谟和史都华考虑了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史都华对此很漫不

经心)。休谟写道：

国家的强盛、国民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和商业。如果强迫农民除了养活自己和家人之外，在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既是一种野蛮的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不可行的。但只要你给他工业品和商品，他就会自己去做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容易让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从事公益事业，不用给他们惯常的回报。他们习惯于辛苦劳作，所以会觉得这不怎么难以忍受。如果你强迫他增加劳动量，而不给他任何报酬，他当然会难以忍受。

总的来说，这种思路和史都华极为相似。例如，休谟注重工农业按照合适的比例结合起来。但他同时指出，虽然工业更有利，但“两者严重失衡会导致国家的衰弱”。

和史都华、斯密一样，休谟也不相信群众，但他明白，国家需要群众的认可。“用哲学的眼光来看，我们会发现，没有比少数人轻松地统治多数人更令人惊奇的了……由于力量总在被统治者一边，所以统治者只能靠群众的认可来支撑自己”。

因为害怕群众，休谟主张让他们无知无觉，保持对现存秩序的效忠。如在他的《英格兰史》中提到处决查理一世时，他写道：

如果真的有什么时候，应该对民众隐瞒真相，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暴动的理论，应该对民众隐瞒。关于这一点，所有睿智的理论家都应该小心地保持缄默，各种政府的法律对此也是保持缄默的。政府制度，是为了遏制民众的怒火和不正义的。政府的基础，是公意，而不是暴力。如果民众知道这些，就会削弱他们对权威的敬畏，这会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已经不再忠诚于政府的话，可以采取什么举动。或者，如果政府发现

没法限制人类的研究自由的话,那么必须承认,只应该灌输“服从”的原则。在公开的讨论或言谈中,应该从不提到或很少提到“服从原则”的例外情况——例外情况是不多见的。

与史都华一样,休谟意识到,为了推动资本积累,必须分配社会劳动力。“鼓励农业生产的最好方法,是首先刺激其他产业,为劳动者的商品提供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他们出售商品的回报,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好享受。这种方法是绝对正确的、普遍适用的”。

在这一方面,休谟与史都华有分歧:同资本积累相比,休谟不太注重原始积累。在其他方面,休谟很接近史都华。然而,现在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一般认为斯密和休谟是差不多的,而说史都华只不过是晚出生的重商主义者罢了。

实际上,这三个人只是形式不同,而无实质区别。斯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带上了最好的面具,而史都华则倾向于率直、细致的分析。因此,史都华的努力从未得到承认。

避开史都华

即使同意史都华的原始积累观点的人,也不愿把自己和他联系在一起。例如,我们的老朋友约瑟夫·汤森——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他是“对人类怀着美好愿望的人”——曾说过,“欧洲最好的政治家”也同意他对济贫法的谴责,这“欧洲最好的政治家”很可能是指史都华。汤森说“那个贵族与众不同,在英国北部,他总站在文人的前列,毫无拘束,毫无保留地发表言论”。汤森在他著作的第六部分,讨论了一个明智的立法者的重要性,以及加强“社会的自然约束力”的必要性,这一点与史都华很相似。

有时,图书或报纸会提到史都华对金钱等物的观点。但是,有

些人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学理论感兴趣,他们在讨论抽象问题时一般不会提到史都华。以萨依为例。他在引用史都华的话时,竟然把史都华的名字都拼写错了。他的这个引用,只是把史都华和斯密相提并论,说他们二人都认为“奴隶的劳动比自由人的更昂贵,且生产效率更低”。在讨论更重要的问题时,他任何源自史都华的观点,都没有提到史都华的名字。例如,萨依在《全书》(*Cours Complet*)的一章“社会生活对财富生产的影响”中,对创造社会劳动分工中的冲突只字不提。萨依用的不是“原始积累”一词,而是“意志的总汇”。一旦把原始积累问题放在了一边,萨依就这样解释劳动分工和社会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

先生们,关于劳动分工问题我已说过,在这儿不想重复了……你们应该知道,人类力量之所以能极速扩张,主要是由于交换……工业的进步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人既有独立的一面,又被迫相互依赖。

然而,萨依在这段议论中,却没有提到史都华的名字。

甚至史都华作品的现代编纂人,一个非常了解史都华和他所处的环境的学者,在说到史都华时,也偏离了自己通常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在评论史都华对劳动分工的见解时,这位现代学者插入了这样的评论:“这种话是史都华在劳动分工问题上,所能提供的全部东西了。”真是如此吗?

这些评论再次证实了人们的惯常做法,就是把史都华看做一个不见经传的重商主义者。这种定论误导读者,让他们以为,从史都华的所见所闻中,了解不到资本的发展过程,或只能了解到一点。他们鼓励读者抛开史都华,去读亚当·斯密之类人的书,因为斯密的书看起来似乎更科学。

史都华与斯密

直到史都华去世 25 年后,英国才有一位学者,强烈表示了对他的支持。在一篇相当不见经传的作品中,丹尼尔·韦克菲尔德说,斯密只是史都华的一个劣质翻版:

亚当·斯密博士受惠于詹姆斯·史都华爵士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很少有别的作家这样受惠于另一个作家的。也没有哪一个像斯密这样毫无诚恳和感激之心,从没有承认过他从导师那里获益,或者对导师的名誉表示称赞。《国富论》的风格使之广为流传……尽管晦涩难解总是代替了深刻。

韦克菲尔德是第一个评论别人抄袭史都华的(后来又出了一系列像韦克菲尔德这样的作者),“那位政治学大师,他的无价之书被后世作家当做知识的宝库”。

几年以后,一个匿名的评论家——多纳德·文奇认为他是詹姆斯·密尔——称赞斯密同那个“重商主义大对手”相比有好处,同时也肯定了史都华对细节问题的重视。这种表面看来是贬低的观点,有点类似下面要提到的马克思对史都华的评论。

两年以后,一个评论史都华文丛的人,提到史都华写过“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的影响问题”。他指出:“斯密博士也偶尔谈过这个问题,但在这里,在斯密博士的几句评论中,我们再次发现,他只是步他那个前辈(史都华)的后尘而已。”

下一个认识到史都华价值的人,竟是杜格尔德·斯图亚特,他是斯密最忠实的拥护者。他告诉自己的学生:

就《国富论》来说,我一直认为,现在也是这样认为,斯密先生的著作,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的首选书籍;不仅因为它全面概述了这个课题的各个部分,而且还因为它是整个欧洲都同声称赞的思想,是政治辩论时最常引用的权威。詹姆斯·史都华爵士的著作除了一些有创造性的见解外,还包含了大量精确的细节。

几年以后,马克思也严厉批评了斯密闭口不谈史都华的做法:

亚当·斯密把史都华的研究结果作为已死的事实记录下来。苏格兰格言(“集腋成裘”)说,一个人有了一点点儿财富后,再获得更多财富常常容易了,难的是在开头获得那一点。斯密在积累学术财富的时候,应验了这句话。他严密地封锁自己的资料来源,他先是从那儿获得了一点,然后自己赚取了很多。

与史都华不同的是,斯密是迎合大众口味来写的。他表示,市场本身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史都华认为互惠义务关系的发展,是由于政治家采取的行动。而斯密认为,这是由于自发的市场关系,“交换、交往意识,导致了行业分离、工艺进步”。

史都华坚持认为,政治家有能力做好事,而斯密则认定政治家只会破坏。斯密说,政治家只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动物”。在那段关于“看不见的手”的不朽比喻底下,斯密发出这样的指责:

政治家如果想要指导人们如何安排自己的资本,那么不仅会给自己增加一个极不必要的麻烦;而且还会使人们认为他是能够信任的权威——事实上,这种权威,不仅不能交给任何个人,而且不能交给任何委员会或参议会。因为如果这种

权威交在一个人手里,这个人愚蠢、自大到以为自己胜任这个权威,那就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

当然,史都华从来没有说过,他的政治家决定着人们如何使用资本。他的政治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处理那些没有资本的人。

史都华和阿瑟·扬

的确,史都华似乎注定要引起那些兴趣在实践上而不是理论上的人的注意。阿瑟·扬在他的《法国游记》(*Travels in France*)里,回应了史都华的说法,很引人注目。我们在判断这位英国农业委员会常任秘书的重要性时,应该记住这样一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学者里面,没有一个人像史都华有那么多农业经验。理查德·琼斯是一个例外,他是个热心园艺的人,被哈瑞尔特·马蒂诺^①称为“我亲爱的玫瑰之王”。种植方面的知识给了他犀利的洞察力,使他推翻了古典的租金理论。

虽然扬不是古典经济学家中的大腕,但所有同时代的人似乎都认为他是农业方面的权威。18世纪晚期,在关于经济的议会辩论中,亚当·斯密经常被提到,而扬似乎被遗忘。扬对纯理论的东西毫不感兴趣,所以他对史都华的反应,是检验史都华价值的很好的试金石。

扬说史都华是一个“特别的天才”。与史都华相同,扬也认为农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加深了劳动的社会分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篇的讨论后,扬总结道:“当农场能最多地产出市场上的农产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农产品能转化成钱的时候——

^① 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 1802 - 1876):英国散文家、小说家,经济和历史学家。

这样的农场大小是最合适的。”尽管他后来补充说：“在前面这句话中，我心里想的只是租用的农田。”然而，扬并不同意自给自足。他用很长篇幅反思了史都华的观点——虽然把史都华的名字拼写错了——他这样写道：

在农业方面，或者说法国的国内经济方面，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法国各地都在种植麻或亚麻，以供家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对国家的整体利益，到底是好是坏。一方面，支持者认为，国家财富也就是个人财富的总和，如果经济作物的种植对个人有利，那么对国家也有利。一个穷人家的妇女和孩子可以用麻来织布，让全家人穿上衣服，而不必被迫花钱去买衣服——他们可能根本出不起钱——这当然是好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辛苦劳作，一个穷人家也可以很独立。就麻布来说，他们都可以穿得更暖和、更舒服，而不用去买；因为，凡是花钱买来的东西，人们在使用的时候，比自己的劳动所得的东西都要计较得多……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繁荣，是由于农产品和城市工业制品的交换。由于双方的这种天然联系，我们可以说，消费量更大、交换更快的话，民族也就更兴旺。如果每个农户都有一块地种麻，可以供给自己所有的麻制品，根本不用去买以麻为原料的制成品，那么就没有了城乡交换，也就没有流通了。如果麻是这样，那么羊毛也不例外。每家都应该养足够数量的羊，全家就能穿上羊毛衫。如果每个村里都有自己的制革工人，那么皮革也能自给了。再加上一块葡萄园，家用饮料也不成问题了。这样，通过简单的家庭工业，就能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那么贫困的家庭——这个名字并不恰当——就没有必要去市场购物了。但同时，也没有了可卖的东西。把土地划分为小块的私有财产，这总是会影响城镇的存在，也就是詹姆斯·史都华爵士所说的

‘闲适阶层’的存在。农民跟家人靠土地生活,只要努力,就能加工或制作各种东西满足自己的需要,根本不需要交换、联系或依赖他人——这的确是一幅自给自足的乡村小康图,但这与现代社会的繁荣是完全背离的。

为什么说,自给自足的乡村小康图与现代社会的繁荣完全背离呢?扬判断,法国农民能以很低的价格把食物运到市场上。“这里的生活花销很低……我想,英国在制造业和实用工艺方面比法国进步,因此,英国的物价应该比法国低。但我们在法国遇到的,却是一种低廉的生活方式,这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他通过仔细的计算,说“法国的食品消费和劳动力价格,比英国要低 76%”,这与史都华预计的情况相同。很显然,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发展的先决条件。

扬又一次清楚地阐述了早期市场的逻辑:

穷苦农民中最勤劳、肯干的,不是那些整理、耕种小果园的人;而是那些只能挣微薄收入,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如果雇佣劳动力习惯于为自己劳作,那么,雇佣他们的价格自然就昂贵,且干活的质量低劣。一个智慧的观察者一定看得出他们的厌倦和懒惰。只有在极度穷困的时候,这些小业主才肯为他人工作。所以,在法国一些费力开垦的地区,那些半开化的野蛮民族的劳动相对昂贵,而且活干得很糟糕。让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丢掉工作一天能赚 15 或 20 先令的活计,白走几英里路,去卖十几个蛋或一只鸡,卖来的钱还不够费事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吗?这让我们明白,这种小生产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一种丧失。

扬说“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一种丧失”,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当然,他

不是说、自给自足的农民懒。扬自己曾写道，“让一个人占有一块荒凉的石头地面，他也能把它变成花园”。但他笔锋一转，回忆说：“除了持续工作外，我不认为小所有者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地方。”总之，扬和许多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除非劳作能挣来工资，否则，持续劳作是不值得尊敬的。

人们把大量农产品运往市场，路上所花的时间值得吗？有时，扬对农民在小交易上花费精力嗤之以鼻。但他对农民的生活很熟悉，知道交易日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人们常常与世隔绝，交易日是他们社会化的过程。他遇到的农民，为卖两只鸡而跑 24 英里到集市上，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经济行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的行为是不合理的。总之，史都华的最虔诚的信徒，莫过于扬了。

知识界的原始积累

史都华从不知道，他的作品会得到一点儿认可。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由于缺少公众对他思想的认可，他很沮丧，他在谈及他那只死去的狗时写道：“我要是写它的一生，那将能写出像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一样的大部头，而且也许一样少人问津。”

对“死狗”的提及，引出了一个奇怪的巧合。马克思谈到史都华的暗淡无名时说：“在莱辛时代，摩西·门德尔松^① 比斯宾诺莎著名，同斯宾诺莎相比，史都华更像一只‘死狗’（一样无名）。”另一次，马克思将同样的比喻用到了黑格尔身上，而黑格尔的著作也是与史都华有关联的。

许多年之后，黑格尔声望大增，比史都华的情况好得多。但从

^① 摩西·门德尔松 (Moses Mendelssohn, 1729 - 1786): 德国犹太人哲学家、评论家，莱辛的《智者纳旦》就是以他为典型的。

某种程度上讲,黑格尔取得的某些荣誉,应该归功于史都华。

在黑格尔年轻的时候,他一直称赞斯密,却大量采用了名不见经传的史都华的理论。实际上,史都华对“双重竞争”的论述,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极为相似。

黑格尔并不是将史都华的创造性研究成果据为己有的唯一一人。例如,马尔萨斯在写给李嘉图的私人信件中,就称赞过史都华。但在他出版的作品中,我们却找不到提及史都华的字样。其他作家,甚至包括斯密在内,公开出版史都华的思想,却署上自己的名字。用斯密的学生及终生朋友的巴肯伯爵的话来讲:

至于那部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我们没有必要去称颂它。因为,当公众把剽窃者们添油加醋后的文字宴席从桌上撤下去后,公众会充分明白那本书的价值的。那些剽窃者把詹姆斯爵士的事实、原则和推理,塞给公众,却不承认其来源。

如果伯爵不是一字一句照搬阿齐巴尔德·汉密尔顿早先发表的作品上的话,我们或许会对他评价更高。

总之,史都华因为诚实,而创造出了这样有见地的理论体系。但也是因为这个诚实,使他一直默默无闻。考虑到他不见经传,政治经济学家似乎觉得,抄袭他的东西似乎风险不大。另外,他们要是承认史都华,就是接受他对原始积累过程的直率表述。因此,这位原始积累问题的最经典理论家——史都华——成了知识界的原始积累的牺牲品。由于对他这个有创造性的头脑缺乏关注,我们可以说蒙受了不少损失。

第八章

亚当·斯密聪明地掩盖了阶级问题

他们站在架在鞣料坑上的一块木板上；那位博士正在就他最喜爱的“劳动分工”问题谈得起劲，忘了他站的地方不安全，于是一头扎到了那个令人作呕的坑里。人们把他从坑里拽了出来，脱光他的衣服后，把他裹在被单里用椅轿送回了家。

——《伦敦时报》(*London Times*)，1790年8月6日

斯密——超凡脱俗的教授

迄今，斯密关于原始积累的理论一直不为人们所注意。人们对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未给予足够关注，这可能正是斯密所高兴看到的。毕竟，他决意使阶级斗争的作用最小化，因此他的陈述中很少出现残酷现实中斗争的一面。

或许斯密认为他采取这种方法是有理由的。他在早期的一篇有关天文学的短文中提出，人们的智力活动，无非是大脑面对矛盾现象时所感到的不适反应。他甚至将科学定义为——为了发现潜在的和谐以“安慰想像”，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很难说原始积累是一个能使人得到安慰的主题。

为了使一切平静下来，他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之后，他成了一个十分抽象的作者，用他富有魅力的散文来消除读者的怒气。他本人还把这一策略推荐给他的学生，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影响

一群漠不关心的听众，“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我们所满意的东西是他们不喜欢的，这会使他们吃惊。我们应该先对我们的计划避而不谈，从稍远一些的地方开始，然后逐渐把他们带到主要问题上。在赢得了那些稍远一些的地方之后，近处的地方自然也就能赢得了”。可以将斯密的建议和史都华的不妥协风格作一比较。

此外，斯密本人也写到了他对劝说的重视。“我认为被别人所相信、劝服别人、领导和引导别人的欲望，是我们所有与生俱来的最强烈的欲望之一。或许人类所独有的语言能力，就是建立在这—本能的基础之上的”。

认识了斯密在修辞方面的一些做法，有助于我们解决困扰着很多读者的一个谜：人们通常认为，斯密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可是为什么他对当时出现在英国经济社会中最具意义的发展言之甚少？这在他对生产程序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斯密只附带着提到过现代工业。他提到的不是纺织厂，而是别针厂。即便是这个例子，后来也被斯密本人抨击为一个“毫无意义的例子”。托马斯·S·爱斯顿写道：“人们可以体味一下克来普汉姆博士的遗憾，他的遗憾是，亚当·斯密没有走那么几英里路，从柯科迪^①到卡伦炮厂^②去看看他们是怎样制造炮弹的，却只关心那个愚蠢的别针厂。”

查理·肯德伯格曾试图对《国富论》中的这一缺点给出解释。他将这都归结于作者是一位“不谙世事”的教授。通常感觉都很敏锐的罗伯特·寇茨，对斯密在商品生产具体问题上缺乏资料，也做出了类似解释。他把斯密称为“家庭阶段的经济学家”。然而这些术语并不能对斯密的自相矛盾做出解释，而斯密迄今仍被认为是

① 柯科迪(Kirkcaldy)：苏格兰城市，亚当·斯密就出生在这里。

② 卡伦(Carron)炮厂：卡伦、苏格兰城镇；这个城市生产炮弹，Carronade(臼炮)由此得名。

一位科学的经济学家,尽管他有很多缺点。理查德·科伯纳曾提出,他的省略和疏漏,可以归结为他缺乏远见,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那么肯德伯格、寇茨或科伯纳眼中的斯密,又能就国家的财富问题,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事实上,斯密远非他的评论家所说的那种不谙世事的教授。他赢得了格拉斯哥那些富有商人的深厚友谊。他的第一份教授工作,实际上也与那些商人密不可分。后来,他又成了当时英国社会中最有权力的那些人的朋友。据说,甚至连英国首相也自称是斯密的门徒。然而我们或许也会注意到,正是这个杰出的门徒,想把穷人的孩子送到被冠以“工业学院”之名的贫民习艺所做苦工。

被认为是不谙世事的斯密,十分清楚应用经济学的价值。查理·汤森向他提出,要一些有关“法国的金融、它的管理方式、税收、公债”等方面的资料。很明显,斯密最开始写《国富论》,就是对汤森的一种答复。他海关长官的职位,或许就是对他的著作的奖励。除此以外,斯密似乎在苏格兰银行业的论战中,早就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斯密和实际经济活动的联系,自然会对他的书产生影响。例如,在准备这本书的初版时,斯密叫上了他在商业上的朋友——例如亚历山大·科克伦——来帮忙。和他同时代的一位T.门罗爵士回忆道:

我记得当《国富论》出版时,那些格拉斯哥商人们对这一著作感到十分自豪,就好像是他们写的一样;他们中的一些还说,亚当·斯密能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的一个有利之处在于,他和他们这一团体有交往,而在这一团体内每天所奉行的正是同样的原则。

在 1784 年经修订出版的《国富论》第三版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后来在海关任职的痕迹。

斯密的方案

现在,斯密被尊称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不断将斯密看成一个和他所在的时代相脱离的人呢?把他和史都华相比较,对回答这个问题将会很有帮助。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一样,史都华虽然因他的很多细节而广受赞誉,但他的最基本思想却被束之高阁。他对原始积累的坚持不懈的鼓吹,即使对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也显得过于生硬、直率。相反,斯密快乐的乐观主义,正是上流社会想读到的:限制政府,释放市场的力量,所有意志都是好的。然而不幸的是,斯密只能从根本上违背事实,才能表达出这一想法。

斯密忽视了正在出现的工业体系。很多人对此进行了评论,但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斯密是怎样对待那些创造这一经济的人的。乔安·瑟斯克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她评述说:

(斯密)对个人生活并不感兴趣。他可以使他的理论,远离那些用劳动为国家创造了财富的人,从而使他的阐释显得非常清晰。然而,他们的生活每每都要闯进来,给他自信的阐释打上问号。例如,他不得不对劳动力工资的不平等加以解释。

瑟斯克让我们注意的斯密的这一缺点,并不是总体上的事实、细节的缺乏,而是在处理那些有关阶级斗争的微妙问题时,对有关事实、细节避而不谈。我觉得,瑟斯克之所以能看到大多数经济历史

学家都没注意到的问题,是因为她是一个农业历史学家。这一背景使她能够透过自由主义的迷雾,感觉到斯密的著作和原始积累之间的关系。当下面研究斯密《国富论》的根源时,我们还会回到瑟斯克的这一见解。目前,我们只需注意到,斯密的方法使《国富论》变得极为参差不齐。有些地方突然会出现很多细节,而很多当时最重要的现象却被忽略了。

斯密在规划他的著作时,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目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认识到,出现这种“参差不齐”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一方面,斯密写出了一本具有实际管理意义的手册,正是汤森想要的那种。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事实材料。

另一方面,斯密又建构了一本结构巧妙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修订本”。其中,他竭力美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残酷现实。在他的这一工程中,他依赖的大多是被他的学生斯图亚特称为“臆测历史”的那些东西。斯图亚特为这种做法作了辩护。他声称:“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推测的事实来代替。”

斯密对推测和奇闻逸事的依赖,是可以理解的。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的修订中,许多事实,尤其是那些有关现存的经济现实的事实,会给斯密带来很多不便。这些事实可能会和他所要表述的思想相矛盾。他认为,经济之所以发展,是因为市场中互相有承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愿行为越来越多。

由于当时的社会对历史并不太看重,所以斯密对历史采取的这种随意态度,并不会使时人感到惊讶。斯密的同事威廉·罗伯森,曾对苏格兰早期的历史作过如下描述。他认为早期的苏格兰是“一个满是神话和臆想的地区,应该被历史学家完全抛弃,或者留给那些勤劳、易轻信的古学家们”。

我建议,我们可以将《国富论》看做两本不同的书:一本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的著作;另一本则是经济管理者们的手册。

尽管这部著作从形式而言并没有被分割开来,但我们还是能够大致把这两部分划分开来。若从后往前地看《国富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本有关实际管理的书。而那本有关意识形态的著作,则是从第一页开始一直往后,并逐渐融入那本政治管理的书中。

尽管有它的不足之处,斯密所要传递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从一些方面看,仍然是朝前迈了一步。例如,他试图将他的著作建立在一种唯物的社会理论之上。这一理论能够“解释政府的起源和发展等相关问题……它并不像有些作者认为的那样是源自某种允诺或协议,而是人们在社会中创造的自然发展的产物”。

斯密认为,他将这一理论运用于经济,是具有独创性的。但它显然仍属于苏格兰坚实的思想传统。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这一观点。甚至连斯密也打算在他对管理经济事务的建议中放弃这一点。

斯密经济学中晚了一步的“发现”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为他赢得了很多赞誉。现代经济学家总是过高估计斯密的重要性。根据卡尔·威里斯的说法,在18世纪的议会辩论中,“和别的作家相比,斯密被引用的数量是很少的”,那些作家包括洛克、威廉·配第爵士、大卫·休谟、格里高利·金^①、查理·戴夫南特、约书亚·柴尔德爵士^②、约书亚·塔克、阿瑟·扬。威里斯记录到,“即使到了《国富论》

^① 格里高利·金(Gregory King, 1648 - 1712):英国雕刻家、统计学家,以所著《1696年的英国状况》著名。

^② 约书亚·柴尔德(Sir Josiah Child, 1630 - 1699):英国商人、经济学家,东印度公司总督。

出版 25 年之后,议会两院对它的原则还保持着漠不关心的态度,怀疑它的正确性,对它的应用所能带来的结果也无法肯定”。此外,威里斯还提到,“斯密对汤森、柏克以及诺思^①的影响是很小的”。

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在《国富论》出版 5 年后的 1783 年 11 月 11 日,首次在议会中提到了该书。但是,斯密的经济理念在当时似乎没有多大影响力。1789 年,马尔萨斯从他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借出 1784 年版的《国富论》,他是到那时为止第三个借这本书的人。这本书共出了 5 个版本,前两版只各卖出了 500 本。爱玛·罗特西尔德不无讽刺地说,当 1790 年斯密死时,《年鉴》(*The Annual Register*)只用了 12 行字来介绍他,而给了对气压计感兴趣的副总军需官雷伊 65 行。《苏格兰人杂志》只给了斯密很少的 9 行字。甚至到了 1800 年,剑桥大学的各学院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有这本书。

一直到了 19 世纪初,当《爱丁堡评论》开始推崇斯密时,斯密的经济理论才被广泛阅读。正如威里斯所写:“直到坎宁^②、利物浦^③、布鲁厄姆^④、里彭伯爵^⑤ 那代人开始在社会中占有主要地位后,政治经济学的理念才在议会中获得了主导地位。”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作者,表面上看都已遵从斯密的

① 诺思(Sir Dudley North, 1641 - 1691):英国商人、公务员、经济学家,后来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早期倡导者。

② 坎宁(George Canning, 1770 - 1827):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因推行自由主义政策而著名。

③ 利物浦(Robert Banks Jenkinson Liverpool, 1770 - 1828):利物浦伯爵,1812 至 1827 年任英国首相。

④ 布鲁厄姆(Henry Peter Brougham, 1778 - 1868):英国大法官及上议院议长(1830 - 1834)。

⑤ 里彭伯爵(1st Earl of Ripon, Frederick John Robinson 1782 - 1859):1827 至 1828 年任英国首相。

信条了。

利物浦伯爵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的根基在于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那么为什么它却带头提倡斯密的观点呢?问题的答案和当时的政治气候——而不是经济气候——有关。法国革命所引起的恐慌,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听到斯密要传递的那种能给人以安慰的信息。

至于这种对斯密观点的支持,诚意有多大,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例如,弗朗西斯·霍纳——金银委员会(Bullion Committee)的著名成员、《爱丁堡评论》的编辑——就曾被邀请为新版的《国富论》做注释。他在1803年8月15日给托马斯·汤姆森信中,解释了他之所以拒绝的原因:

在斯密的著作还未完全发挥他的功效之前,我不愿意指出他的错误。目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斯密的迷信,而且在完全成功之前,我们不应该削弱人们心中的这种迷信……在我们还不能对财富的来源做出一个正确、精到的解释时,他受欢迎的、听起来头头是道的松散假设,对平民百姓来说,就聊胜于无吧。

斯密的吸引力

如果以詹姆斯·史都华爵士的著作为背景,我们就能够比较好地理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吸引力所在。尽管二者都没有得到时人的广泛赞誉,但相比较而言,斯密从一开始就更受欢迎一些。

史都华的写作风格,使他和斯密相比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

读斯密的散文是一种享受,而史都华的散文风格却显得沉重而紧密。他们二者的区别远不止写作风格这一点。斯密写的是人们熟悉的世界。他那本现在很有名的书是这样开头的:“每个国家每年的劳动,是为该国提供各种社会必需品和便利的最初储备所在。”相反,史都华的书开头的話却是:“写这本书时,我很没有信心。”接着,他便开始为他的整个计划辩解,并为他的写作风格表示道歉。这一辩护对公众来说无足轻重,因为这本书不会因此就变得好读了。

约瑟夫·熊皮特^①曾断言说:

史都华的著作,并不像斯密的著作那样,是建立在一个简单划一的原则之上的,这一原则有助于很快地赢得公众认同……人们不可能不惊讶史都华书中那么多既具创造性又有深度的观点,这都是《国富论》所没有的……史都华有关人口、价格、货币和税收的理论,都没有简单的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有一定的深度。亚当·斯密则愉快地在表面航行。

熊皮特接着说:

要是他(斯密)更聪明一些的话,人们就不会对他那么重视了。要是他再挖掘得深一些,发掘出更多隐藏的真理来,并用一些更加难懂但也更具创造性的方法的话,人们或许根本就读不懂他的著作……他不喜欢高于简单常识性的东西……亚当·斯密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对他所处时代的特点和想法,是完全持赞同态度的。

尽管史都华的散文有些浮夸,但据说他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讲演

^① 熊皮特(1883 - 1950):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者。的确,斯密本人也承认,他对他的对手(史都华)的体系的了解,多半来自于他们的谈话,而不是直接阅读史都华的书。但就斯密而言,他的谈话常常为他的跳跃式记忆所打断,而他的书的风格,却非常文雅。

他们两本书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斯密的书中,我们看不到政府采取手段、加强资本统治的那段历史。在那段令人昏昏欲睡的关于劳动力本质的冗长描述的结尾,斯密很例外的描述了小农场主——小农场主能将时间分配到农耕和纺织上。这一例外是有意义的。

由于运用了这一方式,斯密看上去似乎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物之一。的确,从表面上看,除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外,在所有政治经济学家中,斯密对劳动力的利益是最体谅的。

最后还有一点是,在读斯密的书时,我们还能享受到读奇闻逸事的乐趣。而在读史都华时,我们看到的是原始积累严酷的一面。

斯密和史都华

尽管斯密在表述他的目的、用意时,表现得很腼腆,但《国富论》是对史都华的权威的直接挑战。斯密从未在书中提到史都华的名字,然而他对重商主义的非难很有可能是指向史都华的,至少部分地说是如此。例如,在他为书的第四版做的广告中,斯密认为,所有写于他之前的有关阿姆斯特丹银行(Bank of Amsterdam)的著作,都是“难以理解的”。斯密著作的现代编者指出,史都华就那个主题写的著作,很有洞察力,完全不应受到这样的指责。他们还提到很多其他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斯密是应该提到史都华的。

我们不能把斯密就史都华这一问题上的沉默,看做他在这方

面的无知。毕竟,斯密曾在詹姆斯·史都华爵士以前就读过的柯科迪市学校(Burgh School of Kirkcaldy)上过学。从来就是贵族的史都华,还很适当在《亨利四世》一剧中扮演过国王这一角色。到斯密写《国富论》时,史都华是苏格兰最显赫的政治经济学家。尽管斯密可能在史都华的长期流放生活结束前,和他没什么私人交往,但在后来的几年中,斯密和史都华都是某些俱乐部的成员。

斯密在1772年9月3日写给威廉·普尔特内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对詹姆斯·史都华爵士那本书的看法,和你一样。不用说,我自认为,他书中任何谬误的原则,都会在我的书中遭到鲜明的反驳。”这封信还关系到这样一件事:斯密想在东印度公司派往印度的一个委员会中——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管理上的玩忽职守事件——谋得一个职位,因此就变得更使人感兴趣了。斯密作为顽固垄断势力的坚决反对派,已经名声在外。幸运的是,尽管他被选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任务没有完成。

斯密很可能已经知道,史都华已被东印度公司派到孟加拉去调查货币制造情况。斯密所提到,他本人和普尔特内对“孟加拉混乱的货币制度”持相同观点。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这封信可能意在作为作者和顾问的史都华进行抨击。在试图驳斥史都华时,斯密的基本论点是很有吸引力的:个人之间的利益可能会有冲突,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有共同的利益,这也包括其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各个阶级。在斯密的表述中,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原始积累”(他不经意之间,帮助制造了这个词)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一个元素。

斯密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赢得了柏克的高度赞扬。柏克滔滔不绝地称赞:“对这一体系的干巴巴的概括,不可能给它的思想以公正表述,就像早已香消玉殒的她,无法用仅剩的骨架子来表现她昔日的幽雅仪态和诱惑力一样。”书商们用作者的半身像,来装点他们的橱窗。但是,史都华的书,命运就截然不同了。在他去

世前一个月,他给一位记者写信说,他的“观点……没有什么重要性,它们已经被发表很久了,但是很少有人去读,更不用说对它进行思考了”。尽管斯密在商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史都华对当时政策的影响,却比斯密大。

现代经济学文献,既没有记录斯密和史都华之间的战斗,也没有记录史都华后来的失败。的确,我们只听说史都华比普通的重商主义者稍微现代一点儿,此外,我们就很少听到他的名字了。

《市场和国家:纪念亚当·斯密的论文集》(*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Essays in Honour of Adam Smith*)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对史都华所做贡献的抹杀。书的题目暗示着,书中详细分析了斯密对“政府干预问题”的反应。其中有些篇目的题目,的确和斯密的主题有关,但若是浏览一下全书内容,就会发现很令人失望。

这本书的编者之一,曾出版过史都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Inquiry*)的一个早期版本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文章。但在这一册书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史都华。有一位名叫 W. 阿瑟·利维斯的投稿人,极不恭敬的提出了“工业化需要政府行为”的观点,但是这篇文章和书名所表达的有关斯密的主题,并不一致。

也有一些学者同意利维斯的结论,但只占少数。今天,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本身的力量对一个经济的发展来说已经足够了。与之相反的是,在斯密之前,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斯密自负地对此提出了质疑。

阶级社会学和依附式的社会关系

在对史都华进行间接抨击的同时,斯密又对所有群体的社会、经济行为,暗暗进行了强有力的攻击,只有他所属的中产阶级中的少数几个阶层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密在这点上并非独一无

二。经济学家通常都会将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单列出来，给予特殊的嘉许。

约瑟夫·熊皮特对企业家给予了赞扬，而把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的消亡，归罪于那些更懦弱的中产阶级成员。凯恩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表示了信任，而对投资者和商人则持嘲讽态度。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英雄是管理人员，他们从缺乏才能的投资者手中，将对生意的控制权抢了过来。

斯密的社会学的一贯特征，是强烈地鼓吹那些为自己工作的工匠、商人、自由职业者等人的价值。在对依附式的社会关系的否定性描述中，斯密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不但贬低了下层社会中认为自己需要依附别人的人，同时也贬低了那些要求别人恭从的贵族们。

对依附性的关注，是斯密写作成熟时期——从《道德情操论》一直到《国富论》等一系列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我们应该认识到，斯密并不是对所有形式的依附关系都表示反对。他对那些受人雇佣的人的依附性，就容忍得多，这些雇员将产品生产出来，拿到市场上卖。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他的这种有限的宽容。我们将会看到，斯密对依附性的态度，将有助于解释他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阐释，以及其他一些政策性问题。

斯密和贵族

作为斯密的过激性的例子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对贵族始终持有的敌意，“贵族是我们所能想像的自由的最大反对者和压制者……除非对贵族进行镇压，否则人们将永远无法获得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罗伯斯庇尔都不可能比这更强硬了。

斯密常常这样表达对贵族的敌意：贵族将人与人之间卑贱的

依附关系,强加到那些比他们社会地位低的人头上。贵族想使“大批侍从和依附于他们的人”继续存在,斯密对此极为反对,这种态度贯穿了他的所有作品。他不无攻击性的对这种依附性进行了谴责:“没有什么比依附性更能腐蚀、削弱、贬低人们的头脑了。没有什么比自由和独立,更能给出更高尚、慷慨的正直观念了。”

斯密认为:“这类贵族,在家中供养着仆人和家臣……仆人们的生存完全依靠他的施舍,而且还得看他高兴与否。”这种好客,跟慷慨完全没有关系。地主们之所以表现得那么好客,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把地里生产出来的东西,变得具有交换价值。斯密解释说:“富人们除了将他们的财产给别人外,没有其他花法,这样那些得到他钱财的人,就得一直依附于他。”

一旦贵族们能买到奢侈品后,这种好客就不复存在了。斯密认为:

工艺的发展,给了贵族们将所有财产都花在自己身上的机会……他不再毫无理由的免费给人东西了,因为人是自私的,一旦他们有机会把所拥有的一切都用在自己身上(即使用在没有价值的东西上),他们也不会想到要把它给那些需要它的人,从而使它发挥最大的功效。

斯密在《狩猎法》方面的论述,是他反对贵族的又一个例子。斯密认为,《狩猎法》和资本积累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他是怎样把这些法律归结为贵族们邪恶本性的产物的。通过这一做法,斯密将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冲突,隐藏在了两层假设后面。首先,从表面上看,贵族很希望对人们进行残酷剥削。毫无疑问,在这点上斯密是对的,但是他的沉默似乎暗示着,资本对原始积累没有兴趣。然后,斯密又接着断言说,贵族说他们对经济的成功感兴趣,这是虚假的。他认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对狩猎的

一种返祖般的爱好,对他们的同胞的控制、支配。

和他著作中其他部分一样,在这里,斯密认为人类最普遍的错误就是愚蠢。相反的,理性思维(就是“资本主义”),似乎可以使剥削和苦难从地球上消失。斯密摆出的这种伯父般的姿态,使他的文章读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是若作为历史或政治经济学来读的话,就很难令人满意了。

斯密对人与人之间的依附性的态度,很具讽刺意味。事实上,他自己也经常要依靠贵族的帮助,来得到一些教学职位。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雷对斯密的处境的描述:

回到苏格兰后,斯密从一开始就想在苏格兰的一所大学中,得到一个最终的职位。但同时他又想给某个又有地位又有钱的年轻人做家庭教师、到处游历。最终他确实放弃了他在大学的职位,做了巴克勒奇公爵的家庭教师……在他寻找这样一个职位的那段时期,他和他母亲一起在柯科迪的家中,待了整整两年……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这样的职位。据说,由于他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以及差劲的语言和说话技巧,他在一般的父母眼中是一个最不适合于把勇敢而又欠考虑的年轻人托付给他的人。但是他为了这份工作所做的多次爱丁堡之行,还是有成效的。

其中的讽刺性还不止于此。尽管斯密的家族不是特别富有,但却有着很强的贵族根源。他母亲来自斯特拉森里的道格拉斯家族,是利文湖的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也就是后来的莫顿伯爵^①

^① 莫顿伯爵(1516 - 1581):苏格兰贵族,在推翻女王玛丽时起过重要作用。1567年7月将女王囚禁在利文湖的卡斯尔岛上,迫使她让位给詹姆斯六世,后因阴谋杀害女王丈夫达恩利而被处死。

的重重孙女。就是这位莫顿伯爵,将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囚禁在利文湖的一个岛上。斯密的父亲的祖先,也是阿伯丁郡的领主之一,有一段时期被认为是罗西比尔斯本家族,后来又被认为是因维拉姆塞家族。

但是,不管怎样,斯密所在的这一支,很早就与传统的苏格兰贵族价值观背道而驰了。司各特认为,该家族中比较富裕的那一支,对詹姆斯二世十分拥护,“那些非长子们,则在另一个方向表现得更为强烈”。司各特曾提到,在革命时期,很多家族成员都在管理方面表现出了天赋,并获得了很高的职位。

依附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与斯密同时代的人,都将某些特定职业谴责为非生产性的。例如,重农学派将农业生产者的劳动看做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相反,斯密依据生产的社会关系来划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按照这种区分法,同在某一特定行业中的工人,有些可能被划分为生产性的,而有些则可能被划分为非生产性的。毫无疑问,斯密将依附性问题,和他关于生产性、非生产性的理论联系起来。

斯密很明确的将非生产性劳动,和作为封建主义特征之一的卑贱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对家臣和独立商人的社会关系所做的比较:

当那些大土地所有者将所收的租金用于供养佃农和家臣时,他们中的每个人所供养的,只是他自己的佃农和他自己的家臣。但是当把他们把收来的租金用于供养商人和工匠时,如果把他们合在一起考虑的话,他们所供养的人数和以前一样多。如果将那种乡村式的好客所导致的浪费考虑进去的话,

他们供养的人数可能比以前还要多……每个商人或工匠都能受雇于成百上千个顾客，而不单是一个雇主，以此来维持生计。尽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他们所有人，但并不完全依附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事实上，斯密把二者之一说成是生产性劳动，是因为他赞同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他把二者中的另一个斥责为非生产性劳动，因为它必然带来(封建的)依附性社会关系。例如，他曾写道：

例如，一个有财富的人可以将他的钱花在丰盛奢侈的餐桌上，花在供养一大批仆人上，还可以花在养一大群狗和马上；但他也可以满足于节俭的饮食和较少的几个仆人，而把大部分钱用于装饰他的家和他在乡间的别墅……

这些用在耐用商品上的花费，可以给很多人提供生计，这些人的数量，通常会比他出于极大慷慨而雇佣的人要多。

为什么耐用商品需要更多劳动？斯密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在其他地方，他也曾暗示耐用性本身就是目的所在：

仆人们的劳动……都是在付出该劳动的一瞬间就消失了的服务，而且这种劳动不能将其固定或物化在可出售的商品上，以代替他们的工资和维持生计所需的价值。相反，工匠、制造商和商人的劳动，却自然地固定或物化于某一商品。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即可销售的商品的流通，在没有相应的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也能够扩大和加强。回想一下重农学派的分析，那类分析将制造业和工匠们的劳动等同了起来。而工匠们无需资本就能工作，而且赚的也只是用于维持生计的工资。我确信，斯密

对积累的提倡,是服从于他对商业社会关系的渴望的。

非生产性劳动者依附于贵族们,而生产性劳动总是植根于市场关系——事实上,大概只有这一点可以解释,斯密对非生产性劳动为什么态度恶劣。斯密认为,非生产性工人身上有他所不赞同的那些特点。与之相反的是,生产性劳动更有可能吸纳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而斯密希望看到的,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带着这种想法,斯密将商业城市的活力,与存在大量封建侍从的社会中所弥漫的那种闲散之风相比较。他说道:“在商业性和制造业性质的城镇中,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主要通过受雇于资本,以维持生计。这些城镇一般来说都勤劳、朴素无华而繁荣兴旺。”

斯密对自给自足农场主的敌意

斯密公开谴责说,贵族使乡村人继续对他们存在依附性。但是,他对乡村人的关心,也只限于对他们的依附性表示充分的哀叹。斯密在接下去对依附性的可耻本质进行探讨时,所用的语言让人联想起詹姆斯·史都华爵士的残酷分析。在这一探讨中斯密说,需要让现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场主,从斯密称为“多余的嘴”的人们手中夺过土地,这是一种合理的需要。他也赞成“减少佃农,以及其他一些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这一举动在欧洲的每个部分都直接预示着进步和更好的耕作”。

在斯密眼中,传统农场主的形象,也同样不受欢迎。这些农场主还没有完全接受那些心理价值——斯密把那些价值与商业阶段社会联系起来。他对他们的举止行为进行了嘲笑:

每一个乡村工人很自然的就养成了闲逛、懒惰、粗心的习

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不得不养成这样的习惯。这些工人几乎每半个小时就要被迫换一种工作,换一些别的工具,使他们变得懒散、懒惰,即使在最紧迫的情形下也无法变得精力旺盛。

斯密这一情绪化的突然爆发,没有为他赢得很多信誉。乔安·瑟斯克,一位有关英国乡村社会的敏锐学者,将这段话称做是“怪诞的漫画”。无怪乎她要给斯密号称的心理分析找岔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这段话和斯密进行了争论:“对农村劳动没有效率的这一描述,显然是夸大其词。很少有工人比花匠换工具换得更勤;能说花匠不能胜任需要充沛精力的工作吗?”

为什么斯密对小生产者如此怀有敌意呢?他说:“每个人很自然地都会为改善自己的社会条件而努力。”他凭什么假设那些所谓的懒散、到处闲逛的乡下织布工,就没有做出这种努力呢?

的确,一旦从他书中的意识形态部分转到管理部分,斯密就承认,那些贫穷但独立的农民工作很努力:“作为技术和制造业进步的自然结果,农耕技术有了提高,使农民和工匠一样没有什么空闲了。”

在这儿,斯密关注的是一个实际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所关注的问题是:由于乡民们被要求去做的太多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去组成民兵,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政府必须在国防方面多出钱了。

依附性和城市的陨落

斯密对工人阶级也怀有敌意。他惧怕那些聚集在城市的工人们的愤怒。他对劳动分工黑暗面的那段著名斥责是这样结尾的:

在劳动分工的进程中,大部分雇佣劳动力……都被局限在几个简单行业中。但是这些占大多数的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力,只能从他们的普通雇佣劳动中得到。有些人一辈子干的都是几项简单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的结果总是(或几乎总是)一样的。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发挥他的理解力,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难题,让他有机会施展他的创造力,找出解决的办法。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变得要多愚蠢无知有多愚蠢无知了……但是在任何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中,除非政府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否则劳动力阶层,也就是人民的主体部分,都会后退到那种情形下的。

斯密还抱怨说:“在文明社会中,无知和愚蠢经常使下层人民的理解力变得迟钝。”他接着说,“一个没有给他的智力以恰当的发挥余地的人,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比懦夫还可鄙。这样的人,就好比在人类本性的更重要部分上有残缺一样。”

同样,在向他的学生指出了劳动分工的好处后,斯密做了如下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个商业国家里,下层人民都极其愚蠢。荷兰的平民尤其如此……一般的规律是:住在城镇的不如住在农村的聪明,在富裕国家的人不如穷国的聪明。

斯密认为:

(当一个工人)来到一座大城市时,他就沉入黑暗中。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举止行为,这样的话他也就很可能疏忽了自己,任由自己放荡下去,染上各种恶习。

斯密认为,这些道德方面的缺点对富人来说构成了很大威胁,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他警告说:“在穷人中,这种对劳动的憎恶、对眼前的舒适和享乐的喜好,会鼓动人去侵犯别人的财产,而且这种情绪通常更稳定、它的影响也更广泛。”由于有了这种看法,斯密对处于下层社会的城市工人就没有什么好感了。事实上,尽管他对独立农场主和农场工人评价不高,斯密还是把他们摆在没有技能的城市工人之上。他大声说:“乡村中处于下层的人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优于那些在城镇中的人,对于这一点,每个由于商务关系或纯粹出于好奇而和两者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很清楚的。”

斯密著作中的社会关系和军事问题

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人的堕落,给斯密关于商业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他深知,传统军队的支柱就是小农,而正是小农阻碍着他所向往的商业社会的实现。

这些农民都是很出色的士兵。农业生活的节奏很适合于作战,因为农民们在农闲季节可以参加军事活动。若将这些小农场主中的大部分从土地上赶走,他们就会变为没有土地的农场工人或城市无产者,而这些人就不那么适合在军队服役了。

农民们在经济上的失败,会削弱军事力量,而在其他行业的成功,又会使自愿参军和能够参军的人数减少。尤其让斯密感到焦虑的是,少数在商业社会中获得成功的城市工人,不会愿意去参军:“大部分机械工(由于在军队服役)而损失的时间,都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一支由绅士组成的军队很难建立起什么纪律。”

此外,雇主们也不会愿意让他们最好的工人去参加军事活动:

在一个技术、制造业和手工业逐渐趋向完美的国家里……他们不能这样对待工人(指让工人去参军),否则必定会造成商业的损失和国家的彻底毁灭。一个铁匠或纺织工每离开他的铁砧或织布机一小时,他的工作就会停滞下来一次,这和牧羊人看管羊群、农夫耕种土地不一样。

由于有抱负的小资产阶级不愿到军队去服役,国防的任务就落在了两个阶级的肩上了:贵族和非熟练工人,这两个阶级的人都憎恨新社会。在斯密看来,这是对商业社会的最大威胁。斯密警告说:“但是,当军队变为全部由很低劣的人组成时,他们就必须发展成为一支常备军,相应地,军事纪律也应该建立起来。”

不幸的是,这类常备军中的各支部队,对他们的军官“依赖性很强”。斯密担心的是,这种安排可能给篡权提供了一个秘诀,因为“很少有人能拒绝(推翻政府)的这种诱惑”。或许,更大的威胁在于,不论是军官还是他的手下,都不会对私有财产表示出足够的尊重。

更糟的是,斯密意识到,一个商业社会的财富会引来外国势力的进攻。斯密认为,“一个勤劳,并因为勤劳而富裕的国家,在所有国家中是最容易遭到进攻的……人们的自然习惯使他们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自己”。

斯密的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

克劳夫德·葛德文曾说过:“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锻造出来的。七年战争刚刚结束,斯密就出版了《国富论》。”葛德文指出,军事是斯密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元素。斯密甚至宣称“战争的艺术……是最崇高的艺术”。

斯密对军事的关注,也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和史都华一样,斯密也是扑克(Poker)俱乐部的成员,而成为这一俱乐部成员的主要条件,是要对民兵队伍的创建有热情。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也使他跟他著作中的其他部分相矛盾。例如,在国家安全这一语境中,斯密放弃了对镇压贵族的呼吁。他反而宣称“世袭贵族是人民自由的最大安全保障”。

同样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斯密注意到了商业社会消极的一面。例如,他在他的《法学演讲录》(*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中抱怨说,商业销蚀了人们的军事精神:

商业的另一个坏影响在于,它使人类丧失勇气,并且会消磨人们的尚武精神。在所有商业社会中,劳动分工是无限的,每个人的思想都会集中于对某一特定事情的考虑……因此保卫国家的任务就托付给某些没有别的事可干的人。大部分人的军事勇气减弱了……他们逐渐变得既柔弱又懦弱。

这种焦虑促使斯密提到了劳动社会分工,通常他很少提及这一点。斯密总结说:“只有靠国家的智慧,才能将士兵这一行业变成一种和其他行业分离的独立职业。”这听起来很像詹姆斯·史都华爵士的口吻。

斯密对军队的未来感到惊惶,这使他提出一个建议:国家应设立奖赏,以鼓励“军事和体育训练”,使人们保有恰当的尚武精神。由于他对军队和工人阶级的纪律问题的担忧,斯密呼吁政府对教育程序进行干预,希望能通过学校教育,使那些有潜在的难以驾驭性的工人阶级,更多地接受军事纪律,接受财产权。

出于对这方面的关注,斯密在前面所引的那段话中,做了他关于劳动分工有害作用的那段著名悲叹:“在劳动分工的进程中,大部分雇佣劳动力……都被局限在几个简单的行业中。”

具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发现这段引文的一部分,可以作为斯密给工人的人道主义关心的证据。整段引文暗示工人可能是愚笨的,但是劳动分工是造成他们的困境的原因。这看上去的确像是公开反驳瑟斯克——瑟斯克认为斯密没有将人的损失考虑到他的计划中去。

如果更全面地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斯密在这段话中完全没有对工人人们的状况表示关心。相反,他所关心的是对富人福利的威胁。就这一点来说,可以考虑一下前面关于劳动分工有害性的那段引文接近结尾处的省略号,都省略掉了什么:

(典型的个人)是没有能力在战争中保卫国家的。他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会很自然地使他的勇气消逝,并使他痛恨士兵的那种没有规律性的、充满冒险的生活。它甚至还会削弱他身体的活动性……他在他所在的那一特定行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机敏,似乎是……以他思想方面、社会方面、军事方面的优点的丧失为代价而获得的。但是,在任何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中,除非政府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否则劳动力阶层,也就是人民的主体部分,都会后退到那种情形下的。

亚当·斯密名声大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觉得他对工人阶级的福利表示了关切。现代作家经常将上述引文的前一段话扯出来,以证明斯密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呼吁给工人阶级以公正的待遇。

事实上,整个连续的引文所传达的,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了。当时,斯密的注意力在别的地方。没几句话之后,他就已经忘了人民的福利,又回到了培养尚武精神以保护富人的财产的重要性上去了。

斯密反对工人的传统观念

斯密并没有将劳动者的消极态度,完全归罪于城市生活使人堕落的影响。同样使他痛恨的是,被从土地上驱逐出去的工人,把农村的普遍正义传统,也带到了城市中。例如,工人们认为,社会必需品的售价不得高于他们认为公平的价格。爱德华·P.汤普森将这些传统的看法称做“道德经济”。

下层阶级的文化价值使穷人们觉得,在高价时期完全应该“打开粮仓,强迫粮仓的主人以穷人认为合理的价格出售粮食”。对这一点,斯密感到十分气愤。他反驳说,粮商是很有用的:

通过提价的手段,他(粮商)可以抑制消费,并且可以迫使每个人,尤其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学会节俭和理财……当他预计到存货可能卖完时,他就对它们进行短期的限额供应。由于过于谨慎,有时即使没有必要时,他也会采用这种做法。但这给他的雇员们带来的不便,与由于缺乏远见而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危险、痛苦和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斯密写作的时代,正值食物经常出现短缺的时期。显然,斯密认为人们应该把他们忍受的饥饿,看做是一种受教育的经历,因而应该心存感激才对。

斯密反对道德经济的每个方面。政府曾颁布法令,规范粮食零售业,以平息平民。他对这种做法很是惊讶,尽管这一立法的很多部分在1772年被废除了。对斯密来说,这样的立法就跟对宗教的立法一样,没有任何公正可言。他声称,人们因囤积居奇而感到的恐慌,几乎是杞人忧天。

斯密惧怕工人阶级消灭一切差别

斯密担心,工人阶级为某种情绪所左右,这种情绪“怂恿他们去侵犯别人的财产,这种情绪更稳定,更具广泛影响力”。结果是,政府必须对富人的财产给予保护。斯密甚至这么教导他的学生:

法律和政府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联合,每次都是如此。富人利用这一联合压制穷人,并保留商品不均衡的特权。否则这一权力将很快为穷人的攻击所摧毁。这些穷人若不是受到政府的限制,就会以一种公开的武力方式,将别人降到和他们同样的地位。

斯密反复谈到,法律结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富人不受穷人伤害,他同时也认为,市场社会将会越来越平等。因此他预言道,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将会更好地接受社会秩序:

国民政府假定了某种屈从关系。但是,随着有价值的财产的获得,国民政府的必要性也日趋明显。因此,那些自然导向从属关系的主要因素,是随着有价值的财产的增加而增加的。

在市场规则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那些较不发达地区,私有财产需要的保护,比当时英国一般的状况而言要多。例如,在1799年11月8日的一封讨论爱尔兰贫穷问题的信中,斯密写道:

那儿(煤矿)和木材资源缺乏;这两样对大制造业的发展

是至关重要的。它需要秩序、警察、常规的司法管理体系。这样就能保护和限制处于社会下等阶层的人民,保护和限制对工业进步的重要性比煤和木材加在一起还要大的那些物品。

斯密和工人阶级的依附性

斯密很愿意享有他并不值得有的“工人之友”的名声,但事实上,他对广大工人阶级是完全持反对态度的。斯密对劳资双方的工资纠纷所做的评论,的确让他看起来是稳稳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斯密同时指责说,农场主、地主以及贵族们,宁愿收成不好,因而可以把粮食卖高价,原因就在于,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就可以“从他们的仆人那儿得到便宜……而且他们也更为卑下,更有依附性”。

当然,斯密的措辞比其他任何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听起来都更有进步性。他写道:

下层社会的境况的改善,应被看做是对社会有利的一个因素呢,还是应被看做给社会造成了不便呢?一眼看去,答案似乎非常明显……但是,使大部分人境况改善的因素,绝不能被看做对整体带来了不便。如果社会中的大部分人还处于贫穷、苦难之中,那么这个社会不可能是繁荣、幸福的。此外,那些给全社会提供衣食住行的人们,应该有权享有他们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从而使他们自己在衣食住行方面也能过得去。这完全是公正公平的体现。

这为斯密赢得了人道主义者的名誉。然而,斯密对高工资的著名拥护,并不证明他是站在工人这一边的。斯密之所以反对低工资,

是因为这使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行为准则得到了强化。斯密在这些问题上,通常不明确表态。尽管他在讲述理论时总是模棱两可,我们仍能推断出,他对低工资所能导致的两种结局感到焦虑,这两种结局对他都没什么吸引力。一方面,那些感到自己身份卑微的工人,可能会对雇主过分顺从,这就又造成了斯密所鄙视的那种农村依附关系。这类工人很容易为鼓惑民众的政客所左右。另一方面,低工资可能会使工人有更强的表现自己的倾向。这类工人有可能会遵从道德经济,侵犯别人的财产,以及参加其他一些聚众滋扰活动。在这两种情形下,低收入工人都不太可能遵从斯密赞扬的价值取向。

斯密认为,这类阶级冲突在大商业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首先,大企业的财富更容易激起民众的情绪。此外,小资本家在和大资本家比较时不具有优势,因此也很可能无法与大资本家合作,以维持低工资率。

斯密鼓吹高工资。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市场的和谐运作,会有利于工人的利益。我将在第十章中对斯密著作中这一方面进行更细致的探讨。他也希望高工资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工人拥有中产阶级的渴望和抱负,并摈弃他们对市场社会的敌对情绪。他假设说:

劳动的慷慨回报会……鼓励……普通老百姓去辛勤工作。劳动工资是对勤劳的鼓励……丰足的生活条件会增加人们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过上安逸富足生活的希望……它激励他发挥最大的潜力。

当然,并不是所有工人都愿意接受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对那些为自己的传统工人阶级文化感到自豪的人,斯密只有轻蔑。斯密提出说,教育对拯救这类人可能会有帮助。学校会教育他们去接受

他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命运,摈弃那些斯密所反对的与“道德经济”相联系的价值观。他写道:

即便政府不会对下层人民的教导中得到什么好处,它还是应该注意对他们进行一些必要的引导,不能让他们放任自流。但是,政府从这些教育中得到的好处,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接受的教育越多,他们就越不可能产生狂热和迷信的错觉。这种错觉在那些愚昧的国家里,通常都会引起可怕的混乱。此外,一个受过教育的智慧民族,通常会比愚笨的民族更有分寸,更有秩序。他们沉着镇定,每个人都更令人尊敬,都更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合法上司的尊重,因此他们也就更愿意尊敬比他们地位高的人。他们更愿意对人们关注的派系斗争和煽动性言论进行仔细甄别,而且也更看得透。因此,他们就不太容易被误导,从而对政府的一些措施进行荒唐的、完全没有必要的反对。

上述引文证明,斯密的确是他所在时代的产物——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群众是可以凭意志塑造的,而这一塑造可以通过地位高于他们的人的适当教导来实现。

斯密对政府和商业的敌意

斯密对政府行政官员们颇有微词,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尽管我们也知道他曾积极寻求他们的帮助,以便为自己谋得收税官的职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收税官,他执行政府规定的力度,和他之前在书中对他们诋毁的力度一样大。但是,既然我们通常都把亚当·斯密看做是一个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在这里,

我们就他这方面的观点,就不做更深评论了。

斯密开列了长长的一条“坏人”黑名单。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个名单中最奇怪的一项——资本家。很多人在得知亚当·斯密——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辩护人——对资本家却不无微词这一事实后,都感到很惊讶。例如,从他和边沁的交谈中可以看出,斯密偏爱谨慎的小资产阶级工匠和小商人,而边沁却赞赏那些愿意冒险的企业家。

事实上,斯密最尖刻的批评,是对富有资本家的批评。他经常认为,成功的资本家之所以能拥有崇高地位,都是由于政府的偏爱,这或许正戳穿了他“资本是自然进化的产物”的神话。

斯密甚至指责雇主们对工人的不公平待遇。此外,他还指责他们利用政府,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用斯密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不难看出二者谁一定……会在工资之争中获胜,并且迫使另一方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那些雇主们由于人数较少,也就更容易联合起来;而且法律也给他们这么做的权力,至少不像对待工人那样禁止他们这么做。

斯密觉得,甚至到了动用武力之时,工人们和他们的雇主相比,还是处在劣势。他在对雇主们享有的特权做了长达一页的讨论后,总结道:

相应地,工人很少能从那些喧嚣的暴力合作中得到好处。这些合作往往是以带头的人受到惩罚或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结束。这种结局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地方官员的插手,雇主们优越的稳定性,或者出于必要性……

尽管罢工不能给工人带来什么好处,但是市场也没有给出一个特

别有吸引力的前景。在接下去的几段中,斯密暗示,工资的最低线仅仅是由最低生活水平决定的。

斯密对富有资本家的敌对态度,是带有讽刺性的,因为斯密本人也曾向那些有势力的商人寻求帮助,以获得他在学术界的第一个职位。有一位作者指出,斯密的态度所反映出来的,是他个人的憎恨。“斯密对商人的强烈攻击……可以部分地在他个人的层面上得到解释。一个收入不丰的隐遁的知识分子,常常会对商业社会中每天的现实,普遍感到厌恶”。但大多数人都称赞斯密对商业的反对,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主张平等主义。

威廉·鲍摩尔收集了很多摘录,试图以此“证明”斯密反对商业,是因为他是工人的朋友。事实上,除了一个例外以外,鲍摩尔所收集的引文,都不是斯密用来表明他对劳动者的支持的。他写这些话,不是用来攻击那些独自享有特权的公司商业(*corporate business*),就是用来谴责那些反竞争性行为——受保护的商人常常会有这种行为。

鲍摩尔收集的材料中,唯一的例外是斯密的一段话,说的是商业界常常对高工资进行批评,却对高利润保持沉默。鲍摩尔对这段文字的引用,引出了一个谜。鲍摩尔所用的那个版本的编辑爱德文·加南指出,在那本书稍后出现了一段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尽管鲍摩尔没有引用过这段话。第二个引文的前后语境表明,斯密头脑中所想的是公司商业,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

关于斯密对商业的态度,我有不同的理解。我将证明,斯密的确也希望能有较高的工资率。他在这方面的潜在的根本兴趣,在于他希望高工资能使工人阶级的文化逐渐消亡,从而使工人们变得更像小资产阶级。

第九章

亚当·斯密教授对历史的篡改

斯密的意识形态背景

霍布斯试图说服读者们相信,人们需要一个君主,来确保政治上的协调。与霍布斯类似,斯密提出市场将确保经济上的和谐。与霍布斯不同的是,斯密没有说明这种雇佣劳动力的和谐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他以史料为基础来进行分析,那么他将不得不面对血腥的原始积累过程。

斯密回避了这些事实。他仅仅假设,资本已经迫使劳动力进入了一个要么受雇于人、要么忍受饥饿的状态。在那种情况下,雇佣劳动就成了一种自愿行动。一旦资本不再广泛地依赖市场外的强制手段来制造雇佣劳动力,斯密就可以说,已经不再需要想尽办法来削弱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了。一个新纪元已经确立,在这个纪元中,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力已经变得更加有效,资本就可以假装工人们都是一场互惠互利交易中的合作伙伴。

斯密的协调理论,在当时看来十分古怪,那时人们普遍认为雇佣劳动力的存在,是和某些强制手段连接在一起的(参见威尔斯1968年的著作,其中列举了一些例外情况)。但是,在1760年左右,人们开始首次提到,整个系统可能是依靠薪金的刺激,而不是

靠外来的强制(参见寇茨 1958 年的著作;相反观点见荷博思博姆 1974 年著作)。

事实上,在 1770 和 1800 年之间,英国国内的实际工资一直在下跌,最好的情况也是停滞不变。也许这正意味着,原始积累已经为“无声的强制”提供了舞台。当然,雇主们依然使用强制手段来控制工人。一直到 1815 年,英国政府还禁止掌握熟练技术的英国工人移民,这个规定对这些熟练工人的雇主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约书亚·韦奇伍德^①甚至希望政府能够授给邮政局局长拆开“可疑工人”信件的权利(转引自麦肯德里克 1961 年著作)。在当时,有选择性地依赖市场力量的这种观点,占了绝对上风,所以没有人对韦奇伍德们的建议提出任何异议。

当然,斯密提出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自愿性的虚幻说法,是人们愿意接受的。但是,我们有责任细查一下他对劳资的历史关系的篡改。在细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斯密编造了一个精彩的经济和谐的传说。华兹华斯曾在写作中称他为“除了大卫·休谟之外最差劲的批评家,苏格兰土地好像很自然地产生出这样的种子”。但是,作为一个歌颂经济和谐的诗人,斯密是独一无二的。

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像当时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学一样,首先是分析人们是怎样进行生活的,特别是当这种生活可以反映人们的道德和伦理观念时。确实,斯密的部分魅力在于他采用了一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个人化、不那么抽象的立场,来衡量人民是怎样生活的。

斯密的真正目的,跟绝大部分读者认为他们在他书中发现的那个目的不同。至少,他不能称自己是经济生活的“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相反,斯密的著作大力为总人口数中一小部分人的道德辩

^① 韦奇伍德(Josiah Wedgewood, 1730 - 1795):英国有巨大影响的陶器设计者和制造商

护,对其他人的价值则给予同样有力的质疑。

斯密认为的资产阶级典型角色

让我们首先从斯密肯定的方面开始讨论。斯密非常崇敬辛苦工作但却不那么成功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他知道,这些人对社会中其他各阶层的人来说,是毫无吸引力可言的。在他的一段相当奇怪的文字中,开头说的是查理二世时期的时尚品位,然后斯密似乎将讨论转移到了他当时的社会环境中:

根据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一种人文教育……是与慷慨、真诚、无私、忠诚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它也说明一个言行举止具备上述美德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绅士,而不是一个清教徒。另一方面,严格的礼节、严谨的举止,在当时人的想像中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而且是和浮夸、狡诈、虚伪以及粗俗的举止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思想肤浅的人来讲,伟人的缺点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容忍的。他们把那些缺点和……他们认定是属于伟人们的许多优点联系在一起;和自由与独立精神,和坦率、慷慨、博爱以及礼貌联系在一起。相反,那些社会等级较低的人民的优良品质,他们的极端节俭、他们拼命似的工作方式,以及他们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精神,在那些肤浅人眼中则成了小气的、不能接受的。他们不但把这些品质与它们所属的低贱阶层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它们和他们认为常与之相伴的许多严重恶习——如不知羞耻、懦弱、心术不正以及爱说谎和小偷小摸——联系在一起。

尽管小资产阶级有很多不讨人喜欢的价值观,斯密仍然希望能够

通过给他们合理的高工资,使他们从熟练技工向小资本家攀升的时候,能够变得更加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斯密把小资本家和谨慎勤奋的熟练工人,看做是资产阶级的内部生活循环的一个环节。

斯密像往常一样,不得不面对他关于雇佣劳动的糊涂观念。时不时地,他看起来像是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小商品生产的世界,在那里,没有人受雇于人。例如,他写道:“但是,想像一下,若所有人在为别人工作时,都比为自己工作时更加努力,那将是多么古怪。一个贫穷、独立的工人,总的来讲,会比一个做零工的过客更加努力。”更通常的情况下,斯密承认,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个人是贫是富取决于……他可以得到或支付得起的他人劳动”。在这种精神引导下,斯密指出:“工人需要雇主来为他们提供原材料来工作,也需要雇主来支付他们工资,并维持他们的生活。”尽管斯密强烈反对依附,但他却大力支持对工人的这种非个人化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再反对依附,而是改为反对封建关系的人身依附。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一层讨论上,斯密的分析中是不包含阶级观念的。虽然雇佣劳动力在斯密的理想世界中是非常普遍的,但他首先仍是假设所有工人都非常勤奋,而且早晚他们也会在经济上独立,甚至自己也可以雇佣工人。这个观点可能看起来不太现实,但到19世纪时,他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同。

斯密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

同任何其他大经济学家相比,斯密的理论都受到了更多欢迎,尽管他的理论中有着本质上的矛盾。主流文献大体上把斯密描述成一个温和的、向人们大力推荐市场作用的人。甚至连马克思主义文献,通常也对斯密抱有善意的好感,并且从他的劳动力价值理

论中找到安慰。人们唯一有分歧的地方是,《国富论》一书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客观的经济分析,又在多大程度是想宣扬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斯密根本没有那么大魅力。事实上,他只能忍受社会上很小的一个群体。斯密表示了他对于大资本家的蔑视,认为他们会联合起来欺骗工人们。他号召人们消灭贵族,他对广大工人和小农们,也表示出了令人不快的鄙视。

只有小资本家和野心勃勃的工匠,能够赢得他不变的尊敬。斯密本人告诉我们,说他理想中的模范人物是那些“浑身是劲、干劲冲天的积极的人(或者说是那些较好的机械师),他们不会屈服于压迫,并会经常完善自我,也会自然地加入政权中民主的一派,而且只可能欣赏辉格党所喜欢的实用主义原则”。这个群体将包括那些熟练工人、小商人、制造商,还有像他自己一样被认为白手起家的知识分子们。与那些热衷于世袭官阶和特权的贵族们,或那些缺乏完善自我的动机的穷人们不同,小资产阶级完全靠个人努力来获得自己的地位。斯密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

当然,斯密所热爱的这些工匠和小商人,完全不同于约瑟夫·熊皮特所说的英雄似的冒险家。正如约瑟夫·斯宾格勒所说:“斯密的代言人,应是那种谨慎小心、不是过分充满幻想的那种人,他们能够调整自身来适应环境,但从不试图改变环境。”只要足够勤劳,再有一点运气,这些按常规做买卖的勤奋的人们,就能够积累起一点财富,但是他们不会成为显赫人物。

这些工匠和小商人代表了后来边沁称做“实际上的平等”的基础。边沁认为,这种平等“已经存在于美国的一些州,就是那些不蓄奴的州”。根据斯密对英国经济的理解:

在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中,通向美德和财富——至少对这个阶层中的人来说是可及的财富——的道路,在大多数情

况下,都令人愉快地相似。在所有中下层职业中,真正具有稳固的专业能力,以及谨慎、公正、坚定的性格,并且平稳做事的人,很少有不成功的。这些人的成功,几乎总是依靠邻居和同阶层人的欣赏。如果这些人不是一贯如此的话,他们是不会受到赏识的。

我们可以想像,很多这样朝上努力的独立小资产阶级,经历了巨大困难。当其他人可以求助于封建主的善良帮助或政府长官来辅助其事业时,这些小资产阶级中极少有人有这些关系可以利用。

斯密夭折的乌托邦演变

斯密并不认可那种直接的社会联系——工人之间、贵族与他们的依附者之间,就是这样的直接联系。他安慰自己说,社会自然的演进经过了四个过程,从狩猎和采集开始,然后演进到商业社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冷漠的契约关系而产生的社会距离为基础的一个社会关系体系(小商人中就是这样的社会关系),将逐渐代替工人阶级和贵族的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密对于依附的公开谴责,就很好地和他的同情心融合在了一起。就像雅各·维纳独有见地地指出:“要理解斯密‘情操’中的‘同情’,与他充斥于《国富论》一书中的经济观点之间有何关系,关键是要看到,他在给予同情时所注意的‘距离’问题,指的是‘社会距离’。”

斯密描述了他希望见到的世界。他说道:“社会中不同的人,可以像不同商人之间那样相处——就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可以没有任何爱与温情。”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作为市场关系而存在。对于斯密来说,“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

(人)无论何时都需要大批人的合作与帮助(以市场的方式),因为单凭他个人的力量,他一生也只能赢得几个人的友谊”。

斯密认为,一旦他的文化处方被广泛接受,那么无论贵族还是工人,都将遵守他所仰慕的那种“浑身是劲、干劲冲天的”积极的行动标准。我必须指出,斯密对广大工人的顽固敌意,尤其是对城市工人的鄙视,似乎与他关于人类进步四阶段的想法不一致,在那四个阶段中,商业社会必定会提高大众的水平。但是,虽然斯密能言善辩,当时的世界却不合他的理想。工人们固守着他们的工人阶级文化,上层人士拒不承认斯密和他所属人群的成就。于是,仍然是软弱驯服的人接手这个世界。

温柔的商业

社会的大部分人都不赞同他的价值观,这使斯密感到很失望。但他似乎坚信,历史终究是站在他一边的。那种完成他的四个阶段的理论力量,终将扫除封建社会的农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斯密想像出来的不断变化的经济关系,将减弱贵族对小资产阶级的优势。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最终崛起,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将占据统治地位,而且依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因此,斯密告诉他的学生:

商业是对于这种习俗(依附关系)的一种巨大阻碍。制造业给较贫穷的那类人的工资,比其他老爷们给的都要多……苏格兰的贵族不比英格兰的坏多少,但那里的人民却更受压迫,同英格兰的人民相比,他们的性格中诚实、大度、敦厚的成分都要少得多。

斯密在论述商业对于城市社会的进步的贡献时,又回到了《国富论》一书中的主题。他写道:

商业和制造业渐渐将引进秩序和良好的政府形式,同时还有国家居民的个人自主权与安全感。而在此之前,他们几乎一直生活在与邻居的战争中,而他们对于他们的主人,则一直是一种从属性的依附关系。

斯密接着说:

外国商业和外国制造业……逐渐为大土地所有者提供了一些他们愿意用所有的剩余产品来交换,并且他们可以独自享受而不必和雇农或仆从分享的物品。所有东西都独自享受,一点都不分给别人,这似乎是所有时代的统治者的邪恶信条。因此,一旦他们发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独自完全消费掉他们的地租,他们绝不会愿意与他人分享。为了一对钻石腰带扣,或其他一些轻浮、无用的东西,他们愿意用1000个工人一年的全部生活费用来交换,同时交换掉的,还有他对这些工人的全部所有权和支配权。

塞缪尔·约翰逊同样指出这一点:

金钱将推翻原有的附属关系。它消除阶级与出身的界限,还提供抵抗力量或逃脱的权宜之计,以此来削弱权威。封建统治系统是为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服务的。当金银货币普遍流通时,它就不合适了。

的确,地主和雇农之间关系恶化,加速了贵族统治的瓦解。斯密评

论道：“一旦贵族统治者开始追求奢华，他们将不遗余力地从雇农们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佣金，而这又瓦解了他的权力。”罗马也是这样：“贵族们的权力也是很快地消失掉，而在那时，并没有商业或奢华现象出现。”这是因为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关系的恶化而导致的。斯密对他的学生这样解释说：“无论何时，一旦商业被引入一个国家，那么同时，正直与守时也必同时引入。在一个野蛮而粗鲁的国家中，是不会存在这些美德的。”

奇怪的是，斯密提到，休谟是唯一一位持同样立场的作家。但是，正如斯密著作的现代版编辑指出的，他的同辈伟人詹姆斯·史都华爵士、凯姆斯^①和亚当·弗格森，还有威廉·罗伯逊^②，都已在他之前将商业和自由联系在一起了。而且，在他的至少一个观点中，斯密把苏格兰贵族的衰落，归咎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他争辩道：“在联盟成立之前，爱丁堡郡几乎没有贸易或工业存在。”作为结论，他归纳道：“通过与英格兰的联盟，苏格兰的中下层人民终于从以前一直压迫他们的贵族的极权中解脱出来。”

斯密和小资产阶级的奇特英雄主义

斯密所认同的那群人，在寻求对他们成就的认同。但令他们感到悲哀的是，其他阶层的人们，并不欣赏他们那带有强烈小资产阶级色彩的“成功”观念。受失败情绪困扰，斯密把他全部的怒气都撒向那些与他意见不一的人。他坚信，未来一定是属于他们那群人的。

自认为是中下阶层人民中一员的斯密，强烈不满富人对他们

① 凯姆斯(Kames, 1696 - 1782): 苏格兰律师、农学家、哲学家。

② 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 1721 - 1793): 苏格兰历史学家。

的道德观念的轻视。他知道，贵族从小受的教育是崇敬英雄式的美德，他们不太可能去崇拜一个出身低微的小工匠的克己与节俭。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等于是他们承认了商业社会的优势、贵族文化的劣势。

斯密抱怨说，与中产阶级不一样的是，有钱人有机会来发展优雅的社交能力。他告诉他的学生们：“有一点儿地位和财产的人……一般拥有大量的闲余时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各个方面完善自己。他们既可以学实用的东西，也可以学装饰性的东西——他们要么对这些已经有了基础，要么在人生的早期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了。”

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供了一些深刻的见解，来阐述中下阶层和贵族行为的区别。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仍投入大量精力来改写那一章。下面引用的这段文字，就出自他删改最多的那一章。在这一章中，斯密表达了他对社会地位较他高的人的嫉妒。他说道：

那些拥有地位、声名显赫的人，相反地备受世人瞩目。人人都急于一睹他们的风采，而且乐于构想他生长的环境带给他的快乐与荣耀。他的行为是公众的焦点。人们不会错过他的一言一行。在大型集会上，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他。

在这里，斯密并未把贵族的力量，归因于他们对雇农和仆役的物质统治。相反，他提出了“一种要崇拜贵族们的天性”，“人们习惯性地对那些他们惯于视做上等人的贵族，表示尊重”。斯密推测说：“我们面对比我们强的人时所感到的卑微，更大程度上常常来源于我们对他们特权地位的敬仰，而不是因为我们盼望他们发善心赏赐我们些什么。”然后斯密提出一个反问：那么“一个下等人怎样能指望自己变得声名显赫”？他不能靠模仿贵族的举止来达到目的，

因为“那些模仿贵族举止的花花公子,希望能通过这种比日常举止高雅的行为来变得显赫,受人瞩目。结果却因为自己的愚蠢和自作聪明,而受到双倍的鄙视”。最后,斯密问道:“一个没有人认为值得一看的家伙,当他走过一个房间时,何必关心自己昂头的方式,或是手臂下垂的势态呢?”这个家伙必须采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案,才能达到目的。斯密建议说,他必须依靠“更加重要的品德”,来赢得众人的关注。他继续说:

他必须赢得他人的依赖,来抵消大人物的依附者,而且他除了自己的体力、脑力外,别无他物来给予他的依附者。他也因此而必须养成这样的习惯:他必须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在工作中必须比别人更勤奋,他必须在工作中耐心十足,在危险中能坚定执著,在失意时信心十足。他的这些优点,必须让公众看到——通过他的事业的艰难、重要性,以及他的明智判断,还有他追求事业时的坚忍不拔。忠诚和谨慎、慷慨与坦率,这些特点必须体现在他所有的日常举止中。

请注意,虽然斯密认为谨慎的人应该使别人依附自己,但这种依附在某种程度上,比那种与可鄙的贵族阶层相联系的依附高级。也许斯密找不到其他解决办法了,他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谨慎……可以获得一种冷冰冰的尊敬,但似乎无法得到任何真正热烈的爱戴或景仰”。尽管如此,斯密注意到,“在我们的所有渴望中,最强烈的一种也许就是要成为同行们敬佩的目标,在同行中获得赞誉和地位”。

除了从依附者身上获得尊敬外,谨慎的人还可以怎样获得尊敬?斯密对于“依附”的态度转变,与接下来的显著转变(可以说是“神奇的”转变)相比,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斯密在毫无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赋予了谨慎的人以英雄式的美德,而以往那些美德一般是

和贵族联系在一起。同时他还攻击贵族的怯懦：

此外，(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必须同时勇于参与以下情况：那些需要极大才干和美德才能正确行动的工作，但在这些工作中，最大的喝彩声只会由那些体面地完成工作的人获得。一个有斗志和野心却为形势所迫的人，是多么迫不及待地去寻求这样的机会来扬名啊！对于他来说，任何可使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情况，都是他期望的。他甚至憧憬对外战争或国内的不和。他带着窃喜，透过对外战争或国内不和的所有迷雾和流血，看到了他一直期盼的机会终于出现，它们将为他带来全人类的关注和崇敬。相反，有爵位和地位的人，他的光芒显示于日常优雅的行为之中，而且满足于这带给他的微小声望，所以他不愿劳心费力地去做那些可能很困难，或让人沮丧的事情。对于他来说，在舞会上出类拔萃是最大的骄傲；在对妇女献殷勤的诡计中获胜，是他最大的战绩。

斯密奇特的白日梦告诉我们，在这位优秀教授的思想中出现了差错。一向坚决蔑视英雄主义美德的亚当·斯密，怎么可能突然间把他的小资产阶级模范形象，变成了一个英雄？斯密会不会已经将自己视为一个这样的英雄？至少在一种情况下，他把自己看做一个英雄角色。他在1790年10月26日写给安德烈阿斯·豪特的信中，称《国富论》为对“整个英国商业系统给予了有力的一击”。在《国富论》中斯密宣布：

(如果一个人反对垄断者)，而且如果他有权威足以阻止垄断行为，那么，当失望的著名垄断者大发雷霆的时候，即使是最公认的忠诚、最高的爵位、最卓越的公共服务，也无法保护他不受垄断者们的无耻诬陷、诽谤、人身攻击，有时是真正的威胁。

斯密的被压迫感

为什么斯密如此强烈地排斥其他一切不同于小资产阶级行为规范的行为？一个历史心理学家也许更倾向于把斯密描绘成一个不谙世事的学者，不懂社交礼貌，而且对比他过得好的人心怀不满。迈克尔·伯林独有见解的论文《爱与恨》(*On Love and Hate*)，在这里可能对我们有点儿启发。其中一部分说道：

我们痛恨那些人——虽然他们对我们很重要，但并不爱我们，也拒绝成为我们的合作者，不论我们花多大力气来赢得他们的感情。这种情形在我们心中激起以往所有的痛苦、焦虑，然后我们只有用“恨墙”(*barrier of hatred*)来阻止它们重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放弃自己对他们的需要和依赖。

斯密对自己心理的描写，为我们了解他的态度提供了进一步线索。根据他对人性的理解，人们特别需要“正确”的感觉，以至于甚至经济行为都服从于它。斯密提到：

如果我们深入探寻一下，在人的心目中，讨好别人的特性是建立在什么原则基础上的，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每个人都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倾向……人们总是试图让别人顺从自己的观点，即使所讨论之事与他毫无瓜葛。如果一个人所宣扬的关于中国或遥不可及的月球的观点，与你所认为的观点不同时，你一定会立即试图说服他改变观点。在这一点上，人人都在一生中不断进行着演讲。一旦他人与你意见相左，你便会立即感到不安。

这种一心追求控制局面的心理,是跟一种欲望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驾御别人的欲望。让我们回想一下,斯密早些时候介绍说,下层人也应该有自己的附庸。此后他写道:“喜欢统治他人、享有权威,这对人来说是正常的。人人都希望凌驾于别人之上,有权驱使下属干活,而不必说服他人、跟他人讨价还价,这会带来快感。”斯密经常认为,贫穷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困苦是次要的。他宣称,真正可怕的危害,是贫穷带给人的羞耻和耻辱。如果这种说法属实的话,那么斯密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们可真是一贫如洗了。

小资产阶级无法劝服社会上的其他阶层,对此斯密很愤怒。他在这篇文章中,进行了简短的报复。他突发奇想,把小资产阶级的愤怒和嫉妒,转化成了一种英雄气概,尽管斯密自己一般承认,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并不适合当兵(参见本书第八章)。但是,正如斯密本人告诉我们的:“愤怒、仇恨、嫉妒和恶意、复仇的性情,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别人仇恨的对象,甚至别人害怕的对象。”他继续说:

嫉妒是这样一种冲动,它使人们对那些名副其实的上等人心怀灰恨,但是这些人确实应该享受他们的成功。但是另一种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怯懦地允许别人——那些没有资格做上等人的人——升到自己上面去,或超过自己,这样的人的确是卑怯的……但这种性格上的弱点,通常随之而来的是很多懊悔……为了能使自己舒适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住我们的尊严和职位,如同必须保住我们的生命和财富一样。

如果我们相信塞缪尔·约翰逊的评价的话,“嫉妒”在苏格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烈:

苏格兰人的嫉妒感从不会消失,他们总是怀疑任何一个

英国人都因为他们的贫穷而歧视他们。苏格兰人为了向英格兰人证明自己不比邻国人穷,就一定要向他报更高的价。200年前,莱斯利详细说道,在苏格兰,一百只新鲜的鸡蛋只售一个便士。当时,他以为人们除了认为有大量鸡蛋外,不会有其他想法。但是自那以后,后代人变得更聪明了:他们明白了卖价和实价可能会有不同。他们现在在讲莱斯利的故事时,生怕外国人听了后,会以为不是鸡蛋太多了,而是便士太少了。

斯密像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苏格兰学者一样,费尽心思地想同一个英国本地人一样讲话。因此,或许斯密的民族背景,也起了作用。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当心,不要把这些观点推向极端。如果我们用这个来解释斯密个人的写作目的,那是不够的。类似的观点,也不断出现在休谟等作家的作品中。这些想法是与当时人类生活中的变革紧密相连的。伊丽莎白·福克斯-日内瓦兹和尤金·日内瓦兹有一个巧妙的表述方式:

让个人服从于社会,按照社会功能来判断个人的传统世界观,已经让位于现代的世界观。现代的世界观就是让社会服从于个人,并依据为个人服务的需要,来判断社会机构。集体的权利、个人的义务,让位于集体的义务、个人的权利。

托克维尔极有见解地指出,新社会所产生的一个具有影响的结果就是,“民主制度特别能增强人们心中的嫉妒之情”。

斯密和民粹主义

斯密所表达的愤恨不满之情,与民粹主义很相似。总的来说,

民粹主义主要吸引的人,是认为自己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挣工资的劳动者。像斯密一样,民粹主义者感到,他们同时受到社会地位高于他们和低于他们的人的双重威胁,他们常常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归咎于强大的精英阶层针对他们的阴谋诡计。民粹主义者常常拒绝对世界的复杂分析,而更喜欢简单化的解决办法。最常见的民粹主义的秘方是“纸币政策”,或是“打破垄断”。虽然自由放任政策一般不和民粹主义连在一起,但似乎它应该与之紧密相连。正如尼尔·汤普森已经证明的那样,那些所谓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应该被看做是民粹主义者,或者更进一步,应该叫做斯密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我觉得,斯密的著作之所以赢得了广泛支持,是因为他雄辩地表达了其他人深切感受到的东西。他不像其他那些缺少教育的民粹主义者,他通常可以把他的愤怒升华成为令人着迷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在他的理论中,相互竞争甚至相互侵犯,都可以被引导成和谐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在这个奇想中常常出现裂缝,斯密周围的严酷现实也不断挤进来。在这种时刻,我们可以稍微窥见斯密的原始积累理论。

斯密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奇特英雄主义观点,似乎反映了他本人对于某些人的不满与怨恨,因为那些人拒绝接受他那些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对他来说无比珍贵。虽然史都华的语言十分粗暴,但我觉得,社会对于斯密这种被压抑了感情的人,怀有更大的恐惧。斯密对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似乎与此有关。我们可以把友情比做一只张开的、伸展的手,但一只“看不见的手”就给人一种阴森、邪恶的感觉。麦克白就是以这种情绪,乞求夜的黑暗,“用你沾满鲜血的看不见的手”,来掩盖住他将犯下的罪行(《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或者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尼采对于“看不见的手”的怪异描述:

如果我想用手来撼动这棵树,那我可能办不到。但是我们看不到的风,却可以摧残这棵树,使它向它想到的任何方向弯曲。正是看不见的手,最能屈服、摧残我们……人的情况跟树一样。他越想长得高、追求光明,他的根就越强烈地伸向地下,伸到深邃的黑暗之中,伸到恶之中。

斯密关于“和谐”的社会心理学理论

亚当·斯密发现劳动分工 凯恩斯曾经评说:“从主要方面来说,在亚当·斯密关于知识进步的描述,和他对影响‘国家财富’的因素的分析中,还存在着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余地。”我觉得,凯恩斯没有想到,他说的话是多么低估了亚当·斯密。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法学演讲录》中,有一部分是讨论警察的。这一部分最能使我们明白,在《国富论》的理论框架下,他是怎样努力地遮蔽原始积累的严酷现实的。亚当·斯密在该章节的开篇部分提出,政府或国家有义务保证商品价格低廉。他接下来提到,虽然有些材料十分稀少,但是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使他们在价格上变得可以承受。这个过程需要法律的强制力才可以实现,这种强制力对于维持“人类财产中有用的不平等”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毫不起眼的讨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亚当·斯密对法律公正性的好奇。

穷人只是法律的牺牲品吗?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亚当·斯密说,法律的功用是要保护富人免受穷人的伤害。这个观点跟亚当·斯密这个理论家很不协调。

亚当·斯密对他在格拉斯哥地区 1762 年至 1763 年间教过的学生们承认说,“穷人的劳动力和时间,在文明国家里,为保证富人

们的悠闲和奢华而牺牲了”。但他对这种状况是这样谦虚地辩解的：一个社会中最弱势的人们，比“野蛮状态下”，也要拥有多得多的“足够物质财富”。事实上，他断言：“现在一个普通的按劳动日工作的劳动力……比一个率领 1 000 个裸体野蛮人的印第安王子（应该是指美洲的土著人），拥有更多的便利和奢侈。”

在这里，亚当·斯密比洛克走得更远。洛克只是说，英国工人的吃住条件，都比一个印第安王子好。亚当·斯密其实也完全可以采纳伯纳德·曼德维尔^①的思路（参见其 1723 年著作）——曼德维尔曾经写道：“穷人们比从前的富人们过得还好。”亚当·斯密然后转向了曼德维尔的另一个想法。曼德维尔曾注意到，要生产一块漂亮精美的鲜红色布料，需要各种行业的工人们在工作间一同工作。具有民主思想的亚当·斯密在证明这一点时，使用了一个工人的蓝色外衣为例子，没有用一块红色布料为例，但是其主旨却并无改变。

但是，那些不幸地聚居在大城市中的贫苦群众们，恐怕不会同意亚当·斯密的论断，说什么他们比一个印第安王子拥有更多的生活便利和奢华。同样的，那些在 19 世纪 40 年代访问伦敦的人，也不会同意亚当·斯密的这种论断。据说，他们对那些试图与他们进行交谈的英国人说：

（我们）将很乐意与你们交谈，只要这样做能对我们在你们的街道上看到的成千上万可怜的饥饿儿童们有所帮助。在你们的大街上，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的在雪地中赤脚行走的小孩子们，我们同情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很饿……我们的城

^① 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 1670 - 1733）：荷兰散文作家、预言家，因所著《蜜蜂寓言》而享誉欧洲。他指出：蜜蜂都从自我利益出发行事，虽然动机是坏的，但结果却是好的，促进了文明。

市中没有这样的穷孩子。

总的来讲,亚当·斯密对于令人难堪的现实问题,并没有多少耐心。他的目标相当的理论化。但是,在这里,亚当·斯密偏离了他狭窄的理论路线。他又重新回来谈论他说过的观点,就是他的同时代人相对来说已经很富裕,舒适了。他问道,他那个时代的穷人们怎么会过着胜过印第安王子的生活呢?他回答说:

但是,同野蛮人相比,穷苦的劳动力或辛勤的农民,虽然深受压迫和专制,却生活得舒适,这似乎不太可能。在野蛮人中没有地主和放债人,也没有税收官,所以每人都拥有他自己的劳动所得,因此也应该拥有大量产品。可真实情况却相反。

因此关键在于:穷苦劳动力比野蛮人有更多商品,但也更少有闲暇。亚当·斯密明白闲暇对原始社会的重要性。但是,他还没有讨论,是否现在的劳动者也原意选择拥有更多闲暇、放弃那些商品,这时他的演讲就结束了。亚当·斯密甚至没有提到,这种转变可能不是自愿的。

在亚当·斯密的早期作品中已谈到在闲暇观念的进化中,阶级所扮演的角色。他甚至将原始社会优秀的诗歌创作,归因于当时人们的大量闲暇时间。与此同时,他提到,“在文明国家中,下层人民少有闲暇,而上层人士有很多其他自娱的事去做”。换句话说,亚当·斯密同代人闲暇的急剧减少,并未引起他的好奇。

第二天,亚当·斯密对头天的演讲做了扩展:

文明国家中,穷人为富人的休闲和享乐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地主们无事可做、花天酒地,而他们的雇农却不得不干活。放债人靠辛勤商人的利息、借钱应急的人的利息,来

保障生活。但是,每个野蛮人都完全拥有自己的产品,那儿没有地主,也没有放债人和收税官……穷苦的劳动者,需要克服种地的不便、季节的无常。他们常常暴露于严酷的气候之中,还要付出最艰苦的劳动。因此,那些支撑整个社会框架,创造生活便利品和给别人带来安逸的人们,自己只取一小份成果,而且在艰辛中死去。他肩扛全人类,却被抛至底层。我们应该如何衡量这些人和最底层的人,分享到了多大生活的便利?

最后一句十分奇怪。在先前的一次演讲中,亚当·斯密认定穷劳动力比野蛮人在吃、穿、住方面都要好一些。但这次,当听众们听的是这个劳动者分享到了“一小份”时,他突然让他们估量他们“分享到了多大生活的便利”?

后面的部分也同样引人注目。亚当·斯密似乎无意中撞上了古典的原始积累理论。当他意识到那些不幸的农业工人(代表当时的大多数工人)被迫工作很长时间,却食不果腹,亚当·斯密就飞快地转开话题。

这时,亚当·斯密在他的早期劳力分工理论中寻找安慰。他接着对学生们说:“劳动分工完全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但劳动分工和他眼前说的那个问题——穷苦劳动力的问题——毫不相干。

也许是他的蓝外衣,让他想起了曼德维尔——曼德维尔曾谈过劳力分工。无论怎么说,我们没听到斯密提到任何延长工作日的后果。相反,亚当·斯密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到他所谓的“不太相干”的例子,就是别针厂的例子。难怪熊皮特要抱怨人们不关注亚当·斯密的劳力分工理论。熊皮特强调:“在亚当·斯密之前、之后,都没有人这样重视过劳动分工理论。”

在最后的几个演讲中,我们可见一个《国富论》的压缩版。简言之,亚当·斯密似乎想用他的伟大作品,来逃避原始积累古典理论的逻辑。

斯密的人类学观点：自我改进

即使在他自己的社会劳动分工构想中，亚当·斯密仍然对用什么力量来克服传统社会的停滞状态，感到困惑不解。例如，他描绘了一种原始积累之前的停滞、静止状态。他观察到，“在没有劳力分工的粗陋社会中，在没有交换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必要去积累资本”。

亚当·斯密似乎表示，这种粗陋状态可以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中。例如，他注意到，“在苏格兰高地，每个农民都必须同时是他自己家中的屠夫、面包师和酿啤酒师”。

尽管如此，斯密曾在别的地方注意到，每个社会都必将超越这种原始状态，因为从农业中，会自然而然地演变出一种社会劳动分工。关于这一点，他断言：

（当工业仍没有被）引进时，通过某些商人或实业家的暴力操作——他们靠模仿外国的一些工厂，而奠定自己的地位——做外销的一些工厂，通过逐渐对粗糙简陋工厂的不断完善，而自发地成长起来。这些工厂是农业的产物。

亚当·斯密把劳动力的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社会联系起来。他也同时教导他的学生们说，社会分工是先于资本和市场经济社会出现的。他提醒他们：“劳动力的完全分工，是农业发明带来的……铁匠、木匠、织布工和裁缝，不久就发现不必下田劳动，这正合他们的意。”他争辩道，即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像霍屯督人^①，也

① 霍屯督人(Hottentots)：非洲南部的一种土著人。

产生了一种劳动分工,那是他们经济生活的专业化造成的。因此,亚当·斯密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发现社会分工的历史原动力并不是“任何人类政策的结果”,而是一种“交流、交易、交换的本性使然”。

这种人类学观点一点也不新鲜。约翰·惠勒在1601年写的《论商业》(*Treatise On Commerce*)中写道:“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互相交流、交往、贸易、买卖,对人类来说更自然的事了。”亚当·斯密的贡献在于,他将这个观点较任何前人都推进了一大步。

斯密自相矛盾的阶级人类学

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说,亚当·斯密其实并不相信他自己人类学观点的普遍性。相反,他有一个与上一点自相矛盾的阶级人类学。例如,我们已知道,亚当·斯密在解释为什么需要保护财产,以防它们被工人阶级们夺走时,提出了一种穷人的人类学。亚当·斯密对贵族闲人们又提出了另一种人类学——这些人远离市场,不愿将自己的积蓄投入到投资冒险中去。因为他们没有中产阶级的那种对交换、交易的热情,亚当·斯密强烈地指责、攻击他们。

对于这些对市场行为冷漠的人,亚当·斯密并不是唯一的攻击者。事实上,早在1618年,弗兰西斯·培根已经指出,经济的繁荣要求国家中的教士和贵族不要太多,“因为他们对市场没有任何贡献”。笛福也批评道,“贵族没有做生意的天分;他们对贸易制度表示轻蔑……他们决不会插手商业”。斯图亚特也认为,贸易与贵族们无关,尽管他对他们的行为深表同情。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亚当·斯密试图用自己的非生产性劳动理论,为自己对贵族们的鄙视提供一个理论基础。他争辩道,制造一件衬衫所花的劳动,只有当衬衫卖出后才可以算是有价

值,而如果它出自仆役之手,那么他的劳动就没价值。当然,那些更贫困的自给家庭,也同样因其非生产性劳动而受到谴责。

斯密把他对贵族、工人阶级的批判,与他的“自我改进”的人类学观点割裂开来,这样他就遮蔽了人类社会的阶级本质,使他这个原则看起来仿佛是普遍真理一般。但斯密无法把这种普遍真理的假象一直维持下去。当他讨论各个阶层的实际行为时,他就转向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人类学,实际上自己驳斥了自己的普遍主义人类学。

在他的这两种人类学中,斯密都没有明确地说明财产的分配问题。正如弗吉尼亚的总督波纳尔对他解释的:“在一个人养成了讨价还价的习性之前,他一定得有点儿什么东西。”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斯密似乎觉得,他可以诉诸于市场的一个奇妙的和谐本性,来解决他的理论体系中的自相矛盾。因此,我们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可以读到他讲“富人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对生活必需品做出的分配方法,将与假使土地被平均分给每个人时的分配方法,几乎是一样的”。

斯密的表达并不比史都华高明。史都华早先曾写道:“在巴黎,即使是最文雅的居民,也不会把地球上的产品比他人更多地放进自己的肚子里;他可能会挑拣,但是他总会发现,自己丢的被他人拾取充饥。”事实上,这种由“看不见的手”所导致的平等,和史都华幻想复兴的斯巴达奴隶共和国的情景,本质上是相同的。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和谐作用的理念,并没有解决存在于他的两种人类学观点之间的矛盾。如果他想让自己的推理连贯一致,他就不应该从“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个方面来讨论,而应该从生产资料的分配这个角度来分析。毕竟,他自己已经重点强调了

“资本”的重要性。

斯密忽略了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即便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他也很清楚,消费品总的来说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因此,他也承认,“尽管每个人对食品的欲望是受肚子大小限制的”,但其他形式的消费却似乎“没有限制或特定的界限”。他已经发现,虽然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是“一个有钱人的消费,至少相当于500个穷人的,少数人的富足意味着许多人的贫困”。

在《国富论》中,斯密最终确实把注意力从消费转移到了生产上。在该书里,“看不见的手”不是在消费领域里起到确保公平的作用,而是在生产领域中起作用。在那里,“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自然地促使人们把资本投入到对社会最有益的事业中去”。

不幸的是,他没有对资本的所有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分析,斯密所强调的观点,即资本分配有益于社会这一观点,实在是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毕竟,我们看到斯密本人已经注意到:“如果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贫穷而痛苦,那这个社会不可能繁荣兴旺。为了公平起见,那些供养全体人民的人们,应该取得自己劳动成果中的一份,以使自己能相当程度地吃好些、穿好些、住得好些。”

尽管如此,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的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他认识到了他以阶级为基础的对社会劳动分工演进的解释,与他的另一种用市场力量来支撑的解释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当他处理阶级对抗问题时,斯密总是混淆概念,不敢直接面对阶级冲突的所有内涵。

虚荣心的政治经济学

为了尽力淡化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不和谐力量,他对财富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心理分析。在那里他宣称,之所以看重财富积累,

不是因为它能带来兴旺繁荣。看一看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怎样对“贫困问题”不屑一顾的：“是贪婪的本性，夸大了贫富之间的距离。”在谈到穷人们遭受的不幸时，斯密认为，“这些不幸大部分来源于人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其实应该静静地坐好、心满意足。”

斯密劝他的读者们过一种没有奢侈品的生活，连最普通的奢侈品都不应该有：

有多少人因为胡乱花钱，购买小饰品或无用的小杂物，而毁了自己啊！……于是，权力和财富看起来像是被专门设计出来的、制造一点儿小方便的巨大机器。这些小方便包括最漂亮精致的弹簧，它们需要最小心的呵护，但尽管如此小心，还是有可能在任何时刻裂成碎片，同时把它们的不幸主人压在底下。还包括大幅的织物，需要用一生的劳动来织造，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把裹于其中的人压垮。当这些人还能站着的时候，它们虽然可以使人们省去一些比较小的不便之处，却既不能保护人们免受夏日降雨，也不能抵御冬日的风雪，而是总让人们同样——甚至有时更多地——直接暴露于焦虑、恐惧、痛苦、疾病、危险和死亡之下。

长话短说，那些为追求物质丰富而努力工作的人，是受到了蒙蔽。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有一章的标题是“论野心的起源，兼论社会阶层的区别”。在该章开头，斯密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趋富避贫”，只是为了避免贫穷所带来的耻辱，尽管“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也(可以)满足他的生存需要”。

根据斯密的观点，即使“最低级劳动者”，也把“大部分工资都花在生活便利品上，这些便利品可以看成是奢侈品；比如，在特殊的场合，他甚至会为了虚荣和荣誉而捐赠一些东西”。在《国富论》中，斯密又一次要他的读者们相信，英国工人们的工资是在最低生

活水平线之上的。

虽然卖弄、炫耀的渴望,会使人愚蠢地追逐物质上的成功,但是它最终还是服务于一个高尚的目标:

自然赋予我们这种性格,是对我们有益的。正是这种假象激发并维持着人类长期、持久的辛勤劳动。正是它最先促使人们耕种土地、建造房屋、修建城池并建立联邦。人们还因此去发明并改善一切科学和艺术。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生活。也正是因它而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将原始森林改造成了宜人的肥沃平原。

这段引文中的总结句,与斯密所译的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一段文字是相同的。该段译文见于斯密的文章《给〈爱丁堡评论〉编辑们的一封信》,它提示了斯密理论的思想实质。在那篇文章中,斯密驳斥了卢梭的论点,即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私有制的出现。

在《道德感情论》一书的那段文字中,斯密重复了卢梭关于改造原始森林的观点。就在这同一段文字中,斯密提出了我们前面引用过的理论,说“看不见的手”将神奇地消除人类的不平等。我们于是可以又一次得出结论,那就是斯密对于工人福利的关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环境毫不相干。对于斯密来讲,至关重要的是工人们的思想状态,他希望他们可以最终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状态靠拢。

劳动力的社会分工演化得有多快

斯密告诉他的学生们,大公司的专有特权“可以比社会的自然过程更快地带动行业的分化”。这一点可以被当成是被一个勤奋学生记下来的斯密的旁白。我们在《国富论》一书中,当然找不到

类似的文字,因为那将可能意味着斯密向史都华的理论做出了大让步。

在《国富论》中,斯密确实写道,在鼓励之下,某种制造业可能较快地出现。但是他宣称,这种行为减慢了积累的整体过程,因此也阻碍了劳动社会分工的自然进化过程。即使我们承认,单是市场力量就可以改造传统社会,斯密也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不借助原始积累进行的改造速度有多快。但是我们可以推想,既然劳动分工产生于农业以前,那么劳动的社会分工演进速度也是极为缓慢的。

除此之外,斯密暗示了两点:第一点是,当时的社会劳动分工是互利互惠的调整的结果;第二点是,这个过程可以一直上溯到史前时代的社会行为。这样,斯密就提出了一个误导性的推断,让人认为劳动社会分工的产生,是一个没有任何冲突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就只能听他的寓言故事,说什么人们根据自己的特殊技能,分工为猎手和制造弓箭的工匠。

确实,劳动社会分工在前农业社会已经出现了。甚至在植物界和动物界,也有和谐的合作。但是,仅仅将劳动的社会分工作为一个自然历史现象分析,将无法理解它在人类社会中的演进机制。

有一些思维更清晰的思想家,像马克思和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一致同意我们应该寻找奴隶制度下的不同雇佣情况,而不仅仅是做纯粹技术上的分析。人们甚至可以在斯密自己的作品中找到这样的暗示。

的确,市场力量能最终带来更精细的社会劳动分工。自给自足经济的衰退,将为大众消费品创造一个国内市场。但这样一个国内市场开始时是很小的,也很难在一夜之间发展到一定规模。我们怎么能相信,那些想从资本主义发展中获利的人们,对于社会劳动分工的缓慢发展速度会袖手旁观?

重商学派尤其不想等待大型国内市场的自然成熟,他们更想

尽快利用世界上的财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很乐意对自给自足的家庭立刻发起进攻,并以此作为激发出口产品生产的第一步。结果,那些所谓斯密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的路线越来越远。正如马克思提到的:

当时紧跟资本主义发展形势的商人和企业主,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那就是,由封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以及不同国家在工业方面为争夺世界市场的相应斗争,都依赖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并不是由自然方式达到的,而是借助了强制手段。这将造成巨大不同:要么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工业资本。要么是向地主、中小农民、手工业者征收保护性的税收;加速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粗暴方式快速地积累和集中资本,一句话,就是加速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速这种转化过程。这种转化方式的不同,同时在资本家对国民自然生产力的工业剥削之间,也造成了巨大区别。

阿瑟·扬,一位居无定所的农业作家,是唯一一个对史都华表示崇拜的人。他说:“贸易和制造业都在病态而艰难地发展着;一旦人们放弃了对它们的积极鼓励,它们立刻就消亡了。”他的这些说法,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态度。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史都华和斯密的尖锐对立。对于史都华来说,贸易首先是从政府支持奢侈品的出口开始的。逐渐的,国内商业才显示出更大的重要性。斯密则与他不同。斯密将国内商品交换的加速增长,看做国内市场扩大的结果。他将这种倾向视做“自然”过程,而不像史都华那样,把人为计划出来的商业视做原动力。结果,斯密的文章使人觉得,他更乐意等着市场把经济能量从传统活动中撤出,家庭经济将因此逐渐地自行削弱。

斯密相信,农业社会将自然地短期内自己转化成一个城市化的商业社会。事实上,即使是城镇(它们对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是至关重要的),一开始也是人为地开始的,它们享受国家赋予的特权。后来,资本将它的大部分活动转移到像利兹、伯明翰、曼彻斯特这样的地方,在那里,它可以少受传统劳动力规定的束缚。在这些农村地区,工人们不再经过学徒期,而是永远处于低收入的下层。但在北美北部的殖民地中,城镇的确看起来像是按斯密想像的过程发展的。尽管如此,殖民地经验中的大部分,却是和斯密的“和谐经济发展理论”背离的。

斯密说,市场力量足以引发经济的加速增长,这是否只是言不由衷?毕竟,英帝国有许多殖民劲敌,他们会从英国在发展中的任何松懈中获利。罗莎·卢森堡在谈到殖民扩张的转化过程时提到:

如果资本仅仅依赖国内传统制度的缓慢瓦解,这个过程将持续几个世纪。耐心等待贸易分化出最重要的生产方式,这无异于完全放弃这些领域的生产力。

或者,斯密是又一次为他见到的市场社会裹上了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

劳动力分工的自然进化

根据斯密的说法,劳动社会分工的进化,应该仅仅从人类学关于人类自然本性的原则上去理解。他建议,我们应该禁止任何想通过政治行为来干预劳动分工的企图,因为这样的努力是对“天赋自由的明显违背”。因此,这些干预就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不明智的”。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斯密继续总结道:“保证这样的事情(新的劳动社会分工的产生)永远不受强迫和阻挠,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利。”于是斯密也同时批评说,对这种过程的阻挠,会破坏“劳动力在社会中的自然分工和分配”。

1749年,斯密首次说,劳动分工是在乡村自然展开的。他讲道:

将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提升到最高级的繁荣状态,所需的只不过是和平、适宜的赋税和比较公正的司法;其他的就不需要什么,只要靠自然演进就可以了。所有想要阻止这个自然过程,或者想强迫事物改变发展方向,或是竭力想要将社会的发展停滞于某一特定点的政府,都是违背自然的。为了支持自己,他们会不得不变得冷酷、残忍而且专制。

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又一次重申了他的主张,即“每个个体改善自己状况的自然努力”,足以保证经济的发展。根据斯密的观点,“这个原则是如此有力,以至于它不需要任何辅助,自己就足以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斯密有关社会有序发展的理论,排除了两种可能:其一,原始积累可能在经济发展中起过作用;其二,大众在经济上的艰难状况,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

斯密以理论的形式表明,劳动社会分工也可以理解成工场劳动在个人间的分工。由于工场里的劳动分工的优点,结果将“造成不同行业、活动之间的彼此分离”。这个类比构成了斯密主论点的基础:既然在工场中,细致的劳动分工是经济、节约的,那么人们当然这样安排他们的活动,以产生更进一步的社会劳动分工。

斯密的劳动分工自然进化论,对他的著作具有重要意义。他的老师哈奇森曾经不放过任何一个反对曼德维尔的机会。在斯密早期的一本著作中,他继承了老师的传统,严厉地批评曼德维尔和

卢梭,因为他们认为“人性中没有哪种强大的本能,能让人一定组成社会”。

斯密固执地想证明,在由独立家庭组成的一个社区中,资本主义将会自然地演进。他假想出来的劳动社会分工史,部分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承认,小商品生产可能从农业中演化出来。农民在农闲时,可以自己做鞋匠或纺织工的工作。斯密的工场劳动分工的例子,乍听起来似乎很可信,但是它在一个方面上完全失败了:它永远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工场——在这些工场里,雇主拥有生产资料,并雇佣毫无资本的工人。

史都华宣扬采用非经济手段,来创造“一个自由的完美社会,该社会是一个广泛的默认的契约,规定所有签约的人都可以享受相互的、平衡的服务”。与他不同,斯密需要指明这样一个劳动社会分工是怎么从市场关系中发展进化来的。不幸的是,在这方面斯密悲惨地失败了。

“资料”和劳动的社会分工

斯密并不总是从“不同行业、活动的区分”这个角度来分析劳动社会分工。他又发现了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原则,来解释这个现象。他的这种分析,以“资料”(stock)这个概念为中心。在描述这第二种分析时,斯密自负地宣称:“资料的积累,在本质上一定是在劳动分工之前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只是专门从事某一种职业了。现在,资料的事先积累,成了一个前提。

表面上,“资料”一定在劳动力分工之前存在这一论断,似乎纯粹是胡扯。斯密自己说道:“在制造出一些资料之前,不可能有劳动分工。在劳动分工之前,资料积累也会很少。”难道要我们相信,那些不从事市场交易的人们,是用手指甲耕地,用牙齿砍树的吗?

正如朗费尔德所说的：“想像一下一群聪明又勤奋的人们，被置于一个富饶的国家中……完全没有资本。他们除了用手、牙齿和指甲弄出来到工具外，没有任何工具，他们的生活将多么悲惨。”当然，斯密的意思不可能是说人们在社会分工前没有工具。他的“资料”(stock)特指的是“资本”(capital)，而不是工具或设备的总称。更具体一点，斯密的“资料”指的是一群人拥有的生产资料，他们雇别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

但斯密在这方面并不能一以贯之。他在教课时教他的学生们：“在商业中雇工的人数，取决于国家资料的储备……许多物品一时难有所出。亚麻的种植者、纺织者、编织者，都不会马上有回报。”既然人们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生产亚麻并纺织麻布，我们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资料”怎么可以工作？但根据《国富论》，只有“资料”增加了，产量才可增加。

斯密有关“资料”本质的含糊解释，只是一个孤立的失误吗？他的朋友杜尔哥是一个公认的实际学者，他在其著作《论财富的形成与分配》(*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中，使用了几几乎与斯密相同的分析模式。

在头两章中，杜尔哥提到土地的多样性将如何导致以货易货，但不是导致雇佣劳动。雇工制是从商品的自然历史中发展出来的，他在这点上与斯密十分相似。小麦必须从麦粒变成面粉，最后变成面包；人们养牛，然后再将它们的皮制成皮鞋。“如果让一个在自己的土地上同时生产这些作物来满足自己需要的人，同时去完成以上的所有中间程序，他毫无疑问将失败”。结果，人人都从一个详细的劳动分工中受益。在下一段中，杜尔哥却开始向我们介绍一个新的个人，他只是个“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勤奋……他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给别人，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杜尔哥像斯密一样，没有去解释，为什么这些工人从土地的平等持有者，愿意变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这就是政治经济学

的本质！

彼得·格罗纳温根提出斯密和杜尔哥之间的相似，是一个偶然现象。雅各·维纳则建议说，这可能不是偶然的。不论怎么说，斯密比杜尔哥更进了一步。

总之，斯密的先有“资本”的论断，引发了很多问题。首先，我们可能反问道，那么资本的源头在哪里？从天上掉下来吗？为什么生产资料突然成了资本？如果它并非来自原始积累，那么为什么一些人拥有资本，另一些人却一无所有？不幸的是，斯密从未提出过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

资本的起源

对斯密来说，资本的出现，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事件，它彻底改变了社会本质。他讲道：“一旦资本在某些人手中积累，他们中一些人肯定会拿它来雇人劳动。”

我们可以问，为什么那些人会乐意受雇于人？斯密回答道：“大部分工人需要一个主人，来给他们提供原材料、工资和生活手段。”因为当时很多工人拥有自己的工具，所以斯密明智地排除了工具这个因素。

斯密并未解释，他的新原则是如何突然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很明显，资本的引入改变了世界。斯密并未把社会描绘成工人们自愿择业的一个社会。斯密在描述他的受资本控制的社会时，甚至把“牛马劳动力”和“生产劳动力”相提并论。

我们承认，将劳动力和牛马放在一起并无新意。米拉波曾提过这一点。而且约翰·洛克曾写道：“因此，我的马吃过的草、我的仆人们剪过的草坪和我挖过的矿石，就成了我的财产。”但是斯密比他们走得更远。

事实上,斯密认为资本极为重要,以至于我们听他说:“资本开发了这块土地,资本雇佣了劳动力。”很难理解,像斯密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怎么会有这么可笑的推理!

无怪乎皮尔西·拉文斯通吃惊地评论道:

“资本”这个词足以解释一切。如果国家人口数量增加,那是资本的结果。如果人们致力于开垦土地,那是资本借给他们土地……如果他们建造城市、鼓励制造业,那仍是资本带来的后果……创造一切神奇事物的资本,是从哪里来的?亚当并没有给他的子孙留下资本……资本,像人类的所有产品一样,应该有个开端。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资本原本是原始积累的结果,竟然出现在原始积累行为之前,是原始积累的原因,这怎么可能?

斯密在《国富论》一书关于货币的部分中,给资本的起源问题,又添了一个令人糊涂的因素。在这里,他开始是把货币作为一种记账单位,来讨论货币的历史。他似乎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在经过了对于古代货币的大量逸事的长篇大论之后,他大胆地承诺说,他要讨论一下决定交换价值的那些规则。然后,突然,他转而在下一段中讨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但是,接下来是对他的一个观点的令人失望的介绍——他肤浅地把价值当做工资、利润和租金的总和。他从未能证明,他何以从狄俄墨得斯^①的铠甲问题,一下子跳到劳动力的工资这个问题上。

最后,斯密关于资本起源的糊涂解释,似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它使马克思开始形成他自己叫做原始积累的理论。

^① 狄俄墨得斯(Dioneds):古希腊英雄。

社会劳动分工的两个原则

事实上,斯密提出了有关劳动社会分工的两个原则。首先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分析。在这个理论中,斯密认为,劳动社会分工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自愿选择专业化的职业。第二点劳动社会分工原则是跟第一点自相矛盾的。它将社会按阶级划分,其中一个阶级被定义为资本的所有者。每个原则都有自己相应的人类学理论,而且各有各的用处。

劳动力的社会分工形成不同职业,这个理论是一个很有技巧的解释。它可以通过不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互利互惠性质,来解释市场的和谐。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则可能承认矛盾。比如,以职业为基础的分析使斯密发现,屠夫、啤酒商和面包师追求个人利益,却造成了好的社会结果。相反,斯密的阶级分析理论使他认为,资本的利益总的来说和社会的普遍兴趣“不是上述的那种联系”。

在阶级分析理论中,我们再也不能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解释成一种进行交换、流通的本性。同样,第二个原则需要一种不同的价值理论来支持。正如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在他对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论资本的利润”一章的评论中指出的:

如果将劳动力视做商品,而将劳动力的产品——资本——视做另外一种商品,那么,一旦这两种商品的价值由同样的劳动量来规定的话,这表明一定量的资本,将在各种情况下可以交换同样劳动量产生的资本;资本——所谓的先前的劳动——将总能交换现在的同样数量的劳动。

总的来说,斯密以阶级为基础的理论,比他的职业合作理论更加一

致。而且,斯密把他的前一种理论,当做可以在实际中操作的一个体系。而对第二种理论,他把它置于他著名的《国富论》的意识形态部分中。不管怎么说,对社会进行职业分析,不同于对社会进行阶级分析——虽然斯密并没有将它解释得非常清楚,但这仍是一个巨大进步。

资本和向雇佣劳动的转变

斯宾塞曾经写道:“为什么自由人要给自己套上枷锁?既然我们都是生而自由的,让我们蔑视所有卑怯的奴役与屈从吧。”如果斯密敢正视斯宾塞的问题,那么他可能会写一本更伟大的书,但这本书会和史都华的作品遭受一样的命运。所幸斯密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把重点放在“交换”上,从而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交换”本身无法解释由资本的引入而造成的经济体系的本质改变。但是,斯密不能进一步正视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他只能走到物物交换——甚至简单商品生产——那一步。但是,到雇佣劳动的飞跃,就远在他的理解能力之外了。

斯密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表明他理解下面这个转变——那就是,从人们可以在没有资本的条件下生活的“粗陋社会”,到另外一个社会,在这后来的社会中,人们发现自己十分需要那些特殊的叫做资本家的人,资本家因为自己有“资本”,所以要求取得回报。他本可以说,人口的增长以及农场的分化、再分化,使一部分人变得依赖于雇佣劳动。很多历史学家们甚至会对这样一个解释感到满意。但这样的推动力过于缓慢了,不可能导致当时迅速发生的经济变化。况且,斯密的实验室——苏格兰高地,当时的情况却是人口迅速减少。

不管怎么说,斯密从来没有正面讨论过,当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让位于雇佣劳动的时候,生产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之所以

淡化这个过渡中的细节,可能是因为他觉得,雇佣劳动制度是先于发展过程而出现的。

确实,斯密之所以经常陷入混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弄清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在小商品生产中,人们自愿地生产,是为了到市场上去出售而获得利润。而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雇佣工人来为工资工作。斯密不能正确区分这两种现象,所以他的读者总是读到他关于劳动社会分工的自相矛盾的论述。比如,我们刚刚说过,在解释小商品生产的进化时,他说劳动分工是从没有资本的粗陋状态中自然发展而来的。但是,在另外一个理论中,资本成了主要的动力。

我们到处都找不到斯密对以下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什么原因使生活在苏格兰高地的人们,突然想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来接受雇佣劳动。即使这样的刺激确实存在,我们怎么知道这可以很快创造出一支劳动力队伍,能够让那些雇主们满意呢?

简短的说,斯密关于劳动社会分工的自然进化理论,完全不能成立。斯密没有解释资本的来源,而是要让我们相信,资本是凭空出现的,并要求获取利润。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些人是怎么发现自己受雇于别人的?在这一点上,斯密始终保持沉默。实际上,在斯密时代的苏格兰,剧烈的原始积累已经使很多人流离失所。这些人除了找一份新职业——而且经常是在遥远的他乡——就别无选择。

评价斯密

斯密对于“资本先产生”的断言,与我们对原始积累的研究是相关的。前文中提到过,马克思作品的英文翻译者,将马克思原来对斯密的德文翻译,重新译回了“原始积累”。在那段文字中,斯密

无意解释什么是原始积累。相反,他是在强调劳动分工在创造经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虽然严格地说,斯密在这里指的是劳动的社会分工。

无怪乎马克思觉得有必要批评斯密,说他在“揭示劳动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上”,不如以前的作家,比如威廉·配第和《东印度贸易的优势》(*Advantages of the East - India Trade*)一书的佚名作者。

在所有其后的其他评论家中,只有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似乎发现了斯密的意图。韦克菲尔德注意到,斯密“看起来似乎不是在构想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历史”。韦克菲尔德正确地谴责斯密,说他把劳动分工和劳动的社会分工混为一谈。他甚至指出,斯密并不完全了解这个题目。

斯密其实并不像韦克菲尔德指责的那样,不了解他的主题。事实上,有几次斯密甚至似乎已经——也许是无意的——把握住剩余价值的概念了。不幸的是,在这些情况下,他总是在一个将资本神圣化的原始仪式中,转开了他刺人的目光。

公平地说,斯密并不是唯一一个把小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混为一谈的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一个主要作家曾经成功地将这两种生产形式区分开。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评论家们,也大都忽略了“向雇佣劳动的转化”这个挑战性问题。也许最接近于发现它的,就是冯·屠能提出的问题:“工人是怎样从资本的主人,也是创造者,变成它的奴隶的?”

瑞典的一本小册子的匿名作者,也是一个有现实主义眼光的人,也曾写道:“自由竞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所有小业主都将被毁灭,因为所有人都想做主人,没人想做仆人,所有服从、秩序都将消失。”遗憾的是,像这样对原始积累本质的真知灼见,十分少见。正像沃尔特·白哲特^①批评的那样:“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发现,英

^① 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 1826 - 1877):英国经济学家。

国现在的主要资本发展的主要方式,与国家最初出现的方式,有一个重要区别。”

此外,白哲特还注意到:

现代商业的主要部分,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开展的,它的起点和终点并不相同。但是基本点是一样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者——产品是否应该被生产,主要由此人的主观意见来决定——只有他满意,生产才会继续下去。但是,这个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者,如今却不是一个劳动者,而是一个资本家。

换句话说,既然斯密努力想写出雇佣劳动的历史,那么他应该解释一下,是什么推动那些自给自足的家庭,愿意用雇佣劳动换取工资?但他却从来都没有解释过。

不管他有多少缺点,至少斯密指出了对社会的两种分析方法:阶级分析理论和职业分析理论。即使如此,斯密的首要目的,是创造出一种能用和谐的寓言来掩盖阶级斗争的理论。结果,《国富论》就变成了介绍一个奇怪世界的史诗,在那里,“物骑在鞍上,驱使着人”(爱默生语)。

第十章

亚当·斯密与殖民地的意识形态作用

这里与欧洲古国之间的环境差异,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事实上的差别,能够供我们思考一些政治经济学问题,有时会让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

——托马斯·杰斐逊,1804年2月1日信

斯密的北美实验室

如我们所见,亚当·斯密宣扬高工资制,是有其实践上的原因的——他希望高报酬可以使工人转而信仰小资产阶级价值观。他呼吁实行高工资制,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他要证明资本家和劳工的利益并无不同。在这一理论证明的过程中,斯密大量使用了他对北美殖民地劳工市场的研究结果作为论据。那里的情况看来非常理想地支持了他的论证。

从斯密的角度来看,殖民地的经验表明,高工资是如何促进资本发展繁荣的。如果斯密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就可以解决他的理论中的重大矛盾。尤其是他可以表明,市场经济社会如何可以不需要原始积累之类的残酷手段,而实现和谐的发展。

斯密宣称,北美殖民地的利润“通常很高”。他的结论是,那里的人们由于比英国人享有更多的天然自由而变得富裕。在殖民地,高工资和高利润被认为是共存的。并且他认为,原因是那里没

有制约英国经济发展的封建束缚。斯密说：“每个殖民者都拥有种不完的土地。他不用付租金，赋税也很少。没有地主来分享他的劳动成果，统治者所收取的份额通常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尽管缺乏资料，斯密还是以毫不动摇的信念来描写殖民地。他批评英国的工资系统同北美相比分配不够公平，比如，技术工人在英国和北美的工资水平都是基本相等的。本着这种精神，他宣称：“大量优良廉价的土地，是造成繁荣局面的强有力原因……再糟糕的政府，也几乎无法遏止这种过程的效率。”

斯密的殖民地发展理论

亚当·斯密要想证明殖民地经验为英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仅仅证明高工资在这样一片遥远的土地上促进了繁荣，这是不够的。如果殖民地只是一片与英国情况大不相同的农业的死水，那么它的成功充其量只能算做一个奇迹。

为了让读者相信殖民地的经验对英国是有意义的，斯密必须说明殖民地将怎样发展出一个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这方面，斯密遇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证明殖民地有可能向工业发展，这将进一步支持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但是事实上，他希望殖民地保持在一种落后的状态中，专门生产原材料，以供英国加工成制成品。按照斯密的想法，到那时英国将向殖民地出口这些制成品。

这里我们遇到了斯密理论中的另一个矛盾：尽管他认为英国应该把农业生产主要交给殖民地来进行，但他保留着一种强烈的重农主义倾向，使他看好农业。他说，农业是“所有技艺中对社会最有好处的”。他还坚持说，农业“大大增加了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力每年创造的价值，以及居民的实际财富和收益”。他又总结说：“迄今为止，所有使用资本的方式之中，农业是对社会最为有利的。”

斯密信誓旦旦地宣扬农业的优势,以至于我们可能以为他会支持保护英国的农业生产,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英国农业保护的坚定拥护者。相反,他预计:“即使自由进口外国玉米,也不会对英国农民的利益造成显著影响。”他觉得英国太发达了,不应该将如此巨大的精力投入农业。

作为一个普遍准则,斯密认为资本有限的国家总是应该专门发展农业。他说:

农业是适合所有新殖民地的行业,价格低廉的土地使其比别的行业更加有利可图……在新的殖民地,农业要么将劳动力从其他行业吸引过来,要么留住他们,不使他们从事其他行业。剩下的进行必需工业品生产的劳动力少之又少,生产奢侈品的几乎没有。人们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中的大多数来说,购买外国货比自己生产要来得便宜。

斯密断言,这样的专门从事农业,对殖民地是有利的。他甚至宣称说,由于殖民地的“财富是完全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它们将极为快速地发展繁荣。

斯密对殖民地前景的乐观预言,似乎正与他自己的劳动分工理论相矛盾。不管怎样,《国富论》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劳动生产力上的巨大进步……看来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几页后,他又补充道:“农业的本质特征……不像制造业那样……允许如此多的细致分工。”

但是,斯密又提出,专注于农业,造成了殖民地经济的繁荣,因为“用于农业的资本……调动的劳力,不仅多于等量资本在制造业中所能雇佣的生产性劳力,并且与它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力数量是成比例的”。他推理说:“土地如此便宜,相应的,劳动力在他们中间如此昂贵,以至于他们能以比自己生产的产品更低的价格,从他

们的宗主国进口几乎所有的加工品和高级制成品。”斯密认为，殖民者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宣称：

如果社会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本来耕种所有土地，并且以最完善的方式加工全部的初级产品，那么，为了全部社会资源能用于更有用的目的，将这些初级产品出口给外国资本来加工，将会带来更大的利益。

按照斯密的逻辑，在资本稀缺的地方，社会应该专门从事农业，因为农业比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要低，单位资本用于农业，要比用于工业能调动更多的劳动力。但是，单个的农业劳动力要比工业劳动力劳动效率低，因为农业的劳动分工程度低。尽管如此，发展农业仍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能雇佣更多的劳动力。

不幸的是，要让殖民地的经验支持斯密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必须表明殖民地的自然发展路线将如何向英国的经济形式靠拢。他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仅限于他的四阶段理论，其中断言说农业经济将自然地进化为商业经济。

如果殖民地将要工业化，那么英国将从何处获得它的原材料呢？难道斯密期望殖民地向商业经济的转变，会使英国恢复一部分过去的农业经济吗？

斯密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在阅读斯密的过程中，人们有时几乎要相信，殖民者比不得不承担贸易负担的英国人，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既然有英国人来从事这样资本密集的行业，美国人就可以自由地专门从事农业了。斯密认为：

如果美国人靠联合或其他暴力手段阻止进口欧洲工业品，从而让他们的国人获得垄断……(并且)将相当一部分资本用于这一行业，他们将减缓而不是加速他们的年生产总值的增长。

在其他地方，斯密又承认说在这种安排下，英国将会获得繁荣，因为“少量的工业产品能够购买大量的初级产品……而且……一个没有贸易和工业的国家，通常将被迫用大量初级产品从其他国家购买少量的工业产品”。斯密将这一思想，与外国市场能给大规模的工业经济发展带来好处的观点联系起来，却没有想到它与詹姆斯·史都华爵士或约书亚·塔克学说的关系。

这样的规模经济是否能引发一个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经济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巩固？对于这样的可能性，斯密似乎视而不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姿态是令人奇怪的。但是，他的密友大卫·休谟与约书亚·塔克进行了激烈争辩。塔克认为，贸易会使英国在工业上保持一种不可逾越的领先地位。休谟回应说，低工资会使不发达的经济赶上发达的经济。

也许仅仅是因为斯密正在试图论证殖民地将会出现高工资的现象，所以他对此一言不发。米歇尔·哈德森提出了另一种可能。他说，史都华和塔克都看到，如果比较落后的经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市场的话，它们将永远处于一种落后状态。哈德森指控斯密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尽量避开了那些预见到世界经济两极分化的对手们的思想。

此外，斯密本来还应该在苏格兰的经验中获得教益。对当地工业的禁令，曾经制约了爱尔兰的发展。虽然没有那样的类似法令，但苏格兰也保持着原材料供应者的身份。笛福首先批评苏格兰仅仅充当了一个原材料供应者。之后的50多年，詹姆斯·安德森感到有必要重提这一问题。

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以至于笛福和安德森列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进口清单。据说,除了一些纺织品以外,苏格兰不向英格兰出口任何制成品。而它进口的很多产品都是制成品。安德森抱怨说苏格兰的依赖性比美国更为极端:“同样数量的北美居民,除了衣物和硬件设施之外,几乎不从英国进口任何东西,他们不会比苏格兰人消费更多的英国制成品。”

和笛福与安德森不同的是,斯密没有看到苏格兰经济的依赖性。但是在斯密的时代,几乎人人都认为苏格兰需要一定的治理才能发展。斯密自己的赞助人,凯姆斯勋爵,就是“苏格兰渔业、制造业和发展信托委员会”的领导人物之一,致力于“将苏格兰高地从古老落后状态中”解救出来。

罗伯特·华莱士曾提议在苏格兰沿海建设渔村,从而开发渔业资源。早些时候,史都华也曾支持这一计划。看来,反对该提议的似乎只有斯密和边沁。至少好学的雅各·维纳没有发现其他的反对意见。

斯密对他在苏格兰所见到的原始状况,没有找到任何结构性的原因。他把苏格兰高地的落后归因于缺乏劳动分工。他抱怨说,高地的农民还没有适应现代的劳动分工。相反,农民们仍然兼做“屠夫、面包师和酿酒人”,结果是高地人还不依赖于购买的商品。但是斯密对高地的未来仍有信心。他预言说,只要修好道路就足以使该地区现代化。不过斯密并不是说苏格兰高地有一天会成为和英格兰比肩的制造业中心。实际上他说的是,这一地区将永远作为依附于英格兰的原材料产地而存在。

考虑到斯密看到苏格兰高地和殖民地的依赖性之后所采取的默许态度,我们也就可以把教导经济管理者的斯密,当做第一个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理论家,尽管塔克也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获得这一殊荣。尽管如此,在回顾本章我们对斯密的分析时,我们发现斯密多少有些方面是前后一致的。他认为一个经济最好的发展方式,是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实现专业化,并最终将走向繁荣。

不幸的是,斯密的一切都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首先,斯密与史都华进行了辩论。史都华认为外国贸易是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反,斯密认为国内市场才是发展的关键。按照他这种逻辑,殖民地应该以自给自足为目标才对。

另外,如果殖民地都遵循斯密的建议,他们的军事实力将永远是有限的,因为斯密注意到,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来支付军事开支总是很不划算的。这样,殖民地将永远是英国事实上的附庸。

关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学

殖民地的许多农民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和斯密在苏格兰高地所见到的情况有些相似。但是斯密坚持说,即使没有政府干预,资本主义也完全可以在农村落后的条件下,靠当地的投资发展起来。

斯密对农业社会的进化所给出的解释是令人迷惑的。他提出了他的四阶段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类社会将自然地由狩猎和采集业社会,进化到畜牧业社会,再进化到农业社会,最后成为商业社会,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种进化是不可避免的。斯密似乎觉察到,这种发展是有代价的。例如,斯密在讨论殖民地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问题之前,就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绘乡村生活的“美”、“宁静”和“魅力”。

尽管注意到“人们……似乎……对原始的行业保持着一种喜好”,斯密在下一段中突然提出,包括工业在内的社会分工,是高效农业的必要条件。人们几乎被误导去相信,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英国人将要放弃他们的田园式生活,从而让幸运的殖民者们可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斯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解释,人们为什么要自愿放弃农业生活。相反,他根本没有谈发展经济的困难性。他

提出,只要修路就可以促成苏格兰高地的经济发展,而在此时,他提出的建议甚至比这还少。

在其他地方,斯密又认识到农业根本就不可能获得高利润,而低利润自然会阻碍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斯密自己写道:

我们只须简单的观察而不必精确地计算,就可以得到明显的、令人满意的结果,来证明遍及欧洲各地的城市中的行业,要比农村中的行业更加有利可图。在欧洲每个国家我们都发现,特别适合城市的行业——商业和制造业创造的财富,比特别适合农村的行业——靠改进和耕种土地来获得初级产品的行业——创造的财富要多得多。因此,工业一定有更高的回报,工人的工资和股票利润也一定比农业要高。

如果在城市中进行的商业和工业活动利润最高,那么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经济,就应该有能力以比农业社会更快地发展。这种现象将能够解释斯密在苏格兰高地看到的落后现象。

此外,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也表明,非农业的发展即使对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农业生产,也能起到促进作用。斯密自己从没注意到这一因素,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读到:“没有一些技工的帮助,耕种土地确实将遇到很大困难,并且常常会被干扰和打断……城乡居民是相互服务的。”那么结果是,即使是农业,也是在发达的经济中发展较快。

斯密也明白,农业不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

看来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农业的利润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其他行业更高。但是各地的社会活动家们近几年来却拿出了惊人的耕种和改良土地所获收益的统计数字,结果贻笑大方。我们不需要具体讨论某一个统计,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观察,

就可以说明他们的结果一定是错的。我们每天见到的最精巧的工业制品,通常只需要很少的资本,有时甚至不需要什么资本。用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资本,在农业中创造如此的财富的例子,在本世纪的欧洲只怕还未曾有过。而欧洲所有大国都有很多良好的土地未曾开垦过,即使开垦的土地大部分也远未达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托克维尔在美国逗留期间,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

在所有的有用技艺中,农业也许是民主国家里发展最慢的行业……种地获得的收益几乎是固定的……但也是缓慢的。从事农业只能靠艰苦努力一点点富裕起来。农业只是对那些财富大量过剩的富人或是只想生活下去的穷人才是合适的……巨大的财富……差不多都是来自商业。

在19世纪遥远的日本,观察家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而且,即使农业社会中真的存在高利润,那么也是在商业投机中——而不是农业本身当中——产生的。如果农业社会想要摆脱落后状态,那些在农业之外获利的人也许必须在非农行业中投资,最终靠这些行业使农业现代化。不过在落后的经济中靠同农民做生意获利的人,自己很少有在农业上投资的。

最后,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农业的发展,倾向于将资本生产限制在奢侈品市场。英国发展出雄厚的工业基础的原因,恰恰是它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非常成功。由于有相当多的人不得不依靠市场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英国工业的国内市场比别的国家大得多。这一优势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简而言之,农业经济要想成功,不能走斯密建议的道路,必须另辟蹊径。

斯密的重商主义

事实上,殖民地能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不是自由劳动力和自发的商业交换的结果。相反,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非自由劳动力与欧洲大陆原始积累所获得的大量自然资源的优势相结合。斯密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非自由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作用。

斯密也没有认识到,英国政府采取的禁止殖民地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和限制进口的措施,对发展的阻碍作用。他却坚持认为,殖民地的发展证明自由经济是发展的最佳途径。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斯密著作中的另一个重大矛盾:尽管现代读者认为他是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但作为经济管理理论家,斯密并不是人们想像的教条式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他警告说:“自由贸易只能分阶段地缓慢恢复。”

在金融方面,斯密也看到了政府协调的必要性。他曾号召禁止发行小面额钞票。此外,斯密还接受保护高利贷的法律,因此受到过边沁的强烈指责。

斯密还支持使用各种方式,促进英国工业发展。他认识到,有些关税可以平衡对国内生产者所征的税,但他仍然提倡对进口原材料免收关税,以促进工业的发展。并且,斯密常常支持限制原材料出口。举例来说,他曾批评亚麻线的出口关税过低,理由是在生产帆布的过程中,纺织工人的工作占到了4/5。他本应看到,纺织业的发展可以帮助这些人去从事农业。但恰恰相反,他引用的是商业上创造就业机会的说法。他还用类似的推理,对羊毛出口关税做出了建议。另外,斯密还提倡“公众(应该)对在本行业技艺超群的人和表现突出的制造商给予奖励”。

事实上,斯密实际开出的管理药方,与他想像的意识形态很不

一致。斯密像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宣称：“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目标，都是增加该国的财富和权力。”无怪乎斯密关于财富和权力的这个断言，就出现在《国富论》提倡殖民地发展农业的那一章中。

把斯密的观点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它们建议的模式，与他支持建立一种由殖民地为宗主国提供原材料来加工成制成品的这一中心思想是一致的。看到了这一点，斯密的殖民地发展方案就不过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新式重商主义了。

总而言之，斯密所采取的自由放任政策是非常实际的。尽管他对财富和积累的心理进行过哲学沉思，他仍是经济学政策化的倡导者。把斯密关于国际贸易和发展的著作考虑在内，他的《国富论》表现的实际是对富国的兴趣。在这一方面，殖民官 T. 佩罗内·汤普森在动身去非洲之前写信给他的未婚妻说：“我即将开始今后学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历程，我想塞拉利昂会适合按照这种设计发展。”确实如此！

斯密的和谐经济发展理论

我们开始的时候注意到，亚当·斯密对殖民地的分析有两个目的。他的实用性目的，是使殖民地保持英国的原材料供应者的地位。在理论层面上，他试图证明殖民地的高工资与高利润共存的情况，能够证实资本家和劳工的利益是一致的。

只有一个难题妨碍了亚当·斯密关于殖民地雇佣劳动力的和谐理论。斯密假定殖民地的利润很高，但他也曾观察到：“如果不雇佣他人的劳力来开荒和耕种土地，获得高额利润是不可能的。”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斯密不肯面对的核心难题面前，这就是：农场主是从哪里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帮助的？为什么当人们可以轻易地自己开垦，并享受全部劳动成果时，却愿意作为一个农业工人为雇主创造利润？

当然,斯密从未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如果要回答的话,他就不得不面对原始积累这一残酷现实。相反地,他只是断言,在看到劳动力资源稀少的情况下,雇主“因此不再在工资上讨价还价,而愿意用任何价格雇佣工人”。此外,由于劳动力稀缺,“两个较高等级在利益驱使下,不得不更加慷慨和人道地对待较低等级”。

斯密所指的雇主们的“慷慨和人道”,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具体的信息。乍看起来它可能支持斯密关于阶级和谐的论点。但是读过最近发现的斯密的《法学演讲录》的人们,也看到他说“美洲大陆的殖民地的奴隶得到了非常人道的待遇,对他们的使用十分温和”,表明他所说的人道概念是非常宽松的。

根据斯密的理论,只有当奴隶主的财富增加到拥有产糖岛屿的糖业巨头们的程度,奴隶制才会退化成一种野蛮原始的关系。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就可以用斯密对殖民地情况的理解,得出一个结论:奴隶和奴隶主的利益本质上也是一致的。

斯密的确注意到,工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土地。在某一点上,他甚至承认北美的条件与雇佣劳动是不相容的:

在我们的北美殖民地,人们仍然可以轻易地获得未开垦的土地,所有城市都没有发展销往外地的制造业。当一个技工拥有的钱数,超过了独立开办销往邻国的生意所必须的钱时,他不会尝试创办销往外地的制造业,而是把钱用在购买和改良未开垦的土地上。这样,他就从一个技工变成了一个农场主。这个国家为技工所提供的高工资和轻松的生存方式,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去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工作。他感到,技工是顾客的仆人……而一个农场主……是一个真正的主人,在世界上是独立的。

殖民地的雇主们当然并不欣赏这种“慷慨和人道”的环境。加伯利尔·托马斯在发自宾夕法尼亚的信中写道：

这里各种仆人的工资都比别处高得多的主要原因是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除此之外如果不给他们高薪的刺激，他们很快就会自立门户，因为食物很便宜，获得土地代价也很小，跟在英格兰卖地比起来就和免费的差不多了。

确实，高工资在世界的那一隅，很长时间内都是雇主们哀叹的一个因素。

工人们不仅工资高，而且他们还干不长。雇主给他们的工资越高，他们就越快地积攒到足够的资本，开办自己的农场。即使在英国，斯密也说到：“在富足的年份里，仆人们常常离开他们的主人，自己做生意谋生活。”在北美殖民地，这种情况要严重得多。

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已经发达得多的时候，一个一文不名的工人也只要在农场工作两三年，就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本，来购买土地和必需的设备自己开农场，尽管克莱伦斯·丹霍夫估计的时间要比这长一些。

在斯密的时代，殖民地的雇佣劳动与其说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如说是少数的例外，大部分劳动力都是非自由的，要么是奴隶，要么是契约仆婢。否则，如果那些拥有自由的人在农场劳动较短时间后，就可以自己开农场，那么我们就遇到了家庭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现象，和斯密要解释的情况完全相反。最后，有些不管时间长短都不愿当雇工的人，还可以靠狩猎为生。

简单地说，斯密没有考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自愿接受雇佣这一问题。所以，当然他就无法成功地用殖民地的经验，解决他关于雇佣劳动的理论矛盾，因为殖民地的雇佣劳动只是少数例外，而不是普遍规则。他对殖民地经济的分析，反而更适合讨论自给自足

或者小商品生产问题,而不是雇佣劳动。

斯密学说的反响

美洲人对斯密经济学的态度 斯密一次又一次地把北部殖民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搬出来,作为仍然是部分贸易化的英国经济的榜样。我们会以为,既然斯密意在褒扬殖民地的情况,那里的人民应该欢迎他的著作才是。

实际上,斯密的许多看法在《国富论》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已经被他的一个著名的同名者约翰·斯密船长表述过了。这前一位斯密曾经这样描写新英格兰殖民地:

这里没有残酷的地主向我们索要高额地租……这里每个人短时间内就可以拥有和主宰自己的劳动,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即使他一无所有,他也可以谋得生计,并靠勤劳迅速致富。

然而,殖民者们从未接受亚当·斯密的观点。事实上,尽管史都华在英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著作在北美却要比斯密的更受欢迎。阿瑟·史莱辛格在形容斯密著作的影响时写道:“尽管人们读过并且欣赏他的书,但并没有立刻被说服。”在经济思想上做出过里程碑式的研究,在美国无人能及的约瑟夫·多弗曼总结说:“似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詹姆斯·史都华爵士。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史都华的著作一起被引用,但引用者总是坚持重商主义的。”《国富论》1789年才在美国出版,比史都华的书晚8年,这也许也能说明一点问题。

我觉得,史都华之所以在北美受到欢迎,是因为非市场经济活动在殖民地依然重要。一般来说,史都华的书在资本尚未成熟的地方都受到了欢迎。爱尔兰、法国和德国的出版情况都很好。类

似地,英国的情况解释了斯密最终在英国受到欢迎的原因,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处于上升阶段,家庭经济对资本主义来说已经不再是竞争对手,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斯密有效地证明了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道路的合理性。

必须承认的是,斯密如果不把神职人员划入非生产性劳力的话,他在北美就会有更大的影响。教会在殖民地开办各级学校,斯密对神职人员地位的评价,当然使学校管理者们心里不快。但是,这些学校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们的经济学教学与实际相脱节是出了名的。

1821年翻译的让-巴普斯特·萨依的《论社会生活对财富生产的影响》一书,帮助斯密最终赢得了学术上的认可。这本第一次有意撰写的经济理论教材,没有提到斯密任何有侵犯性的段落。更重要的是,实施得法的原始积累,使美国东海岸与英国的情况变得更加相似。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①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口头反对者,他曾在1827年宾夕法尼亚制造业促进会为他举行的晚宴上表示,他很遗憾发现萨依的书“学生们人手一册”。我们应该注意,尽管萨依在很多地方都沿用了斯密的思想,但他自认为超越了斯密。萨依对他的读者们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本公认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本……内容详尽、安排合理、各部分相互支持,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优先学习的书。”

政治领导人对斯密经济学的解读

殖民地的管理者们看来对斯密的那些抽象理论可没有什么好

^①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 - 1846): 德裔美籍经济学家, 倡导保护关税, 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感,因为这对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几乎毫无用处。那里的事实毕竟要比斯密船长或亚当·斯密所写的复杂得多。弗吉尼亚的殖民官波纳尔曾按这一意思,对《国富论》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批评。

波纳尔早在马克思和傅立叶之前,就已经明白,经济学的目的是分析“那些运动的法则……它们是个人的劳动力的源泉和指导者;它们形成了创造了人类社会的需求和供给的交流互惠行为”。他与史都华的理论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波纳尔并没有表示读过史都华的著作。正如上面说过的那样,波纳尔批评了斯密理论对于他玄思得来的人类学结果的依赖。

波纳尔还认识到了社会劳动分工和“物品分工”——财产分工——的关系。最后,他还强调,应该用政府管理的方法加速市场形成和资本积累。不管怎么说,波纳尔是个执政者,所以可能本能地更认同史都华,而不是斯密。

当然,波纳尔是英国——那个意在从殖民地的商业政策中获利的国家——的代表。那么,那些反对英国商业暴利的革命的支持者们,持的是什么态度呢?他们会不会更可能是斯密的信徒呢?

华伦·纳特甚至称斯密是人文学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这一提法是有问题的。杰斐逊称赞《国富论》是“现存最好的书”,但是到1817年,他又感到萨依的书更好。詹姆斯·麦迪逊向杰斐逊建议,国会应该购买史都华和斯密的书。约翰·亚当斯认为“詹姆斯·史都华爵士和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中……包含了科学的精髓”。

我们必须谨慎地看待上面引用的关于斯密的影响的评价。亚当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毕竟不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在他推荐了史都华和斯密著作的同一封信中,他承认自己看不懂重农学派的理论。杰斐逊也曾预言,李嘉图的“混沌不清的推理……无法承受时间的考验”。

威廉·亚伯曼·威廉姆斯认为,麦迪逊曾受到詹姆斯·史都华爵

士的重大影响。麦迪逊自己也为“现在经济的无政府状态”而感到痛心。为了补救这种状态,他把史都华的“反数量货币理论”,作为组织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

对斯密学说的长处的更加准确的评判,是由费舍·爱姆斯^①提出的,他在1789年说:“(《国富论》)中的原则是非常优秀的,但在美国应用它们则要谨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斯密

在所有开国元勋中,汉密尔顿是最赞赏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在汉密尔顿的著作中,发现了一些和《国富论》一致的地方。威廉·格兰普甚至认为,阅读斯密足以使汉密尔顿放弃他早期所学的重商主义思想。有一件事表明,斯密在汉密尔顿的思想发展中没有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汉密尔顿在大陆会议任职期间,曾经准备了一篇文章,批评《国富论》。

事实上,汉密尔顿的思想和史都华非常接近。两人都认为除了市场之外,还需要用其他手段来使经济实现一体化。汉密尔顿肯定了史都华的流行的货币理论,因为它们可以“像水泥一样巩固各州的联盟”。史都华曾用同样的比喻来号召政治家们“像水泥般去巩固”他们的社会。在其他地方,汉密尔顿称赞说,债务和军队巩固了殖民地联盟。在1788年纽约州的美国联邦立宪会议上,汉密尔顿做了支持宪法的发言,听起来简直像是史都华的回声。他说:

人们要追求自己的利益。要改变人们自私的强烈欲望,就

^① 费舍·爱姆斯(Fisher Ames, 1758-1808):美国小品文作家,18世纪90年代的联邦党政治家,杰斐逊民主政治的主要反对者。

和改变人的本性一样困难。而一个聪明的立法者会温和地改变它的方向,引导它,使它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公众利益服务。

史都华的影响在汉密尔顿的《造币厂建造报告》(*Repor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int*)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大量引用他这位导师的著作。但汉密尔顿并没有明确点出史都华的名字。在一份较早的草稿中引用时,汉密尔顿称之为“一位看来精心准确地调查过这一问题,并且计算的数据来源由其他权威认可过的著名英国作者”。

在他最为系统的对市场局限性的研究当中,汉密尔顿抨击了那些“坚持认为市场会自我调节的人”。他还说:“这些人以为不需要一个普遍的指导力量。这只是狂野的幻想产生的自相矛盾的结果之一。我们之中慢慢有些人开始相信它了,但这和那些最文明国家的理性和实践都是相悖的。”

汉密尔顿对经济学理论最值得人们注意的贡献,是《制造业者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rs*)。尽管他的思想不可否认地一次又一次与斯密吻合,但这一文件的目的无疑与斯密相左。汉密尔顿也写到了劳动分工,但他的劳动分工是史都华式的,不是斯密式的。他以如下论断开篇:

人们看到,产生适当的劳动分工的时候,是一国经济少有的重大时刻。职业的分开,使其中每一种都发展到了更加完善的程度,超过了混合在一起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为创造适当的社会劳动分工,汉密尔顿号召“把农民和技工的工作分离开来”,办法是“将一部分人口从种植业分流到制造业……让农民留下来承担种地的工作,并使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产品获取生活和娱乐所需的工业品”。

汉密尔顿建议州政府征收一种连续的税务,用来刺激“各行业更

加努力工作的动机”。和史都华一样,他认为工业是雇佣了那些“愿意把本行业间隙的空余时间用于一种次要的劳动”的人。简单说,汉密尔顿反对下面这个说法:“即使工业不加治理也会成为最有用、利润最高的行业,即制造业者即使不靠政府的帮助,也可以按照事物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公共利益要求的速度发展。”史都华正是这个意思。

实践对斯密理论的否定

尽管宣称信奉亚当·斯密的学说,那些自称为他的信徒的人,常常长篇大论地支持操纵社会机构,来促进市场发展,消除旧生产制度的残余。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也许在边沁的复杂计划——特别是他的“圆形监狱”计划——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美洲殖民地,可能存在亚当·斯密所指的近似于天然的自由状态。按照当时在英国流传的对殖民地的描述,大自然对人们是极为慷慨的。托马斯·哈里奥特^①估计,“一个人可以开垦相当多的土地……”只要在25平方码的土地上劳动“不到24小时,就可以收获他全年的食粮”。类似的关于弗吉尼亚的报告中还提到,葡萄高产到一根葡萄藤上的葡萄就能装满一辆伦敦货车,还有像小孩大腿一样粗的马铃薯,足够6个法国人吃饱的大青蛙。

乔治·班克罗夫特^②的描述更加可靠。他写道:“劳动力非常昂贵;土地则很便宜;只要勤劳,立刻就能富足。人们不需要相互争夺,财富从地下喷涌而出,分给每个人……这里是世界上‘对穷

^① 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 1560 - 1621):英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创立了英国代数学派。

^② 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 - 1891):美国历史学家,被称为“美国历史之父”。

人来说最好的国家’。”在这个“对穷人来说最好的国家”，那些实干的生意人不愿意把他们的未来作为赌注压在市场上，而是靠长久以来的经济控制的传统，使形势向有利于雇主的方向转变。

在此一个世纪以前，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就曾经尝试制定工资上限。殖民地政府也曾限制穷人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占有土地，其部分原因是为了防止温思罗普总督^①所说的“对贸易的遗忘”。在17世纪的弗吉尼亚，更早的移民者大量把土地据为己有，也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由于殖民地工人们的独立精神，资本家们认识到，创造高利润需要使用非自由劳动力。确实，有一些美国人在奴隶贸易基础上的三角贸易中大发横财。英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奴隶的存在为英国商品开辟了广阔市场。1766年，弗吉尼亚从英国进口了价值500 000英镑的商品，而出口给英国的只有40 000英镑。本杰明·富兰克林告诉议会说，北美殖民地的贸易逆差是靠对西印度群岛的出口来平衡的。

即使在北方殖民地，工人们大多也是有束缚的，他们不是奴隶就是契约仆婢。而且，北方各州的利润很多是由南方种植园的盈余中得来的。北方的资本家靠与棉花贸易直接相关的一系列其他活动获利，比如销售、金融服务和运输。东北地区几乎所有的富豪家族，都是靠这些生意发家的。

有些人认为，这种所谓的“棉花中心论”有些言过其实。例如，有几个作者反对用种植园来解释西部和北部的农民由于南方食物匮乏而致富的现象，理由是，到达南方的产品，很多是运到新奥尔良等大城市的。但这些大城市自然也是棉花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些南方城市的工人们，也与种植园经济有着复杂关系。

克里夫·莱斯利曾经对奴隶制对“自由活动”的需求的依赖，做

① 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 1588 - 1649): 英属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首任总督。

出了讽刺的评价。尽管他想说明另一个道理,我们却可以从他模棱两可的话中,读出对我的观点的总结:

据说,我们确实靠奴隶制,获得供给英国主要制造业的生产原料。但是事实上,这整个生产过程的形成,确实是自由工业的功劳……种植棉花获利之所以可能,是商业和其他自由社会的发明的结果。

或者像马克思坦白地指出的那样:“欧洲雇佣工人的被伪装起来的奴隶制,需要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它的基石。”

斯密不肯去认识奴隶制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只是简单地认定后者比前者高级。他应该意识到,奴隶制完全符合他雄辩地宣传的供求分析理论。当劳动力稀缺,资本必须为雇佣劳动付出高昂代价时,它当然有很好的理由偏爱奴隶制。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解释农奴制在东欧的再次出现,即三十年战争以后,由于劳动力稀少造成的一些封建关系的恢复。

相反,斯密仅仅武断地说,殖民地证明了“自由劳动”的成功。他的说法遇到了众多的反对意见,首先能驳斥他的,就是非自由劳动的中心地位。

斯密从未费心去听取这些反对意见,因为他在狂热地宣传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事实上,他对奴隶制的讨论,也许是他所写的各个方面中最具有欺骗性的了。

斯密和殖民地的奴隶制

斯密看到,奴隶制种植园利润丰厚。他写道:“人们通常说,一个甘蔗种植园主觉得,用糖浆和甘蔗汁酿制的朗姆酒,就可以支付

种植的所有开支,糖的价值是纯利润。”

很有特点的是,斯密并不说这种利润反映的是奴隶制的效率,还是对奴隶的剥削。根据他的说法,是价格补贴和欧洲市场的暂时短缺,造成了甘蔗种植园主的高利润。实际上,斯密本应贬低奴隶制的利润,因为他说过,奴隶制是所有生产关系中“最昂贵的一种”。

但是,尽管斯密的理论认为奴隶制本质上是高成本的,有一次他却似乎从自己的话中推出了南方奴隶制可能获利丰厚的论断。他变相地看到,“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释放所有黑奴的决定,可能说明他们的奴隶数量不是很多”。这里斯密准确地把握了商品的思想,他又补充说:“如果奴隶在他们的财产中占有很大份额,那么这样的决定可能永远也不会通过。”

事实上,奴隶在宾夕法尼亚的劳动力中并不占重要部分,这仅仅是因为一般的小私有者没有足够现金来购买一个奴隶,因此不得不满足于拥有一些契约仆婢,这样初始投入要低得多。

所以,在《国富论》出版仅仅两年后,宾夕法尼亚州一个还给契约仆婢自由的提案,遭到了立法会的坚决反对,他们说:“所有学徒和仆人都是他们的主人的财产,任何一种剥夺这些主人财产的行为,都侵犯了人权。”

实际上,“除了移民到西北部的清教徒之外,殖民地大约有一半到2/3的白人移民是罪犯、契约仆婢或有待赎身的人”。当时以罪犯做劳力,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引用一位美国作者1824年的话说:“把我们放在同新南威尔士一样的地位上,办法是分给我们一份收益,它或多或少来源于……罪犯的劳动。”

只有傻瓜才会期望南方的财主们会对占他们财产一大部分的奴隶,表示出更多的人道精神。佐治亚是南方唯一的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州,但那里的种植园主很快绝望地承认,他们无法招到足够的雇佣工人。他们坚持说,“毫无疑问,黑人对于佐治亚的农业来说,就像斧子、锄头和其他农业工具一样必不可少”。

美国内战以后,任何人都不能再占有奴隶的劳动。部分地因为人们对闲暇的偏好,还有很多黑人家庭中的妇女参与了粮食生产,结果棉花的产量直线下降。这一现象也证明了斯密的雇佣劳动理论的狭隘性。

斯密的意识形态理论,最终在世界一隅造成了重大变化,这就是西印度群岛——英国殖民奴隶制的最后堡垒。尽管在1834年就废除了奴隶制,但黑人们在一种事实的奴隶制下又生活了4个年头。约翰·R·麦卡洛克^①为此指责英国政府的虚伪:“为什么当英国的工业仍继续依赖于棉花业的奴隶制时,废除糖业的奴隶制?”

即使如此,英国人废除奴隶制的过程也是非常谨慎的,并且对奴隶主利益的考虑比对奴隶的要多得多。例如,政府赈济爱尔兰的饥荒,只拨了700万英镑,可为了补偿奴隶主的财产损失却付了2000万英镑。仅仅是格莱斯顿家族为释放他们的2000名奴隶,就获得了80000英镑补偿。

1838年以后,反奴隶制政策的真正实施对占有奴隶的各阶层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马克思说,1857年11月的《伦敦时报》登载了一个种植园主愤怒的抗议,因为获得自由的奴隶,宁愿自给自足也不愿受雇佣工作。结果是糖产量大幅度下降。1839至1946年的年产量要比1824至1833期间低36个百分点。

斯密对奴隶制政治经济的歪曲

极具讽刺的是,在斯密断言奴隶制并不经济的同时,苏格兰的盐业和矿业工人仍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奴隶制之中,甚至衣领上不

^① 约翰·R·麦卡洛克(John Mculloch,1789-1864):出生在苏格兰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得不标记老板的名字。托马斯·爱斯顿还发现,南威尔士的铁矿工人也要依附于他们的雇主谋生。斯密在《国富论》中除了他想像中固执的佃农会给自己招惹的麻烦之外,对苏格兰的贫困问题只字未提。与此相互一致的是,他也没有提及苏格兰存在的奴隶制。他引用的是孟德斯鸠对雇佣劳动的匈牙利煤矿与使用奴隶的低效率的土耳其煤矿进行的比较。

斯密还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煤矿工人的工资做了比较,但是没有对苏格兰矿工的不自由地位做出评价。他估计这些工人的工资是普通劳动者的3倍。此外,他还估计苏格兰的奴隶比做类似工作的英格兰工人收入更高,但这一估计遇到了很多牵涉极为复杂的反对意见,使得大多数这类比较都变得问题重重。后来的学者们发现,苏格兰的煤矿付的薪水更少。

回想一下,斯密为雇佣劳动辩护时,提出的原因是雇佣工人比在劳动力市场外的人“拥有更多便利和奢侈的条件”。实际上,斯密完全可以像南方很多保卫奴隶制的人常做的那样,用这套理论来使奴隶制合理化、反对雇佣劳动。

斯密看到,苏格兰的奴隶们逃到英格兰的煤矿做雇佣工人,尽管他以为他们的工资降低了。所以,斯密总结说,对苏格兰工人实行雇佣制对各方都有利。

那么,怎么解释苏格兰存在的奴隶制呢?斯密认为这就像一种游戏规则,仅仅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什么经济作用。它是出于“恐怕是人类天性的对于主宰别人、拥有权威的热爱”。但是仅仅在斯密讲演后几年的1776年,英国的巨头们就努力想把英国的“每年签订契约的系统,变为发达完善的奴隶制……像苏格兰一样”。

很奇怪,斯密不愿对苏格兰的矿工的地位发表意见,因为当时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1774年,当斯密正忙于创作《国富论》的时候,苏格兰的总检察长亚历山大·吉尔摩勋爵在阿伯

根男爵等煤业大亨的怂恿下,起草了一份议案。这一行动的原因写在了议案的序言中:“苏格兰现有的煤矿工人、搬运工和盐业工人,数量不足以生产必需的煤和盐。”它的第二层考虑是“消除对自由国家中存在这种农奴制状态的批评”。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释放奴隶的法令并不能行之有效,尽管旧的束缚体制最后终于丧失了力量。矿工获准参加海军,每周工作日也缩减到三至四天。尽管如此,苏格兰的奴隶们直到 1799 年才正式获得了全部自由。

解放奴隶后产生的即时效果,和斯密的想像不尽相同。从 1799 年直到拿破仑战争,工资一直在缓慢攀升。只是在军队复员和大量爱尔兰移民涌入的情况下,工资才逐渐回落,跌到巅峰时期的 45% 至 70% 的水平。

人们也可能以为,斯密会联系烟草贸易,讨论奴隶制问题,然而他从未提到烟草商们的生意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

斯密偶尔也曾对烟草业进行过讨论,但却未曾暗示作为他朋友和赞助人的格拉斯哥商人们是靠行业垄断发财的。事实是,烟草商人是 1750 年建立的第一家格拉斯哥银行的合伙人。1754 到 1764 年间,烟草进口翻了一番,达到每年 11 500 吨。

尽管斯密看到银行建立后,15 年内格拉斯哥的交易据说增长了一倍,但他写下这一点的目的,只是为了表明建立金融机构的好处。1776 年以后,格拉斯哥商人无法再从事烟草贸易,这座城市就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但斯密书再版的时候并没有告诉读者这一消息。

从另一个方面看,斯密的书也是拐弯抹角的。苏格兰银行问题方面的权威,很可能是史都华,但编辑史都华著作的现代编者却注意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斯密在《国富论》中,从来没有提及史都华。

斯密理论的失势

我们必须将斯密的意识形态,和他的经济学理论加以区分。尽管斯密的意识形态理论受到了热烈欢迎,但他对历史的重新演绎,作为经济政策发展的基础却是不可操作的。

斯密在可能真正起到了影响的唯一政策领域,也没能为自己赢得信誉。尤其是后来的一些评论家认为,斯密对殖民地税收的建议,影响了殖民地的进口税,对美国革命的爆发负有责任。比如雅各·维纳就曾经说过:“斯密在伦敦时期的主要活动……(1766年11月)就是同汤森一起炮制了一个灾难性的税收计划。”

实际上,英国政府多年来的行动似乎表明,他们越是赞扬斯密的理想,就越是倾向于用他们的权利去干预资本的收益。例如,在斯密的意识形态理论日益被人们接受的时期,英国的统治阶层通过了一系列抑制性的立法,和政府拥护的斯密观点正好相反。这些法令包括1799年和1800年的《结社法案》(*Combination Act*)^①,1813年取消法官限定工资的权力的法令,1814年的学徒条款,还有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②。这些法令都无可反驳地表示,政府要利用国家机器,增加资本的收益。

1824年《结社法案》的废除,是当时立法上的反斯密倾向的最显著例子。议会通过这一法令,是为了减少经济方面的抗议,并让劳工阶级相信工资资金理论是正确的。到1830年,西尼尔明显已经承认了这一特殊实验的失败,着手重建对劳动力的限制办法。

^① 《结社法案》把工联主义定为非法。

^② 新《济贫法》依据的是比较苛刻的观点,认为体格健全的工人的贫穷,是道德缺陷,对这类人,除了在济贫院的工作者之外,其余的一律不给救济。

到1830年,政治经济学领域已经公开接受了和斯密截然相反的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思想(见本书第十三章)。事实上,除了斯密思想流行的短短一小段时间,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的史前时代——重商主义时期——到韦克菲尔德学派的胜利,一直都对政府维持资本利润的必要性加以肯定。

斯密:要点回顾

同史都华相比,斯密对殖民地的观点更有效用。史都华的思想会令现代读者震惊,斯密看起来则比较温和。但这种表面上的善良是危险的,因为它能削弱我们的批判能力。斯密偶尔提到劳资之间的冲突,这就使我们更加疏于防范。尽管我们在斯密的作品中可以读到劳资双方的利润“绝不会相同”,但我们在两页后就会找到关于北美劳工的故事。这种现实的写法,使我们在看到北美的劳工和资本家和谐相处的故事时,更容易上当。这实在是最巧妙不过了。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尽管斯密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才华,《国富论》仍不能算是完全的成功,因为他过多地陷进了他的意识形态之中。

意识形态和关于好政府的考虑,使斯密倡导自由放任主义;然而只有在忽略现实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这样的和谐。一个头脑平庸的人也许会编出一个平淡但内容相互一致的故事。可斯密不能——也许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他全力否定的客观事实。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试图建立一个阶级和谐的意识形态理论;另一方面,他的政治和经济的管理理论,需要对阶级冲突进行清晰的分析。

总的来说,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管理原则是矛盾的。他在经

济学中所致力的这两个方面,唯一好像可以相容的实例,就是他对北美殖民地的分析。如我们所见,即使在那里他也没能把意识形态和对实际问题的建议融合在一起。

我们还看到,斯密自己也曾多次违反自由放任的理论。雅各·维纳注意到,斯密“对大量的矛盾之处展示了非常的容忍”,他说得对。

还应该加以补充的是,斯密在生活中的行为也并非不与自己的理论相矛盾。难道他没有感到,作为一个守护自由贸易的圣人,从贵族手中接受年金或者当海关官员领取薪俸是一种讽刺吗?难道他寻求在东印度公司委员会供职时,没有感到一丝虚伪吗?

斯密的生活中存在与他的理论矛盾之处,并不意味着他是故意要欺骗读者。研究这种心理的学者彼得·伯格发现:“故意的欺骗需要一种很少有人能拥有的心理自控能力……欺骗自己则要容易得多。”

《国富论》不仅仅是自我欺骗的成果而已,它是一部伟大的书。它的伟大之处,部分地在于斯密自己对他的自相矛盾之处的处理上,“他自己没有解决问题,但却通过自相矛盾揭露了它们”。有时他的观点看起来如此荒唐,以至于使我们觉察到,我们遇上了一个重要问题。

第十一章

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斯密的 奴隶制与雇佣劳动思想

致力于公众事务的人——无论他们如何掩饰——很少仅仅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尽管他们的行为确实给国家带来了好处，但那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没有人是纯粹的慈善家。

——本杰明·富兰克林《我的图书馆阅读生涯》

富兰克林与北美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北美问题曾是一个让欧洲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的确，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英国人是非常留心北美殖民地事务的。在1720年到1784年间，伦敦出版的所有书籍、宣传手册、地图和版画中，大概有20%是有关这些殖民地的。同样，在1774到1779年间，全英国大约12%的书籍和宣传手册，都与北美殖民地有联系。

欧洲人当时对北美殖民地如此关注，部分原因是这些殖民地让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过去。洛克写道，“万世之初，全世界都像美洲这个样子”。《美洲史》(*History of America*)一书中，威廉·罗伯逊也写道：

在新世界的探索使我们认识了很多新的民族。这些民族发展的阶段不同,比欧洲大陆的各民族都落后一些。在美洲,人们的生活标准要多原始就有多原始。我们可以找到刚刚开始聚居到一起的氏族,也可以观察到在人类社会建立之初人们的情感和行为。

甚至在托克维尔眼中的美洲土著,也像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眼中的日尔曼人一样。

毋庸置疑,亚当·斯密也对北美抱有浓厚兴趣。洛伊斯·惠特尼指出,斯密至少有 30 本有关去远方异国旅行的书籍和航海日记。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斯密认为,美洲土著社会处在一种接近“未开化”的状态。除了在他的《法学演讲录》中给出不胜枚举的美洲土著生活的例子外,他还猜测,古苏格兰人和这些土著差不多。

在所有提供殖民地信息的人当中,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著名的一个。人们那时认为,他对这方面事务的看法“可信度丝毫不比圣经低”。毕竟,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又有谁能比他对原始社会的了解(不管是真的还是幻想的)更多呢?

所以毫不奇怪,富兰克林的影响是深远的。他让威廉·配第地位显赫的女婿——那位曾先后担任大英贸易委员会主席和英国首相的谢尔本勋爵相信,他富兰克林是“有关任何美国问题的(三个)最具权威的专家之一”。

富兰克林的机会主义

我们都熟悉富兰克林这个人:他和蔼可亲,机智,充满创造力。但在实际生活中,他的性格要比《美国大百科全书》(*Americana*)名人传里描述的复杂得多。或许除了配第之外,没有哪个政治经济

学家像富兰克林这样狡黠善变而又富有魅力了。那么,让我们通过一些传记资料来了解一下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建树吧。

富兰克林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发表于1729年,那时他只有20出头。该文极其出色地“运用”了威廉·配第的《赋税论》(1662)中的观点。富兰克林对纸币问题的兴趣,似乎源于威廉·罗尔1725年发表的有关同一问题的政论手册。富兰克林写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里,大段的观点都来源于配第的文章。约翰·戴维斯甚至声称,富兰克林一生中赖以成名的许多语句,都是未经注明从他人那里借用的。

富兰克林诸多著作孰轻孰重很难判断,因为他写作最主要的目的,往往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传播真理。比如,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发表之后,宾夕法尼亚政府就与他签订了印刷纸币的授权合同。而这正是他在自己的首篇政论里大力提倡的。在这以后的岁月里,富兰克林写作的目的依然是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为了任何主义或原则。

由于政治风云变幻,继其首篇有关纸币的政论发表之后,富兰克林又表达了许多与之相矛盾的观点,以至于一位学者把他比做变色龙。比如,他写政论反对走私版,并认可当时的低工资水平,显而易见他是希望在与英国政府打交道时自己能多赚一笔。在殖民地晚期,他一面言辞激烈,反对强加于殖民地制造业的种种限制,一面还指望着赢得强大的英国的好感。后来,他又在新建的合众国倡导自给自足。就连他把土著人描写成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点下文会提到),也是为他的个人利益服务的。

评价富兰克林是如此之难,有人甚至对他对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忠诚都产生了怀疑。德尼斯·德伯特认为,在当马萨诸塞殖民地代表时,富兰克林“完全是中间派(相对于革命派来说)”,直到看清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发展前景,他才积极地倒向美国这边。一种更加充满敌意的说法是:富兰克林的机会主义和贪欲,使他在独立战

争中沦为英国政府的双重间谍。不管我们接不接受这种说法,富兰克林是一位善于通过文字和话语来实现自己利益的行家。

不管有多少对富兰克林真实立场的猜忌,也不管约瑟夫·熊皮特认为富兰克林的著作“几乎没有为纯粹的研究提供资料”的论断有多么正确,富兰克林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原始积累理论发展的贡献还是巨大的。

斯密关于殖民地知识的来源

了解了斯密对北美的浓厚兴趣以及富兰克林在这一问题上的权威性之后,我们就不应奇怪,斯密对殖民地的研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以富兰克林的著作为依据。可以想像,斯密对富兰克林有关新世界的土著居民的论述,有着特殊的兴趣。读一读《国富论》,你会发现斯密是如此喜欢从古代经典著作里引用小例子,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斯密是不会对一个亲自到过原始社会并掌握大量第一手信息的人有所怀疑的。至于富兰克林提供的信息是否属实,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如此,富兰克林究竟对斯密有没有影响,对此还不能盖棺定论,毕竟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富论》里。不过,受到斯密反对的史都华,还有论述与斯密有着过多雷同之处的杜尔哥等人的名字,也同样没有出现。斯密关于“北美的人口在 20 到 25 年里翻了一番”的论断,确实采用了与富林克林所估计的极为相近的数值。这段文字最有可能的出处,就是富兰克林的《论人口增长》(*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和 1760 年的《论大不列颠的利益》(*The Interest of Great Britain Considered*)。而这两篇文章斯密都有。

实际上,斯密有关北美殖民地的繁荣的分析,是从对人口增长

的讨论开始的。如此一来,富兰克林那两篇文章就十分切题。因为它们有可能促使斯密形成了对北美经济发展中劳动者和资本家关系的看法。

斯密著作的编辑艾德文·加南忽视了斯密的估算可能借鉴了富兰克林的著作,而不是理查·普赖斯^①的。以后的多位编辑和路易斯·凯里根据斯密所写的一封信,否定了伽南的看法,信中斯密说:“普赖斯的论断总是注定要被人否定的。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做作的公民,一个最浅薄的哲学家,根本不会计算。”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封信,就小觑了普赖斯的重要性。毕竟,以我们对斯密和史都华关系的了解,我们知道,不应急于根据字面意思来理解斯密的话。另外,对普赖斯的这一评价是在《国富论》发表后12年做出的,因此也有可能斯密对这位一直有争议的人物的评价由高变低,是1773年以后很久的事了。

伽南提出,斯密写作资料的另一重要来源有可能是约翰·米切尔博士的《农业、人口、贸易与制造业》(*Agriculture, Population, Trade, and Manufactures*),也同样极有可能出自《美洲农业》(*American Husbandry*)一文。而有些人认为该文同样出自米切尔博士笔下。

关于富兰克林在政治经济学发展中起的作用,富兰克林自己最有发言权。富兰克林一位朋友的遗孀洛根太太这样写道:

富兰克林博士曾告诉我丈夫:大名鼎鼎的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的时候,曾把一章又一章刚完成的草稿拿到他、普赖斯博士和当时的其他学者那里,耐心听取这些熟人的意见,从他们的议论和批评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不仅如此,在

^① 理查·普赖斯(Richard Price, 1723 - 1791):英国道德哲学家、财政专家,美国与法国革命的热情支持者。与他经常来往的朋友有富兰克林、休谟等。

看完那些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的论述以后,他有时整章整章地重新改写,甚至推翻原来的一些主张。

富兰克林对《国富论》的贡献

富兰克林与斯密是 1759 年在爱丁堡结识的。路易斯·凯里指出,富兰克林和理查·普赖斯一样,在 1773 到 1775 年期间其实是住在伦敦的,而那时斯密也在那里写《国富论》。富兰克林、斯密、普赖斯同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不仅如此,富兰克林和斯密都和斯特拉罕交往甚密,而这个人正是《道德情操论》的出版商,并且在最先出版《国富论》的公司工作。

尽管斯密在这段时间以前很久就已经开始写《国富论》了,但凯里指出,富兰克林不知道这本书酝酿写作的情况,这是情有可原的。而且斯密 1773 年到 1775 年写作的主要内容也包括 1773 年 10 月写的一章“论殖民地”以及“论劳动工资”一章中有关美洲工资的段落。

在 18 世纪 60 年代初之前,斯密已经开始动笔写《国富论》的草稿了。在草稿中他断言,宾夕法尼亚和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都比弗吉尼亚富有。而且,在斯密草稿中,他把美洲土著人作为社会劳动分工不发达的社会的例子。除非斯密的这些思想都是在 1759 年他和富兰克林初次见面以后产生的,否则我们大可认为,斯密会很急于想从富兰克林这位知名的到访专家那里获取些信息。

不过,确实有迹象表明,尽管富兰克林和凯姆斯勋爵以及休谟之间交往很密切,但是富兰克林在英国这段时间可能有什么令人不快的经历。富兰克林回忆时也提到,尽管他天性喜欢避免和别人争论,但是对以下几种人他是不会客气的:律师,大学老师,还有

所有在爱丁堡受过教育的人。

我们没有资料记录说明斯密对富兰克林的评价,但是他的知交密友休谟的观点,可能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1762年,也就是休谟与富兰克林初次见面几年后,他热情地赞颂道:“美洲给我们送来了很多好东西:金、银、糖、烟草、蓝靛等等;但是您是第一位我们要感谢的来自美洲的哲学家,不,是伟大的文人。1774年,休谟的观点已然改变了。他问斯密:

想想我们听到了多少关于富兰克林所作所为的骇人听闻的评论!我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善于伪装的好恶之徒,尽管我一直清楚他是一个好搞派系的人。在所有过激行为中,除了盲信以外就要数搞派系最有损世风道义了。

休谟所指的,可能是马萨诸塞总督、副总督信件被盗事件,富兰克林牵涉在内。显然,殖民者开始怀疑富兰克林这个北美殖民地代表的工作是不是尽心尽力。由于人们的这种猜忌,司法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韦德本——斯密过去的学生和休谟的朋友——要求富兰克林1774年1月29日到枢密院接受审查。这次事件可能使富兰克林与斯密的联系减少了,但这多半是在斯密有机会向富兰克林了解大量有关北美殖民地的广袤土地及高工资之后的事了。

有关殖民地的材料,对斯密的《国富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斯密举出的唯一一个用来证明劳动者可以在不使资本家受损失的情况下发家致富的具体实例。因此,它在斯密创造的“雇佣劳动是非强制性的”这一思想体系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我们接下来有必要对富兰克林的贡献做一番认真谨慎的评价。

请注意,斯密认为普赖斯和富兰克林有同样的罪过;他对“好搞派系”的定义是非常主观的。他给谢尔本勋爵的信中如此写道:“尽管派系之间时不时的一些小争论会给国家带来活力,但是没完

没了的派系斗争,必将妨碍公众事务,最终即使是最好的大臣也不能控制住局势了。”

从富兰克林在1780年2月6日给普赖斯的一封信的口气里,我们可以听出,他们两个人都因为自己支持殖民地运动的方式而受到排斥:“你和你写的东西在经历种种误解和滥用之后,终将给那些最初对你的忠告不屑一顾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们的分量会与日俱增,备受推崇,而对它们吹毛求疵的声音则会消亡,或者完全被遗忘。”

尽管人们对此有种种猜测和推断,但是富兰克林对斯密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富兰克林有自己独到的经济发展理论,而斯密对这一理论并不欣赏,因而也就没有把它吸收到自己的著作中去。

斯密和殖民地关系的思想

即便如富兰克林所说,斯密受到了他的影响,但他们两人的理论在很多方面是背道而驰的。首先,富兰克林声称英国不必通过立法限制殖民地的制造业;而斯密坚持认为英国根本就不需要跟殖民地有什么关系。在斯密看来,与殖民地的联系给英国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因为不管有没有正式的殖民地隶属关系,那些殖民地都会保留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而这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他的殖民地发展理论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从这一点上讲,他和塔克所持的观点大同小异,只不过斯密的分析更迂回一些。塔克认为,不太发达的国家在经济上永远都会落后,而斯密坚信新殖民地会对所有人都有利。

不仅如此,思想家斯密还探寻了能证明北美各种生产方式和和谐共存的依据。他的观点是:殖民地的经验证明了,在高工资的情

况下资本也可以增值。与此相反,富兰克林强调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比如工人想成为独立的农民或农场主。另外,富兰克林号召殖民地独立,也不是想让殖民地经济成为英国经济的附属。

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斯密和富兰克林的不同呢?我们知道,斯密认识富兰克林,而且有富兰克林写的书和文章。有一次,他批评了富兰克林的一篇科技文章,而这篇文章是和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富兰克林的两篇政论文章在同一本小册子里发行的。

斯密不太可能误解富兰克林在这两篇论文里阐述的观点。尽管富兰克林这个头脑灵活的美国人经常自相矛盾,但是这两篇论文却没有丝毫隐晦之处。斯密看待富兰克林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这个苏格兰人经常犯糊涂。比如,我们已经讨论过,斯密在分析雇佣劳动的起源时犯了很多令人难堪的错误。

在他所有有关殖民地的分析讨论中,他都是这样思维夹缠不清的。我们提示过,斯密认为雇佣劳动制是殖民地农业获取高额利润的前提。斯密解释说:经营者要支付的高额工资数,是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成正比的,因为他们需要鼓励和促进“人口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当然,人口增长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至少,富兰克林的论文是这么说的。即使是对北美殖民地最乐观的人也理解,雇佣工人会集中在少数几种依靠丰富资源和节省劳力的技术支付高工资的行业。斯密自己是前后观点一致的。他认为殖民地只可能在依靠宗主国的情况下发展,至少在可以预知的将来是这样的。

斯密的思想体系要求他解释,为什么工人们愿意成为雇佣劳动者。他提出的二元公式“人口增长和发展”的一方面认为,雇佣工人由于“马尔萨斯式压力(Malthusian pressures)”,^①会继续当雇

^①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比食物供应的增长要快,除非对人口增长采用道德的约束或通过战争、饥荒和瘟疫加以抑制,否则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

佣工人,这种压力会抵消他努力研究的经济繁荣现象。而在他的论断“殖民地只会生产原材料”中,他对公式的另一方面却似乎未加考虑,因为斯密想到的农民喜欢做自耕农,而不是为了工资生活。

英国在北美之外的殖民统治

与斯密不同,富兰克林对英国与其附近殖民地的关系非常不满。在有人问为什么北美的“牛肉、黄油和亚麻布”出口都不如爱尔兰时,富兰克林严词反驳说“也许原因在于,我们的人民每天都吃牛肉和黄油,都穿自己做的衬衫”。

富兰克林的自由主义朋友斯密和休谟等,也可能同样认为爱尔兰模式乏善可陈。这种假设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富兰克林本来热切地希望能够投资开发俄亥俄山谷的土地,但是这一愿望却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强大的爱尔兰地主势力的阻碍,而没能实现。

约书亚·柴尔德在他的《贸易新篇》(*New Discourse of Trade*)中反对种植园经济时论述道:“那些缺少相应数量劳动力的土地(尽管它们很肥沃),是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财富的。”英格兰的土地所有者们接受了这一观点。他们觉得,如果自己的佃户移民到了美洲西部,他们就会蒙受经济上的损失。因此,他们想把劳动力留在国内。尤其是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希尔斯巴罗勋爵,害怕爱尔兰移民会减少他能从自己大片的爱尔兰领地中获取的利润。

与此极为不同的是,苏格兰贵族对大批的苏格兰“自由劳动者”向外移民,却持一种欢迎态度。因为苏格兰的佃农刚刚被剥夺了土地使用权,因此地主们认为,至少在移民数量还没有使他们面临劳动力短缺之前,佃农移民国外有利于巩固他们对牧场的财产所有权。苏格兰对劳动力移民海外的宽容,在一定程度上还有

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农耕经济是非劳动密集型的。

同时,英国对苏格兰的控制也不是很彻底,这使他们对保持那里的人口数量不太在意。英格兰人在爱尔兰瓜分了土地。与此不同,他们在苏格兰把土地所有权留给了当地原来的领主。

苏格兰和爱尔兰另一个差异是两地的人民掌握枪支武器的情况不同。正如笛福所言:“高地居民(译者注:指苏格兰人)不仅都掌握着枪支武器,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而在爱尔兰贫民当中,拥有枪支并不是一个普遍情况。

现在反观一下,英格兰人征服苏格兰比征服爱尔兰做得更成功。但是,有很多好战的高地人都移民到了北美的阿巴拉契亚山和阿勒格尼山地区,在那里掀起了不计其数的反抗运动。

与富兰克林不同,斯密从未承认英格兰人给爱尔兰和苏格兰人民带来了苦难。比如,他认为苏格兰的贫困是由当地贫民和地主顽固不化的保守思想造成的,因此这两者都对贫困负有责任。

在爱尔兰问题上,斯密对贵族的态度更加宽容。他把那里平民贫困的原因,归结于他们的反抗。他在给卡理斯勒勋爵的信中这样写道:

(爱尔兰)煤矿和森林资源匮乏;而这两种资源是发展大型制造业必不可少的。它缺乏保护和制约下层人的社会秩序、警察和稳定的法制管理;而这对工业发展的意义,比煤矿和森林的作用加起来还要重大。

斯密从未详细讨论过军队在殖民地的作用。我们已经提到,斯密确信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法律系统,来保护富人的财产。但我们无法肯定他对爱尔兰问题的上述看法是出于保护财产的总的考虑,还是只把爱尔兰当做一个特殊的例子。

总之,斯密在利用富兰克林的著作时,是非常有选择的。富兰

克林关于北美殖民地的著述,有一部分和斯密的殖民地资本与劳动力和睦相处理论相互吻合。但是,除了对殖民地事务更加了解以外,富兰克林似乎还比斯密更加了解殖民地斗争的深刻性。当然,富兰克林的实际观点,与斯密为了论述劳动力社会分工的自然发展问题时所引用的他的观点是不同的。

富兰克林与对殖民地工业前景的悲观展望

尽管斯密的著作和富兰克林的著作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是非常相左的。就以富兰克林的《论人口增长》一文为例。这篇文章是精心写就的,用来博得英国人和殖民地居民双方好感的,代表殖民地工业界利益的简短有力的政论。约翰·R.麦卡洛克认为这篇精彩的政论,是富兰克林“犀利睿智、紧凑明晰的写作风格的最佳体现”。马尔萨斯称赞富兰克林的这篇文章时,说他自己的写作是踏着富兰克林的足迹完成的,尽管我们可能认为该文跟马尔萨斯的著作不太一样。富兰克林甚至曾明确表示,他希望“在地球表面上的白人”数量能够增加。

富兰克林的这篇文章是针对1750年的英国铁业法令而做的。该项法案禁止在美洲殖民地增建切铁厂或轧铁厂、锻铁炉和炼钢炉。当时已有人提出,建立强大的英国殖民地,对方兴未艾的英法两国争夺新大陆的斗争,是有战略意义的。但是,仅仅从这种政治背景来论证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与活力,会让那些希望把自己在殖民地的竞争对手扼杀在襁褓里的人更加害怕。

富兰克林并没有对英国制定这样的法案提出疑义,而是通过论证“在未来殖民地和英国的经济是互补的”,以此来巧妙地调和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目的和斯密是一样的。富兰克林认为,宗主国没有必要限制殖民地的工业

发展。北美洲的经济会发展,但是发展的必定是农业。从这个角度看,他和斯密的大致思路是一样的,只不过富兰克林比斯密走得更远一些。

斯密确信,殖民地的发展肯定会超出农业的范畴,而富兰克林则向他的英国读者保证,殖民地广袤的土地会阻碍当地奴隶和雇佣工人的使用,也会限制该地区未来的工业发展。

富兰克林对殖民地竞争力威胁的论述,还是能自圆其说的。他保证,给殖民地经济发展更多的自由,不会使英国受到丝毫损失,而会让它得到一切好处。还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就算没有法律规定,殖民地开拓者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关心这项强制性的法案呢?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是把一个外在的标准强加到了这篇文章上。富兰克林的意图仅仅是消除英国人当时对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恐惧。

这种关于殖民地发展的思想,反复出现在富兰克林 1760 年写的《论英国的利益》(*Interest of Britain Considered*)一文中。当时讨论的是 1759 年法国在蒙特利尔投降以后,英国是否应该乘胜宣布加拿大或瓜德罗普岛(译者注:位于拉丁美洲的一个岛)为己有。当时的论战非常激烈。而首相威廉·皮特则左右为难:“有人说应该留下加拿大,有人说留下瓜德罗普;有谁能告诉我,放弃了哪个我不会被绞死?”

在这件事情上,富兰克林的贡献是又一篇充满智慧的代表美洲利益的短文。为了更有说服力,他做出一副英国人的样子来写作。他指出,瓜德罗普对英国的仓储货物没有多少需求,因为那儿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奴隶。而加拿大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可以更好地为英国的利益服务。

为了使自己的论点更有说服力,富兰克林强调,殖民大陆与英国的经济具有互补性,而不是竞争性。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富兰克林会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手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有一段时间,富兰克林似乎决意要打消英国人对殖民地经济实力的恐惧,使他们安心。比如,1776年,在英国政府要求殖民地总督上交一份该殖民地工业实力简报以后,富兰克林忠告自己的儿子(他经富兰克林的推荐,当上了新泽西殖民地总督),不要讲实话。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你只要汇报有一个能制造粗糙窗玻璃和瓶子的玻璃厂,一些生产能力还不够向一半居民家庭提供亚麻和毛线的家用产品制造厂,所有精细产品都来自英国,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就可以了。”

他的儿子对他信里的建议几乎全盘照做。其他总督也跟着隐瞒事实。比如,纽约的摩尔总督写了封详细的报告,描述不让雇佣工人流失是多么困难,因为他们一有可能就会开始务农。只有北卡罗莱纳炫耀自己光在一条河上就有50家锯木厂,不过这种工业不太可能对英国造成任何威胁。

当然,那时殖民地工业还远没有建立起基础。但问题是,它会永远是那样吗?

富兰克林、斯密和奴隶制

在现实中,北美殖民地不像斯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论述里描绘的世外桃源,但是它们同西欧经济相比,确实也有不少迷人之处。即使是这样,斯密和富兰克林都大加溢美的殖民地繁荣,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了那些没有自由的劳动者。可惜,斯密和富兰克林都没有提醒他们的读者注意,强制性的奴隶制关系对殖民地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

他们二人一致认为,奴隶制永远不可能有效率。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这里的奴隶劳动,绝不会像英国工人的劳动那样便宜。”尽管这段话引自一篇公认的没有科学依据的政论,但是在涉

及可能的生产模式方面,它的观点却比似乎是受到它影响的《国富论》更有一致性。斯密在没有提到任何具体历史条件的情况下,就断言奴隶劳动力比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更昂贵,而富兰克林则比较谨慎地说,在殖民地,奴隶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比英国工人劳动力的价格还便宜。

即使如此,至少富兰克林还明白,在殖民地经济中使用奴隶可能有一些优势。他写道:“为什么美洲人要购买奴隶呢?因为一个人想拥有奴隶多久就能拥有多久,需要他们劳动多长时间就可以劳动多长时间;而雇佣工人却不断地离开他们的雇主(时常是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然后创立他们自己的事业。”

这种对奴隶制的不太寻常的认识,和殖民地的不自由劳动力的情况并不相差太多。尽管奴隶制在东北部并不十分普遍,但是仆役还是很常见的。此外,当地不少人都从奴隶贸易中赚了大钱。而且,制造业在当地发展成熟以后,它经常能在奴隶制兴盛的地区找到市场。

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的继承地产里,就使用“白人仆役”耕种“肥沃的土地……和未来繁荣的工业的种子”。难道富兰克林和斯密是那么幼稚无知,以至于他们相信奴隶制和仆役跟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没有关系?

富兰克林只提到了斯密的家乡苏格兰有奴隶制;而斯密只提到过古代的奴隶制和当时远在土耳其的奴隶制。两个人都没有论述过他们当时的仆役和奴役,更不要说在北美终身为奴的黑人的悲惨状况了。

比如,富兰克林发表在1770年《伦敦公共广告人》(*London Public Advertiser*)杂志上的《关于奴隶制的对话》(*Conversation on Slavery*),似乎在解放实际上过着奴隶生活的苏格兰农奴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文中,他对一名假想的苏格兰人说:“先生,关于你的想法,我想如果我们真的热爱自由,我们自己就不应该实

施奴隶制。当我从你那儿……听说在你自己的家乡苏格兰,奴隶制仍然存在,我真有点吃惊。”

与斯密不同,富兰克林在《论人口增长》里,表达了强烈的种族主义思想,尽管在后来他一直表现出反对奴隶制的样子。当这篇文章再版的时候,他很明智地把“几乎每个奴隶都天生就是窃贼”这句话改成了“在奴隶制下几乎每个奴隶都成了窃贼”。

尽管富兰克林对奴隶制的评价很低,但在1770年以前,他几乎没有提到过北美的企业主们能够完成从家庭作坊式的制造业发展到以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大工业。在当时教友派信徒占主导地位的宾夕法尼亚,富兰克林的反奴隶制立场是能带来政治利益的。但是,当自己在当地的政治地位高得不能再高以后,他仍然长期坚持这种立场。他反对奴隶制,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坚持不变的道德立场。

斯密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沉默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很多有关殖民地的信息,他都是从格拉斯哥烟草商和从殖民地回来的种植园主那里得到的。当然,斯密可能对南方的情况不太感兴趣,但他仍然应该了解种植园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斯密没有尽力修改他在《国富论》中有关奴隶制的自相矛盾的论断,而是插入了这么一段风马牛不相及的论述:“这样看来,相对来说,古希腊许多殖民地的扩张和财富积累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很快就反驳了这种不实之词:“在希腊根本没有人出卖他的劳动力,也没有人支付薪水,不管是高是低……一切(工作)都是由奴隶完成的。”

斯密这段暗指奴隶制的文字似乎反映了,他在潜意识里承认,需要有一种强制力来保证雇主们能够榨取工人們的剩余价值。斯密在著作里从未详细谈到过这种被压制的想法。如果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国富论》可能就会和富兰克林关于殖民地发展的相当现实主义的观点比较一致了。

富兰克林对殖民地雇佣工人的看法

富兰克林之所以认为制造业在殖民地不可能轻易地发展起来,是因为他认为殖民地的大量土地会妨碍大量雇佣工人的产生。用富兰克林自己的话来说:“美洲的土地如此广袤,地价如此低廉,一个劳动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攒足钱购买一块土地进行耕种,靠它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制造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没有竞争力的。

工人挣到的工资足够他们购买农场,成为自耕农。富兰克林认为:

在那个国家土地很廉价,年轻力壮、懂得种地和养牛的劳动者可以很容易站稳脚跟。他们只要从给别人干活挣的不薄的工资里省出一些,就能购买土地,拥有自己的种植园。

同样,在写到瓜德罗普岛时,他认为:

在殖民地的人口变得更多以前,这个国家(英国)有必要向他们提供消费所需的工业产品,因为新移民会从事农业劳动,而新的移民点会不断吸收老移民中的闲散劳动力。这样,我们现在的殖民地将不能……给自己的居民提供足够的工业品……他们能向更后来的移民提供的产品就更少了。

在另外一处,富兰克林甚至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殖民地制造业遇到的种种困难:

凡是学过政治史和商业史的人都知道,制造业是在贫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当一个国家存在大量没有土地、不当廉价劳动力就会饿死的穷人时,企业主才可能经营制造业,才可能防止国外同类劳动力的输入,并支付得起保持劳动力不外流的工资。但是一个能拥有自己土地、靠自己的劳动谋生养家的人,却不足以成为一个雇佣别人工作的工场主。因此,尽管美国有足够的土地来养活我们的人民,却不可能建立起很多工厂。

在1782年写的一本题为《移民美洲须知》(*Information For Those Who Would Remove to America*)的宣传册里,富兰克林表达的观点和斯密提倡的很相近。他指出,当国家不能向私人企业提供资助时:

这样的企业很少有能成功的,建立一家工厂也是一样的,国家还没有富裕到鼓励私人建厂的地步。那里劳动力价格昂贵,也很难集中,每个人都想做主人,而且低廉的地价让很多人弃商从农。

富兰克林接着写道:“有些企业确实办得挺成功,而且仍然运营得不错。但是这些企业都是那种只需要少数劳动力,或者主要劳动由机器来完成的。”简而言之,富兰克林的基本观点是,殖民地会一直保持以农业为本,直到人口数量大得无法使一个普通工人成为自耕农的时候。因此,英国人大可不必害怕殖民地会与自己竞争。

1769年,当富兰克林表示同意殖民地的《不接受进口决议》(*Resolutions of Non - Importation*)时,他分析了殖民地对农业的依赖性:

因为财富和繁荣的真正来源是他们的土地和海洋;如果

他们每年都能增加财富,并且不像这个国家(即英国)这样把钱浪费在无用的地方,而是把闲暇时间用于生产自己所必需的产品,他们肯定很快就能偿清债务,过得舒适安逸,甚至变得富有。

富兰克林为重农主义大声疾呼的时期,也刚好是他大量投资购买土地的时期。

总之,富兰克林对雇佣工人的观点,比斯密的要清晰得多。两人都肯定,低廉而大量的土地会妨碍雇佣劳动者队伍的壮大。斯密指出,殖民地经济在从原材料生产向制造业逐渐过渡的过程中,会走向繁荣。而富兰克林似乎认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完成的。他意识到,自耕农是不会心甘情愿成为低工资的工厂工人的。

富兰克林的高工资经济观点

殖民地取得独立之后,富兰克林的观点又一次转变了。他以《国富论》中的数据为依据提出,美国个人的收入比英国工人高出许多。也许是为了回应亚当·斯密,他断言:“一个社会,如果由于工资过低或不足,而使劳动者阶级取得如此不足的生活资料,以至于他们无法结婚、养活家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算是幸福的。”

富兰克林原来认为高工资是对现代工业发展不利的,但是这时他不再视高工资为洪水猛兽了。他也不再认为幸福与竞争是相互排斥的了:“现在应该降低的不是工人工资,而是商品价格。”比如,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带来的效益,就能抵消劳动力高昂的价格。

富兰克林确实曾说过:“高昂的工资是……美国制造业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与欧洲抗衡……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他完全放弃

了这种观点。实际上,高工资是有它的好处的。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高工资能吸引技术最好、最勤劳的工人……一名出色的工人能减少工具的损耗和原料的浪费,并且比技术差的工人干活更快……所有工艺技术的改进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人进行的。”富兰克林预计,高工资会带来永久性的效益。因为对刚刚独立的殖民地居民来说,向外移民会使大西洋两岸工资拉平。而且,这个新兴国家的繁荣,会使他们增加对英国进口货物的需求。

富兰克林的思想广为流传

富兰克林并不是唯一一个认识到土地缺乏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人。他的《论人口增长》(*Observations*)发表于1755年。第二年,米拉波发表的《人类之友》(*L'Ami des Hommes*)也表达了他对土地稀缺的重要性的认识。米拉波的兄弟是瓜德罗普的总督,尽管他是反对奴隶制的。到底米拉波是从自己兄弟那里,还是从富兰克林那里获得的这种思想,我们只能猜测。这种思想当时确实是广为流传的。

与此类似的是,一位与亚当·斯密同时期的匿名作者,在20年后一本题为《美洲农业》(*American Husbandry*)的一书中写道:“当土地很难买到或者比较贫瘠的时候,由于居民增长太快或者国家的强制,穷人就只能去干其他的活,不能靠土地吃饭。制造业、商业、渔业等等于是就这样繁荣起来了。”美国当时大多数领导人都接受了富兰克林的看法,认为殖民地制造业的前景不容乐观。杰斐逊就曾这样写道:

美国的劳动力价格太高,制造业不太可能成功,这是由农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造成的。一个从欧洲来的工人,如果

发现他干别的活能赚得更多,他就会转行。他能找到一些报酬优厚的职业,能让他积蓄一笔钱,买下 50 英亩土地自己耕作。这种自由独立的生活是很有诱惑力的。

约翰·亚当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有头脑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欧洲政府对美国没什么好怕的。几个世纪以来,美洲的主要兴趣都在土地上,主要行业也是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只占次要地位;欧洲国家会成为工业国家,而美国的商业只会随着农业的增长相应有所增长,这种情况要一直持续到美国的土地上人口稠密的时候,而那将是几百年以后的事了。

几年以后,麦迪逊预计,西部广阔肥沃的土地会使农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对工业的优势。

当然,杰斐逊、麦迪逊都是以政治家而不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说这些话的。他们害怕未来工业的发展,会使大量工人集中到城市,整天大喊要求自由解放的革命政治口号。

快乐的中庸之道

在另一方面,富兰克林的思想跟杰斐逊等很多革命领袖的观点也很相似。与他同时期的革命者,都对英国的阶级关系进行了批判。在一篇未属名的政论《宪法真义》(*The True Constitutional Meaning*)的评论中,富兰克林顺便提到了对这个问题的个人看法:“英国的那些富人和贵族,那些大量吞并穷人小块土地的富人,那些压低劳动人民工资让穷人不得翻身的富人,他们凭什么抱怨说,

那些以极低工资为他们终身工作的穷人给他们带来了负担？”许多观察家同意，欧洲的工厂把大批赤贫的工人集中在一起劳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富兰克林提出，不到美国人口变得稠密一些，这里的工业是不会壮大起来的。他还预计，美国人口只有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才可能多起来。

几十年以后，在一本 1799 年出版的题为《美国内部情况》(*The Internal State of America*)的论文里，富兰克林指出，北美已经发展到了工业可以壮大起来的阶段了。读过这篇论文，你会发现许多观点都可以从《国富论》里找到依据。他这样写道：

只要你曾经游历过欧洲几个地方，看到那里生活富足的人比例是如此之小，生活贫苦悲惨的人是这么多；看到少数既有钱又傲慢十足的地主，大批贫困可怜的佃农，还有工资微薄、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工人；再看到我们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安于快乐的中庸之道，在这里农人为自己工作，养活着家庭，过着体面的生活。你就会深信，世上再没有一个比这更幸福的国家了。

在他写的宣传手册《移民美洲须知》中，富兰克林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事实上，尽管在这个国家很少有人像欧洲的穷人那样穷，但是也很少有人像欧洲的富人那样富；总的来说，大家都安于快乐的中庸之道。几乎没有什么大地主，也几乎不存在佃户；大多数人都耕种自己的土地，或者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富兰克林说：“新大陆的支柱产业是农业。”但是，在此之前的手册里，他总结道：“简而言之，美国是一个劳动者的国度。”

其他人的文章观点都跟富兰克林的极其相似。当时有人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屋土地，自己劳作，每个人都安乐平凡。”理查·普赖斯也问：“在哪里居民最平等，生活最安逸？难道不

是那些农夫自给自足、健康殷实的内陆吗？又是在哪里居民最自私堕落、懒惰奢侈，而又最不快乐呢？难道不是沿海那些贸易繁荣、富商云集的大城市吗？”富兰克林更大的贡献在于他没有点明的话。在谈论工人能得到较高工资而资本家也能赚取利润的“快乐的中庸”社会时，富兰克林和斯密一起，描绘了一幅劳资和睦相处的景象。不过，在看富兰克林的文章时，我们总是应该考虑到他写作的背景。

可惜，在富兰克林对快乐的中庸之道大加褒扬之时，平等主义时代正在迅速走向完结。在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期，北方殖民地的财富正日益集中。尽管在独立革命之前，北方殖民地的农民比较富裕，但仅从1700年到1736年，白人中无地者的数量就从原来总人数的5%上升到12%。每个成年男子的平均土地拥有面积，从17世纪初的将近150英亩，降到了1786年的43英亩。

简而言之，富兰克林和斯密对中庸之道的讨论，都是一些理念模型，虽然他不如斯密那么注重理论。具体来讲，富兰克林后期的经济学发展理论，都是为了给那些看到城乡贫富差异日益加大而感到不安的人吃定心丸。

尽管奢侈风大行其道与中庸之道相互矛盾，但富兰克林告诉他的读者，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整个社会财富还在不断积累增加”。尽管富兰克林曾鼓吹过斯巴达式的简单生活，但是他也很清楚舒适生活的种种好处。在1784年7月26日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问本杰明·沃翰：“如果这样一个豪放的民族，能够依着他们的禀性爱好行事，生活得稍微懒散、轻松一点，难道奢华不可以创造出比它消耗掉的更多的财富吗？”紧接着，他讲了个故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梅依角(Cape May)至费城航段上，有一艘小船的船长曾经为我干了点事儿，但又没有要报酬。我妻子知道他有个女

儿,就送了她一顶样式新潮的帽子。3年以后,这位船长和梅依角的一个农夫(他的乘客)来到我家,提起了那顶帽子。他说她女儿对那顶帽子喜欢得不得了。“但是,”他又说,“我们的教区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怎么回事?”“我女儿带着它参加了礼拜,让好多年轻姑娘都羡慕不已,最后都非要去费城买这种帽子。我和老婆合计了一下,整个教区买这种帽子的钱不会少于100英镑。”“没错,”那位农夫说,“但是你没有讲事情的另一面。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那顶帽子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好处。因为就是它最先刺激我们那儿的姑娘到费城去兜售她们做的精致棒球手套,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可以用赚来的钱在费城买帽子和丝带。就这样,编织这种副业就在我们那儿发展了起来,而且越发展规模越大,可以满足更多的需求。”

商业化

从富兰克林(自由劳动者的)安乐平常,日益向农业商业化的转变,在大城市周围地区极其迅猛。比如,在富兰克林最熟悉的宾夕法尼亚东南部地区,1790年时,一般农场40%的产品都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富兰克林自己写道:农夫们仍然没有什么对进口货物的需求,而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相对于市场来说却过剩了。

富兰克林确信农夫们过着好日子,他写道:“在以往,农夫们从未从商业中赚到这么多钱……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拥有的土地也在不断升值;总的来说,他们能开出较高的工资……这样……没有其他地方的农场雇工能像美国的一样吃饱穿暖,拿到不菲的工资。”富兰克林并没有提到伴随这种经济繁荣而日益恶化的收入分配情况。相反,他坚持认为全体人民都在共同走向富裕:“走进城

市,我们就会发现大革命以来,房地产的价值不断攀升,而房租也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富兰克林自始至终都很清楚,商业化最终会导致制造业的大发展。早在1769年,他就对斯密的资助人凯姆斯爵士建议说,制造业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集中了价值,这样“产品就更容易运到国外市场去”。还有一次,他引用圣经典故(《约翰福音》),宣扬制造业,因为它们能够“把零碎(时间)都利用起来,这样什么就都不会被浪费了”。

这些都可以解释富兰克林如何在1769年的《宪法真义》中,在紧接着有关家庭手工副业的段落之后又写道:“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从事手工业可能比从事农耕更有利可图。”富兰克林在早些时候写给哥廷根大学法学教授格特弗里德·阿琛沃的信中,详细展开讨论了这一观点。根据阿琛沃的记载,富兰克林是这样写的:“土地足够养活富人和穷人,但是前者更喜欢从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不是从土地中得到较小的回报。”

这些话说明,富兰克林认为制造业会成为各个农场的副业,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积累模型最初认为的那样。在《结束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争端的宪法手段》的旁注中,富兰克林阐述道:“他们没有必要离开种植园;他们可以在农闲时间搞加工制造业。”

富兰克林还认为,从事这种经济活动的家庭,是美国最兴旺的家庭。除非说这些话的原因都是出于富兰克林的政治目的,否则它们多半代表了他真实的想法。

富兰克林还认为工人在这种经济中会致富。他写道:“各行各业对熟练工匠的需求日益增大,以便为土地耕作者提供不太容易从欧洲进口的房屋、家具、粗糙的用具。”

对于这种经济,富兰克林所持的观点是:“这些工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也确实挣到了他们想要的钱。”但是,富兰克林没有公开表示,他认为美国已经发展到可以开展大

工业生产。在1782年,他才解释道:“大工业生产需要大量只要低工资的穷人;这样的穷人可以在欧洲找到,但是,不到美国所有的土地都被占有开垦,而且大批人得不到土地、急需找到其他工作的时候,美国是不会有这种穷人的。”在未发表的笔记中,富兰克林既提到了工人较差的境遇,又提到了制造业辉煌的前景。比如说他在《宪法真义》的旁注中,隐约提到了自耕农生活状况的恶化:“实际上,美国没有什么农民的利润能超过5%。他完全靠自己和自己儿女的劳动来赚钱。”

尽管富兰克林试图论证工人很容易变成自耕农,但是随着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独立经营的人越来越少了。富兰克林在斯密出版《国富论》之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社会发展。

这样,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和农场收益的相对低迷,我们离雇佣劳动制只有一步之遥了。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富兰克林认为美国是英国情况的翻版。实际上,他为殖民地的特殊性而感到自豪。不仅如此,相对于斯密来说,他的观点与史都华的更接近。

富兰克林关于雇佣劳动的比较社会学

有时候,富兰克林也怀疑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参与到商业化进程中。比如富兰克林认为,美洲土著民是“天性喜欢悠闲、自由自在、不愿操心和劳动的人的典型”。他还补充说,尽管他们了解“艺术、科学和协作型社会的优势……但他们从未流露出一丁点儿想要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意思”。

不仅是在白人社会里受过教育的美洲土著,甚至连当了印第安人俘虏的白人,都无可避免地更喜欢“原始”社会,而不是文明社会。在同一件事情上,麦迪逊也在烦恼,美国社会从总体来说可能会退回到原驻民的“野蛮状态”。

在写给乔叔亚·巴伯考克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写道:“假如我从没到过美洲殖民地,只是根据我最近(在不列颠群岛)的所见所闻来做出判断,我绝不会让一个野蛮民族来接纳文明……这种文明社会只不过是压迫大多数人,使他们生活得还不如野蛮人,从而让一小部分人活得比野蛮人好些。”富兰克林似乎很喜欢这些人类学的字眼,所以在同一天写的另一封信里,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

不过富兰克林对美洲土著的价值观也有所褒扬,这与他那不愿勤奋劳动的白人的厌恶,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解释说,美洲土著寡欲少求,容易满足,因此生活快乐;而文明社会“对人工制品和天然物品的需求永无止境,因而更难满足”。

同样,富兰克林还很赞赏其他前资本主义文化的简朴。詹姆斯·库克船长的两名船员 1771 年告诉富兰克林,新西兰土著拒绝了库克的礼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制造这些东西。富兰克林赞扬那些人“勇敢而明智”,他还称颂道:“看啊,一个哲学家的国度!表现得像我们敬佩的他(指苏格拉底)经过市场时一样——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是我不需要的啊。”

库克自己这样写道:

他们生活的地方气候温暖宜人,空气清新有益健康,因此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对布料服装的需求。他们自己对这一点很清楚,因为很多人都漫不经心地把我们带去的而他们又没有习惯穿的衣服留在了海滩上和树林里。简而言之,他们似乎不认为我们带去的任何东西是有价值的,他们也从不在我们给他们一件东西以后,就扔掉自己以前的用品。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有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并且他们没有奢侈品。

与此完全相反的是,当传教士们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伊尔约戎特人中分发欧洲货物的时候,那些土著人接受了礼物,并且他们自己的传统制作工艺很快就因此失传了。

尽管富兰克林公开声称自己对传统社会很欣赏,但是他后来却很热衷于向新西兰传播文明。

在富兰克林看来,幸好不是所有人都会拒绝参与商业化的社会。在论文《美国内部事务》中他断言:“似乎每个国家里勤劳节俭的人都要占大多数,这些人容易致富,而那些游手好闲、挥霍浪费的人则更可能变穷;这样,总的来说,整个社会还是在不断积累财富。”这种观点肯定会引起斯密的兴趣,据说他相信“每个人骨子里都有苏格兰人节俭的禀性”。

不过,富兰克林并不是一直相信平民百姓都是勤劳的。在一封珍贵的写给彼得·柯里森的信中,他分析说,英国工人到达“劳动力价格高得多的”殖民地以后,他们的勤劳似乎相应地减少了。请注意这一观点对德裔移民来说是不适用的。富兰克林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制度”。他所指的制度,是向穷人提供一定救济的《济贫法》。

出于这一点,为了保证资本的积累,社会上不仅要有穷人阶级,甚至要有赤贫阶层。不管有多少人对工人工资自由浮动有偏见,至少对富兰克林来说,那些不妥协者最终会是正确的一方。

就在一篇大肆赞美美洲土著简朴生活的信中,富兰克林号召建立贫民习艺所,在那里穷困者“被强迫集中在一起,仅仅为了挣口饭吃,不得不听凭他人指使”。或者用富兰克林的代言人穷理查^①的话来说,“吃饱肚子,别无所求”。

总之,尽管北美殖民地贫富差异较小,看起来比英国更好一些,但是富兰克林意识到,要建立雇佣劳动制,一定程度的贫困是

^① 富兰克林所著《穷理查历书》中的一个人物。

必要的。他认为美国的工资水平在逐渐接近理想中“正常”或者“自然”的工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能够发家致富,而不必把穷人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毫无疑问,斯密对殖民地的这种情况同样也很赞赏。

富兰克林与斯密

斯密试图用新大陆的例子,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优点。尽管富兰克林的文章著作使他看起来与斯密持的是相同观点,但是这个精明的宾夕法尼亚人,实际上在教导新大陆的人民接受史都华而不是斯密的观点。如果仔细检查一下,斯密其实很难在富兰克林的著作里找到能支持他的“人口与发展”理论的例证。换言之,不管斯密对美国乡村的宁静做了怎样的描述,美国注定要按照史都华的设计路线——而不是斯密的设计路线——发展。正如富兰克林所总结的:

我们国家的每个工厂主都受到鼓励,组成自给自足的市场,为国家节省了大量本来要用于购买进口货物的资金。在英国人们都明白,一个工厂建立起来并雇佣一定工人以后,它周围地区的土地价格就会抬高;这一部分是因为工厂需要附近的土地提供更多的产品;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工厂会为那个地区带去大笔的投资。因此,新兴工业得到发展,好像对所有农夫和土地所有者都是有利的。

实际上,斯密的信奉者,杜加尔德·斯图亚特引用了富兰克林讲的斯密式的关于帽子的故事,来说明史都华对经济发展的分析。斯图亚特在引用那个故事之前,是这样评价的,富兰克林“信手拈来

的小例子……比我的长篇大论更能说明这种(经济的)整个自然发展过程是什么样的”。

与史都华相同,富兰克林开始认为工业只是农业的一个补充成分,后来,随着制造业所占时间的增加和劳动力的密集,他逐渐把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分离开来。由于史都华和富兰克林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不难理解史都华对待制造业比富兰克林更肯定一些。

尽管富兰克林与史都华有这些相似之处,最近一些学者还是认为,富兰克林与斯密更相近一些。比如,帕特丽夏·詹姆斯在最近的著作里就提出,史都华对城市健康发展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富兰克林的直接呼应。但是,富兰克林同史都华的理解相同:不断增长的人口能让劳动者接受在工厂专职工作。否则,富兰克林的著作肯定要比史都华的低一个层次。

威廉·格兰普和沃伦·努特都强调,斯密影响了富兰克林。尽管我们可能在富兰克林后期的著作中找到斯密观点的影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富兰克林认真研读过《国富论》,尽管他确实有这本书。斯密的观点与富兰克林的许多观点一样,在当时都深入人心。因此我们说,富兰克林思想演变历程受当时社会背景影响更深一些,这倒更保险一点。

诚然,有时富兰克林的论调听起来跟斯密的很相像,但是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只看富兰克林文字的表面意思。简而言之,说斯密影响了富兰克林,至少是理由不充分的。

比如,富兰克林在修改惠特利写的论文《贸易原理》(*Principles of Trade*)的初稿时,不遗余力地宣扬了一种自由贸易精神。但是在1774年那篇文章写作之前,北美的工业发展已经比他写《论人口增长》(*Observations*)和《论大不列颠的利益》(*The Interest of Great Britain Considered*)时更加发达了。更重要的是,自由贸易原则支持了殖民地独立运动。尽管这些政论文都是匿名发表的,人们很快就知道谁是作者了。

富兰克林对安乐平凡的痴迷,是与原始积累的早期阶段相适应的。这和史都华对家庭手工业的分析是类似的。后来,当劳动力已经足够的时候,富兰克林就又开始倡导一种比较传统的经济观念,这种观念更重视市场、公用事业、高消费等因素。就是在晚期,富兰克林的著作还是和史都华的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我们知道富兰克林确实研究了史都华。他在史都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Principles*, 凯里 1928 年再版)一书的第二卷第二章,做了好几页笔记(可惜的是,在其他方面都很细致的编辑富兰克林著作的编辑们,忽略了这些笔记。其中一位编辑向我保证,在接下来出版的书里会收入这些笔记)。富兰克林选择这一章来做笔记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包含了史都华有关自给自足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渡理论的最清晰有力的论述。

斯密并没有对富兰克林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予以承认。斯密自己是尽量对这种过渡避而不提的。斯密对富兰克林有关北美发展问题的观点有选择的借鉴进一步证实,他歪曲了富兰克林和史都华本来论述得很清楚的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经济。

第十二章

古典学者作为武装警察^①：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

据说，这一新学派的领导人物李嘉图先生曾宣称，在英国能读懂他的书的人不会超过 25 个。或许他的晦涩难懂是由于他的深奥，以至于能读懂他的人已形成了一个精通新语言的流派。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新原理》

史都华和欧文的苏格兰^②

罗伯特·欧文是一个很成功的纺纱工^③。和这一行业中的其他人一样，他发现要想在苏格兰或别的什么地方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件易事。工人们一般都反对“对劳动的监督管理、罚款、钟、金钱刺激、布道和学校教育、对市集和运动活动的压制”，这些都是和工业纪律有关的。这种反对，在苏格兰表现得尤其强烈。用欧文的话说，“按常规的传统方式培养起来的苏格兰农民，对到棉花工厂起早摸黑、日复一日的工作这一念头，持鄙视的态度。”

根据锡德尼·波拉得(Sidney Pollard)所说，“高地居民”据说“坐

① 警察(Cossacks)：尤指镇压罢工、示威等的武装警察。

②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早年在苏格兰经营纱厂。

在织机前从来都感到不自在,就好像是被犁套住的鹿一样”。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格兰,人们把工厂称为‘公共工厂’(public works)。这表明人们把它和贫民习艺所(workhouse)联系起来,而搬到工厂区去住,则被比做是流放。”马克思指出,甚至连亚当·斯密也把“制造厂”和“贫民习艺所”这两个词换着用。人们对工厂的反感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著名工业家理查·奥斯特勒的父亲宁可卖了他的生意,也不使用“机器,因为机器是工厂体系逐渐侵入之标志”。他认为机器是“富人剥削人的手段,这一手段相应地使穷人降了格,并给他们带来了苦难”。

由于人们对工厂工作普遍怀有厌恶之心,雇主们只好竭尽全力,到城市的中心去攫取劳动力。例如,有时孩子们由于学徒契约,不得不在工厂待上至少7年,通常要到21岁时才能离开。“济贫法将大批孩子像牛群一样送到那儿,关上几年”。

未来的雇主们必须善于把握有利时机。大卫·戴尔是苏格兰著名的棉花主,也是欧文未来的岳父。当听到有200个移民在附近的海滩遇到了海难,他马上就赶往那儿,去雇佣他们。和其他棉花巨头一样,戴尔最终发现,可以建立一个新村庄,以保证劳动力的供给。戴尔的村庄位于拉纳克郡,是詹姆斯·史都华爵士的故乡。这座村庄最后传到了欧文手中。

欧文认识到,船只失事之类的一些偶然机遇,无法满足现代纺织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他总结道:“现在只剩下两种获得劳动力的方式。一种是从国内各类慈善机构的手中得到一些孩子,另一种方式即劝诱一些家庭到工厂周围安家。”

为了使他的工人适应他们的处境,欧文为孩子建立了幼儿园,为年长一些的设立了夜校。他也建立了一项赡养基金,以照顾那些老弱病残者。此外,工人还能享受公司拥有的一家银行和一些销售价格低于私人零售商的商店的服务。

或许是由于他的这些开明政策，欧文的生意盈利颇丰。但是他的合作伙伴们却因为欧文在工人福利上花费过多而心烦意乱。正如詹姆斯·密尔 1813 年 12 月 3 日给边沁写的信中提到的那样，那些合作伙伴们“普遍对他在提高工厂工人素质方面所做的努力（这正是为他们所反对的）表示不满”。欧文接着又转向了另一批新的投资者，其中包括边沁。

不久这两个不太可能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又恶化了。1815 年 3 月 25 日，边沁写信给欧文，要求把他的投资要回去。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边沁毫不恭维地对欧文做了如下描述：“欧文一开始时是蒸汽，到了结束时也只是烟。他很会自夸，他的头脑就像个乱糟糟的迷宫。他试图避免谈及具体事务。他一贯如此，没有什么变化，同样的东西说了一遍又一遍。他建造了一些小房子；没有房子的人就可以去那里住。他把这称为他的成功。”欧文对此做了回复，他将边沁刻画成一个隐遁者，他和世界的唯一真正接触也是通过书本和他所信赖的朋友获得的。他宣称边沁的朋友曾告诉他，边沁在新拉纳克的投资，是他所有投资中唯一成功的。

当然，边沁对欧文的这种看法只代表极少数人。新拉纳克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称颂。虽然欧文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一般水平，但他的工人的生活似乎比城市无产者还要好。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工厂运转得很健康，收益很好，但也不是出奇的好。

马尔萨斯从另一个角度，反对欧文的工厂。1810 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受雇于那个棉花工厂的工人大约有 1 500 人，在这些人中道德败坏之风日益盛行。”但是，在他接下去的一句话中，他描述了那里一周 6 天、每天 13 小时的工作日程。不幸的是，马尔萨斯没有给出有关道德败坏的细节，这些大概都只能在安息日那天发生了。

欧文的人道经济模型

尽管欧文的社区有很多进步特征,但是工人对这种家长式的作风也有抱怨:“欧文先生强迫我们采纳他在有些问题上给我们提的做法,而这些事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公平。这整个过程和我们作为人的意向和思维方式是相矛盾的,也是对我们人格的贬低。”

人们只需追溯一下“公司城镇”的发展历程,就能看出潜在的弊端。我们可以先从弗兰西斯·卡波特·洛威尔^①开始。他最初想在马萨诸塞的纺织品城,再造他在新拉纳克看到的情形,包括对纪律的强调。

接着让我们看一下以乔治·普尔曼^②的名字命名的那个城镇。公司选择了有利的地理位置。设计这个社区的目的在于“吸引并留住一批素质较高的工人”。这些工人在这个社区中会得到更大的提高,变得更文雅,有教养。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亨利·福特设计的那套怪诞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超过30个人的调查员……(这些调查员)到工人的家中去拜访,收集各种消息,并对家庭预算、饮食、社会安排、生孩子,社会观点和道德等方面提出建议”。

值得赞扬的是,欧文知道他的村子的缺点。他试图创造出与

^① 弗兰西斯·卡波特·洛威尔(Fancis Cabot Lowell, 1775 - 1817):美国纺织商,曾深入研究了苏格兰的纺织工业,返回美国后成立了波士顿制造公司。他的工厂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为工人建造的舒适住宅,在当时是榜样。

^② 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 1831 - 1897):美国实业家和发明家。为了供雇员住宿,他在芝加哥的南面建立了普尔曼镇(后来并入了芝加哥)。这种由家长式统治的公司建立的市镇,是一个引起广泛议论的社会实验。

现存社区不同的更具自治性的社区，尽管一份名为《黑矮人》（*Black Dwarf*）的批评性报纸，十分敏锐地将他这种按家长式作风规划的社区称为“成年人的托儿所”。

欧文在棉花工业中的经历，在很多方面使他受到了教育。他认识到，劳动力正以快于工厂接受能力的速度被从农村赶了出来。在这方面，欧文似乎也受到了托马斯·斯彭斯的影响，后者对土地改革的呼吁，在前文中已经讨论过。但是，斯彭斯要求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在欧文身上已不再表现得那么强烈了。欧文希望的是，包括皇族在内的富人能够帮助他建立起一些村庄，以便让工人回到地里干活。

像史都华和斯彭斯一样，欧文认识到，食品加工业内的劳动社会分工，是决定真实工资水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欧文在1817年7月25日写的一封信中宣称：“手工劳动的价值必须重新得到承认，而这又是以土地上存在雇佣劳动为前提的。”

欧文对建立以劳动密集性农业为基础的村庄，制定了一份计划。他强调他的计划有社会性优势，而不是技术方面的优势。他呼吁富有的人们，甚至是政府，和他一起投资一个项目，以纠正社会劳动分工中存在的不平衡。

人们为实践欧文的想法而做的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是，事实上，位于爱尔兰克莱尔县（County Clare）的罗拉海（Ralahine）社区，还是相当成功的，甚至从盈利来看都很成功，直到后来它的所有者将财富输光为止。有些王室成员的确受到了不小的震动。

当然，欧文的很多想法根本不是新想法。欧文自己后来也发现，他的很多分析和解决方法，早就为被本书第三章中出现过的约翰·拜勒斯提出过了。拜勒斯被马克思认为是“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殊人物”。拜勒斯也精明地注意到“穷人的劳动……是富人财富的源泉”，但他还是主张资本家应投资创办工业大学来教育穷人，教育他们要勤劳，并保护他们不受那些现世追求

的困扰。

那么为什么利润还是必要的呢？拜勒斯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富人除了依靠别人的劳动外，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劳动力的集中合作，能使生产能力急剧增加，因此这位天真的慈善家希望能够通过改善社会劳动分工，来使全人类都受益。用拜勒斯的话说就是：“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抬起一吨的重物的，10个人也只能勉强做到，但是若有100个人的话，每个人不用过分费力，就能轻松的把它抬起来。”拜勒斯认为穷人像样的、还过得去的生活，和富人们关注于他们生意的利润之间，是谐调一致的、兼容的。他可能是第一个提到和现代的效率工资这一概念相类似概念的人。

在欧文的计划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很多政治经济学的因素了。毕竟欧文的目的在于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如史都华早先认识到的那样，自给自足的农场劳动力的数量如果增加，将会减少参加剩余价值生产的人数。使史都华感到烦恼的是，若退回到精耕细作的阶段，利润可能就会受到损失。这种诚实与坦白，在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已很难看到了。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把欧文的计划抨击为对文明的危害。

关于土地改革的一段题外话

之后的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呼声，在欧文的思想中也有体现。在英国和美国，工人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有机会自己去耕种土地，但他们还是站在了争取土地改革斗争的最前列。例如，宪章运动的成员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就买了土地向他们的成员出租。奥康纳^①在1845年6月7日的那一期《北极星报》(Northern Star)中谈到：

^① 奥康纳(Feargus O'Connor, 约1796-1855):英国宪章运动的领袖。

对他们来说,土地的首要用途是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中供大于求的状况;其次是为人们创造一些工作机会;再次是为人为的市场设定一个自然的工资率。只要还存在劳动力剩余,只要劳动力还有充足的来源,工资就会仍然保持不稳定的低水平。

奥康纳意在说明,工人们可以被拉回到土地上,从而使“每个行业中的工人数量(有可能被调整为适合于)人们对每个行业生产的需求量,从而使供需达到健康的平衡”。

遗憾的是,奥康纳的观点很狭隘。他将“共产主义”谴责为“一种令人着魔的理论……它为那些最狂热的空想家开辟了一片广阔的领域,使其沉溺于其中”。他想“将游手好闲定为一种犯罪”。更为重要的是,奥康纳想要复兴小商品生产体系。无论如何,宪章运动的计划失败了,资本主义体系仍继续存在。它对人们的“压榨和折磨”也继续存在着。

正如他们无法认同赫尔曼·克里格在美国发起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样,宪章运动的左翼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并不支持奥康纳的计划。这一点并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但是,恩格斯的确也认为,在像德国那样经济条件不很先进的地方,还土地给农民,不失为一种具有进步性的方案。

宪章运动的计划,对在短期内提高劳动力工资,可能是有帮助的。被富有的慈善家雇为费城荒地开垦协会(Philadelphia Vacant Lots Cultivation Association)主管的 R. F. 鲍威尔先生的例子,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亨利·乔治的追随者,鲍威尔先生十分清楚他的城市中用于投机的空闲土地有多少。据他统计,其占地面积已达到了整个城区的 1/4。鲍威尔先生共帮助了将近 1 000 户家庭,到这些土地上开垦园地。对于那些特别贫困的人,鲍威尔先

生还将他们雇为园丁,而工资只有每小时 12.5 美分,即使工资涨到每小时 40 美分,他的机构也不会有损失。

那么,为什么将工资定得那么低呢?因为该协会由富商组成的董事会,不允许将工资定得更高。鲍威尔告知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译者弗劳伦斯·凯利说:“麻烦将会源源不断……如果这些人发现他们能赚那么多的话,他们就会要么离开工厂,要么在工厂里也提出同样的工资要求。”

大卫·李嘉图

欧文的计划引起了很大争议。古典政治经济学被牵扯到了这场争议中。这一争论很能揭示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社会分工和自给自足的看法。

李嘉图是不愿参加这场争论的人中的一个。不该有人期望李嘉图会对欧文的计划表示多大支持。现代评论家经常引用李嘉图对穷人表示同情的那些话,但这种感情即使不能说是空洞的,至少也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李嘉图对于雇主们企图“将给工人的报酬压到最低限度”,根本不持批评态度。在他在议会做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就警告其他议员,不要对穷人的孩子过于仁慈,以免这些善举使他们生更多的孩子。

1818 年,李嘉图拒绝给詹姆斯·密尔捐款,用于威斯敏斯特幼儿园学校,理由是学校将用这笔捐款给孩子们提供一些饮食:

如果喂养并教育穷人们那些三岁以上的孩子,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的话,我对这项计划表示最强烈的反对,如果我对此给予资助的话,我就太前后自相矛盾了。我对济贫法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对任何一个鼓励人口过多增长的体系的态

度也是如此。如果你给所有穷人的孩子吃的,穿的,还让他们受教育,这将对本已过于活跃的(人口增长)的极大鼓励。

即使是这样,当和罗伯特·托伦斯^①一起参加欧文主义者的一个会时,李嘉图还是屈服于压力,参加了研究欧文的建议的委员会。从一开始,李嘉图就怀疑那一方案,能否按欧文想像的那种社会主义形式得到实施。他在给他的朋友特劳尔的信中写道:“会有任何有理智的人相信欧文,认为他所设计的那种社会能繁荣昌盛,而且如果人们受到个人利益的驱使,他们就能比以往任何时候生产效率都高吗?难道过去那些年代的经历,不都是在证明他是错的吗?”

李嘉图的反对并不仅仅限于对人类本性的哲思上。他指出,欧文要建立“一种与政治经济学原则不相符,并……给社会造成无穷苦难的理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李嘉图和欧文都认为,现存的社会分工是由个人利益造成的。但欧文认为,这一结果对劳动者的福利是有害的。李嘉图对这一问题的考虑则是建立在另外的基础上。他认为,如果劳动密集型技术对社会有利,那么它们也就会是有利润可图的。这一想法的结果是,他告诉议会,“一旦农场主认识到寻找另一个体系对他是有利的,他就会很自然的接受它”。

考虑到他的这一立场,李嘉图可能会接受欧文的某些分析,但决不会同意他的解决方法。李嘉图只想知道精耕细作是否更有利可图,仅此而已。市场自身会解决其他问题的。

带着这种态度,李嘉图对自己提出的设问做了回答:“目前,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劳动力。如果有有关精耕细作的一些说法

^① 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 1780 - 1864):英国经济学家,澳大利亚殖民化倡导人。

都是事实的话,满足那一需求就是一个有益的做法。”

后来,李嘉图一直将欧文主义等同于慈善事业。例如,1819年,李嘉图被提名为一个议会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是威廉·斯图格尔-伯纳领导的,目的是对济贫法进行调查。威廉·斯图格尔-伯纳建议取消对有很多孩子的父母的贫困救济,同时他又主张,对那些在贫民习艺所的穷苦孩子以救济。李嘉图不同意这一提案,声称向那些父母保证“他们的孩子可以到济贫院去,并且在那儿会受到很好的照顾……这只不过是欧文先生的计划的一个走得更远也更糟糕的一个翻版”。

李嘉图论马和机器

李嘉图表面看上去对市场很有信心,但他在知性上还是没有欺骗自己,他体会到了怀疑主义的恐慌。最终,他在自己未发表的《马尔萨斯论》(*Notes on Malthus*)中,对欧文所关注的一些问题,给予了一定的认可。在那篇文章中,李嘉图明确地承认,如果换一种农业技术,尽管对于单个的独立农场主来说并不有利,但或许能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

或许人们做的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用马来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马对工人阶级有利的话(虽然伴随而来的可能是更大的产出),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难道这不也正意味着对劳动力的需求的本质性减少吗?我想说的是,可能会有一种更便宜的耕作方式,采用这种耕作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会减少,反之就有可能增加。

有两则和李嘉图在这儿的立场有关的评论。第一,李嘉图在早先

的一篇笔记中认识到：“事实上，人类使（净）产出的减少与消费的增加，协调了起来。”从农业方面讲，拿精耕细作和用马进行劳作相比，折合为谷物计算出来的农场工人消费的粮食，和农场主的利润的总和，在前一种情形下也可能更多一些，尽管就利润而言，用马匹代替人力给农场主带来的利润可能会更高。李嘉图对削减消费的可能性的思考，表明他感觉到了市场中似乎缺少了些什么。

第二，李嘉图在写了下面这个想法后，又把它删掉了：“在这个用劳动力代替固定资本的例子中——如果马匹可以被称为是固定资本的话——资本家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对工人阶级而言确是有利的。这或许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例子。”换句话说，引入固定资本可能会带来有害影响，这种可能性只限于用马匹代替人力这一情形。

和皮埃罗·斯拉法相反，塞缪尔·荷兰德认为，关注使用马匹对农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并不一定会引出李嘉图后来的那个观点，即一般来讲，机器会伤害到劳动者的利益。从以下几点来看，荷兰德的这一立场是正确的。

首先，包括欧文在内，有一大批作家都注意到了用马匹耕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当时，1匹马的劳动量大约相当于5个人的劳动量。马匹还需消耗大量食物，而这些食物原本可以用来给农场工人们吃。每天除了干草外，1匹马一般还需要消耗3配克^①的燕麦、1加仑的豆子。有一位作者把马匹称为“整个农业经济网中最危险的蛀虫”。甚至连坎特龙（Cantillon）也提到了这一点。

在做出对用马匹耕作的那段评论后的几个月内，李嘉图关于机器的观点似乎就发展成熟了。但我们还是不能肯定地说，两者之间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至于李嘉图关于机器的评论，与欧文的方案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对此我们也无法做出肯定的回

① 1配克等于2加仑。

答。李嘉图用抽象原则的形式表述了他的分析,和任何具体政策都没有任何联系。他说:“我没有意识到,我所发表的关于机器的任何东西中,有什么我必须收回的。”但他又接着说,“然而我已通过别的方式,对我认为是错误的学说给予了支持。”这可以看做是他承认没有公平地对待欧文。说这话时,他头脑中想的是否是他早先对欧文的批评呢?

马匹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子

现代经济学家通常把所有推测都扫到一边,例如李嘉图对于马的关注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食物的供给并非重要问题。新雇佣关系自然就会产生。由于用马匹耕作技术的先进性,食物的价格会因此下跌,总的消费能力就会增加。由于购买能力的增加,会使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应增加,因此被马匹换下来的劳动力只不过是转移到新行业中去了。这样的话,所有涉及马匹和人之间为食物而竞争的言论,似乎就显得不切题了。这种乐观的看法,只有在工人们找到了新职业,并且能挣到足够的钱去买相当数量的食物后,才有意义。现代社会的现实,并不怎么能证明这种乐观主义。

相反,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马看做一个特殊的例子,原因有两个。首先,一个特定的农业模式影响到了他们对马的看法。他们经常建立起一些简化的模式,在这些模式中,他们把作为投入的谷物,和作为产出的食物,或多或少等同了起来。

当谷物既是投入又是产出时,说技术变化会对工人有利,这一说法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尤其是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假设工人的工资完全依赖于雇主们预留的用来供养工人的一个基金。而且他们所说的基金,似乎是由实物构成的。由于马匹会消费掉原本给工人吃的一部分食物,马匹自然会减少那一基金的数量。

其次,很多人将用马力代替人力和圈地联系起来。圈地是生产方式重大变化中的一个内在部分。机器的使用,则大体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生的。因此,用马匹耕作就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尽管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是这样认为。虽然在市场关系发生之初可能会使人们经历一定的痛苦,但市场的发展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

再次,和工业革命时期遍布于英伦三岛的现代纺织工厂相比,农业通常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我们不该把这点,说成是“李嘉图关于马匹的讨论被认为具有独特性”的第三个原因。事实上,这一印象是有误导性的,至少李嘉图是这么认为的。他于1822年5月9日在议会发言中提出,他认为,农业和工业相比,资本密集程度并不低。事实上,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并不是很高。整个国家在给马钉蹄上的花费,比整个纺织业的资本投入还多,而纺织业是工业革命中最核心的部分。

农业是这样一个投入和产出都为谷物的特殊行业,因此,李嘉图便把它看做是和制造业不相关的一个特殊例子。

经济学家至今仍在讨论,李嘉图在关于机器的那一章中是否犯了错误。我认为这一问题之所以能引起如此混乱的局面,部分原因在于李嘉图对机器折旧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保罗·塞缪尔森给出了对这一章的一个更好解读。塞缪尔森将马匹看做一种机器,或许是这一点,使和其他那些狭义看待机器定义的人相比,就有了优势,因此,塞缪尔森能够避免犯在解读李嘉图的机器理论时经常出现的错误。

李嘉图和折旧理论

李嘉图关于固定资本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不认为

他关于马匹的理论和关于机器的理论具有可比性。作为背景知识,我们应该注意到,李嘉图对资本的特殊看法,是他《论机器》那一章中的一个严重缺点。他认为,只要对固定资本进行了足够的保养,使其完整无缺,它就会一直具有生产能力。

是的,我知道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一书中,第一章的三到五节,讲的都是他对资本耐用性的思考。但是当我们进入关于机器的那一章时,所有对耐用性的考虑,都被抛到了一边。李嘉图在他于1821年6月18日给麦卡洛克的一封信中,几乎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写道:“我没有谈到机器到底能用1年、10年还是100年的问题,我在这上面的态度的确应该再明确一些。”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的其他地方,李嘉图的确也时不时谈到,由于技术进步,机器可能因为闲置不用而折旧。例如,他对下面这个例子做了评论:

有一个人花了很多钱,在他的工厂里置备了机器。后来,由于一些现代的发明,这类机器有了很大的改进,因此他制造的商品就大大贬值了。至于他是否应该放弃那些旧机器,置办更好的机器,从而丧失所有的旧有价值,还是继续利用那些旧机器的相对微弱的力量,这就纯粹是一个计算的问题了。

即便如此,在关于机器的那一章中,李嘉图仍把机器当做是可以一直使用的。我们不应该因为他的分析存在的缺点,而对李嘉图过于苛刻。首先,他只不过是在遵循当时通行的计算方式。的确,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机器的最初费用等企业的一般管理费用,都被看做没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根据一位研究会计思想的历史学家理查·布里夫的观点:

会计实践基于一个最古老的假设,其中隐含的意思是:只要还处于正常的运作状态,那些有形固定资产就是不变的……根据更新会计法^①(replacement accounting),所有维护、修理、更新的支出,都属于费用。来自股票市场的基金,用于增加和改良设备的支出,也就是资本支出,被资本化了……对最初的设备的折旧问题的认识,也就被拖后了,直到那些资产被更新的那一刻。

由于持有这一观点,李嘉图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讨论机器问题的时候,把折旧问题考虑在内。但是,对折旧问题的忽视,使李嘉图在处理机器的问题上大打折扣。

在不考虑折旧问题的情况下,李嘉图的机器和他的土地一样,被赋予了一种想像的、可以无限存在下去的生产能力。其结果是,李嘉图没有把用来制造机器的劳动,算做最终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因为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样的话,李嘉图只需将用于维护机器的劳动算入支出就可以了。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家,李嘉图为什么没能在他关于机器的那一章中超越当时粗陋的资本理论呢?为什么他没有把他对于过时技术的认识,融入他更理论化的分析中去呢?

我们无从知道李嘉图对这一问题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我想在此做一个猜测。李嘉图在资本理论方面的一致性,可能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混乱。它可能表明,他的资本理论更有深度。

李嘉图也谈过,应该将资本折旧问题纳入考虑范围,这表明他看到了当时幼稚的资本理论中的不足之处。同时,李嘉图的复杂性也使他很可能认识到,在经济模型的大环境中建立一个精确的

^① 更新论:以数学方法确定何时更换机器设备最为经济的理论。

折旧理论,是不可能的。

假设李嘉图曾试图把握贬值这一概念,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很可能会使他陷入困境。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经济模型对贬值做过任何现实介绍。其中的原由不难看出。

会计师用的那种单凭经验的方法,对一个旨在说明利润最大化是如何实现的经济理论来说,是不够的。但是折旧问题,又要求理论去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例如,一件设备(资本货物)的折旧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那件设备的经济寿命。大多数公司不会因为资本货物磨损了就将它抛弃。如果一家公司在1年内就把那一货物废弃,那么整个折旧的进程就不得不在这1年内完成。如果那一资本货物被用了10年的话,那么折旧的进程就会更缓慢一些。

每一次替换,都受到对将来替换期望的影响。在做出任何替换决定之前,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者,通常会对下一代资本出现的日期做一个预测。约瑟夫·熊皮特曾写道:

虽然情况不是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但是,放弃一些设备的考虑,通常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否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一问题……新型机器通常只不过是一系列改进中的一个环节,而且很快也会变旧。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跟下去,而不考虑每次所要遭受的资本损失,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

在经济大萧条的末期,经济学家在一段时间内考虑到,要建立一个关于资本经济寿命的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满足哪些困难条件。但是,建立这一理论的困难是如此之大,没有人敢接受这个挑战。折旧依赖于资本货物的经济寿命,因此在对折旧进行分析的同时,也需要对期望进行分析。经济学家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理论来分

析期望。

亚当·斯密建立了他的理论,来说明市场为小雇主、他们的工人以及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建立起了和谐的关系。同样,现代经济学家们也勾画出他们的理论,以表明市场本身的力量会实现可能的最有效产出。其结果是,他们对折旧理论避而不谈。这种做法是一种大趋势的一部分。那就是人们认为,意外事件、无知等,都有可能使整个经济偏离效率最大化的轨道,但他们偏偏不承认干预性的政府也会是原因之一。在这些方面,现实主义的考虑是微不足道的。

要指望李嘉图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掌握错综复杂的折旧理论,这完全是不现实的。毕竟,李嘉图很擅长使他的理论在分析角度上更易处理。对此,只须想一下他是如何巧妙地从他的价值理论中除去对租金的考虑。因此,虽然对折旧的现实主义描述也偶尔出现在他的书中,但是,一旦对折旧的分析可能歪曲他的机器理论所要表达的思想,他就会注意避开它。

在这儿我们还可以发现,马和李嘉图所说的那种机器,还有另一个差别。认为马匹是不会折旧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马不是长生不老的。即使受到最好的照顾和保养,所有的马最终都会死,或者是因为受伤了,或生病了,要不就是老了。因此,“马资本”是李嘉图的固定资本和循环资本之间的一种资本,尽管从理论上讲,很多农场主都能拥有一群“不折旧”的马,至少从保险统计的角度上说是如此。

李嘉图和机器

李嘉图那著名一章的核心内容,是分析这样一种情况:工业中引入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会给劳动力带来危害。他在给麦卡洛克

的一封信中,甚至做了下述推测:“如果机器能代替人完成所有的工作,那么对劳动力就不会有需求了。”在这种假设下,“凡不是资本家的人,买不起或租不起机器的人,就无权消费”。

李嘉图还注意到,“劳动阶级对整个国家的净收入是如何花费的,没有什么兴趣,尽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收入都应该花得使那些有权享用的人满意和高兴”。几段后,李嘉图又说,如果富人们将他们的钱用于“购买酒、家具等奢侈品上”,工资水平就可能随着战争的结束而下降。事实上,他似乎认为劳动者有权对富人如何花费他们的钱,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他没有暗示说工人阶级也同样有权对财富分配提出质疑。

富人的消费方式,这和机器模式所提出的一些政策问题,有什么联系呢?毕竟,拿破仑战争后的重大社会动荡,是无法用对奢侈品的过多消费来解释的。但是,仅仅提到那个时期这一点,就给那个模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方向。

在接下来的一段中,李嘉图又回到了对使用马匹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讨论中去了。在此他又暗示,他的模型并不只是一种抽象的演练:

还有另一种情形……即国家净收益——甚至是总收益——的增加,和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并存。也就是说,马的劳动代替了人的劳动时……用马代替人不会给人带来什么好处,而且……很明显人口会过剩,工人的处境也会恶化。

换句话说,一般而言,机器会给劳动者带来损失,但这一后果在用马耕作的例子中表现的更为强烈,因为总产出和对劳动力的需求都下降了。

李嘉图没有按着这个思路下去。在接下来的一段中,他把他的模型中一切和政策牵连的地方,都清除了出去。他指出,他的模

型只涉及机器的突然改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技术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在技术方面的突然进步,和李嘉图的静态价值理论是相悖的。

李嘉图进一步对他的发现做轻描淡写的处理。他用隐晦的方式指出,机器不会对工人造成巨大伤害,因为,除非存在高工资,否则引入机器是不经济的。即使有了高工资,机器也不一定被广泛引入生产。例如,根据李嘉图的观点,机器在美洲农业中的应用是不经济的,因为那里的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当然,对农业机械的密集使用,很快就成了美洲农业的一个典型特点。

英国的《谷物法》

即便欧文的提议对李嘉图的理论没有多大重要性,劳动密集性农业的问题,在当时却是一个争论激烈的政治话题。议会当时正在积极推行一项有争议的政策,阻碍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发展,这一政策即著名的《谷物法》。

18世纪上半期,英国是欧洲一大部分地区的粮仓。它出口的粮食,足以养活英国1/4的人口。随着人口的增加、原始积累进程的开始,英国经济变得逐渐依赖于进口的粮食了。就这一方面,侯赛因·阿塔和凯斯·特莱伯曾说道:“在英国这个没有农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人们可能会注意到,由于国际竞争,农耕地区发生了重大衰退。”

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一趋势是相对优势的结果。就是说,他们认为英国可以专门从事制造业,把粮食生产的任务留给周边的一些国家。但是,较近的历史表明,工业化国家也可以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有了这一认识,我们就可以推测,原始积累进程的出现和传统粮食生产体系(包括对家禽的重视)的衰退,或许

是英国粮食生产紧缩的主要原因。

根据传统的看法,《谷物法》应该会使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波伊德·希尔顿甚至坚持说,《谷物法》使对所有劳动力的需求都增加了。他推论说,虽然更高的面包价格,缩减了对工业劳动力的需求,但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农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足以抵消这一缩减。

根据这种说法,《谷物法》增加了国内农业的生产,因为它阻碍了人们对进口产品的需求。此外,人们还认为,在国内的贫瘠地区,每生产一蒲式耳^①所需的劳动更多。事实上,李嘉图本人求助于贫瘠地带劳动力花费更高这一事实,来建筑他的相对优势理论,用这一理论来反对《谷物法》。一些《谷物法》的支持者,也提出了他们反对废除《谷物法》的理由。《北极星报》到1840年,还在重复这种立场。

实际上,这一论点并不一定成立。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很多农业经济学家都声称,价格支持实际上最终会导致长期的低价格。最初吸引人的投资氛围,会引发长期的技术变革,而这一变革又会最终导致有充裕资本的人的劳动成本大幅度下降。的确,詹姆斯·安德森等早期《谷物法》的支持者为这一法案所做的辩护,和英国政府在1815年所做的辩护十分类似。

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对将沼泽地和湿地改造为农田这一资本高度密集型项目感兴趣的农场主,都属于什么类型。李嘉图关于资本永远具有生产能力的理论,一般来讲是不确切的。但这些改良土地的例子,为这一理论提供了一定的辩护。一旦投资到位了,很多原先贫瘠的土地获得了高产出的能力。这不一定比资本密集程度不那么高的典型小麦农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事实上,很多这样的农场主走在了农业改良的最前列。《谷物法》的废止,很可

^① 蒲式耳:谷物等的容量单位,在英国约等于36.368升。

能会削减国内的粮食用地,但是很多——虽然不是大多数——改良后的土地,仍有可能继续作为耕地。

从初级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谷物法》的相继引入和废除,很可能将农业供给曲线右移。其结果是,这些农场所用的劳动力,可能最终会比一般的小麦农场要少。相应的,《谷物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不如期望的那么多。

事实上我认为,由于它对劳动密集型农场带来的负面作用,《谷物法》可能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当然,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并不等于劳动密集型农业的活力。我的论点是,《谷物法》削弱了小农场的生存能力,从而增加了雇佣工人的数量,使失业的范围扩大了。

《谷物法》和小农场主

《谷物法》在一个重要方面,对农业就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和其他大多数农作物相比,谷物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相对要少一些。此外,谷物种植所需的季节性工人,比大多数小规模种植业要多,尤其是因为,典型的小农场采用的生产方式是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从而在尽量长的一段时间内分配劳动力,这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谷物法》可能增加谷物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若对《谷物法》的影响做一个全面评价,它对比谷物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的作物的影响,也应放在考虑范围之内。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早期,劳动密集型农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16世纪晚期,作为商品的蔬菜种植业有了迅猛发展。到1649年,伦敦园艺公司(the London Gardeners Company)的成员,共雇了1500人,学徒也达到了400人,平均每个人有6个雇员和1至2名学徒。有些富人还拥有自己的私家园子。据格里高利·金统计,

英国人对水果的消费比荷兰人要多。还有些人认为,英国人也比法国人消费得多。

到18世纪早期,英国已发展出了一个由劳动密集型的农耕和园艺组成的先进体系。当英国的酒吧提供诸如椰菜等蔬菜时,同样的蔬菜在法国还很少见。尽管法国被誉为商品蔬菜种植业的领头人,但英国似乎在某些技术方面,走在了法国前头,这些技术包括如何使花椰菜和芦笋在钟形玻璃罩下生长。

在关于《谷物法》的早期辩论中,商品蔬菜种植业通常是小规模的,但同时也是很成功的一个产业。当时的很多观察家认为,小农场主在蔬菜和奶制品的生产上,有相对优势,而大农场主则在谷物生产方面更有优势。

大多数情况下,大农场主对种植专门作物并不感兴趣。随着原始积累进程的加速,很多小农场主消失了。肯特认为,其结果是,“原先,他们(劳动者)可以在各自的教区买到牛奶、黄油和其他一些小件商品,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自从小农场数量减少后,人们再也买不到这类商品了,因为大农场主根本不会想到要零售这类小商品,即便他们从事零售业,他们也是把东西拿到城里去卖”。此外,税收使谷物与水果、蔬菜、家畜相比,更加有利可图。其结果是,税收使生产的重点从肉类、奶制品、水果和蔬菜,转向了谷物。

即便英国的气候很适合奶制品和蔬菜等的生产,专业作物生产仍然衰退了。相反的,随着后来《谷物法》被废除后谷物价格的下降,英国的各类资源,又加速度地转移到商品蔬菜种植业。但是,英国后来的这一蔬菜种植业和先前的不同。它常常是大规模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流动劳动力。

在使贸易条件朝着不利于小生产的方向发展时,《谷物法》所起的作用是双倍的。首先,这一立法直接鼓励谷物生产,促进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其次,典型的小农场主必须购买粮食,以供个人消费,因此《谷物法》也直接打击了小农经济。

在法国,我们可以看到小规模农业对廉价谷物的依赖性。在那儿,葡萄种植者经常由于粮食价格过高而引发骚动。佛兰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子。在那儿,农场主们购买谷物,使他们可以把尽量多的土地和时间,投入到高价农作物的生产上去。根据B. H. 斯里彻·范·巴斯的统计,在19世纪,一个佛兰德家庭靠一英亩半的亚麻,就可以维持全家的生计。这类农场的产出并不小。汉密尔顿曾提到,若收成好时,半英亩亚麻地的产量,足以满足整个康涅狄格州对亚麻的需求,即使在该州对亚麻需求量最大时也足够了。虽然如此,这些行业仍然需要廉价的粮食,以维持生计。

因此,《谷物法》使贸易条件朝着不利于小农场主的方向发展,这或许也怂恿了人们违反《狩猎法》。而且,《谷物法》提高了收获、种植季节的雇佣劳动成本,从而减少了农场主们的收益,或迫使他们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

即使存在《谷物法》,英国农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仍然很高,很多农民仍然用镰刀,而不是长柄镰刀,尽管使用前者需要更多劳动。但是,英国的农业和欧洲低地相比,劳动密集程度还是低得多。

研究内战后美国南方农业的学者,发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随着农场平均规模的缩小,小农场主们只好放弃种植玉米,改种棉花,此外别无选择。棉花生产的风险性更大,农场主们只能寄希望于买进玉米,从而能更好地投入到他们的商品作物生产中去,以维持生计。其结果是,更高的谷物价格,将那些规模太小,无法从事谷物销售的农场摆在了不利位置。

总的来说,更高的谷物价格,给英国农业体系中的很多方面都带来了不利影响。侯赛因·阿塔和凯斯·特莱伯就这一点写道:“谷物税所带来的利益,分布极其不均,就这一点人们达成了广泛共识,不仅仅是农学家有这一看法。例如,霍恩洛厄伯爵在1895年

说,农场的土地面积若小于 12 公顷(根据 1895 年农业普查的结果,87%的农场都属于这一类),就没有谷物可卖,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还是谷物的买进者。”马克思做过一段短评,指出《谷物法》“通过高地租,以及用工厂中的方式剥削土地财产,从而将农民转变为最贫穷的无产者”。除此以外,别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谷物法》和农业规模之间的联系。托伦斯似乎是古典经济学家中,唯一一个提到贸易条件在农业中的重要性的。他评论道:

兰开夏的荒地不可能最初就是用来种植谷物的,因为开垦和耕种这些土地的工人所需消费的谷物数量,比他们能生产的数量还要多。但廉价谷物被从爱尔兰等地购入;财富和人口的增长,使得对农业奢侈品的需求激增,而这些奢侈品并不在农场劳动者维持生活所需的产品之列,因此一旦消费了就无法再生;其结果就是,过去的荒地现在种上了价值很高的农作物,而且所需的地租甚至比英国最肥沃的耕地还要高。

显然,托伦斯对于自己在理论方面超越李嘉图主义迈进的这一步,感到很满意。他在《给乾多斯侯爵的关于《谷物法》对预算影响的三封信》(*Three Letters to the Marquis of Chandos on the Effects of the Corn Law on the Budget*, 1839)和《预算》(*The Budget*, 1842)中,对这段话做了逐字逐句的复述。在他给《博尔顿时报》(*Bolton Chronicle*)的一封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思路。但是,无论是托伦斯还是他的同事们,都没有把这一思路推进一步。

总的来看,我们可以说,《谷物法》的基本目的,是帮助那些大农场主,使他们以牺牲小农场主为代价,卖出自己的大部分产品。因此,重心向谷物生产的转移,可能意味着农业就业总数的下降。

熟悉古典政治经济文献的人可能想说:“等一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也是反对《谷物法》的吗?”对此,我不得不回答说:“不完

全是。”

只是当《谷物法》已经达到了操纵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目的后，英国经济学家才以市场自由的名义，将《谷物法》抛弃了。有两项策略性考虑，导致了这一改变。首先，英国的制造业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因此他们认为，接受进口谷物，有助于使其他国家接受英国的制造业产品，从而建立一个有利的国际性劳动分工，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谈到了。其次，他们认为制造业可以从廉价食物中受益。但是，我们将在李嘉图的例子中看到，这种对廉价食物的兴趣，也是有条件的。

为富人生产的奢侈性农作物

在《谷物法》之下，经济条件不利于小规模农业生产。所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很多专门的农产品在英国出现了供给不足的状况。例如，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在那儿度假的马尔萨斯抱怨说英国乳酪短缺。西斯蒙第说，英国所需的鸡蛋，要依赖法国的供给，而且当他访问英国的时候，很难找到黄油和蔬菜。

具有讽刺性的是，很多富裕的英国人仍然能够吃上水果，因为大多数上流社会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李嘉图主义者，都拥有自己的温室。亚当·斯密对富人和穷人从事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区别，进行了以下分析：

农作物生产也变得更加不稳定了，至少在啤酒花和水果种植园内的情况是这样的。因此，除了补偿意外损失外，价格还必须足以支付诸如利润保险等费用。园林工人们的生活通常都是简陋的，而且总是很贫寒的。这可以令我们感到满意，因为，看来人们对工人的才智，没有给予过高的报酬。很多富

人为了娱乐,也学会了他们那门令人愉悦的艺术,以至于那些想以此谋利的人,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因为那些本可能成为他们顾客的人,现在自己也可以做了。

换句话说,现在富人和农民一样,开始从事不经济的小规模农业了,这正是政治经济学所强烈反对的。当然,那些社会精英们所从事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受的是美学原则的左右,而不是为经济法则所控制。

我们在第三章对鹿苑的探讨中,已遇到过类似的现象。狩猎一方面被认为是穷人的一种不正确行为,另一方面却是富人们受人尊敬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塞缪尔·约翰逊绝对是富有的英国人中的少数。他断言说“最好的花园……应该是有很多的根和果实的;有很多鱼的水才是最好的水……就仿佛人们只要听听轻柔的低语、看看天然瀑布,就能填饱肚子一样”。

《谷物法》和劳动力供给

从前面可以看出,《谷物法》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可以是巨大的。小农场数量减少了,为更小规模的经营所代替。根据关于原始积累的古典理论,这些更小规模的经营,是用来补充非农业工资的。

约翰·巴顿有人认为,他的研究促使李嘉图改变了关于机器的立场,使他将贫穷和谷物价格的下降联系在一起,而后者被他认为意味着对农业劳动力的更高需求。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农业工人可怕的贫穷上,为此他应该受到赞许。但是,他的分析和我在这儿所列的观点是矛盾的。

的确,如果没有《谷物法》的话,对某些农业工人的需求的下

降,将会被不那么受季节影响的其他劳动力的需求所弥补。结果,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将涌向工业劳动力市场,非熟练工人的供给增加了,而对某些具有特殊技术的劳动力的高需求,却仍然得不到满足。《谷物法》带来了真实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这点来看,也有助于建立起劳动纪律。

在1799年和1815年期间,谷物的价格上涨了,尽管正如前面所说,潜在的生产能力增长的回报,开启了未来价格下降的序幕。李嘉图认为,《谷物法》会导致工资的真实成本的上升、利润的下降。和他相反,马尔萨斯认识到,劳动者的处境越来越差,这使雇主们可以延长劳动时间。尽管名义上看工资增加了,但真实工资却下降了,而剩余价值则增加了。毫无疑问,《谷物法》对原始积累进程所做的贡献,在这方面帮助了雇主们。

更糟的是,《谷物法》的结果之一,可能就是从制造业向农业转移,这一转化可能造成工业资本更加不足。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李嘉图认为和工业相比,农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而不是更低。假设李嘉图是对的,对谷物生产的人为刺激,可能会使对资本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进一步增加,从而提高利润和工资的比率。即便我们忽略对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农业的破坏,上述这一结果也是站得住脚的。

不久,很多小农场主都变成了工业工人,而很多工业工人则不得不接受在工厂工作的行为准则。在那一点上,较低的食物成本会带来更高的剩余价值率。既然《谷物法》的继续存在已不能给资本带来什么好处,它们很容易就被废除了。

是的,我们在前面说过,《谷物法》可能会使谷物价格下降。但是,这一因素并不能算是废除《谷物法》的原因之一,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好处。此外,所有能提高土地生产力的有效技术,可能已经被农场主们用尽了。

我对《谷物法》的理解和南里·纳乐特和克劳德·西沃林提出的

一个观点是类似的。他们两人将小农业的持续存在,看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农场主像两面神一样,半是资本家,半是工人——这经常被看做是和资本主义发展相矛盾的,但事实上,这是提供廉价食物和生产资料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

政府让这一小生产者体系感到,不断有压力在激励他们前进。同时,政府也给这个看似古老的生产体系以一定的保护,因为它知道,建立在更严格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农业,成本会很高。纳乐特和西沃林在论证他们的例子时,是建立在法国的经验之上的,但是我对美国的分析,似乎也证明了他们的观点。

当时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学家,一般把自己表现为《谷物法》的坚决反对者。因此,他们对这一法案所带来的苦难,似乎也就不负任何责任了。

但实际上,和他对欧文的反对相比,李嘉图在这方面远没有固执。他建议应该在10年内逐步废除《谷物法》,而不要求立即废除该法。

李嘉图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看的。事实上,主要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要求立即废除该法的。但是,对那些等不到废除该法使食物变得便宜的那一天的小生产者来说,《谷物法》的最终废除,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安慰。

本书对《谷物法》的分析,和对该法的一般性讨论是相反的。后者一般是从商业利益与土地利益的斗争的角度,来对该法进行描述。当然,问题不只是大农场和小农场之间的简单对立。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关注李嘉图和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那些家庭(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巴里·戈登正确地注意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是“偏袒无须抵押就能获得资本的那些农业人士”的那些政策的延续。李嘉图和这一阶层的农民结成的同盟,不仅仅限于《谷物法》。戈登认为,李嘉图主张通货紧缩的政策,一般来讲是维护“土地出

租者的利益的……其中包括拥有贵族头衔的更富有的地主,但对那些企业家的需求却并不予以注意”,我们还应该在其中加入小规模经营的农场主。考虑到他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农业态度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李嘉图应被算作当时原始积累进程中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谷物法》对不同人产生了不同影响,李嘉图也不是唯一一个对此保持沉默的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来不从《谷物法》对小农场主的影响角度,来研究该法。英国大部分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相当复杂,考虑到这一点,对《谷物法》这方面影响普遍缺乏评论,这只能归咎于对小生产者状况的不敏感,或是想掩盖他们的本质使命。

李嘉图论爱尔兰

在李嘉图的私人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对小农业的敌意,但这一敌意并不是普遍性的。尽管他向英国推荐大农场和廉价的食物,他在爱尔兰却提倡小农场和价格昂贵的食物。我们只有从原始积累的角度来读李嘉图,才能解决这一明显的矛盾。

李嘉图的朋友特劳尔提出:“(在爱尔兰)除非消灭所有小农场和小规模租佃,否则,永久的和实质性的利益,就不可能实现。”李嘉图对此做出了反应。他同意最终在爱尔兰消灭小农业。但是他认为,小农业是爱尔兰现状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

李嘉图又接着说,他认为,小农场使食物在爱尔兰的成本下降了。他在给弗兰西斯·布雷斯的信中,用的话几乎和马尔萨斯没什么区别:“和其他消费品的价值相比,人们的食物价值显得很小,他们对占有其他商品并没有很大的欲望,这才是爱尔兰人应该抱怨的不幸。廉价的食物并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如果它不是和对

舒适、得体的生活的不敏感联系在一起的话。”李嘉图对爱尔兰食物的廉价是如此害怕,以至于主张:“他们(爱尔兰人)所经历的苦难,并不来自人们的懒散和邪恶,而是来自于他们在获取生活必需品时表现出来的无能。如果减少他们的人口的话,粮食减少的幅度会更大,这与其说消除了人们的苦难,还不如说使情况更为严重了。”

在他的第一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重复了他的论点:爱尔兰的人口太少了,无法激励人们去工作。“由于存在那些为贫穷的爱尔兰人提供救济的机构,人们可以把大部分时间在懒散中度过;如果人口下降的话,这一罪恶会变得严重,因为工资可能会上涨,从而工人付出少量的劳动,就能交换到他所有朴素的生活需要”。这一部分值得我们做更细致的分析。以下是与之相关的一部分:

有些国家有充足、富饶的土地,但是由于当地居民的无知、懒散和不文明,这些国家还是遭受着饥饿和短缺之苦。据说,在这些国家,人口给谋生带来了很大压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不同于那些经历了长期稳定状态的国家。后者拥挤的人口所经历的各种不幸,都来源于初级产品生产率的下降。

他在第一版中继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经历的苦难,都源于他们的不积极工作。因此,要想过更幸福的话,只需激励人们去努力就可以了。”这一段话读起来很像是重商主义的文献,甚至或许像约瑟夫·汤森的话。李嘉图接着写道: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亚洲的很多国家和一些南太平洋的岛上,人们生活得很悲惨。形成这一现象,不是由于存在一

个邪恶的政府，就是因为人们懒散的习惯，有了这一习惯，人们就会更倾向于过无所事事的安逸日子，尽管这样的生活没有保障……通过减少人口，是无法缓解这一现状的，因为生产也同样会减少，减少的幅度还有可能更大。波兰和爱尔兰所遭受的不幸，和南太平洋岛上的人们所经历的类似。解救办法就是刺激人们努力工作，创造新的需求，改变人们的审美观……由于存在那些为贫穷的爱尔兰人提供救济的机构，人们可以把大部分时间在懒散中度过。如果人口下降的话，这一罪恶会变得严重，因为工资可能会上涨，从而工人付出少量的劳动，就能交换到他所有朴素的生活需要。要让爱尔兰劳动者和英国劳动者一样，去追求舒适和享受，那样他就会愿意把更多时间花在辛勤工作上，以得到那些享受。不仅现有的食物生产力能够得到实现，而且，由于新的劳动力的加入，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其他商品，从而带来巨大的额外价值。

乔治·恩索尔对李嘉图的这段话进行了全面攻击。他指出，英国的劳动者“不是值得羡慕的对象”。接着他问道：“怎样才能引发爱尔兰劳动者在这些方面的爱好呢？难道他们和别人不一样吗？难道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贫穷？”在受到恩索尔的批评后，李嘉图改变了语调，但他的意思没有变。他写道：“只需对他们进行更好的管理和引导，就能使他们过得更幸福，因为资本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将是一个必然结果。”

在爱尔兰，食物很便宜，但生活水平也很低。英国的观察家通常都会谴责爱尔兰人的懒惰，有时还会提到他们过多的假日。尽管一直有人说他们懒惰，但人们为了生存，还是付出了巨大努力。爱尔兰人采集海藻，并将它们晒干以用做肥料。为了能从地里多收获一些，爱尔兰的孩子们还不得不到马路上捡马粪。

爱尔兰产粮区的原始积累

按照李嘉图的描述,爱尔兰工人选择了安逸,而不是雇佣劳动。他们不愿意用很多小时的雇佣劳动,来换取只值几小时价值的消费品。因此,对资本来说,应该采取措施,以直接消除好逸恶劳的现象。但是,李嘉图只特别提到了刺激对奢侈品的喜爱。如果工人们能被拴在雇佣劳动上的话,“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其他商品,从而带来巨大的额外价值”。而且按照他的想法,只需其中一部分商品,就能满足爱尔兰工人新养成的爱好了。

李嘉图很清楚,谁会从他倡导的高强度工作中受益。在给马尔萨斯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承认,工人们选择安逸,而不是增加消费,这一做法完全是理智的。“人们追求幸福。在有充足食物的同样条件下,我们不能肯定人们是觉得享受闲适生活更幸福,还是觉得拥有整洁的小别墅和好衣服更幸福。毕竟,我们也无从知道他到底是否能得到这一切。他的劳动有可能只使他的雇主得到了更多享受”。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他未发表的《论马尔萨斯》(*Notes on Malthus*)中,李嘉图多次将马尔萨斯说的获得食物如何容易,斥为无稽之谈。但是,他的证明是建立在同前面一样的基础之上的,即马尔萨斯所用的例子不适用于“人口密集,资本、技术充裕,商业和制造业发达,喜欢自然、艺术、科学所能带来的一切享受的”英国。但是马尔萨斯所考虑的并不是英国,而是爱尔兰。

李嘉图的第一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包括了原始积累的古典理论中的所有要素。在后来的版本中,他就爱尔兰问题进行讨论时,改变了语调,但实质还是不变的。他插入了下面这一经常被引用的观点:“所有博爱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希望,所有国家中的工人都培养出一种对舒适和享受的喜爱。”这一版本常被看

做是李嘉图人道主义的表现,但它只是使他“坚持工资的下降是一种自然进程”的观点显得温和一些罢了。

我们可能会认为,李嘉图对爱尔兰广大民众的生存状况会很感兴趣。毕竟,李嘉图是以代表爱尔兰人的身份成为议会成员的——尽管他的席位是买来的,而且他也从来没到过他的波特拉灵顿(Portlarington)选区。

在研究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时,李嘉图对财富从爱尔兰大量外流的事实,保持了沉默。相反,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李嘉图将那个动荡不安的岛屿看做英国“最强大的”农业对手。的确,在当时的爱尔兰,农业潜力被认为是无限的。在1794至1796年间,英国对谷物、肉类和面粉的进口,44%是爱尔兰提供的。从1800年到1814年,英国对谷物、肉类和面粉的进口,至少有35%来自爱尔兰。爱尔兰用船运送了2200多万盎司的燕麦和将近600万的小麦。

对爱尔兰粮食的攫取,被看做是对爱尔兰收地租者的弥补,但却被认为和爱尔兰的贫穷无关。一个名叫约翰·米切尔的爱尔兰作家指出:“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试图通过曲解和误用那一科学中的原则,来向我们证明,放弃面包和奶牛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商业’,而且和他们国家的贸易会使爱尔兰富裕起来,尽管忍受着饥饿的爱尔兰人觉得情况刚好是相反的。”斯威夫特在《布商的信》(*The Drapers Letters*)中,将这一情形做了简洁的概括:“贫穷的爱尔兰使很多人变富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爱尔兰经济的问题,应该归罪于悲惨的农民本身。一般来讲,这些经济学家对爱尔兰文化都没什么耐心。他们将爱尔兰文明描述为野蛮的、不开化的,而把英国人的野蛮方式称为文明的。

在爱尔兰,古典政治经济学遇到了一个还未被资本征服的民族抵制。对此,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亚当·斯密对爱尔兰缺乏秩序

的状况的关注。早期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将这种对资本的抵制,看成是种族缺陷,而不是将它看成对一种剥削程度很高的境况的正常反抗。正如西尼尔对他的学生所说的:“像凯尔特人一样既不顺从也没有智慧的那些种族,应该用使其惧怕的方式进行统治。”因此,简单的市场解决办法,不足以对爱尔兰进行统治。

李嘉图对爱尔兰的态度和西尼尔相比,没那么极端,但是他对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提倡表明,当遇到阻碍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多么随便就被抛到了一边。有一种市场力量,可以无需外来强制,最终就能将爱尔兰人融进市场。特别是,所有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爱尔兰人学会追求更多奢侈品,并通过雇佣劳动得到这些奢侈品,他们可能会变得更顺从。

李嘉图作为一个原始积累理论家的表现,并没有抹杀他作为经济理论家的光辉。它更能证明他的纯熟技巧。在他的价值理论中,展示了令人赞叹的知识成就。从他给爱尔兰提的不无挖苦的政策建议中,我们也发现了对他的理论的一个实际驳斥。从理论上讲,廉价食物是好的。但在爱尔兰,这却是件坏事。

当然,李嘉图作为政治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爱尔兰经济和英国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本质所在。爱尔兰以对资本主义的强烈反对而著名。相反,英国似乎已达到了能够完全依赖于市场的“无声压制”的阶段。这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会有效。到了那个阶段,通过教育、传统、习惯等方式,“将那种生产模式看做无须证明的自然法则的工人阶级,已经被造就出来了”。

李嘉图的胜利

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历史,对李嘉图的政治学并没有给予公正的待遇。它们将他反对《谷物法》的斗争,说成是他反对对市场力

量加以不理智的干预。一些人记住了他对通货膨胀的坚决反对。他对机器的作用的疑虑，成了他在意识形态上对工人阶级没有敌意的证据。

事实上，李嘉图留给我们的东西，比斯密的更具意识形态性。李嘉图只成功地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净化。和其他人相比，他在将政治经济学转化为经济学的过程中，做的贡献最大。经济学是一种抽象的演绎逻辑，被认为是超越任何个体的狭隘利益的。

凯恩斯对李嘉图的胜利，概括得或许最恰当。他写道：

李嘉图之所以能获得完全胜利，可能是由于他的学说中包含了适应于它所影射的环境的一套东西。它得出的结论，跟一般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所期待的结论大不相同。我认为，这一点使它的学术威望更高了。如果将他的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话，是严厉的、令人不快的，这也成了它的优点。它被用于建立一个巨大的一致逻辑上层建筑，这使它显得美好。它可以将很多社会不公现象和明显的残忍之处，解释为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并认为，如果试图对这一切加以改变，很可能带来的坏处比好处要多，这使它成了权威性的。它也提供了为单个资本家的自由行为进行辩护的方法，这为它赢得了权威后面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的支持。

麦卡洛克和原始积累

约翰·拉姆塞·麦卡洛克是李嘉图两个最重要的追随者之一。他继续对自给自足造成了爱尔兰贫穷的说法表示支持。和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麦卡洛克肯定地认为，农业要想获得成

功,就必须将其转化为资本主义模式。他概括说:“在那些实施改进了的农业计划的地方,或在有相当多农业资本的人进行经营以赚取利润的地方,技术和精心,都是不可缺少的。”他又补充说:“一个拥有资本的人,如果不是希望在付出管理之后得到回报,也就是实现他的资本的通常利润的话,是不会投资于农耕的。”

麦卡洛克为“在外地主”^①对爱尔兰农业的控制进行辩护,无论是从历史的还是商业上,都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从历史角度看,他认为:“在爱尔兰拥有很多充公财产的英国贵族和乡绅们发现,他们的财产掌握在一群贫穷的、没有文化、混乱无序的人手中,而且没有办法将这些人逐出去,对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占有方式也一无所知。这些人除了将土地出租给冒险家外,没有别的生活来源,而且他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并对之加以最好的利用。”从“在外地主”式农业的经济影响来看,他计算道:“如果那些‘在外地主’回到爱尔兰的话,那么国内市场上对商品或劳动力或两者的需求,就会增加,数量可达400万或450万。但是很显然,国内市场上这一需求的增加,会被国外市场上需求的减少所抵消。”麦卡洛克甚至宣称,不许农田的过细划分,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这对工人阶级非常有利。一旦农场合并起来了,就不得再分开。因为这一禁令,出现了大农场耕作的趋势,而且……这样的话得到小片土地的机制就不存在了,那种曾存在于爱尔兰的维持生活的方式也就不存在了”。

再划分(subdivision)的进程在爱尔兰达到了最高峰。“大片土地被分成土豆园大小,被最贫贱的农民占有”。抱着这种思想,他曾向一个议会委员会这样谈论爱尔兰:“我认为,制造业和农业的结合,在任何国家都是落后的证据……我认为劳动分工越多,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产出就越多。如果一个家庭中结合了制造业和农业,那么两方面就都不能好好进行。”按照麦卡洛克的观点,土地再

^① 在外地主:不在土地上,而收取租金的地主。

划分的结果是“国家人口过剩，生活贫困；因此最后租金得不到偿付，整个耕地的产出将不能满足土地占有者的需要”。

一位议会询问者就这一点向麦卡洛克提出质疑：“你认为劳动阶级的情况，会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而更好？”麦卡洛克回答说：“当然，这是我很明确的观点。”

对于麦卡洛克而言，发展是将劳动者与土地上分离的充足理由。他否定了拥有小片土地带来的安全感，认为它“无一例外地与贫穷联系在一起，往往最后沦为赤贫。它导致最令人厌恶的产物——贫穷、骄傲和懒惰的结合体。它不仅不能拓展人的能力，反而会限制、僵化人的能力。持有小片土地的农民的喜悦，就像牡蛎的快乐那样，无知而满足”。麦卡洛克对原始积累的极力推崇，为古典文献做了惊人的注解。

马尔萨斯关于经济政策的观点

与马尔萨斯相比较，李嘉图似乎对穷人更有同情心。否则，我们又能怎样解释马尔萨斯的怪异理论呢：

为了行动一致，我们应该协助大自然……实现人的这种死亡……我们不应向穷人们建议卫生的生活方式，而应该鼓励与之相反的生活习惯。在城镇里，我们要建造狭窄的街道，让房子里挤满人，设法招致瘟疫的再次来临。在乡下，我们应该把村庄建在臭水湖边，特别鼓励在沼泽地、不利于健康的地方定居。但首要的是，我们应该取缔救治疾病的专用药材，批评那些好心的，但常常犯错的人。他们以为，给消灭某种社会混乱出谋划策，是在为人类做贡献……必须有必要的死亡，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死亡。根除一种疾病，只会意味着一种可能

更致命的新疾病的诞生。我们不能通过把痛苦的洪流引向别处,来平息它的波涛,这样只会使它在别处又涨起来;唯一能达到目的的途径,是把水抽干。

一个议会委员会曾向马尔萨斯问道:“你不承认,料理那些(失业的)劳动者们的后事,会对国家财富造成任何损失吗?”马尔萨斯回答说:“收益必然更多。”

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允许人们自给自足,会导致大范围的好逸恶劳。谈到那些不费太多力气就可以得到食物的地区时,他说:

应该总是只有一小部分人从事农业,而大部分人为其他社会需求而工作……但是考察一下那些落后国家的情况,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什么?——几乎无一例外是这样:在那些人口增长使人们不得不求助于贫瘠土地的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远远超出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口数量;人们把更少的时间,而不是更多的时间,用于提供方便的服务和享受。

马尔萨斯的确更偏爱小型化的农业,其理由是,小型农业使更多人能上升为土地持有者。他认为,土地持有者有可能成为一股保守的政治力量。因此,马尔萨斯很欣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小土地拥有者的中度繁荣,但是,他反对个人持有土地的面积像法国那样小。他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关于财富的所有重要成果,都取决于比例”,这反映了传统的原始积累理论。

因此,马尔萨斯对欧文的理论持怀疑态度,这不足为奇。在欧文的计划中,大部分人口自给自足,而不是进入劳动市场。在1819年11月21日给阿瑟·扬的信中,马尔萨斯问道:

请你告诉我,在哪本不起眼的书中,我能得到近来谈论很

多的精耕细作的最新信息？我还想知道你对它是怎么想的。你是否认为，抛开雇佣教区穷人的目的不讲，如果节省土地上的劳动，而不是增加这样的劳动，我们的荒地就得不到开发。荒地开发的一大阻碍，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劳作得不偿失；而且在我看来，这个困难只能通过技巧和价格来解决，绝不是仅仅靠劳动。

实际上，马尔萨斯顽固地敌视各种可能提高穷人生存能力的方法，其中甚至包括马尔萨斯自己提出的建议——计划生育。他警告说：“在一个以制造业和商业为主的国家里，劳动阶级的谨慎习惯会毁了这个国家”，“尽管劳动阶级自身幸福的重要源泉是那些谨慎习惯”。

似乎只有让-巴普蒂斯特·萨伊这位纯化论者，注意到了这种立场与著名的人口原则的冲突。他反对马尔萨斯，但他的兴趣不在人民的利益上，而是在原始积累的古典模式。萨伊认为，一个未婚者维持生计需要的花销较少，因此薪水必然会下降。

另外，马尔萨斯还是《谷物法》的坚决拥护者。他不仅支持这些手段，更反对给家庭提供养牛的土地或花园。他甚至赞成拆毁农户的房子。

总的来看，马尔萨斯对自给自足的看法比李嘉图更极端，原因是他们对英国社会有不同认识。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作为参考框架。马尔萨斯认为，接受雇佣劳动的英国工人数量，还远远不够。

相反，李嘉图认为，英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家庭经济已经不再是资本的一个严重问题了。在他看来，进口廉价稻谷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这样的时机就要到了。而马尔萨斯认为，英国的资本还需要更强的原始积累。

马尔萨斯对爱尔兰的观点

我们可以把爱尔兰看成对原始积累兴趣的石蕊酸碱测试剂。在爱尔兰,家庭经济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或理论问题,还有着非常实际的含义。在爱尔兰,自给自足经济仍非常强劲,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仍需要加强。因此,在爱尔兰问题上,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观点是一致的。

马尔萨斯抱怨说,在爱尔兰这样的国家,“付出很少劳动,就可以得到必要的食物,社会较低阶层没有对便利和财富的明确偏爱,因此,不用于生产食物的时间,也不可能创造相应的财富”。马尔萨斯斥责爱尔兰人的需求太少了。正如李嘉图一样,他希望爱尔兰人对“缎带、蕾丝和天鹅绒”这样的奢侈品有更浓厚的兴趣,但这个建议是空洞的。像西斯蒙第强调的那样,只有在用别人的劳动购买奢侈品时,它们才显得诱人。

这位尊敬的马尔萨斯先生,可能应该用后来在殖民地采用的方法。在殖民地,传教士们教导人们献身于上帝的同时,要相应地崇拜商品。最近,培养对商品的更深崇拜的这种职责,落到了发展顾问的肩上,他们的工作就是慢慢地向原始居民灌输对奢侈品的喜好。

马尔萨斯不仅认为爱尔兰人对奢侈品没有足够的需求,而且还进一步控诉爱尔兰人“基本上在家中满足(他们的需要)”。在1817年8月17日给李嘉图的信中,他甚至说道,爱尔兰的最基本的问题在于,“以维持生计为目的,而不是以出售为目的”进行生产,这与史都华的观点相似。在1826至1827年移民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组织的一次议会调查中,马尔萨斯更深入地阐述了他对爱尔兰小农的观点。这位成员向他提出:“如果1 000(爱尔兰)劳动

力死去，国家的财富不会因此而减少”，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马尔萨斯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马尔萨斯建议说，尽管爱尔兰工人缺乏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他们应该关心奢侈品。我们可以说他的建议是荒唐的。实际上，我们应该更严肃地把他的言论看成一种托词，是英国给自己对爱尔兰的残酷手段找的借口。

的确，劳动阶级似乎不太可能用过多劳动时间去换取相对价值较小的商品，因此，马尔萨斯赞成向穷人施加额外的经济压力。他对如何达到这一目的，没有提出具体办法，但他曾反对在爱尔兰的土地上种植马铃薯，因为这样使穷人可以付出较少努力，就能生存下去。

马尔萨斯还非常严肃地认为，与马铃薯相比较，水是对调教劳动者的更大威胁。他还特别表示，很担心朗福德伯爵的工作。据说这位伯爵每天只用花 1/4 英镑多一点的汤，就能养活穷人。朗福德在科学界的名誉比在政治界更为牢固，他宣称他那种著名的汤中，最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水。马尔萨斯承认，朗福德的汤也许是“利于大众的绝妙发明”，但他仍希望它们“不应成为百姓的普遍食物”。

马尔萨斯表面上关心的是，便宜的食物会导致较低的薪水。但在他的书中，一页之间他就将话题从朗福德的汤，转到阻碍资本进程的令人恐惧的懒惰。

马尔萨斯的演变

在较晚的时期，马尔萨斯预计了 19 世纪 30 年代大西洋经济面临的消费不足问题。这赢得了凯恩斯的青睐。

马尔萨斯态度的变化，带有一些机会主义的色彩。一生中大

部分的时间,他都表现出对市场的信心,这种信心随着原始积累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而逐步增加。他的《人口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最早版本,旨在阻止任何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计划。他相信这些办法最终是没有希望的。1798年写这篇论文的时候,他明确地表示,“丝绸、蕾丝、小装饰品这样的消费品……只是富人的收入,而不是社会整体的”。

工人的唯一希望,是必需品消费的暂时增长。这种进展不会持久,因为食品消费的增加,必然会使人口增加,最终又会降低已经提高了的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不断修改这篇论文,讨论其他问题。他不再辩护说,帮助原始积累的受害者的慈善事业是无用的。相反,他开始形成这样一个观点,认为穷人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与富人分享资本主义的繁荣。在这篇论文的第三版中,他说:“穷困的劳动阶层的情况无法得到本质改善,除非让他们掌握更多的生存资料。”在第五版中,他则建议:“较低阶层的人们的舒适生活不仅依赖食物,也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

在最后的阶段,马尔萨斯发现,不受限制的人口增长本身,并不一定恶化穷人的情况。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拿破仑战争之后,军人复员引起的英国经济萧条,使他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平衡的后果。

在这次经济衰退的启示下,马尔萨斯认识到,供给与需求不是经济行为的合适向导。他发现隐藏在此背后的是,如果经济情况过分恶化,工人会向政治体系挑衅——即使承诺将来会有缎带、蕾丝和小饰品,也不能阻止这些挑衅。因此,政府有责任保持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正常平衡,以免高失业率对政治稳定造成威胁。

罗伯特·托伦斯

罗伯特·托伦斯是爱尔兰人，爱尔兰的贫穷是他始终最关注的问题。他还是一位海军军官，在保卫安霍特（Anholt）——卡特加特海峡^①的一个岛屿——的战斗中表现英勇，被提升为上校。这样的背景影响了他的经济理论。

托伦斯写了一篇强有力的文章，批判欧文的计划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别严重的威胁。威廉·思韦特认为，麦卡洛克参与了这篇文章的写作。但奥伯莱恩和达内尔有力地证实，该文出自托伦斯之手，否定了思韦特的观点。托伦斯认为，社会应通过移民出境来解决失业问题，而不是通过给失业者土地。

在文章中，托伦斯否定了欧文的计划，说那“只是乔装了的斯彭斯式（Spencian）计划”。这种异端邪说应该被彻底铲除。托伦斯说：“他的计划造成各村庄内部消费自己的产品，劳动分工——无论是地区的还是机械的——都将被推迟。”托伦斯预计，如果欧文的计划得以实施，“整个国家的收入就只能用于满足人们的动物似的需求：艺术、文学和科学会被遗弃；比哥特时代更为严重的无知将会蔓延”。尽管李嘉图是欧文的私人朋友，他也对托伦斯的观点表示赞成。

虽然可以依赖市场解决某些问题，但托伦斯呼吁政府在一些关键方面扮演积极角色。正如史都华希望农场主们去掉土地上“过剩的嘴”，托伦斯建议国家把过剩的劳动力放到殖民地去。提议出口劳动力的同时，托伦斯还建议限制出口机器。他认为，帝国主义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欧文试图通过精耕细作解决的

^① 卡特加特海峡：丹麦大陆部分和瑞典之间的一个海峡。

问题。实际上,托伦斯是主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最实际的一个。

在他的首部著作《被反驳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s Refuted*)中,托伦斯谈到了劳动的地区分布问题。他强调,英国应该用成品交换落后国家的原材料。托伦斯告诉他的选民们:“我们不应向法国、而应向俄罗斯帝国中的那些国家、两个美洲、我们的殖民地、印度、中国,去寻求、拓展新的市场。而向我们的商业打开这些辽阔地区的手段,必然是未来流通的主体。”托伦斯警告说,殖民地的利益极有可能因与英帝国的联系而受到损害,至少短期是这样。他写道:“除非采取及时有效的防范措施,爱尔兰在向繁荣富强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段最艰苦的时期。”

我们并不常能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记录中,找到这样的现实主义。威廉·配第仅仅了解早期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国家之船上的一个侍者。而托伦斯则有着皇家海军的一位真正上校的姿态。

拿骚·西尼尔和爱尔兰的原始积累

18世纪40年代充分证实了以上引用的托伦斯关于爱尔兰“最艰苦时期”的预言。乔治·波利特·斯科罗普^①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呼吁土地改革,以挽救爱尔兰被毁坏了的经济,但他们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爱尔兰的土豆饥荒进一步证明,有必要加强原始积累。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只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才能挽救爱尔兰。

没有人像拿骚·威廉·西尼尔这样有力地论证过这种观点,尽管他激烈地否定说,爱尔兰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贫穷。他推断说,

^① 乔治·波利特·斯科罗普(George Poulett Scrope, 1797 - 1876):英国地质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因为人口在增长,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爱尔兰的居民处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种穷困境地”。

在《关于爱尔兰的杂记、对话和论文》(*Journals, Conversation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Ireland*)中,西尼尔收集了大量资料,就像他在准备政府报告一样——他曾准备过很多份政府报告。大多数被调查的人有机会阅读西尼尔的对话记录。恰当的私人细节,给他这本精心设计的书披上了自然的色彩。

我们已经触及了西尼尔对爱尔兰人的看法。他知道“缎带、蕾丝和小饰品”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一个英国人曾对他说:“他们没有英国人勤劳、清洁、体面、舒适,但是他们不觉得需要舒适、体面或者清洁。”

西尼尔将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在他看来,“穷人的政治经济学”会吸引未受过教育的人,因为“虽然人类制度能够使所有人贫穷,却不能使所有人富有;……它们可以散播痛苦,却不能传播幸福”。

抱着这种思想,西尼尔渴望能劝服爱尔兰人放弃对市场关系的对抗。他参观学校,观察课堂,甚至询问孩子们,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知道多少:

我重复了我在其他学校问过的问题——“要是每个人都能做他现在能做的4倍的工作,情况会怎样?”

“会使所有工作的人贫穷,”他们说,“因为不会需要他们的工作。”

我问:“他们可以消费的东西不会变得更丰富吗?”

“可能是,”他们说,“但他们不会有钱买。”

“为什么这样?”

“因为只有富人才会有足够的东西,而且只会雇佣他们中的四分之一。”

这肯定是明显的观点,因为我总听到这样的回答。穷人

似乎不清楚无限的多样性和人类需求的范围。

西尼尔希望,一旦爱尔兰社会整体发生变化,爱尔兰人会排斥关于阶级矛盾的政治经济理论。他发现爱尔兰人到了美国以后成为出色的工人,这就是证据。

西尼尔和他的朋友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重建爱尔兰社会的计划,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尽管农村穷人自身不拥有他们劳作的土地,重组爱尔兰非常接近原始积累。西尼尔和G博士之间的一段有启示性的对话,值得在这里详细引用。G博士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解释近来饥荒的影响:

在饥荒之前,除了地主外,佃农没有其他的债权人。他出卖劳动成果仅用于支付地租,他不买任何东西;他依靠他的土豆、猪生活,(不太好的时候)靠奶牛……

尽管他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他很少去找支付薪水的工作。他的确工作得太少了,甚至为他自己工作都很少,这从他篱笆的状况和周复一周丰富的收获就能看出来……现在,他不再能依靠土地得到所有东西;他意识到——这是他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人有土地也可能饿死,没有土地也可以生活。

然后,G博士向西尼尔精彩而简练地描述了古典原始积累理论:

“我相信,”G博士接着说,“现在正在爱尔兰进行的佃农与农场主之间的斗争,大范围的农业中的斗争,其他所有曾经是封建国家——因而曾经掌握在大地主手中的国家,在发展的一定时期都经历过。当资本还未形成,因而很少人从事制造业的时候,大量人口耕种土地。没有多少牛或羊,很少食用肉类。只有最好的土地被开垦,并且通过大量的劳动,生产出

总量很多的作物,但并没有太多剩余。”“穷人靠耕耘,”所罗门说,“生产出了很多食物,但因缺乏判断,而破坏了某些东西。”当财富增长,对牛羊的需求随之增长,地主发现将耕地换成牧场、小农场换成大农场是有利可图的。会有更多的剩余产品、更多租金和更少的麻烦。

同时,这一变化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将小农场主和佃农转化为农业劳工,并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已有的土地占有者,在各方面都遭到损害。他们失去了自由和以前的那种表面的安全保障。他们必须服从一个主人,按时劳作,放弃因为替死去的人守夜和集市而常有的假日,并且为薪水而工作,而这份薪水,会因突然增多的劳动力而降低……

爱尔兰的任何朋友,都不希望这场战争继续下去,更没人希望它以佃农的胜利而结束;因为那样会使爱尔兰重又回到原始状态,比上个世纪更糟糕。这场战争越早结束,爱尔兰就会越快地成为畜牧业国家,人口正像畜牧业国家要求的那样稀少,这对各阶级都更有好处。

在饥荒之前的1832年,西尼尔曾谈到过爱尔兰的农业问题。他发现,爱尔兰劳工的产出有剩余——“爱尔兰劳工每消费1蒲式耳,其产出量能够超过1蒲式耳”。但这位顽固地拥护市场的人认为,要是朝雇佣劳动转变的话,能赢取更多利益。他建议,“扩展农场,并相应地把佃农转化成雇佣劳动力……政府可以提供协助,动用资金推动移民出境,为农场的合并提供便利”。呼吁国家把资金用在鼓励大型农场上,这个呼吁出现在其中的那本书警告政府说,动用资金为穷困潦倒的爱尔兰人提供工作,是危险的。

西尼尔对G博士的回答更为谨慎。他只是重复了G博士的话,用的语言既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原则一致,又与他的调查人的话一致:

“英格兰的苦难，”我说，“随着过剩的农业人口被发展的制造业吸收、城镇的增长，慢慢地、逐渐地消退。苏格兰高地的过剩人口的消化……通过大规模移民出境完成，而在萨瑟兰郡，是用有史以来最大、最有利的驱逐出土地的活动之一来实现……”

“但在爱尔兰，除了贝尔法斯特以外，几乎没有制造业。工会四处破坏或者阻挠它们的存在。”

西尼尔给爱尔兰的病症开的处方相当简单。他呼吁通过法律手段，“建立制造业，将制造业人口从工会的独裁中解放出来”。这些话给英格兰政策的暴行，披上了自由的外衣：以自由的名义摧毁工会。政治经济学，即使在爱尔兰，仍保持着自由主义的姿态，无论它的政策如何残忍。

当西尼尔真正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时，他对爱尔兰小生产者表现得颇为同情。在他 1844 年发表在《爱丁堡评论》杂志上的文章中（该文章又收集在他的《关于爱尔兰的杂记、对话和论文》一书中），他写道：

实质性的问题，正在于缺乏资本、缺乏小财产所有者。一个缺乏资本的民族，的确无法具有多少劳动分工。因此它的劳动力不能多产，它的制造业稀少而粗糙，它的大部分成员必然从事农业……中产阶级是资本的产物，但是即便没有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传播的道德和知识，这样的人群如果是由财产持有者组成，也可以享受幸福……

另一方面，在一个拥有大量资本的国家，如果缺乏小土地所有者，尽管伴随着大量的政治上的不利和危险——可能是超出其经济利益的不利和危险——但并不是与总体的舒适和繁荣相矛盾；而且有可能是劳动的最大盈利性和财富的最大

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

总之，对西尼尔的研究，不仅说明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怎样分析原始积累，而且清楚地展现了他们如何试图逃避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负责任。

第十三章 反 击

美洲的发现……为欧洲居民打开新的永不枯竭的市场……从而为劳动力的新分配和技术进步,提供了机会。此前,在旧商业的狭窄圈子中,由于缺乏一个市场来消化大部分产品,这种情形永不可能发生。劳动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它的产出在欧洲所有国家内都增长了,与之相伴的是当地居民实际收入与财富的增长。欧洲的产品几乎都是美洲没有的,同时,美洲的许多产品也是欧洲没有的,因此,以前从未想过的一套新交换开始了,这自然证明对新大陆有利,同时必然对旧大陆也有利。这个事件本应对所有人有利,但由于欧洲人的极度不公正,使它给几个不幸的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亚当·斯密《国富论》

罗伯特·古尔利

罗伯特·古尔利不是政治经济学家。他甚至似乎没有读过多少政治经济学。然而他仍然成功地帮助人们对斯密的理解进入了新层次,原因可能来自他的农业经验。他回忆道:

当我年轻时,我拥有可以自行安排的时间与金钱。我作为一位农学家,花了15个月时间,周游了英格兰,在那段时间,认识了已故的农业董事会秘书阿瑟·扬。一天,在与他的

谈话中,我们谈到了双方都很关注的话题。我的父亲,实际还有我的祖父,曾经习惯于拿出小块土地,永久性地出租给劳工,在苏格兰称为封地,每人可以在地上建设住房,享受方便的菜园之乐。我注意到,拥有这样一小块财产,对人的性格会产生何等奇妙的影响……我注意到,一个工人,尤其是做固定活计的工人,是如何恬静而喜悦地忙于菜园,而不愿投身到交易中。我曾经计算过,如果普遍采用这种经济安排,那么个人、国家的财富与幸福会增加多少。

阿瑟·扬想修改一般的圈地法规,以保证“每个人都拥有足以养一头牛的一块地,来替代古老的放牧权”。扬请古尔利去“拉特兰郡与林肯郡的乡下,在那里,让穷人拥有土地与奶牛的做法广泛流行”。

在旅行中,古尔利发现了原始积累对农村社会的强大影响。他回忆道:“年复一年,在这里那里,穷人看到自己被不公正地剥夺了从远古时代继承下来的权利,开始抱怨、暴乱、被镇压。这种过程是不知不觉地逐渐进行的,群众的力量被一点儿一点儿地压制了下去。最后,通过多种原因的变化与演替,造成英国劳动者情况的变化,但是政治经济学家很少提及或注意这种变化。”古尔利的观点远非激进。他表示“极为厌恶好心的欧文先生倡导的精耕细作”,他要让土地的分配与雇主的利益挂钩。回想一下第五章的长篇引述,古尔利提到:“我们的目的不是想使劳工成为专业园丁或农夫!而是为了将他们限制到只够糊口的状态。”

古尔利“绝望地看到,农业董事会无法有效完成任何事情”,于是他说,“需要用某种方式改变济贫法体系,这种思想越来越深地印在我的意识中”。他指责济贫法是“使英格兰的命运笼罩上阴影的最大罪恶”。他怎样得到这种启发的?古尔利说,英格兰与苏格兰农业劳工之间的显著差异,使他感到吃惊:“在一方(苏格兰),劳

工尽管要面对增长的税收,仍是独立的,并不断改善他们的条件;另一方(英格兰),尽管周围的人都富裕起来,劳工却濒临极端的贫穷与屈辱。在苏格兰,人们更习惯于向农业劳工提供奶牛,比英格兰更常见,但双方的差异远不止这一点。”虽然古尔利确信济贫法是英国问题的根源,他没有加入关于贫民额外负担率的常见悲叹中。相反,他指出,济贫法的目的是维护农场主的利益。他说:“农场主的目的,主要是压低……单个人的工资……法律阻止制造业的工人联合起来提高工资,因此,一个最强有力的体系就在运作着……以使农业工人的工资在正常水平之下;我一年花 12 英镑,就能雇到英格兰的农夫,但我要雇到同样的一个苏格兰农夫,就至少要花 18 英镑。”到古尔利要出版他的著作时,苏格兰的工资已经从一年 12 英镑降到 9 英镑,但英格兰农夫挣的工资与过去一样。英格兰的高工资,并不值得高兴。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至少希望工资的下降程度控制适中,从而让劳工与雇主共同分担艰难时带来的损失。

古尔利打算使英格兰废除济贫法。英格兰应该将贫民移民到加拿大,来卸掉贫穷的负担。这样英国的税收可以降低。要让加拿大经济能够从这一新的劳动力供给上受益,障碍只有一个——可恨的是,加拿大的廉价土地太多了。古尔利说: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荒地是该国的主要祸害,应该采取一切合适的手段,来减少荒地……美洲的土地,正是妨碍了自己发展的罪魁祸首。如果 9/10 的土地都沉入大海,后来每次 1/10 地一点点儿浮出,以满足人类的最低需求,这将在各方面都有无限的好处。美国居民的广阔领土扩展得太快了,以此浪费了他们的精力。

古尔利抱怨说,平均一位安大略农场主拥有 237 英亩土地,其中耕

耘的只有 38 英亩。土地不应免费给人,也不应该免税占有。

我承认,我使古尔利的观点显得相当连贯,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观点充满了愤怒与激情,与他的经济纲要相关的问题随便散落在各处。在书中,古尔利高呼:“我已经展示了我的案例……拿出了文件证据,陈述了我要说的观点,下面我就要开始矫正了。”

古尔利的写作风格跟他名声不佳的个人生活一样奇异。实际上,古尔利的经济学与他的个人行为紧密相关。如许多其他早期经济学家一样——包括配第、史都华与我们下面将要研究的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古尔利企图通过写经济学作品,来恢复他因缺乏自制而造成的坏名声。例如,当亨利·布劳汉没有给他的一封信回信,古尔利便用马鞭打他。古尔利不介意招致强权人物的敌意,这使他经常被关禁闭。

虽然古尔利的推理看起来很稀松平常,但随着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挥作用,它的影响变得相当深远了。

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

在某种程度上赞扬古尔利的人只有几个,老爱德华·韦克菲尔德就是其中一个。韦克菲尔德是大卫·李嘉图的土地代理商,丹尼尔的兄弟——据我所知,丹尼尔是第一位相信史都华胜过斯密的人。关于古尔利的早期作品,老韦克菲尔德写道:“以我个人对那位绅士的认识,我愿意十分重视他的观点,因为很少有人像这位聪明的北大不列颠人一样,这样实际地看待英格兰。”

一些年之后,老韦克菲尔德的儿子,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仿佛从古尔利那儿获得了一些灵感,但小韦克菲尔德从来没有公开声明对古尔利的感谢,尽管米尔斯说某些观点“明显来自古尔利”。实际上,他对古尔利的书籍态度冷淡。在一篇给《旁观者》

(*Spectator*)写的文章中,韦克菲尔德写道:“作者(古尔利)……将许多有价值的统计信息,与对自己超常不幸的讲述混在一起,描绘自己的精神苦难,这些东西对读者来说是如此痛苦,或者说如此令人恼火,以至于难以从他的书中提炼出纯粹有价值的部分。”他在小册子《综述民族社会解决与防止贫穷问题的原则与目标》(*A Statement of the Principles and Objects of a Proposed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Cure and Prevention of Pauperism*)中引用了古尔利的观点,在他的《英国与美国》(*England and America*)的附录中,引入了少许古尔利的话。除此之外,韦克菲尔德通常避免提到古尔利。据古尔利讲——未必特别可靠——在1838年加拿大的私人会晤中,韦克菲尔德愿意承认借用了古尔利的思想。古尔利称:

他自称韦克菲尔德先生[就是报纸上说跟随德汉姆爵士(即史都华)的那个人,来指导如何在加拿大的荒地上定居]。他告诉我,大概7年之前《伦敦旁观者》上关于我的文章(“来自P的信”),就是他写的。我想起了这些信:它们赞扬了我,目的是想引起格雷^①政府对我的注意。我此前从来不知道应该感谢谁,现在,我感谢韦克菲尔德先生……他然后说道,他也是一本关于殖民地的小册子(前面说的小册子)的作者,不久之后,这个小册子以豪威克勋爵的免费邮件特权,寄了给我……韦克菲尔德阁下说,他的殖民地思想,是从我的书中获取的。我回信说,册子中对我的计划说得很不完备……韦克菲尔德先生补充道:“但是,政府已经根据您的原则,在澳大利亚建立了殖民地。”

虽然古尔利从未造成很大轰动,韦克菲尔德著作的重要性,却怎样

① 格雷(Charles Grey, 1764 - 1845):英国首相(1830 - 1834),辉格党领袖。

评价也不算过高。如林耐尔·罗宾斯所写的：“(韦克菲尔德)的出场,好比一只华丽的热带鸟,降落到一个体面庄园的冷静居民中。”将此比喻解释成更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挑战,结束了斯密式意识形态在英国的胜利——至少从政策角度是如此。

韦克菲尔德是最不可能在经济学思想中造成这种革命的那种人。他早期的生活一点也没有前途远大的迹象。他妈妈曾一度长时间认为,他不能将聪明的头脑用到合适之处,她已对此感到绝望。后来,政府因韦克菲尔德诱拐一富家的女学生,将其关入纽盖特(Newgate)监狱。在监狱中,韦克菲尔德开始接触到许多打算迁到澳大利亚的人。

在纽盖特监狱,旅游书籍非常流行,这一点不值得奇怪。韦克菲尔德写道:“在纽盖特监狱时,我有机会仔细阅读关于新南威尔士州和范迪门地区^①的每一本书,还有这些殖民地出版的很多报纸。”基于这些书籍、报纸和可能来自其他囚犯的资料,韦克菲尔德写了一本书,自称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英国殖民者写的。

韦克菲尔德的殖民地

让人吃惊的是,韦克菲尔德从监禁的牢房中,成功地以现实的方式再现了劳资关系。有人说,劳动的社会分工是自愿同意的产物,他对这一观点嗤之以鼻。这种劳动分工的创立,需要权威、等级制度,一般还需要奴隶制。

韦克菲尔德不像史都华那样不情愿接受奴隶制。按他的话

^① 范迪门地区(Van Diemen's Land):澳大利亚东南角的海岛殖民区,现称塔斯马尼亚州,1642年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范迪门手下的航海家发现,以此得名。

说：“奴隶制看来是国家脱离贫穷走向富裕和文明的步骤。”

在他捏造的来自澳大利亚的信中，在哀叹劳动力稀缺之后，韦克菲尔德大声呼喊：

多少次，在我狂妄的时候，我会诅咒拉斯·卡萨斯^①，因为他贿赂伊斯帕尼奥拉岛^②的第一批殖民者，说他们可以从非洲获得奴隶，从而使他们放过了岛上土著居民。在我不知道因果关系的时候，我是多么轻蔑地辱骂北美的民主党，因为他们拥抱可怕的奴隶制。在软弱的时刻，面对在好望角施与黑人的可诅咒的残忍，我叹息，甚至因同情与愤怒而潸然泪下！但是，虽然我有我的理由和每一种善良本性，但我还是可以原谅西班牙人、美国人、荷兰人；啊，要是有几千黑人，对新南威尔士州该是一笔多大的收获！他们的确是收获；他们将带来财富，并且——谁敢否认这一点呢？——甚至让殖民地地主更文明。

韦克菲尔德坚持认为，甚至到他生活的时代，奴隶制的重要性仍没有消失。他预言说，如果奴隶制在美国被废除，北部的大城市“将在无形中消失”。

广义上来说，英格兰自身也依靠奴隶制。牛津的教授、韦克菲尔德的信徒赫曼·墨利维尔在 1839 至 1841 年开设了关于殖民化与殖民地的一组课程，由此被任命为印度的次长。在印度，英国人因敏感细致，无法接受奴隶制的道德。他向他的同胞解释说：

① 拉斯·卡萨斯(Las Casas)：早期西班牙史学家，16 世纪到美洲活动的传教士，反对奴役印第安人。

② 伊斯帕尼奥拉岛：在西印度群岛。

是什么促使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从外省集镇变成大城市?是什么维持了它们现在一直活跃的工业和快速的财富积累?是与美国奴隶种植的农产品的交换。他们现在的富裕实际上归功于黑奴的艰辛与苦难,就如同奴隶亲手挖掘了他们的码头,亲手制造了蒸汽机一样。(与英国和美国的商业有关系的每一个人)……都以他特有的方式支持着奴隶制。我觉得,任何一位喝咖啡或穿棉衣的消费者,都无法避开这样的指控。

墨利维尔教导他的牛津学生:“在旧文明国家中,工人虽然自由,但却因自然法而依赖于资本家。(在殖民地)应该找出人为的方法,来替代奴隶与犯人——正是奴隶和犯人的劳动,使我们的殖民地至今仍很多产。”

美洲的教训

虽然很少有人同韦克菲尔德一样,公开表明需要“人为的替代品”,在1600年之后,殖民地劳动力流向更易得到的土地,这一问题成为英国重商主义文献中相当常见的主题。我们应该记得,富兰克林要拓殖到俄亥俄河流域的计划,因希尔斯伯勒勋爵等爱尔兰领主的阻挠而落空。

独立战争后,英国对美国廉价土地的诱惑,依然很关心。如丹尼尔·韦伯斯特所指出的,在新英格兰,殖民者“就财富来看,水平大体相近……他们需要对土地进行瓜分”。

雇主憎恨廉价的土地。据一位18世纪法国大使讲,一群有势力的美国人希望西班牙关闭密西西比河,不要让人们远离商业社会也能生活。后来,政治家企图制定限制土地的政策,尤其是在西部。新英格兰对想雇佣劳工的未来雇主极为不利,以至于父母不

得不想办法阻止儿子离开。最常用的威胁办法是,如果他不推迟婚姻,就剥夺他的财产继承权。

政治家,如前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康涅迪格州的参议员弗迪,都特别呼吁,应该对获得公共土地的途径进行限制。这成了美国主要的政策问题。政治经济学的读者,可以从托马斯·库伯的书中了解到当时情形,库伯指责“工业管理层的狡猾与自私……他们反对西部的廉价土地,希望移民之门能由于他们的专横管理而关闭”。

美国廉价土地的威胁,一直影响到不列颠。美国的高工资增强了对机械的需要。结果是,美国的雇主愿意对应用机械的技能付额外的奖金。到1814年底,英国禁止国内从事机械制造业的熟练技师移民,否则将受到严惩。在1816年,一些英国人要求政府阻止向美国移民,尽管他们的初衷是想抑制“新世界”的发展。

实际上,美国土地的易获得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夸大了的。虽然如此,西部的土地按照国际标准仍然便宜。关于英国与它的前殖民地的土地易获得程度,可以如下比较:1830年,英国的农场工人一年的工资可以买到1/10英亩土地;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农场工人,则可以买到800倍于此的土地。

韦克菲尔德从美洲学到的教训

根据美洲的经验与来自澳大利亚的资料,韦克菲尔德认为,容易得到土地的地方,资本将不得求助于强制。根据他对历史的解释,“土地的廉价(是)……奴隶制的原因”。

为证明他的主张,韦克菲尔德提供了弗吉尼亚的例子,那儿从来不是富人的天堂。实际上1676年,贫穷的弗吉尼亚农夫与富有种植园主之间的冲突,是“北美革命前最大的社会矛盾”。富有的

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从未发现有充足的雇佣劳动力。韦克菲尔德坚持认为,只有奴隶制“拯救了”弗吉尼亚。

韦克菲尔德与他的学派认识到,要保证附庸的劳动力,关键是土地的高价,因为如果土地可以廉价拥有,工人就“停止雇佣劳动、自己……成为独立地主”。韦克菲尔德体系的力量,很大程度来自于他认识到,他的不言而喻的说法同神圣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是矛盾的:“真理之光终将从我身上散射出来。劳工的稀缺,是各种需要雇佣大量人手的农耕活动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承认自己很不精通政治经济学;但事实却不言而喻。”根据韦克菲尔德对北美殖民地的解释,“亚当·斯密说,廉价土地与昂贵劳动力,有助于造成国家的财富,这被所有辩论中最可靠的辩论——广泛的一个实验——驳倒了”。应该补充的是,这个实验是斯密自选的。

澳大利亚正相反,“在40年中,我们把政治经济学中的水与火——昂贵的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糅合在一起”。韦克菲尔德对他的新颖观点感到骄傲,尽管实际上,他的观点根本不新颖。即使在洛克那里,我们都可以发现韦克菲尔德理论的模糊痕迹。霍布斯也显示了与他的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洛克与霍布斯的时代,工人阶级没有注意到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但在亚当·斯密写作时,工人阶级暴动的威胁,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了。法国大革命让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应该十分谨慎。结果,尽管对工人与农民施加的非市场压力正在深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却对自由市场关系高唱赞歌。

我们应该记得,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雇主如何不容易找到易管理的工人。那些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将工人通过雇佣劳动束缚起来。只有史都华与后期作品中的马尔萨斯,意识到过剩的劳动力会导致问题。

然而,在韦克菲尔德写作的时候,劳动力暂时过剩,他没有理由对英格兰劳动力短缺问题表示关注。小土地拥有者也加入到穷

人的行列,支持失业工人。在这种环境中,实用的经济学家关心的是找到削减过剩劳动力的方法。

西尼尔总与资本的要求相一致,于是他在这一点上同意韦克菲尔德。西尼尔相信,减少贫穷率的收益,要胜过从英格兰移走工人的成本。同时,西尼尔感到,移民也将减少社会革命的压力。

当时,韦克菲尔德只是将一种已经根深蒂固的做法,写进了经济学理论的话语之中。他敢于公开阐述此事,仅仅因为他的规划在国内外会赢得巨额利润。在此过程中,韦克菲尔德证明,古典政治经济学谎称的自由放任政策,完全是假的。从韦克菲尔德那里,我们听不到斯密的天赋自由。相反,韦克菲尔德提出的是“天生为奴”的概念,甚至超过了詹姆斯·史都华的程度。

韦克菲尔德与自然的奴隶制

到澳大利亚的移民,很多都不是自愿的。英国例行公事地将罪犯流放到那里。这些人中的许多,是犯了极恶劣的偷猎罪。移走偷猎人,就除掉了最可能妨碍英格兰资本需求的人。

移民还带来另外的好处。这样就可以用来自爱尔兰的季节性工人,替代较贵的永久雇工,后者将被移到殖民地。但对澳大利亚的雇主来说,劳动力仍然太昂贵。

韦克菲尔德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过是将土地定上足够高的价钱,人为地使土地变得稀缺,这样就使农民失去了成为自给自足农夫的机会。这一规划,他称为“系统殖民化”,无疑是用来限制获取土地的。他之所以推荐这些方法,是由于它们鼓励“自然的奴隶制……人类大部分,一直处于天然的次要地位,并将永远如此”。韦克菲尔德确信,无论“天然”还是“被迫”,奴隶制都有一个好处,就是允许更高级的劳动分工。因此,他的体系也能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扩张。

同史都华不同,韦克菲尔德更喜欢天然奴隶制,而不是自由市场。他坚持认为,“系统殖民化”比自由市场能带来更高收益与更好的生活标准。韦克菲尔德甚至号召英国工人加入他的计划,来限制在殖民地获得土地。

高价土地与昂贵的雇佣劳动力,将吸引更大的劳动力流入。不考虑许多其他对立因素,被殖民地的廉价资源吸引过去的英国劳动力越多,余下的工人的条件就越好。韦克菲尔德称:“为了立即提高工资,英国资本与其劳动力的活动领域必须扩大。”结果,他劝告工人说,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起见,需要在殖民地满足资本家的要求。他从来不解释,工人怎能从对劳动力的限制受益。

韦克菲尔德通过引用拜勒斯法则,来冲淡人为充斥起来的殖民地劳动力市场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说,工人的集中能大大增加总产品,从而保证劳资双方均获益。当然,用同样的推理线索也能表明,英国工人通过限制劳动力与资本的外流,也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他看起来似乎比较关心工人阶级。但他的根本观点是,如果除了雇佣劳动外,工人还有别的路可走,那么资本甚至将求助于奴隶制。这样的话,斯密关于雇佣劳动的乐观评估不得不被修改。根据韦克菲尔德学派的计算,“当能够获得充裕的自由劳动力时,奴隶劳动力比自由劳动力贵”。简而言之,只有在劳动力服从资本之后,资本才会服从市场。

我们可能也注意到,在韦克菲尔德的规划中,几乎根本没有考虑到土著人的权利。

韦克菲尔德、澳大利亚和《狩猎法》

1830年,英格兰到处都在关心乡下出现的广泛暴动。韦克菲尔德认为,这些暴动的先驱,就是围绕着《狩猎法》进行的斗争。他

指责说：

特权阶级……将公用土地围圈起来。他们截断小路。他们用墙围住公园。他们装配了弹簧枪与捕人陷阱。他们花钱养高繁殖能力的狗，其费用足够养一半数量的小孩，但劳工要是有一条狗，就遭到指控……他们养殖猎物，以供自己消遣，但要是哪个穷人因此受到引诱，抓住一只兔子炖着吃，就会因自己不可饶恕的罪过，被送到踏车^①上去，或送到澳大利亚去。他们为穷人制定了新的罪行与新的处罚。

即使在教堂——他们中某些人庄严地鼓吹人人平等的地方，他们坐在软垫上，靠背长凳上……帘子为他们挡风，并隔开平民的目光……他们到处卖弄。

贵族家族不仅豢养猎物，还培养了仇恨。按韦克菲尔德的话讲，“他们(穷人)对他们的压迫者充满了极度的憎恨，这在农村的不满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贫民的反应或多或少是可以预料到的。“受自己和家人对食物、衣服与取暖的需要的驱使，凡是猎物充足之时，他们就成为偷猎者”。

根据韦克菲尔德所说，两类人参与偷猎活动：“一种是有残疾的人，腿上没有肉，弓肩缩背，智力与体力都弱，懒惰、胆小、愚笨，他们早生的皱纹与偷偷摸摸的眼光，表明了他们的穷苦与卑微。那是英国的叫花子……(另一种)肌肉健壮，正直风度，感觉灵敏……是比较大胆的农业劳工，通过与狩猎者及保护人之间的血腥冲突，逐渐习惯于强暴行为。”

韦克菲尔德的分析很犀利，但他的建议却没有这样一针见血了。他警告说，提高工资只会使制造业贫穷，将问题转移到城市。

^① 踏车：古代用以惩罚囚犯的工具。

就短期来说,富人可以通过武力征服穷人。他提议:“派部队到冲突严重的地区;宣布军事法律;不加区别地大规模射杀、削减、绞死农民。”

韦克菲尔德承认,这样的措施从长期来讲是不会成功的。他要求消除贫苦,但他没有说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会以为,他在这个时候会强烈要求移民海外,但可不是谁想移民,谁就能移民。更可能的情况是,韦克菲尔德希望把顽固不化的叛乱分子遣送到遥远的殖民地去,但穷人应该留下来,在“自然的奴役状态”中挣扎。

韦克菲尔德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内部被如何接受

韦克菲尔德学派说,雇佣劳动源自奴隶制,或者更糟——英格兰的繁荣持续依赖于(至少是部分地依赖于)奴隶制。这样,韦克菲尔德学派就揭穿了政治经济学的一切人道伪装。然而,韦克菲尔德的思想几乎受到了当时所有大经济学家的支持,只有麦卡洛克是唯一的例外。韦克菲尔德的影响还扩展到政治领域。他成为新西兰殖民地的主要影响力量——富兰克林先前曾提出,应该向此地引入资本主义文明的益处。

在美国,学术思想完全吸收了韦克菲尔德对北美历史的解释,从阿齐里·劳里亚一直传到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在阅读了《英国与美国》(1834)后,乔治·波利特·斯科罗普写信给该书作者:“我记不得阅读哪本书有这么大的兴趣,或这么彻底同意作者的看法、主张与观点。”西尼尔总是坦率直言地反对工人阶级,他宣称:“下面这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政治知识的发展是多么缓慢——虽然殖民化已经有力地发展了近3000年,但是,在何种方式下进行殖民对宗主国和对殖民地最有利,这一问题的

答案直到 25 年前才被发现。它的发现人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我们可能指望着从韦克菲尔德的公开弟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作品中,找到对韦克菲尔德思想的清晰阐述。然而,密尔觉得有必要修饰一下他的老师的观点,使之更体面。因此,他用一个奇怪的寓言,向好几代学生这样介绍韦克菲尔德。密尔要求他的读者假想,“有一伙带着工具的技术工人,具有足以维持一年生活的食物,来到并定居在”一个社会中,该社会是由自给自足的家庭构成的。结果,他写道:“当地人口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本质变化。他们拥有了一个机会,去享受舒适、华贵的生活。”

为了使读者明白他的意思,密尔,作为殖民地管理者,改换了场所,说:“早一点儿开发印度的生产资源,最好的机会在于迅速加强它的农产品(棉花、靛青、糖、咖啡等)向欧洲市场的出口。”

密尔的做法很值得注意。首先,虽然政治经济学觉得韦克菲尔德很新颖,但实际上,同密尔相似的一个寓言,也出现在史都华的书中。其次,密尔企图引入斯密式的对劳动分工的拓展,来摘除韦克菲尔德理论中刺目的东西。但是他把目光投向哪里呢?印度!印度从未将斯密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实际上,印度的英国行政官,总是偏爱重商主义者的发展观念。最后,从密尔的寓言看,似乎财富是从“那伙技师”的家乡英国流到了印度。至于利润如何返回英国,他却没提。

在讨论密尔的寓言时,我们大概也可以提到马克思的观点:生产方式不能仅仅通过商业资本发生改变。然而,剥除其中的虚构成分,密尔的寓言纯粹是韦克菲尔德风味的:“行业的分离,对生产造成的影响是特别重要的,然而,从对这个问题的已有讨论来看,人们会不觉得它如此重要……事实远不是如此。没有行业的分离,就根本不会有多少物品生产出来。”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寓言出自提倡一种体面的社会主义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笔下。

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章,留给了韦克菲尔德。

他并不是很关心韦克菲尔德发现的殖民化。如前文所说,马克思已经在半个世纪之前的米拉波那里,发现了这些观点。他可能也研究了富兰克林等许多美国人。那么,韦克菲尔德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回想一下,斯密尝试着发现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经济的性质,但斯密失败了。而试着驳倒斯密的韦克菲尔德,在这一方面则更成功。用马克思的话说:“他发现的不是关于殖民地的什么新东西,而是殖民地中已有的东西——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实质。”

现代经济学是如何接受韦克菲尔德的

尽管受到了充分赞扬,韦克菲尔德在今天被无声地忽略了。约瑟夫·熊皮特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讨论了最没有名气的作品,却一次没有提到韦克菲尔德。

大家一般都忽视了韦克菲尔德。一个主要的例外情况是林耐尔·罗宾斯。他不情愿地承认了韦克菲尔德的重要性:“此看法完全推翻了我30年前的观点,当时,在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命题进行辩论时,我指责我的对手莫利斯·道博先生过分强调了韦克菲尔德的主张。”

罗宾斯在认可韦克菲尔德的同时,仍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从其作品中抽取的教训。罗宾斯指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行,误传了韦克菲尔德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其根本条件就是废除建立在本人劳动基础上的私有财产;也就是说,其根本条件是从工人那里征用。”罗宾斯引用韦克菲尔德《致南澳大利亚委员会的信》来反驳马克思:“人们应该清楚,对公有土地的定价,目的不是阻止可用于雇佣的劳工成为土地所有者。相反,每个人都希望,所有去那里的劳工,过了几年的雇

佣劳动生活后,都能获得土地,都能有自己的仆人……就我的计算……我想3年的雇佣劳动时间,对资本家来说不算短了,对劳工来说也不算长。”在这个著作中,韦克菲尔德的假定是,移民的数量应该足够多。即使雇主人数不断扩大,他们仍能得到满意的劳动力供给。这样的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可以考虑美国的例子。很多观察家估计,边境的劳动力能够在韦克菲尔德推荐的3年时间里攒够钱,足以独立,但韦克菲尔德却对边境的居民没什么好感。他将边境居民描述为“粗鲁、无知、肮脏、不合群,喜欢朗姆酒与烟草,除了来复枪什么都不带,爱冒险、不安宁、相当野蛮”。因此,他说自己支持人们容易地获得土地,这种说法也不能全信才是。

在美国,当人们可以在3年之内获得土地时,理论上讲,美国可以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但在英格兰,虽然跟爱尔兰离得很近,显然移入的居民太少了,无法提供充足的雇佣劳动力,以满足雇主的要求。劳动力必须从农村夺取。这样说,韦克菲尔德表明,应该实现英格兰实际发生的那种原始积累。

如果罗宾斯想找出马克思话中的错误,他可以指出,家庭经济实际上可以使资本获利。我们在对原始积累的古典理论进行讨论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但韦克菲尔德本人对英国经济的直接评论却比较少。

韦克菲尔德与原始积累

韦克菲尔德的观点比较有创见,这可能受益于他对爱尔兰事务的极端熟悉。虽然不是爱尔兰人,但他的作品与他父亲的作品密切相关,而他父亲是《爱尔兰,统计与政治》(*Ireland, Statistical and Political*)一书的作者,该书被认为是当时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最

好作品。据说,皮特曾向他父亲咨询爱尔兰事务。

沃纳·斯达克曾经评论过爱尔兰视角对后来的英国经济思想的重要作用:“历史主义在英国的信徒……是爱尔兰人。这绝不是单纯的巧合。”附带说一下,托伦斯也是爱尔兰人。然而我们不能过分强调韦克菲尔德对爱尔兰的关心,而忘记他在纽盖特监狱时跟工人阶级的重要接触。

这里的要点在于,劳动密集化,是资本的政权制度的自然结果。可以回忆一下斯密的批评:“闲逛、懒惰、做事粗心……导致(农民)几乎总是散漫与偷懒。”韦克菲尔德对此表示赞同。他将爱尔兰农民缺少业绩,归咎于麦卡洛克所说的“粗鲁社会状态中存在的冷漠与懒散”。

我们不要责怪此观点:韦克菲尔德没有看到,市场中抽象的讨价还价中,可以自然地发展出来交换的机会。实际上,像史都华一样,韦克菲尔德将爱尔兰农民缺乏劳动热情,归咎于缺少交换的机会。但是,像史都华一样,他企图鼓励非市场力量,来创造机会。

韦克菲尔德最关注的,是雇主用工资换取劳动力的机会。如果可以为自己进行劳动,农民家庭就将对雇佣劳动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在雇佣劳动中,家庭成员用许多小时的劳动,换取较少时间的价值。如果有机会躲避这样的雇佣劳动,家庭成员就很珍视这样的机会。而且,即使做雇佣工人能获得金钱方面的优势,工人仍常常选择较少受约束的独立生活。韦克菲尔德看起来对此话题有更多要说的,但是他明智地保持了沉默:“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作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透彻分析。这个复杂力量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在什么条件下将增长或削减;这些问题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据很大篇幅。”此外,韦克菲尔德还认识到,劳动力的社会分工问题,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挑战:“一个人不可能仅因为想用资本,便可以用资本,光是一个工人也不能实现‘劳动分工’——资本

与‘劳动分工’出自以前的进步中。”

韦克菲尔德对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洞察力,看起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作为理论分析,似乎不值得考虑。然而,同样的问题也常使一流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例如,李嘉图在他关于机械那一章的结尾处归纳说,由于美洲廉价的食物,“几乎没有使用机器的强烈动力”。如果两地(美国和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是相同的,李嘉图可能发现自己有了坚实的依据。

最近,在使用经济学工具分析历史材料方面胜过他人的彼得·泰明说,美国广阔的土地资源,不应该使美国工业比英国的机械化程度更高。泰明还说,如果美国的利率比英国高,那么美国工业应该更是资本密集型的。农场主的比例很高,他们一般是债务人,这的确抬高了利率。弗里德里希·里斯特的结论尽管是建立在别的基础上的,但他认为,农业社会中的利率一般比较高。

实际上,家庭限制了工业预备大军的生长,从而成了利润的严重威胁。然而,即使在美国内战的前夕,估计北方的劳力中,仅有28%从事的是雇佣劳动。韦克菲尔德在这件事上现实得多,他意识到,北方各州中仅有10%的劳动力从事雇佣劳动。

一些经济学家正确地想到,早期美国雇主的状况令人担忧。他们总是用新古典主义词语,来含糊地掩盖事实。例如西伍德·弗雷斯哥在理解这个形势的时候,不是说劳动力在雇佣劳动体系之外是否有机会找到职业,而是说,潜在的雇主的管理能力被剥夺了出路。

从这一点来说,韦克菲尔德代表了雇佣劳动研究中的高层观点。政治经济学直到史都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发表之后100年,出现了《资本论》,这才跟上了韦克菲尔德的脚步。遗憾的是,《资本论》发表之后不久,政治经济学又回到了一种安逸的沉睡状态。

韦克菲尔德与英国经济

按韦克菲尔德的观点,斯密的一个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在任何国家,当资本增长时,通过使用资本而获得的利润必然减少”。韦克菲尔德承认,有两种方式可以改善资本的状况:“殖民化与进口食品。”廉价的进口食品,显然意味着同样的货币工资可以换到更多的使用价值。这样的话,同商业资本控制着的小商品生产相比,雇佣劳动就显得不那么讨厌了。

殖民化是另一方法。韦克菲尔德在这里预见到了列宁的理论。他认为,资本的出口能够增加利润率,只要有适合殖民的合适氛围——缺少便宜的土地。在此之外,韦克菲尔德很忌讳谈及他在英国经济中发现的事实。

韦克菲尔德好像看到了史都华没有看到的一个事实。他似乎意识到,如果他诚实地描述国内经济的运作,那么他的思想就会太令人尴尬,不会被政治经济学接受。在描述自己的表达方式时,他解释道:“通过只讨论前面的问题(分配问题),我们会让两个阶级互相仇恨……研究后一问题(总产品问题),我们可以证明,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

在他对《国富论》的评价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当一群人制造的食物多过自己所需,用多出的食物作为资本,以工资的形式发付给其他劳工,那些劳工就会跟资本家协调一致起来。”

我们不需要再深究了。尽管韦克菲尔德对殖民地经济的分析极为清晰,但在对待英国经济问题时,他小心地掩饰了雇主与劳工之间的鸿沟。一旦到了此处,他可以简单地转入劳动分工这个技术话题。这样的有意举动,让我们对韦克菲尔德更了解,却不能更了解政治经济学。

当韦克菲尔德真的接近真理时,他将之表达成废话,可能是为了使其更容易被接受。例如,在问自己,“为什么人会生产出任何超过自己能消费的东西”时,他用斯密式的幻想满足自己:“只是因为,这个人期望其他人能从他那里取走他不想要的劳动部分,给他想要的其他东西作为交换。”

当韦克菲尔德尝试证明劳资关系是正当的时,他变得更可笑。他重复一种类似洛克的社会契约的天真神话。因此他告诉我们,“人类采用一种简单方法来促进劳动分工:他们将自己分为资本拥有者与劳动拥有者”。韦克菲尔德甚至说,这两个群体在心理需要上是互补的:资本家愿意攒钱,是因为他们指望雇用工人;工人乐于消费,因为他们指望着能找到就业机会。

在描述英国农场工人是“可怜不幸的人”之后,韦克菲尔德说:“农民阶级看起来已经理解了其他阶级,把自己的活动同制造商与商人分开。”我们差点儿会以为,韦克菲尔德重复了卢梭的话——卢梭曾辛辣地写道:“我(资本家)将允许你享有为我服务的光荣,条件是,为了报答我领导你所做的付出,你要将你所剩的一点儿给我。”

在迫不得已的时候,韦克菲尔德不愿同意“自愿主义”。如果小农拒绝加入“自愿”的协议,怎么办?韦克菲尔德说“单调的人必然乏味无知”,他能容忍他们的自愿选择吗?

我们的确知道,韦克菲尔德强烈反对欧文的计划。他指责说,如果欧文的计划付诸实施,“所有人将完全一样”。韦克菲尔德嘲笑欧文的劳动自愿分工的想法,在那个想法里,人们会“一会儿耕作,一会儿交易,一会儿修鞋”。

可以确信,韦克菲尔德肯定已经认识到,如果小型的、自给自足的家庭占主导地位,那么人们一定会把休闲看得比生产重要。因此,他断言:“一位爱尔兰运煤工人或伦敦铺路工——这个工人的劳动,在他没有交换手段的时候,只够养活他一家人的——如今却可以养活六七家人。”他的意思是,运煤工人的生活水平很高,甚

至跟贫穷的爱尔兰农民相比都是高的。对此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接受才好,大概只能从货币收入的角度来看了。

至少韦克菲尔德告诉我们,何时应该认真对待他的观点。结果,我们不费气力将良莠分开。并且,韦克菲尔德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他的分析天赋,而在于这样一点:总的来说,他能够不被包围着他的各种意识形态(包括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搞混。

约翰·雷:预备知识

对斯密理论的另一个正面攻击,来自有名的约翰·雷——注意,还有一个约翰·雷是斯密的著名传记作家,另外又有一个叫约翰·雷的人同样著名,是北极探险家。我们说的这个约翰·雷虽然是政治经济学家、药学家和夏威夷的文职官员,同时在地质学与语言学上做过显著贡献,却没有另外两个约翰·雷那么名气大。

雷在他有生之年,受到的认可就更少了。的确,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大量引用过他的话。欧文·费希尔^①对他是如此感激,甚至将《利息论》(*Theory to Interest*)献给雷和尤金·布赫姆-巴威克。从其他方面来的承认,则根本没有。

约翰·雷对斯密式经济学的攻击,甚至胜过韦克菲尔德,后者从未真正觉得自己是个经济理论家。相反,雷却很深刻。并且,雷在加拿大边境过了多年,可以从第一手资料研究原始积累的意义,因此他更懂经济的发展。

雷似乎没有借用韦克菲尔德的任何思想,但他可能受到了古尔利的影响。实际上,他和古尔利的个人生活表现出许多相同之

① 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 1867 - 1947):美国经济学家,因在资本方面的理论而著称。

处。两者均在加拿大写出大量作品。两者均为避开私人麻烦而进行长期旅行。雷对留给加拿大牧师的土地提出的处理方法,与古尔利的建议有许多共同之处。最后,我们可能注意到,雷对古尔利著作的评价,与韦克菲尔德对古尔利的评价非常相近。

1840年,雷在自己唯一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著作发表之后,出版了另一本他想写的书的大纲。他把自己计划中的书与前人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并写道:

除了邓洛普博士的《住在边远地区的人》(*Backwoodsman*)、古尔利、布歇特与罗非的作品外,我认为,在我国知道的已出版的任何作品中,没有那一个接近我现在的计划……关于其他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古尔利先生的作品是在极为不宜的情况下出版的,某些部分显然出自一个天才之手,但这个天才的部分,却深藏在各种无关利害的事情中。

关于雷的生平

雷是个很难描述的人。在某些方面,他的著作惊人地现代。他预见到了布赫姆-巴威克的资本理论,以及凡勃伦^①的“炫耀性消费”观念。实际上,在两个不同地方,他甚至已经将消费描述为“炫耀的”。在另一方面,他几乎是中世纪的思想家,从显见的道德理论出发来推导他的经济学。

像雷这样的重要作家,怎么会卷进关于道德问题的狭窄争论中去呢?1820年,西北公司和哈德森湾公司(Hudson Bay Company)合并。蒙特利尔逐渐失去了在毛皮交易中的支配地位,它的传统

^① 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1857 - 1929);美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

商业力量逐渐衰退。这些新形势,为蒙特利尔的商人家族在地区经济生活中提高权力和影响,打通了道路。

雷同蒙特利尔商人一样,是苏格兰长老教会员。他“与蒙特利尔商人和他们的朋友关系亲密,不久就成了他们的哲学家与宣传家之一”。他妹妹开办了一所寄膳宿的学校,满足富裕商人家庭的需要。她的丈夫与其兄弟均是成功的商人。

此地的主要人口是天主教徒与法国人。阶层之间的不同语言、信仰与社会风俗,一向是社会动荡的诱因。加拿大也不例外。到1837年,武装冲突爆发了。

雷积极参与一个运动,呼吁给新教教会拨款。据雷所说,教会对加拿大低地地区的1/7,都有合法的占有权,这些地方是专门用来“支持和供养新教牧师”的。圣公会则认为,前面说的引文中,不包括长老会。我们下面会看到,雷参与了这次辩论,这似乎影响了他的经济理论。

显然,雷的道德敏感性,使他在年轻时已经与斯密的理论发生了冲突。1819年,苏格兰人希望减少对酒征的税。雷回忆道:“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改变一下做法将有很大好处,少数人害怕这会对公共道德产生负面影响,他们只是遭到嘲笑。亚当·斯密的权威被引用,并被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最后发言权。在公众的一片赞许声中,采取了措施。我承认我是怀疑者之一……现在时间已经证明,我没有错很多。”我们可能注意到,斯密本人也建议对酒收税。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引用斯密权威著作的人,比这位大师要偏激得多。

资本的耐久性

人们可能觉得,像雷这样思想比较狭窄的人,不会对深入理解市场做出贡献,但他做到了。他不是仅仅责怪市场是个超越道德

的制度,而是将经济活动作为道德的子集进行分析。要理解他的方法,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古尔利对加拿大农民过剩土地的关心。同样,雷也问他的读者敢不敢对一个农民问以下问题:

为什么在土地的周围,使用会坍塌的石头围墙,或使用需要不断修剪的树篱,而不使用铁栅栏,他会回答:“不值得。”问房屋建设者,为什么不使用切割的石头替代砖头,用橡树替代松树,用铁替代橡树,或用铜替代铁,这样整个建筑物的寿命将加倍?

他也将回答:“不值得。”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还有其他成千个可以问的问题,答案对个人足够了,但对社会来说却根本不是答案。

雷的看法并非独一无二。在他之前几年,托马斯·库伯使用同样的石头围墙的例子,说明在农业上进行改进,比在制造业上更值得,因为制造业的投资一般不太能耐久。甚至更早时,约翰·泰勒写道:

让我们假设,建造枯木篱笆需要农夫 10% 的时间,即每年使用大约 36 天处理此事。在 50 天中,他将使用 5 整天时间。如果他的农场用得起石头,他将用 1 年时间,用这种持久的材料建造围墙,这样他可以用这种更好的做法省 4 年时间;此外还除去更长的寿命或传之于孙的益处……在我看来,栽种与修剪活栅栏的时间,不足枯木篱笆耗费的 1/10。

雷的评论针对的,既包括加拿大本地人,也包括新近从英国来的农夫。农夫起初轻视新大陆的耕作方法,但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将迫使他们采用技术。雷说:“他的邻居将告诉他,是的,从一开始就会告诉他,如果他想获得与他们同样多的收益,必须在手中把持尽可能少的死资本,必须盘活他的资本;但他总是要慢慢地才能相信。”

基础经济学预测到的,正是这样的结果。新世界缺少资本。因此,农场主与其他商人节俭地分配资本,是很明智的。并且,许多其他观察者也注意到与雷同样的现象。

我们也能参照麦卡洛克。他指出,去过佛兰德斯的英国农场主,决定像佛兰德人一样细心耕作,但“用不了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必然回到原来的习惯方式;他们将衰落归因于雇佣的那些人的懒惰与无能上”。

雷在分析这种分配时,研究得更深,比其后半个世纪时间内的任何人都深。实际上,雷本人似乎推动了后来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实在觉得应该比较一下麦卡洛克与雷的业绩。麦卡洛克差一点儿就会误打误撞上了雷的真知灼见。但是,他却将佛兰德式农业在英国的失败,归咎于地租的价格太低。因此,他没能使他的观察超出农业领域。相反,雷使用同样思想,却发展出了关于资本与社会劳动分工的成熟理论。

雷论劳动分工

雷的社会劳动分工理论,来自他所谓的“死资料”(dead stock)。如果社会是由相同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组成,那么每一家庭都有一套完整的生产资料。如果某些家庭能专门从事某项行当,那么,社会需要的总资本量,就会有所节约:

织工、铁匠、木匠、农夫,要想干活儿,都需要各种工具。但是,一个人在一个时候只能干一个活儿,所以,如果这几种行当需要的工具一个人拥有,那么至少 3/4 的工具都会老是闲置着不用。

这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职业分工最初产生时的情况,但显然以前曾有这种情况,以至于现在,在北美的定居点中还发生这种情况。在此种情况下,每人首先可能被迫自己做木匠、上釉工人、制革工人、补鞋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自己的铁匠。当定居点逐渐扩大,人口足够密集时,他放弃了这种多样化的行业,转向某些特定的分支。

此观点不是全新的。我们可以在杜尔哥那里找到它。但是,似乎没有其他人对它进行过太多思考。

对于雷来说,劳动分工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被动因素。这一解释使他与斯密直接矛盾了,后者将劳动分工描述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雷在这一方面对斯密发出了大胆挑战:“在《国富论》中,劳动分工被认为是发明与提高的伟大动力,也是资本积累的伟大动力。在我已表达过的看法中,劳动分工主要是从先前的发明过程中生发出来的。”

雷做出了这样的假设:“在主要由农业人口构成的民族中,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机敏,以各种方式做出了发现,改善了自然的产品,由此逐渐产生了劳动分工、职业的区别、财富在人类中的新分配。”雷强调科学,以此含蓄地表示,那些显示出商业聪明的人,并不是进步过程中的主要动力,因为他将科学活动与商业活动分割开来。

资本的效率与耐久性

雷关于加拿大农民使用的技术的评论,看起来很随意,却发展成了一个理论,最后形成了现代新古典主义资本分析的核心。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勾勒出此理论的轮廓。

让我们回到那个农夫的例子,他可以使用木材或铁建造栅栏。木栅栏的初期费用较低,但使用寿命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农夫,将不得不权衡相对成本。

设想铁栅栏需要按两步安装。首先建一道木栅栏。然后用一些额外的工作,可以使之具有铁的耐久性。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购买这个“耐久性”的额外花费,还有把额外资本套牢到“耐久性”上的成本,这二者应该进行权衡。如果利率高的话,那么投资者将不愿意将大量投资套牢在“耐久性”上。未来进行维护或更新的贴现成本将比较低,因为贴现率比较高。

雷好像是第一位考虑到这一点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果他就此罢手,他将给自己赢得荣誉。但实际上,他没有就此止步。他注意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每人都想尽快消耗掉他现有工具的潜在能力。通过迅速消耗工具的潜能,产出的回报不会变慢,而是变快了。”

为了能把很不相同的技术进行比较,雷做了一些假设,来简化问题。首先,他假设每种设备都能使用特定时间。其次,他通过完成同样工作量所需的劳动多少,来描述该设备的生产能力。然后,他看一下需要用多长时间,一件设备产出的工作量,将是需要安装该设备的工作量的两倍。最后,他假定,在最短时间内就能产出双倍最初产量的技术,是最不耐久的。换句话说,最不耐久的生产方式,将有最高的回报率。然而,从他的铁栅栏的例子来看,产生最高回报率的技术,效率也是最低的。

我用“效率”,是专门用来描述雷的观点的。有效的投资需要长时间内的最少劳动。例如,假设安置铁栅栏,需要比木栅栏多10倍的劳动。铁栅栏的寿命为50年,并且不需要维护。木栅栏的使用寿命仅为3年。30年以后,木栅栏的平均每单位栅栏的年劳动投入,变得比铁栅栏高。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铁栅栏的优势变得更大。

实际上,雷偏爱这样一个社会:此社会中的价值系统,产生了一个低贴现率,耐久的技术(比如铁栅栏)将被采用,而不是更短命的技术(比如木栅栏)。

雷的原始积累种族理论

雷延长投资得到回报的时间,来辨认什么技术更有效率。到这一点上,他与布赫姆-巴威克的资本理论已经很接近了。在雷生活的加拿大,高利率反映了资本的短缺。把投资限制到具有高回报率的技术中,这是分配有限的资本资源的合理办法。

实际上,雷不能接受现代经济学的逻辑。他确信,资本的稀缺不是因为加拿大居民所处的自然条件,而是因为加拿大部分人民的道德与伦理的败坏。据雷所说,采用不耐久技术的人,比文明人似乎更原始。

对雷而言,原始人采用更简单的工具,不是对经济条件做出的合理反应。相反,他们采用此技术,是因为他们对未来考虑得太少。按雷的话,这些人缺乏“对积累的有效欲望”。有时,这种精神缺陷被解释为环境的产物。例如,雷推想:“猎人的生活,看起来不符合积累发展的法则……人们似乎根本没想到未来,因为未来完全是可以预知或可以控制的……这种社会的每个成员,只想着猎物供给是富足还是缺乏,此外什么也不想。”因此,结果是,“在猎人国度中,积累原则程度很低,这自然阻止他们形成能带来长期、足够回报的工具”。因此,雷假定:“环境造成每一社区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民族的道德与智力能力,得到的是不同程度的发展。”

雷从未解释过社区怎样能够提高到更高水平,相反却将发展能力归因于种族原因。他说,那些觉得欧洲居民与美洲土著人类似的人,是错误的。欧洲人不是狩猎人。雷承认,“我们的责任是,

探索一下如何才能使他(猎人)采用“牧人的生活方式”。

这种思路,使他与自己的另一理论矛盾,那一理论就是——科技是发展的原因。他提出,只有当人们对积累有了充分有效的欲望,他们才会采用新技术。他说道:“拥有牧群,就暗示着需要相当程度的耐心与远见,保护它们,给它们食物,避免消费它们太多;也意味着存在着比较多的私人财产,因此也存在着将家庭联在一起的纽带。”但雷除了种族原因之外,没有提出别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欧洲开始实行畜牧业。他还将种族作为中国贫穷的根源,将其人民描绘为“自甘于堕落的粗俗好色、嗜酒、低级放肆”。作为证明,他引用了一些旅行家的叙述,说中国人使用的是简单工具。复杂的梯田与水利设施显然是长期艰巨的工程,但雷却坚持说,此类项目在中国并不表明“对积累的有效欲望”,因为灌溉工程的存在源于官方,而不是个人。

雷无法从最近约瑟夫·尼德海姆的作品中获益。雷接受了当时欧洲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科学落后于欧洲。虽然中国的科技落后几个世纪,“中国在14世纪与工业化只有一墙之隔”,由于无知,雷总结说:“我想,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总的来说,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道德感上,欧洲人都远胜过亚洲人。”

尽管中国人已经较差,但他们的“有效积累欲望……比其他亚洲人都高”。雷提供了一个不合逻辑的推理:“在印度,织布机只是几根木棍,如果一个人再雇一个人为他织布,也节省不下什么。因此,在人口密度最大、交通设施最发达、工具的回报率更慢的国家,职业最分散。”基于他的种族理论,他推理道:“因此,我们应该首先假定,他们制造的工具同欧洲国家的工具相比,必然是回报比较快、用的材料比较少的;但他们工具的回报速度,同积累原则更弱的亚洲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慢的……”后来,雷甚至说:“种族的更替,似乎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便如此,雷并不认为种族是支配有效积累欲望的唯一原因。

移民加拿大的英国农民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环境条件是这种变化的原因。并且,同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雷认为,低级阶层的价值与低级的种族差不多。

自然,雷指责低级阶层对未来关注得不够。他确信,目光短浅使穷人处于贫穷状态。他认为,工人家庭中的家用工具很少,恰好可以证明他们缺乏足够的积累欲望。他抱怨说,穷人浪费他们的资金用于饮酒与喝茶,而不肯购买更好的锅碗瓢盆,锅碗瓢盆可以帮他们减少浪费的食物数量。

喜欢进行心理分析的人,对于雷为什么指责低层阶级,会感到困惑。他自己的酗酒,可能就是他被免除教师职位的原因之一。雷时常将有效积累的欲望,与生殖后代的欲望等同起来,然而雷自己好像没有孩子。

雷与原始积累的道德价值

据雷所讲,在加拿大发现的那种自给自足与独立情形,是“社会最简单的状态,那时工艺非常粗陋,积累发展得极少,每人几乎能制造他自己或家庭所需的全部工具”。雷抱怨说:

在大多数人口分散、内部沟通状况恶劣的社区,许多行当都是在农夫家中,由自己的家人做的。这样,在许多最近定居的北美地区,羊毛制品的每一工序,从剪下羊毛到裁剪与织成布,都在农夫家中,由自家人完成。同样的情形在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也很流行。如今,欧洲很多其他地方的制造商也是这样的,他们更应该叫家庭小业主才对。在加拿大,下面的情况并非罕见——不仅整个羊毛在被穿上之前的全部工序都在一个农夫家里,由家庭成员来做,而且他的家人还制造许多其他

物品,以免到很远的地方去买这些物品……他餐桌上的蔬菜,宰杀的牲畜,开胃的苹果酒,使茶水变甜的糖,能吸引最挑剔食欲的各种水果——这些都产自他自己的土地、果园与树林。

与许多我们看过的作者相比,雷对自给自足本身并不反对。相反,他关注的是自给自足造成的社会关系,虽然他分析时用的是宗教语言,而不是经济术语。

对于雷来说,通过节俭的独立生活,可以发展起来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节俭的独立生活,也可能是对资本社会关系的顽固抵抗。苏格兰长老教会员,用他们的自给自足来加强自己的道德信条。天主教徒等不这么好的团体,面对自给自足的挑战时,则沉沦了,至少雷是这样想的。结果,“的确再没有比加拿大农夫更自豪的人了。他们没有上司;他们不依赖于什么人的帮助,甚至很少依赖什么人的合作”。

不幸的是,雷确信,这样的骄傲并不是所有独立农民的特点。只有苏格兰农民,他们的“感觉……完全与圣公会的信条与精神对立”,可以自称有这样的独立。雷宣称,这些群体的典型代表“已经使他们的家庭从贫穷走向富裕”。这些人形成了“足够统治别人的强大阶级”。

雷还看到了另一阶级,一个“足够弱小,可以被统治的阶级”。他们的命运与上述人不太一样。在雷看来:

有许多来自爱尔兰、苏格兰与英格兰的人,在到达加拿大前财物已耗尽,承受着多子女的大家庭的负担。这些人不可能像他们起初计划的那样,立即从事工作,直接进入荒野。他们绝对需要事先有小额的旅程花销,一些必须的设备与器具,以养活自己与家庭,直到他们可以依靠自己占有的土地来生存。要获得这些必需品,唯一的办法通常是到城镇或村庄,或

村镇附近去工作,然后从工资中攒够符合自己目标的数量。时间就这样在游荡中消耗掉了,通常,在达到目标之前,他已经年岁变大,或者屈服于放纵的诱惑——新习惯与陌生的风尚,使他受到这些诱惑——或者他过早地出发了,结果在严酷的土地、饥馑与疾病的联合压力下,倒下了。

雷把关于资本与劳动社会分工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原始积累的道德理论。如果能让人们具有较高的有效积累欲望,通常的回报率将偏低。具有较低回报率的话,社会的阶级组成将发生变化。

按此方法,雷用他的道德观点来支持原始积累。他清楚地看到,不管原始积累,还是基于市场的积累过程,都不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与道德进步相当的物质利益。在一篇已经散失的文章中,他解释道:

(现代文明)的进步过程的本质,就是首先将原来简单粗糙的工具,转变成为成本与效率更高的工具,然后再转变成更昂贵、更有效的难以制造的复杂机器。卷线棒变成纺纱轮,再改变形状,通过其他能量的作用,就成了纺织厂的一部分。原先粗糙的刀刃先做成锯子,加入把手;然后放进架子中,两人操作;然后,通过曲柄与连杆做成水泵,成为锯齿压榨机……我们的所有机械都是这样,都在变成大机器……仍然有一个问题,可能困扰着喜欢思考的慈善家。“谁应该是这些机器的主人?应该让这些现在挥舞着工具的技师与工匠拥有机器,还是让一个单独的阶级来拥有这些机器?”先前的工匠在放弃自己的工具时,从来没有成为后来的机器的主人。这些情况发生得太多了,可以说具有必然性。这些机器……开始被一个特定的阶级拥有。操作人员在工业中没有财产权利,他们

除了双手与使用双手的技能外，一无所有。使用机器的机会、使用机器挣的工资，他都依赖于机器的拥有者。他因此社会地位变得卑微。先前他是小资本家，现在他只是个操作人员，没有任何资本。

更糟糕的是，雷希望新技术可以减少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随着工艺从最初的粗陋阶段发展起来，人干的更少了，机器干的更多了”。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人将成功，另一些人将失败。雷几乎意识到，任一个人有何结果，可能依赖于阶级出身。但他却转向以种族为基础的解释。但是，雷的原始积累理论分析，还是极有价值的。

雷的分析显然很有创见，但他为什么没有赢得认可呢？他强调，个人和种族因素是造成贫穷的原因，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并非罕见。即使现在，经济学家有时也注意文化、伦理、宗教特征，说它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支配因素。

雷同史都华一样，因为倡导采取国家手段来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失去了人们的宠爱。结果，同史都华一样，他遭到贬斥。以西尼尔为例，他的资本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雷的影响，但他却从未公开声明此事。一些人问西尼尔，当对市场进行干预显然是错误的时候，为什么像雷这样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却反对自由贸易呢？西尼尔回答道：“噢，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书的这一部分；我看的是关于资本积累的某一章，还有与此类似的一些讨论。”由于这一遭遇，失望的提问者从此放弃了政治经济学：

他想，这些学究害怕将自己卷到自己科学的迷宫之中，以至于只要他们承认有某个人的天才和能力偏离了普通道路一步，他们就不敢追随他，唯恐找不到出口……这种学究不是我的向导，因为他们显然对自己不可能有任何信心。

最后,西尼尔把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名声,拓展成了一个成功的政府事业。他的资本理论与雷的几乎一模一样。然后,布赫姆-巴威克把西尼尔的资本理论很大程度上据为己有。后来,布赫姆-巴威克“发现”了雷——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他自己的,似乎奇异地相似。这段简短的认可时期很快过去了。今天,雷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他存放在夏威夷大学的论文,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结 论

读一读现代人写的经济思想史,你会觉得古尔利、韦克菲尔德、雷似乎都不能告诉我们太多东西。实际上,这三个人都看到了很多东西,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喜欢把那些东西遮蔽起来。他们将原始积累问题放到了人们的视野中。三个人得到的报酬都是默默无闻。

第十四章 关于发展

因此,农业问题和农业危机的核心,不只是除去农业技术进步的障碍,而是这些障碍将用什么方式去除,应该由哪个阶级通过哪些途径消除。

——列宁《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列宁与革命性的斯密主义的形成

奇特的伙伴:列宁和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对市场的错误构想,是本书多次出现的论题。而对斯密主义历史阐释表示支持的某些言论,却可以在列宁——他最不可能的同盟那里找到。

这两位全然不同的人的融合,让我们对二人的著作都有了启发性的看法。尽管列宁的写作公开反对斯密,但他反斯密主义的主要论点,仅仅指向斯密提出的价值转化为工资和利润的观点。实际上,他们都很关注一些问题。他们都发现自己的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相对快速发展,从而要求清除早期社会的残渣的时期。如同斯密一样,列宁希望迅速的经济的发展,能改变本国群众的守旧心理。

马克·琼斯,一位英国的独立学者,在读了本书的草稿后评论说,马克思从未见到俄国乡村的贫穷,而列宁没有英国工厂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列宁的作品可能不同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因为后者来自于一种西欧的环境。

罗莎·卢森堡等马克思主义者,将原始积累看做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进行的过程。与他们相反,早期的列宁像斯密一样,相信先前经济残余在市场力量的直接作用下会自然毁灭。事实上,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劳动社会分工的演变之间的关系,列宁比斯密说得明白得多。列宁在1893年就写道:“‘市场’这一概念与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概念——马克思称之为所有商品生产的总基础(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基础)——是不可分的。”

在某种意义上,列宁与斯密走了不同的道路。列宁小心地保存着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而斯密总的说来模糊了这种区别。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从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变到商品经济;其二,从商品经济转化到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个转化是由于劳动社会分工的出现,即孤立、彼此分离的生产者专门从事某一工业门类(注意:这是商品经济的一个基本条件)。”当然,列宁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的人崇拜他,有的人蔑视他。他拥有亲身经历19世纪的历史这一优势,但所有他的同辈人都如此。但是,不管人们如何评论他的方法和目标,客观地阅读他的著作就能看出,列宁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地阐述了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主题。早在乔治·施蒂格勒关于劳动分工的著名文章出现之前半个多世纪,列宁就已经写道:

当小生产在农民中增长起来时,标志着新行业的出现,原材料加工这些新行当转化为独立的工业领域,以及劳动社会分工的进步。而小生产被大生产吞并,隐含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前进,走向它的更高一级形式的胜利……在一个国家的发达地区,或在工业的发达领域,资本主义将小手工业者吸引到机械化的工厂来,以取得进步,这是很自然的。在更偏远的

地区,或在工业的落后部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只处于初级阶段,体现为新部门和新工业的出现

列宁在关于美国正在变化的社会分工问题上,引用另一位俄国作家威斯德尼克·叶夫特罗匹的话:

最近,在美国,木工工厂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蓬勃兴起的一些新工厂,只制造诸如斧柄、扫帚把,或者可伸展桌子一类的东西……机器制造正持续发展,不断有新机器被发明出来,使生产的某一方面得以简化和降低成本……例如,家具制造的每一部门都已成为一个行业,要求有机器和专业工人……在马车制造业,轮缘由位于密苏里、阿肯色、田纳西州的专门工厂制造,轮辐由印地安那、俄亥俄州制造,轂由肯德基和伊利诺伊州的专门工厂生产。

如同斯密一样,列宁关注着农村的积极发展,但并不像斯密那样,存在着对农村发展更为艰难的一面视而不见的盲点。虽然列宁不像斯密的继承者那样醉心于消费泡沫,但他欢迎正被采纳的新生活标准:“改革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农民的要求提高了。”

列宁对这些变化带来的清洁特别高兴。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像斯密一样,欢迎这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以消除依赖性,或是他所说的“在农村会不断遇到的对人类尊严的亚洲式虐待”。

在一篇基于研究《对莫斯科古贝尼亚的回报统计》(*Statistical Returns for the Moscow Gubernia*)的引申性文章中,列宁写出了最好的一段文字,描绘农村从资本主义前期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片断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列宁提到的很多特点,都与史都华早期举

的例子不谋而合：

随着工业占有的加剧，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他们购买俄国茶壶、桌上用的陶器和玻璃器具，他们穿更为整洁的衣服。这种服饰的整洁，最初在男子中间，表现为用靴子代替树皮做的鞋子，但在女士中间，皮鞋和靴子则是最为荣耀的；他们偏爱色彩明快、五彩斑斓的印花布和方巾以及华丽的披巾之类迷人的小饰物……在农民家庭中，妻子为她的丈夫、小孩以及她自己做衣服，是代代相传的风俗（史都华提到，在他们苏格兰，同样的习俗非常普遍）……只要他们种植自己的亚麻，花在买亚麻、布匹及其他衣料的钱就很少，而这笔钱可以通过卖掉家禽、鸡蛋、蘑菇、浆果、多余的一束纱线或是一块麻布得来。其余的一些都在家中完成。

然后，该报告说明了商业生产驱逐传统制造业的方式：

花边主要由比较富有的或比较大的家庭的年轻妇女制作，因为在那种家庭里，不是所有妇女都要纺麻或织布。但是，便宜的印花布逐渐取代了亚麻，对此还加上了其他的因素：或是亚麻欠收，或是妻子想为丈夫做一件红色的印花棉布衬衣，给自己做一件更漂亮的衣服。农民在家为自己织各种亚麻或围巾的风俗，因此而渐渐消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尽其所能做东西来卖，甚至让他们的小孩参与这项工作。

列宁和斯密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自然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一致。列宁不同于斯密的地方仅在于，他相信大工业的产生也是自然的。是列宁错了，还是我应该收回我的观点——认为斯

密关于发展的理论是一个失败的意识形态冒险？

列宁和民粹派

我们已经看到,韦克菲尔德的实际计划,揭露了斯密主义教条的错误。为什么列宁事实上会退回斯密?列宁对斯密的理解,部分来自于他对民粹派的反对。民粹派对他兄弟的命运应承担 responsibility——他兄弟因参与了民粹派暗杀沙皇的图谋,而被处死了。

民粹派经济学家——如瓦西里·华仑索托夫、尼古拉·丹尼尔森——认为资本主义不适合俄国的土壤。他们抗议国家想人为地把资本主义引入俄国。国家的这些努力,例如推动俄国铁路系统,确实执行得很蹩脚,后果也具有压迫性。由于很多投资都是引进的,这一项目的直接冲击,可能会限制国内市场,从而扼杀俄国的本国经济。

人为地促进资本主义所导致的扭曲,因为典型的俄国制造业的庞大规模,而更加具有破坏性。在 1914 年,工人数不到 100 的公司,雇佣的工人总数不到 17.8%。而在美国,35% 的产业工人都被这种小机构雇用。在俄国,41.4% 的产业工人被大企业雇用,这些企业拥有 1 000 以上员工。在莫斯科,这样的企业雇用了 57.3% 的工人。在美国这一数字仅是 17.8%。

俄国经济遭受了二元经济增长模式会带来的通常病兆。民粹派想在传统的乡村经济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以此来避免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要付出的代价。

列宁谴责他们的计划。农民的生活是无穷尽的苦难。小说家高尔基用以下这句话表达了俄国村庄的状况:“农村的原始劳动沉重得令人难以置信,农民们把那称为‘strata’,此词来自俄语中的动词‘stradat’,意思是‘受难’。”

民粹派指责资本主义是对整个俄国乡村生活的人为入侵。与此相反,列宁把俄国乡村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看做是更大的演变过程的一部分,最终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认为农民不是被铁路压垮了,而是被手工劳动的重担压垮了。列宁告诫说,沿着民粹派的路走,就会被浪漫主义的幻想所欺骗。列宁声称,村庄不像民粹派想像的那样是传统社会关系的壁垒。资本主义在乡村已经牢牢的扎下了根。他坚持认为:

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俄国,工人与土地的联系非常脆弱而且不真实。财产拥有者的力量又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再有一次技术进步,农民(他们实际上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就会成为简单纯粹的工人……农村工业总的来说很可怜,设施很简陋,劳力效率非常低,技术原始,工人数量少,但它还是资本主义。

在这一方面,列宁的观点与很多现代主流农业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他们把农民看做的的确确的利润最大化者。列宁从这一观察推断“自由交换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的把产品过程分为资本拥有者和劳力的拥有者”。

简而言之,民粹派根据国家是否能成功地推行资本主义,来衡量资本主义。而列宁则根据资本主义在农村的自然发展来分析它。在这种意义上,列宁可以被称为斯密主义,而民粹派可以说是继承了史都华的衣钵。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自然的,这一立场可以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得到支持。然而恩格斯是在攻击杜林可笑的“力量理论”,杜林以此几乎否定了资本运动法则中固有的经济力量的任何影响。在这一活动中,恩格斯很自然地避开了原始积累这一主题。

列宁的阶级分析与斯密有点相似。斯密把进步的资产阶级看做是乡村经济的自然产物。地位已经巩固的资产阶级,则多少与重商主义力量相联合。因此,斯密并未重视他们。列宁也认为,俄国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太软弱,不能促进发展。

正如斯密不公正地批评他的重商主义对手,列宁在与民粹派的争论中,也不时失去了自制力。我们可以说,列宁可能误读了一些对手,他甚至可能低估了乡村家庭工业“聚集时间碎片”的潜力。然而,他确实对俄国状况提供了一个前后一致的革命性解释。

再论列宁与斯密

列宁把斯密与民粹派等同起来,以此模糊了他的分析与斯密的分析的密切关系。然而这是误解了斯密的用意。如同民粹派一样,斯密一开始确实展示了市场力量如何取代了传统的生产关系。然而,与民粹派完全正相反,斯密把市场的演变归功于自然力量,而不是国家。

列宁和斯密对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问题同样有兴趣。斯密没有明确分析劳动的社会分工,但他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反,说明他更赞同加剧劳动社会分工的演变。

劳动的社会分工是列宁在他早期作品之一《论所谓的市场问题》(*On the So-called Market Question*)中探讨的核心。在列宁有点类似斯密的分析当中,“市场的发展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模糊了资本主义关系生根的方式和决定这些关系具体过程的因素”。在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重要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中,列宁在头三页三次重复了这一观点,那就是社会的劳动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基础。

此外,如同斯密一样,列宁坚持说不需要外部措施把家庭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割开来。如果农民有可能获得土地,“那将不会废除资本主义;相反,那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基础,而且将加速并深化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

斯密和列宁在美国的经验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听起来列宁比斯密更像斯密,他主张道:“在美国,不是大地主的奴隶经济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基础,而是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农场主的自由经济,他们摆脱了中世纪的锁链,从农奴制和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他可能是正确的,虽然量化在这种问题上很困难。

我们知道,早期的美洲农业主要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有田产的家庭经常像苛刻的奴隶主驱使奴隶一样驱使自己去辛勤工作。此外,它们用来给自己提供消费品做的劳动比较少。

勤劳工作还不够。例如,在1770至1775年之间,人均收入估计是以每年0.4%的微弱比例增长。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待着大量使用奴隶制,来生产出口产品——这些出口产品成了国家经济的基础。

的确,奴隶制也有它的局限性。最终,奴隶制撞上了双重障碍。一个是土地资源的枯竭。另一个是奴隶制的激励机制与高生产率之间的矛盾。还有就是发展出了更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对奴隶制来说是不适用的。到内战之前,南方农业的衰落已不可避免。赫尔柏^①通过计算得出这样的结论:15个蓄奴州的棉花、烟草、干草、大麻和白糖收获的总价值,还不如自由州的干草一项的价值。赫尔柏就像列宁一样,仍然忽视了早期奴隶劳动对美国的积累过程所做的巨大贡献。

① 赫尔柏(Hinton Rowan Helper, 1829-1909):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南方唯一一位对奴隶制做出抨击的杰出作家。

列宁对小生产的重新解释

值得赞扬的是,列宁显示出从时事中学习的能力。在1905年革命之后,列宁大幅度修改了他对农民的立场(农民对这次革命是支持的)。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他原来的经济学,而是使他对资本主义已经建立的程度更有信心了。

基于对美国经验的理解,列宁为俄国乡村提出了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或者国家分配土地,来重现美国的情况;或者将土地给大土地拥有者,使他们就像在普鲁士一样拥有大地产。列宁写道:“两种解决方法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有助于更高科技的采用……两者都符合农业进步的进程。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一个是把这种进步建立在把穷苦农民加剧挤出农业的基础上,而另一个的基础是通过消灭封建大农场主,加剧雇佣劳动体制。”因此,列宁相信:“农业问题和农业危机的核心,不只是除去农业技术进步的障碍,而是这些障碍将用什么方式去除,应该由哪个阶级通过哪些途径去除。”

列宁还认为美国道路是“最民主的……而且让人民大众少受苦”。此外,美国道路是最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列宁主张,美国道路“将不可避免的从农业中消灭大多数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毫无保障,任何‘对土地的权利’都不足以阻止这一倾向”。

列宁满怀信心地总结说:“农民的劳作方式……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产生了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在这一点上,列宁的结论又一次与斯密的观点不谋而合。

列宁可能低估了奴隶制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但他对美国道路的描绘,与历史经验是一致的。无论韦克菲尔德说在美国从

事农业多么容易,大量农夫面临着无数障碍,这些障碍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严峻。到19世纪,建立一个典型的农场成本大约为1000美元。农业向新的西部土地扩张,充斥了市场,使价格降到了灾难性的低水平。在辛西那提附近,玉米价格在某些地区降到了每蒲式耳6美分。在其他地区,价格降得那么低,以至于人们用玉米代替木材来做燃料。很难借贷。农场主须支付的利息极为昂贵,短期贷款利息高达120%。特别在新英格兰地区,土地相对少,还比较贫瘠,农民不得不求助于借债,来让他们的孩子们继续务农。

美国的财富分配以前在殖民地时期比较稳定,在1774年以后变得更加不平等。结果,美国经济开始从大批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大军中,创造出大量土生土长的工业劳力大军。开始,这些工人是东北部的妇女,她们是被男子的大规模迁出而留下的。

到列宁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时,农场已经成为美国工业劳力的主要来源。在1860年到1900年之间,每一位工人从事农业,就相应地有20位农夫迁移进城市。农家子弟每有一个成为农场拥有者,就相应地有10位在城市定居下来。

斯密狂热地颂扬说,人们是在更好机会的驱使下,向新职业流动。与斯密不同,列宁在解释从农村迁出的倾向时,强调绝望情绪的推动力。虽然二者的数学计算是一致的,但在社会化学方面却不一样。

在美国,一个本国无产阶级出现的实际机制,比列宁所说的略为复杂。当经济情况变糟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从城市回到乡村。当商业周期再次向上运动的时候,向城市的迁移将以更大规模重新开始。例如,安德烈·君德·弗兰克注意到,1958年的经济衰退中,单底特律市就失去了5万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迁去了南部和边界各州的农场。相似的因素决定了涌向美国的移民潮。例如,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与墨西哥的降水缺乏程度密切相关。

马克思认为,这种向乡村转移的时盛时衰,可以追溯到15世纪。他谈到,在每一个循环过程中,“小农阶级再次出现,虽然数量更少,并且情况更糟”。

无论何种情况下,经济繁荣阶段与农村人口流失的吻合,都与斯密的计划相一致,斯密强调的就是移民和城市提供的机会有关。然而列宁更正确地找出了把人们从农村驱赶出来的潜在力量。

总的来说,美国更能证明列宁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斯密的理论。

列宁论农村的分化过程

列宁的俄国和斯密的英国都有一个关键特点:贫穷使自给自足的家庭生活模式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很困难。贫穷不是资源情况的自然结果,而是几个世纪的剥削的产物。回想一下马克思对英国的描述:

自从亨利七世以来,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对待传统农业关系都没有这样无情地调整并使农业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为革命的国家。无论在哪个地方,只要历史遗留下来的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不一致或不相符,它们就会被无情消灭;这不仅适用于乡村社会的地位,也适用于乡村社会本身,不仅适用于农业人口的聚居地,也适用于农业人口本身,不仅适用于最初的耕作中心,也适用于耕作本身。

我们已经说过,这种转化经常要跨越很长时间(本书第二章)。当家庭经济发现自己处于封建式雇主统治的环境中时,会发生什么

情况呢？

列宁同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分析：在那样的情况下，报酬越低，就会有越多的人为自己生产。他并没有像史都华等人那样，认为这种安排将在根本上有利于资本。相反，列宁肯定地说，这只会保持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促进资本的积累。就像恩格斯在德国观察到的那样，在俄国，家庭经济也将会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列宁理解了古典原始积累理论的本质。他知道，一旦传统部门变得枯竭，贫穷的农民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雇佣劳动。因此，在这个背景下，贫穷并不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可以利用贫穷这个工具，按照资本的利益来组织社会。

在俄国，传统部门中的贫穷已经特别厉害，以至于列宁看到了近期之内的希望。在他内心，“在改革后的时代，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已经导致了‘农民’需求层次的提高：农民开始过‘更为整洁’的生活（关于衣、住等等）”。然而列宁也观察到，对便宜的印花棉布等东西的渴望，正使家庭小生产逐渐消失。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了由各种经济层次构成的社会：从无地的劳力，到成功的农民。俄国人称后者为“富农”。与斯密不同，列宁对农村的这个分化过程的细节极为关注。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交换”这个词，来解释列宁的某些分析。我们回想一下以前举的一个例子，其中，典型的家庭用4个小时，就能制造出一切自己所需的东西（见第四章）。有一些家庭生产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一些则更少。因此，如果雇佣劳动力的一个工作日是8小时，一个低效率的需要7小时来制造所有必需品的家庭生产，将不太可能抵抗雇佣劳动的条件。

事实上，实际的分化过程不会像以下讨论的那么简单。不过，它仍将遵照以下的大致趋势。假设，无论家庭经济还是用工资来购买商品，都能赢得同样的生活标准，那么，一个低效率的家庭生产，与一个高效率的只需两三个小时来生产同样物品的家庭相比，

接受了雇佣劳动也没有太大损失。

那么,决定家庭生产低效率程度的是什么呢?列宁认为,效率与现代化是同义的。他嘲笑传统生产者号称的效率。是的,传统生产者有时能与现代工业相竞争,但这种竞争只能通过极度降低他们的生活标准,才能达到。答案在部分意义上取决于纯粹的技术现象。更好的种子、更仔细的工作、更先进的设备,都能提高小农场的效率。

原始积累或资本积累

就像马克思一样,列宁强调将传统生产者消灭殆尽的技术和经济力量。当然,家庭能否获得生产资料,不单是科技的结果。卡尔·考茨基关于农业的作品,曾经赢得列宁的赞扬。考茨基指出,一些政治行为,诸如剥夺农民收集木材和打猎的自由等,可以增加一个家庭生产同样的使用价值的小时数。

家庭可以通过降低生活水平,来应付原始积累造成的困境。例如,随着对传统农业经济的压力的增加,肉的消耗量似乎降低了。生产力更强的家庭可能会试图为市场生产更多的产品,来克服困境。

有两个因素会使后一方法变得更为复杂:很多家庭不具有足够资本,来为市场生产足够的产品;而且,如果所有家庭都采取这种策略,就会导致农产品过剩,就像我们刚才描绘的用玉米代替燃料的情况一样。另一方面,家庭可能会试图通过挣工资,来维持生活水平。无论怎样,市场的逻辑引导着分化的过程。有些家庭在前几年,效率与周围的邻居不分上下,现在则显示出获取利润的能力。还有一些没有竞争力的家庭,会将财产输给更成功的生产者。因此,幸存者就会在他们扩展的产业上,雇用无产业的工人劳力,

来增加产量。

考茨基对原始积累例子的讨论很有趣,但他掩盖了这一过程的最初压力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他认为,规模经济和专业化本身,就可以导致分化过程。有时,考茨基对市场力量的信心似乎极大。他甚至赞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效果。列宁也过分相信市场力量,认为那些富农掌握了先进的技术。

拉杜里研究了此前的时期,认为还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他描述了一位生于1495年的法国土地所有者马森的活动。在这里,我们发现,马森通过各种方式占有土地,包括放高利贷,不交十一税来降低成本(他表面上说,不交十一税是为了与宗教改革步调一致)。马森与传统行为的决裂可能对社会有利,也可能对社会不利,但却和资本积累一致。然而,我们并未得到暗示说,马森在生产商品时采用的生产方式更有效,只是他更有能力在市场条件下获取利润罢了。

后世的另一个马森式人物,那些所谓的“白手起家的人”,似乎已经成了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的核心。其他人,比如马森的那些无力还债而失去了财产的邻居,形成了无产阶级。

斯密以赞赏的态度,看待这些成功人士的活力和进取心。确实,他们与他鄙视的没落贵族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强调“资料”(stock)的作用,这与列宁的看法一致——列宁也坚持说,成功不是个人美德的结果,而是占有资本的结果。

列宁认为,在俄国,本地“马森”的受害者的人除了参加共产党以外,将别无选择。这个过程进展越快,革命的杂乱工作就能更快完成。这一分析中暗含的一点是,以前的经济结构造成的压榨,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列宁指出:“生活创造了一些形式,这些形式中逐渐融合了一些经济体系,这些体系的特点是相反的。”

列宁部分地摒弃了斯密的论调

很明显,列宁会反感这样把他的作品描写为斯密主义。甚至在今天,在左派人士口里,“斯密主义”也不时被用做一个刺耳的贬义词。例如,罗伯特·波兰奈尔就指责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家,如弗兰克、华勒斯坦,甚至斯韦茨,说他们是“斯密式”的。让人惊讶的是,波兰奈尔自己宣称,封建制度崩溃的“原始压力”来自对英国布匹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听起来就像斯密主义的论调。

“斯密主义”这种词的用法表明,斯密想倡导资本主义社会,却不承认存在着创造它的历史的必要方式。这种立场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多么可行,而是因为这能支持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辩护。毕竟,在斯密写作的时候,英国的农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资本的需要一致了。因此,英国看上去井然有序。

与此相对照,苏格兰的部分地区,仍然没有充分融合到更广泛的劳动社会分工中去。即使如此,对斯密来说,苏格兰高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能很快通过市场的作用被吸收到社会劳动过程中来。因此,人为地制造贫困,似乎没有必要。

斯密的敌人史都华对意识形态并不太关心。对他而言,还有太多的工作没有做。世界仍然缺少政治家,来进行政治家的事业,例如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斯密式的发展步伐对他来说太慢。韦克菲尔德想要将这一观点发展到全球范围。而对列宁来说,这一过程的结果将到达一个更为先进的阶段——世界革命。

让列宁痛苦的是,他很快意识到了他的斯密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斯密主义在他与民粹派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可能有用,但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他想像的那样。

因此,列宁求助于市场,来帮助创造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建

立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包含了大量理论矛盾的实用策略的杰作。各种市场关系被整顿排列,来构成社会主义关系。对个人动机的让步,将为构建更广泛的合作基础,铺平道路。

在此时,列宁对市场的应用,更接近于史都华,而不是斯密。斯密式的理论,让位于史都华式的政治家的行动。列宁得出了与史都华类似的认识,那就是“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商业生产”,以及“建立工农之间的恰当联系”。

斯大林与毛泽东

史都华很久以前就说过,人们在收割以前,必须先收集落穗(见第七章)。因此,苏联构造了新经济政策,在农业部门内部培育增长,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

斯大林接管政权之后,党的思考,继续让人想到史都华式的用语。斯大林号召在“城乡联系、工农联系”的政策上进行转变。如同史都华一样,他强调将生产产品而不是消费产品提供给农民。因此,他推荐一种“不只是基于纺织品,还应该基于金属……的联系”。

斯大林的“联系”跟史都华的不一样,目的“不是要保存阶级,而是要消灭阶级”。因此,具有讽刺色彩的是,他的集体主义计划在巩固城乡联系的意义,得到了维护。最终,俄罗斯农村也将除去“多出来的嘴”。

就像苏联一样,毛泽东也表示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生产和交换关系。因此,他继续说,正在寻求越来越多的合适形式。中国从斯大林时代的错误中学会了很多,但是学得还不够。

与斯大林不同,毛泽东相信,不能通过法令来创造正确的安排。不幸的是,法令会成为习惯。然而,毛泽东的继承者听起来几乎像史都华的继承者一样,提出了一个经济计划,要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

直接联系起来,使每个人在一个事业中都把它看做与自己的实际利益相关的事,关注完成国家计划,关注这一事业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毛泽东赞同用看得见的政治联系,取代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就这个方面来说,毛泽东的想法可以称做“斯密式的”。尽管他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但他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的自发力量在农村得到了稳步增长。要消灭这些反动的斯密主义力量,纠正方法就是一个耐心的“斯密式”社会主义发展计划。毛泽东坚持,经济方面的考虑要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之上。他也同意斯密的观点,认为主要由农业带头的发展,将最终创造出最高水平的工业化。如同斯密一样,他也偏爱农业。

斯密与毛泽东之间的最大相似点,就在于他们对人民的态度。斯密,如果不算他的意识形态的话,对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会带来社会的持续进步,充满信心。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也积极肯定地认为,人民大众会把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只要人民被置身于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能力的合适环境当中。

这种想法恰恰反映了马克思的构想。确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一方面的最佳继承人。

阿瑟·刘易斯

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例如原始积累,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见解,但也定义了它的盲点。就说一个相当近的例子。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最严重失败之一,就是它对食品生产的长期忽视。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作品的基调,都是由阿瑟·刘易斯^①

^① 刘易斯(Arthur Lewis, 1915 - 1991):英国经济学家,1979年与舒尔茨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定下的。从他 1954 的经典文章《无限劳力供给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开始,刘易斯就宣布自己遵循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确,虽然刘易斯的文章不完全忠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字面意义,却反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精神。

刘易斯试图解释,表面看来似乎无限的非雇佣劳动力供给,如何可以开发利用。他甚至恢复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这两个范畴,来说明排挤农民生产者的必要性。

刘易斯并不是完全坦白的。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他注意到:

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水平,取决于生活资料部门的收入……这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最坏特征……保持低工资对他们(帝国主义者)有利,即使他们不故意使生活资料部门贫困,他们至少很少做任何事情来使它更多产。实际上,现代每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在非洲的记录,都是一个使基本生存资料经济贫困的记录。

刘易斯将原始积累解释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在非洲,但这与市场无关。实际上,刘易斯构想的经济发展,是让生活资料部门尽快消失,使市场力量能拯救殖民地人民。

在描写种植园主怎样迫使工人离开土地时,刘易斯甚至借助于马克思的权威。那么,资本家和自给自足人民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仅限于殖民地呢?刘易斯是不是说,种族或民族偏见是殖民地贫困的根源?他在这方面保持了沉默。

刘易斯不觉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和生活资料生产部门人民的利益有什么矛盾。相反,他建议不发达国家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议:增加储蓄和投资,使资本家雇主能雇用离开农村的

剩余农业劳力。资本和劳力的利益显然被认为应该结合起来。

古典政治经济学表面上采取了一种相似的立场。对斯密来说,所有邪恶都是重商主义做法造成的,资本主义是拯救的源泉。然而隐藏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内的,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那就是,通过削弱人们的自给自足能力,资本可以获利。

因此,刘易斯是忠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他赞扬自由放任理论,却不公开讨论与此相伴的干涉主义政策。那些没有充分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跟随刘易斯的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古典经济学家总是很重视食品价格政策。刘易斯的跟随者们,仅仅听了他对资本的有用效果的讲座,而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的那一方面。刘易斯的情况再次说明,对古典名著的正确阅读,可能會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刘易斯的政策,在不发达国家的农业中,已经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结 论

本书的结论,现在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首先,本书试图说明,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一股关键的力量——不仅是在资本主义之前的过去,或甚至在某些幻想出来的封建社会突然变成资本主义的时刻。而是,原始积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一直在扮演着角色。

此外,我试图说明,原始积累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在总体分析资本积累时,特别有价值。原始积累对于理解社会劳动分工的演变,是一个中心范畴。

本书揭示了古典政治学家们对自由放任原则的所谓坚持,其实是很脆弱的。

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原始积累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了一起。诚然,资本主义的种子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播下了,但以前从未有任何地方有那样激烈集中的资本积累过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促进资本积累,以培育资本主义发展,很感兴趣。但在写经济理论的时候,则隐藏了他们是那一部分想法。本书呼吁人们注意原始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角色,由此指出,有必要修正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方法。在这一环境下,亚当·斯密显得不那么新颖了。他的重要意义来自于他大力提倡自由放任政策,以及他最终成功地模糊了所有可能对他的意识形态提出疑问的信息。

其他人,例如韦克菲尔德和雷,对积累的本质基本上持更为现实的看法,虽然后来的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分析抛在一旁,让人觉得

政治经济学有一种人道主义传统。从经济思想史的文献来判断,对历史的这种修改获得了巨大成功。《资本主义的诞生》一书,就是想改正这种错误的历史遗产。

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这些结论的细节,或把它们再总结一遍。我希望将大家的注意力,转向本书没有提到的一个主题,我认为这一主题值得更进一步的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号召加速原始积累的发展,展示了对资本积累的潜在力量的清醒认识。小生产者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无疑是对资本进步的一个障碍。

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都意识到,之所以应该限制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因为它的成功。甚至在工业革命证明其巨大潜力的过程中,小生产者也展示了惊人的顽强。确实,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仅仅通过降低生活水平来得以维持,然而这并不是他们能够继续下去的主要原因。小生产有它自身的经济,有它自身的效率。从长远看,它们可能无法跟现代的资本密集型生产相提并论,但在资本稀少的地方,这样的技术则特别具有竞争力。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小生产的分析中得出的教训,对贫穷的、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极为有用。这些国家可以采用一个过渡计划,大量依靠与传统家庭生产部门类似的技术潜力,那么它们的经济有可能运转得比较好。很明显,在制定这样一个计划时,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提供一个蓝图,不过,马克思也无法提供。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来是用来帮助资本剥削劳力的。不过,它有可能是我们获得启发的一个重要来源。本书的附带作用之一,可能就是将重新激发人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兴趣。

参考文献

Abeille, Louis Paul. 1768. *Principles sur le liberte du commerce des grains*. Amsterdam: Desaint.

Achenwall, Gottfried. 1767. *Some observations on North America from oral Information by Dr. Franklin*. In vol. 13 of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edited by Leonard W. Larabee and William B. Wilcox.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

Adams, John. 1780. Letter to John Luzac, 15 September 1780. In vol. 7 of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edited by Charles Frances Adams. Boston: Little, Brown, 1856.

— . 1819. Letter to William B. Richmond, 14 December 1819. In vol. 10 of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edited by Charles Frances Adams. Boston: Little, Brown, 1856.

Adams, Thomas R. 1969. The British 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or 1774: A progress report. *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81: 31 - 103.

— . 1971. The British look at America during the age of Samuel Johnson. Typescript: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 Providence, R. I.

Adler, Moshe, 1985. Stardom and tal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no. 1 (March): 208 - 12.

Aglietta, Micha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The U. S. experience*. Translated by David Fernbach. London: New Left Books.

Akhtar, M. A. 1979. An analytical outline of sir James Steuart's macroeconomic model.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1, no. 2(July): 283 - 302

An alarm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 1757. London: J. Scott.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698, item 9215.

Aldrich, Robert. 1987. *Late - comers or early - starter? New views on French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6, no. 1(September): 89 - 100.

Allen, G. C. 1929.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Birmingham and the Black Country, 1860 - 1927*.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Althusser, Louis. 1970. *From capital to Marx's philosophy*. In *Reading capital*, edited by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London: New Left Books.

Alvord, Clarence Walworth. 1917. *The Mississippi valley in British politics: A study of the trade, land speculation, and experiments in imperialism culminating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2 vols. Cleveland, Ohio: Arthur H. Clark.

Ambirajan, S. 1977.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British policy in India*.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merican husbandry, 1775. Edited by H. J. Carm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Ames, Fisher. 1854. *Works of Fisher Ames*. Edited by Seth Am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erson, Gary M., William F. Shugart II, and Robert Tollison. 1985. *Adam Smith in the customhou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 no. 4(August): 740 - 59.

Anderson, James. 1777a. *Observations on national industr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8.

—.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the corn - laws*. Edinburgh.

Anikin, A. V. 1975. *A science in its youth: Pre -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ppleby, Joyce Oldham. 1976. *Ideology and theory: The tension between economic liberalism in seventeenth - century Englan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1, no. 3(June): 499 - 515.

—. 1978.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 - 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rbuthnot, John. 1773. *An enquiry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price*

of provisions and the size of farmers. London: T. Cadell. In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1024, item 10958.

Arnot, R. Page. 1955.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miners from earliest time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Arthur, W. Brian.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99(March): 116 - 31.

Ashley, P. 1920. *Modern tariff history: Germany,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London: Murray.

Ashton, Thomas S. 1925. The records of a pin manufactory, 1814 - 1821. *Economica* 15(November): 281 - 92.

—. 1948.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University Paperbacks.

Aspromourgos, Tony. 1986.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The economics of Sir William Petty.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3, no. 1 (February): 28 - 45.

—. 1988. The life of William Petty in relation to his economics: A tercentenary interpret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 no. 3(fall): 337 - 56.

Athar, Hussain, and Keith Tribe. 1981.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Vol. 1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peasantry, 1890 - 1907*.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Atkins, P. J. 1977. London's intra-urban milk supply, circa 1790 - 1914.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 no. 3: 383 - 99.

Auden, W. H., ed. 1956.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writings of Sydney Smith*.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Bagehot, Walter. 1880. *Economic studies in the works of Walter Bagehot*. Edited by Forrest Morgan, vol. 5. Hartford, Conn: Travelers Insurance Company, 1889.

Bailey, Elizabeth E., and Ann F. Friedlander. 1982. Market structure and multi-product indus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 no. 3(September): 1024 - 48.

Bailyn, Bernard. 1955.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Baldwin, Carliss Y. 1983. Productivity and labor unions: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self-enforcing contracts. *Journal of Business* 56, no. 4(April): 155 - 85.

Balibar, Etienne. 1988. The notion of class politics in Marx. *Rethinking Marxism* 1, no. 2(summer): 18 - 51.

Balint, Michael. 1965. On love and hate. In *Primary love and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ers.

Banaji, Jairus. 1977. Modes of production in a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Capital and Class*, no. 3(autumn): 1 - 44.

Bancroft, George. 1854.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10 vols. Boston: Little, Brown.

Barber, William J. 1975. *British economic thought and India, 1600 - 1858: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ardhan, Pranab K. 1973. Size, productivity, and returns to scale: Analysis of farm - level data in India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no. 3 (November - December): 45 - 66.

—, 1979. Wages and unemployment in a poor agrarian economy: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 no. 3(June): 479 - 507.

Barrios de Chungra, Domitila. 1979. Let me speak! *Monthly Review* 30, no. 9 (February): 42 - 54.

Barton, John. 1817. Obs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society. In vol. 2 of *Economic writings*, edited by Georges Sotiropff. Regina, Canada: Lynn.

—, 1833. In defense of the corn laws. In vol. 2 of *Economic writings*, edited by Georges Sotiropff. Regina, Canada: Lynn.

Baumol, William. 1976. Smith versus Marx on business morality and the social interest. *American Economist* 20, no. 2(fall): 1 - 6.

Beaglehole, John C. 1955 - 67. *The voyage of the endeavour, 1768 - 1771*. Vol. 1 of *The journals of Captain James Cook on his voyages of discovery*.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arington, F. 1975.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gardening in Bedfordshire, 1799 - 1939.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23; 23 - 47.

Becker, Gary S.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75, no. 299(September): 493 - 517.

Beechy, Veronica. 1977. Some notes on female wage labour in capitalistic production. *Capital and Class*, no. 3(fall): 45 - 66.

Bell, John Fred. 1960. Adam Smith; Clubman.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 no. 2(June): 108 - 16.

Bellers, John. 1696. *Proposals for raising a college of industry, etc.* In *The life of Robert Owen*, by Robert Owen. London: Effingham Wilson, 1857.

— . 1714. *Essay towards the improvement of physick.* In *John Bellers, 1654 - 1725: Quaker, economist, and social reformer, his writings reprinted.* London: Cassell, 1935.

Benians, E. A. 1926. Adam Smith's project of an empir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 249 - 83.

Benson, Lee. 1950. Achille Loria's influence o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 *Agricultural History* 24: 182 - 99.

Bentham, Jeremy. 1787a. Letter to Dr. Smith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dited by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and Ian Simpson Ro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 . 1787b. Defence of usury. In *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 edited by Werner Stark. 3 vol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2.

— . 1790. Letter to Dr. Smith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dited by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and Ian Simpson Ro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 . 1797. *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 house.* In vol. 4 of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edited by John Bowring.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2.

— . 1822.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religion on the temporal happiness of mankind.* Reprint, The psychology of economic man. In *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 edited by Werner Stark. 3 vol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2.

— . 1830 - 31. *History of the war between, Jeremy Bentham and George the third, by one of the belligerents: Extracted as selections from Bentham's narrative regarding the panopticon penitentiary project and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n the subject.* In

vol. 11 of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edited by John Bowring.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2.

—, 1952. *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 Edited by Werner Stark. 3 vol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1954. The psychology of economic man: Extracts arranged by Werner Stark. In vol. 3 of *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 edited by Werner Stark.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2.

—, 1962. Constitutional code. Vol. 9 of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edited by John Bowring.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2.

—, n. d. *Outline of a work entitled pauper management*. In vol. 8 of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edited by John Bowring.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2.

Berg, Maxine. 1980a. *The machinery question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5 - 1848*.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0b. Proto - indust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1700 - 1800. Coventry: University of Warwick,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1986.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work in Britain, 1700 - 18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ger, Peter. 196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Bergue, Augustin. 1976. Alternance agricole et urbanisation au Japon. Paper read at the *Symposium on Urban Growth in France and Japan*, 30 September, Tokyo.

Berkeley, George. 1740. The querist. In vol. 4 of *Complete works*, edited by A. C. Fras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1.

Bettelheim, Charles. 1976.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 S. S. R.: *First period, 1917 - 1923*.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idwell, Percy Wells. 1916. Rural economy in New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20: 251 - 76.

Bidwell, Percy Wells, and John I. Falconer. 1941.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620 - 1860*. New York: Peter Smith.

Billingsly, John. 1798. Uselessness of commons to the poor. *Annals of Agriculture* 31.

Bishton, J. 1794.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Salop with observations for its improvement*. Brentwood: P. Norbury.

Black, R. D. Collison. 1960.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Irish question, 1817 – 1870*.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ack, R. D. Collison, and Rosamund Koenigkamp. 1972.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Biography and personal journal*, by William Stanley Jevons. Vol. 1 of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London: Macmillan.

Blackstone, William. 1775.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6th ed. 4 vols. Dublin: Company of Booksellers.

Bogart, Ernest Ludlow, and Charles Manfred Thompson. 1927. *Reading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Böhm – Bawerk, Eugen von. 1959. *Capital and interest*. 3 vols.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Bonwick, Colin. 1977. *English radical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Boserup, Ester. 1965.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Chicago: Aldine.

Boswell, James. 1799.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 Edited by George Birkbeck Hill. 6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Bowring, John, ed. 1962.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11 vols.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Bowsher, Norman N. 1980.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Is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undermining monetary policy? *Monthly Review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62, no. 1 (January).

Boylan, Thomas A., and Timothy P. Foley. 1992.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lonial Ireland: The propagation and ideological function of economic discour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Braunson, Roy. 1979. James Madison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0, no. 2 (April – June): 235 – 50.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ay, Charles. 1841. *The philosophy of necessity*. 2 vols. London: Longman, Orme, and Green.

Brenner, Robert. 1977.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04(July - August): 25 - 92.

Brief, Richard P. 1965. Nineteenth century accounting error.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3, no. 1(Spring):12 - 31.

Brockway, Lucille. 1979. *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roderick, George C. 1881. *English lands and English landlords*. London: Cassell Petter, Galpin and Co.

Buecher, Karl. Hausindustrie aus dem Weihnachtsmarkt. In vol. 2 of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Tübingen, 1893.

Bukharin, Nikolay, and E. Preobrazhenski. 1922. *The ABC of communism: A popular explanation of the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6.

Burke, Edmund. 1759.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 *Annual Register*, 6th ed. London: J. Dodsley, 1777.

Burns, Scott. 1976. *Household, inc.* New York: Doubleday.

—. 1979. What self-reliance is worth. *Organic Gardening*(May):86 - 92.

Byington, Margaret. 1910. *Homestead: Households of a milltown*. New York: Arno Press, 1969.

Cairncross, Alexander R. 1958. Economic schizophrenia.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 no. 1(February):15 - 21.

Campbell, Robert. 1953. Sir James Stewart: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mpbell, T.D., and I.S. Ross. 1981. The utilitarianism of Adam Smith's policy advi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2, no. 1(January - March):73 - 92.

Cannan, Edwin. 1929. *A 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P. S. King and Sons.

Cantillon, Richard. 1755.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eneral*. Edited by Henry Higg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4.

Carey, Lewis J. 1928. *Franklin's economic view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Doran and Co.

Carrier, Lyman. 1918. American Husbandry, a much overlooked publication. In *American husbandry*, edited by H. J. Cann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xx.

Carter, Ian. 1980.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s an underdeveloped region. In *The rural sociology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Frederick H. Buttel and Howard Newby. Montclair, N. J.: Allanheld and Osmun.

[Chalmers, George.] 1805. Anecdotes of the life of sir James Steuart. In *The works: Political, metaphysical, and chronological*, Sir James Steuart.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Chambers, J. D., and G. E. Mingay. 1966.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750 - 1880*.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Chamley, Paul. 1965. *Documents Relatifs a sir James Steuart*. Paris: Librairie Dalloz.

Chandler, Alfred C.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tfield, Michael. 1977. *A history of accounting thought*. Huntington, N. Y.: Robert E. Krieger.

Chayanov, A. V. 1966.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Edited by Daniel Thorner, Basil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Child, Josiah. 1751. *A new discourse of trade*, 5th ed. Glasgow: Robert and Andrew Foulis.

Chinn, Dennis L. 1979. Rural poverty and the structure of farm household incom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7, no. 2 (January): 283 - 301.

Chitty, J. 1812. *A treatise on the game laws and on fisheries*, 2 vols. London: W. Clarke and Sons.

Clarke, Richard N., and Lawrence H. Summers. 1980. The labour scarcity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 *Economic Journal* 90, no. 357 (March): 129 - 39.

Coats, A. W. 1958.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labour in the mid -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1:35 - 51.

— . 1962. Adam Smith: The modern appraisal. *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6:26 - 48.

— . 1971.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labourer.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economic policy*. London: Methuen.

Cobbett, William. 1806 - 20.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36 vols.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 1966.

— . 1830. *Rural rides*. 2 vols. London: J. M. Dent.

— . 1831. *Cobbett's two - penny trash - politics for the poor*. 2 vols. London.

Cole, Arthur Harrison, ed. 1968.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orrespondence of Alexander Hamilton, anticipating his report on manufacture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Coleman, D. C. 1988. Adam Smith, businessmen, and the mercantile system in England.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9, no. 2: 161 - 70

Colletti, Lucio. 1979. *Marxism and Hegel*. Translated by Lawrence Garner. London: Verso.

Collier, Frances. 1930. An early factory community. *Economic Journal* 2(supplement): 117 - 24.

Collins, E. J. T. 1969. Harvest technology and labour supply in Britain, 1790 - 187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2, no. 3(December): 453 - 73.

The colonial policy of Great Britain, by a British traveller(Philadelphia). 1816. In *Reading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Felix Flugel and Harold U. Faulkne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29.

Colquhoun, Patrick. 1815. *Treatise on the wealth, power, and resour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Joseph Newman;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1965.

Comito, Terry. 1971. Renaissance gardens and the discovery of paradis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2, no. 4(October - December): 483 - 506

Conner, Paul W. 1965. *Poor Richard's politicks: Benjamin Franklin and his new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nsiderations on the game law. 1772. Edinburgh.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1010, item 10847.

Conway, Stephen, ed. 1988. *January 1809 to December 1816*. Vol. 8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Jeremy Bentha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oke, Jacob E. 1967. *The reports of Alexander Hamilton*. In *Alexander Hamilton: A profile*, edited by Jacob E. Cook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Cooper, Thomas. 1830. *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1.

—. 1833.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Washington, D. C.: Duff Green.

Cornelius, Wayne A. 1979.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view from rural Mexican communities. *Development Digest* 17, no. 4(October): 90 - 101.

Cowherd, Raymond G. 1977. *Political economists and the English poor law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economics on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Coxe, Tench. 1794. *A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4.

Cranston, Maurice. 1957. *John Locke: A biography*. New York: Macmillan.

Cressey, Peter, and John MacInnes. 1980. Voting for Ford: Industrial democracy and the control of labour. *Capital and Class* 11, no. 2(summer): 5 - 33.

Crouzet, F., ed. 1972. *Introduction to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Methuen.

Gunliffe, Marcus. 1979. *Chattel slavery and wage slavery: The Anglo - American context*, *Mercer University Lamar memorial lectures*, no. 22.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Currey, Cecil B. 1965. *Road to revolution: Benjamin Franklin in England, 1765 - 1775*.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 1972. *Code number 72. Ben Franklin: Patriot or sp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Danhof, Clarence. 1941. Farm making costs and the "safety val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9, no. 3 (June): 217 - 59.

Darity, William A., Jr., and Keith Hurt. 1981.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June 1981, East Lansing, Mich.

Daunton, Martin J. 1995. *Progress and povert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00 - 1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d, Paul A. 1975. *Technical choice and innov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D. 1796. *The case of the labourers in husbandry*. Dublin. In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1855, item 16797.

Davis, David Brian. 1966.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avis, John. 1803. *Travels of four and a half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1798, 1799, 1800, 1801, and 1802*. New York: H. Caritat; reprinted privately, 2 vols. Boston: Bibliophile Society, 1910.

Deane, Phyllis. 1957.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vidence of early British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 no. 1; reprinted in *The cause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edited by R. M. Hartwell. London: Methuen, 1967.

Deane, Phyllis, and W. A. Coale. 1967.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 - 1959*. 2d ed.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 Canio, Stephen, and Joel Mokyr. 1977. Inflation and the wage lag during the civil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no.2(October):311 - 36.

de Crèvecoeur, J. Hector St. John. 1782.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New York: Dutton, 1972.

de Crisenoy. 1979. Capitalism and agri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8, no. 1 (February): 9 - 25.

Deere, Carmen Diana. 1976. Rural women's subsistence production in the capitalist periphe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8, no. 1(spring): 9 - 17.

Deere, Carmen Diana, and Alain de Janvry. 1979.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easan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61, no. 4 (November):601 - 11.

Defoe, Daniel. 1724 - 26.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Baltimore, Md.: Penguin, 1971.

- Dempsey, Bernard. 1960. *The frontier wage*.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 Devine, T. M. 1976. The colonial trades and industrial investment in Scotland, c. 1700 - 181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9, no. 1 (February): 1 - 14.
- De Vivo, Giancarlo. 1985. Robert Torrens and Ricardo's "corn ratio" theory of profit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9, no. 1 (March): 89 - 92.
- Diamond, Daniel E., and John D. Guilloil. 1973. *United States economic history*. Morristown, N. 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 Dickey, Laurence. 1987. *Hegel: Religion, economics, and the politics of spirit, 1770 - 180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ener, R. A. V. 1991. Cultural dissolution: A societal information disaster: The case of the Yir Yoront in Australia. In *Great information disasters: Twelve prime examples of how information mismanagement led to human misery, political misfortune, and business failure*, edited by F. W. Horton and D. Lewis. London: Aslib.
- Dillard, Dudley. 1967.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 Dobb, Maurice. 1963.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Dockes, P. 1969. *L'espace dans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u XVIème siècle*. Paris: Flammarion.
- Domar, Evsey. 1970.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no. 1 (March): 18 - 32.
- Dorfman, Joseph. 1966a. *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1606 - 1865*. 2 vol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 1966b. "Piercy Ravenstone" and his radical tory treatise. In *A few doubts as to the correctness of some opinions generally entertained on the subjects of popul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edited by Joseph Dorfman.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 Doyle, Sir Francis Hastings. 1886. *Reminiscences and opinions of Sir Francis Hastings Doyle*. New York.
- Draper, Hal. 1978.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Vol. 2 of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Duckham, Baron F. 1969. Serfdom in eighteenth - century Scotland. *History*

54, no. 181 (June): 178 - 97.

Dudden, Arthur Power. 1971. *Joseph Fels and the single tax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Dyos, Harold J., and Michael Wolff. 1973. The way we live now. In *The Victorian city: Images and reality*, edited by Harold J. Dyos and Michael Wolff, vol. 2.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Earle, Carville, and Ronald Hoffman. 1980.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 economy: Agriculture and the costs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 1800 - 186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December): 1055 - 94.

Edmonds, Thomas Rowe. 1833. *Practical, 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9.

Edwards, Edward. 1827. On agriculture and rent. *Quarterly Review* 36, no. 51: 391 - 409.

Eiselen, Malcolm R. 1928. *Franklin's political theorie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Doran and Co.

Eisner, Robert. 1979. Total income, total investment, and grow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9 December.

—, 1988. Extended accounts for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 no. 4 (December): 1161 - 84.

Emerson, Ralph Waldo. 1940. Ode inscribed to W. H. Channing. In *The selected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edited by Brooks Atkin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Engels, Friedrich. 1845.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In *Marx and Engels, 1844 - 1845*, Vol. 4 of Collected work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 1847. "The agrarian programme of the chartists." In *Northern Star* (6 November); reprinted in vol. 6 of *Collected Work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 1881. The peasant question in France and Germany. In vol. 3 of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 1973.

—, 1887. The housing question. In vol. 2 of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 1973.

—, 1891.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vol. 3 of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 1973.

—, 1894. *Anti - Dühring: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 1954. *Dialectics of nature*.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Ensor, George. 1818.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opulation of nation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Escher, Hans Caspar. 1814. Letters from England. In *Britain under the regency: The diaries of Escher, Bodmer, May, and Gallois, 1814 - 1818*, edited by W. O. Henderson.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8.

Everitt, Alan. 1967. Farm labourers. In 1500 - 1640. Vol. 4 of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edited by Joan Thirsk.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wen, Stuart. 1976.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McGraw - Hill.

Fage, Anita. 1952. La vie et l'oeuvre de Richard Cantillon, 1697 - 1734. In *Richard Cantillon: Essai du commerce en general*.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Etudes Demographiques, 1952.

Fay, C. R. 1932. *The corn laws and social England*.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56. *Adam Smith and the Scotland of his day*.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tter, Frank Whitson. 1943. The earl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87. Reprinted in *Economic thought: A historical anthology*, edited by James. A. Gher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 1953. The authorship of articles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1807 - 1847.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1, no. 3 (June): 232 - 59.

—, 1957.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Francis Horner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edited by Frank Whitson Fetter. New York: Kelley and Milman.

—, 1980. *The economist in parliament, 1780 - 1868.*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Field, Alexander. 1978. Sectoral shift in antebellum Massachusett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no. 2(April): 146 - 71.

Finch, G., ninth earl of Winchilsea and fourth earl of Nottingham. 1796.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agriculture on the advantages of cottagers renting land.* In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1581, item 16622.

Fite, Gilbert C., and Jim E. Reese. 1965.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Fleisig, Heywood. 1976. Slavery,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no. 3 (September): 572 - 97.

Flink, James J. 1975. *The c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Stanley Engerman. 1974.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 Brown.

Folbre, Nancy. 1980. Patriarchy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12, no. 2(summer): 4 - 13.

Foner, Eric. 1970.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ner, Philip S. 1975.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Vol. 1 of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Forster, Nathaniel. 1767.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London: J. Fletcher. In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887, item 10309.

Foster - Carter, Aidan. 1978. Can we articulate "articulation"? In *The new economic anthropology,* edited by John Clamm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65.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ack.

—,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Fox - Genovese, Elizabeth. 1976. *The origins of physiocracy: Economic revolution and social order in eighteenth - century Fra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raginals, Manuel Moreno. 1978. *El Ingenio*. 3 vols. Hav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Frank, Andre Gunder. 1975. *On capitalist underdevelopment*.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78. *World accumulation, 1492 - 17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Franklin, Benjamin. 1782. *Information for those who would remove to America*. In vol. 8 of *The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 edited by Albert Henry Smyth. New York: Macmillan, 1905 - 1907.

— . 1783. Reflections on the augmentation of wages which will be occasioned in Europe b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vol. 2 of *Th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 edited by Jared Sparks. Boston: Hilliard Gray.

— . 1905 - 7. *The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 Edited by Albert Henry Smyth. 10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 . 1959 - .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Edited by Leonard W. Larabee and William B. Wilcox.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64.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reudenberger, H., and G. Cummins. 1976. Health, work, and leisure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3, no. 1 (January): 1 - 12.

Friedman, Milton.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urniss, Edgar. 1965. *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Garnett, R. G. 1971. Robert Owen and community experiments. In *Robert Owen, prophet of the poor: Essays in honour of the two -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edited by Sidney Pollard and John Salt.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Gates, Paul. 1960. *The farmers' age: Agriculture, 1815 - 186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eorge, M. Dorothy. 1953. *England in transition*.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 1964. *London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eorgescu - Roegan, Nicholas. 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herity, James A. 1993. An early publication by Adam Smith.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5, no. 2(spring): 240 - 82.

Gideon, Siegfried. 1948. *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lbert, Geoffrey. 1980.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oor in Malthus' essay on popul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2, no. 1(spring 1980): 83 - 96.

Gilder, George. 1981. *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Goodrich, Carter, and Sol Davison. 1935. The wage earner in the westward movement, part I.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0, no. 2(June): 161 - 85.

Goodwin, Craufurd D. W. 1961. *Canadian economic thou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developing nation, 1814 - 1914*.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Barry. 1976. *Political economy in parliament, 1819 - 1823*.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Gorky, Maxim. 1922. On the Russian peasantry. In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Teodor Shanin.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Gorz, Andre. 1968. *Strategie for labor*. Boston: Beacon Press.

Gould, Stephen J. 1988. Pussycats and the owl.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5, no. 3(3 March): 7 - 10.

Gourlay, Robert Fleming. 1822.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account of upper canada*. London: Simpkin and Marshall;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1966.

Gourne, Edward G. 1894. Alexander Hamilton and Adam Smi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 no. 2(April):328 - 44.

Graham, H. Grey. 1937. *The social life of 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A. C. Black.

Grapp, William. 1960.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65. *Economic liberalism*. 2 vo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 1974. Malthu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6, no. 3 (fall): 278 - 304.

— . 1979. Adam Smith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ist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1, no. 2 (summer):179 - 91.

Gray, Malcolm. 1951. The kelp industry in the Highlands and island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 no. 2(May): 197 - 209.

Great Britain. 1840. *Reports from the assistant handloom weavers' commissioners on the West Riding and Ireland*. Vol. 23 of Parliamentary papers.

Greer, Edward. 1979. *Big steel: Black politics and corporate power in Gary, India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Grigg, D.B. 1974. *The agricultural systems of the world: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oenewegen, Peter D. 1969. Turgot and Adam Smith.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no.3(November): 271 - 87.

Guest, R. 1823. *A compendius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Manchester, U.K.: Joseph Pratt.

Habakkuk, H. J. 1967.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earch for labour - saving inventions*.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gen, Everett E. 1980.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3rd ed.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Hale, E. E., and E. E. Hale Jr. 1887 - 88. *Franklin in France*. 2 vols. Boston: Roberts Bros.

Halevy, Elie. 1956. *Thomas Hodgskin*. London: Benn.

— . 1961.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 2 of *The liberal awakening, 1815 - 1830*.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Hall, Charles. 1805. *The effects of civilization on the people in European state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Hall, Robert E., and Charles I. Jones. 1997. Levels of economic activity across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no. 2(May): 173 - 77.

Halsband, Robert. 1956. *The life of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milton, Alexander. 1961.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Edited by Harold C. Syret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milton, James C. 1879. *Life of Alexander Hamilton: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vols. Boston.

Hammond, J. L., and Barbara Hammond. 1919. *The skilled labourer, 1760 - 183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 . 1927. *The village labourer, 1760 - 1832*.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Hansard's Parliamentary History. 1830. 3d ed. Vol. 1. (26 October - 30 December).

Hariot, Thomas. 1588.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In *The Roanoke voyages, 1584 - 1590*, edited by David Beers Quinn.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Harris, Donald. 1988. The circuit of capital and the "labour problem"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37, nos. 1 - 2(March - June): 15 - 31.

Harris, Marshall. 1953. *Origin of the land tenure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artmann, Heidi. 1976. Women's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History* 70, no. 416(May): 215 - 19.

Hartwell, Ronald Max. 1978. Adam Smith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Adam Smith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 1976*, edited by Fred R. Glabe. Boulder: 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1976. Labor, capital, and class struggle arou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Politics and Society* 6, no. 3: 265 – 97.

Hayek, Friedrich A. von. 1932. *Prices and produ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no. 4 (September): 519 – 30.

— . 1948.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59. *The counter – revolution of science :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Press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821 – 22.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lper, Hinton. 1860. *The impending crisis of the south ; How to meet it*. New York: A. B. Burdick.

Henneau – Depooter, Louis. 1959. *Miseres et luttes sociales de Jans le Haunaut , 1860 – 1890*. Brussels: Universite libre de Bruxelles.

Herrick, Chessman A. 1926. *White servitude in Pennsylvania ; Indentured and redemption labor in colony and commonwealth*. Freeport, N. Y.: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0.

Higgs, Henry. 1931. The life and work of Richard Cantillon. I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eneral*, edited by Henry Higg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4.

Hill, Christopher. 1964.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 1967. *Society and Purita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Hilton, Boyd. 1977. *Corn, cash, commerce ;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tory governments, 1815 – 18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ilton, Rodney. 1978. Reasons for inequality among medieval peasant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5, no. 3 (April): 271 – 84.

Himmelfarb, Gertrude. 1985. *The idea of Poverty :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Hobbes, Thomas. 1651. *Leviathan*. Baltimore, Md.: Penguin, 1968.

Hobshawn, Eric J. 1974. Custom wages and workload in nineteenth - century industry. In *Worker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ited by Peter N. Stearns and Daniel J. Walkowitz. New Brunswick, N. J. : Transaction Books, 1964.

Hobshawn, Eric J., and George Rude. 1968. *Captain swing*. New York: Pantheon.

Hollander, Samuel.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Ricardo's position on machine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 no. 1 (spring): 105 - 35.

—. 1979. *The Economics of David Ricardo*.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Hollis, Patricia. 1973. *Class and conflict in nineteenth - century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opkins, A. G. 1966. The Lagos strike of 1897: An exploration in Nigerian labour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 35 (December); reprinted in *Peasants and proletarians: The struggles of third world workers*, edited by Robin Cohen, Peter C. W. Gutkind, and Phyllis Brazi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Horn, Pamela. 1981. *The rural world, 1750: Social change in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rner, Francis. 1843. *Memo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Francis Horner, M. P.* Edited by Leonard Horner. 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Hu Chiao - mu. 1978. Observe economic laws, speed up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3 pts. *Peking Review*, nos. 45 - 47 (November 10, 17, 24).

Hudson, Michael. 1992. *Trad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ebt: A history of theories of polarisation and converg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ume 1: International Trade*. London: Pluto Press.

Hughes, J. R. T. 1976.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Hughes, Robert. 1987. *The fatal shore: The epic of Australia's founding*. New York: Knopf.

Hume, David. 1751.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In Vol. 4 of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 edited by T. H. Green and T. H. Gross. Aalen: Scientia Verlag, 1964.

— . 1752a.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Press.

— . 1752b. On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nations.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Press.

— . 1752c. Of taxes.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Press.

— . 1752d. On commerce.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Press.

— . 1752e. Of interest.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Press.

— . 1752f.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Press.

— . 1769. Hume to Morellet, 10 July 1769. In *David Hume: Writings on economics*, edited by Eugene Rotwe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5.

— . n. d. *History of England*. 5 vols. Philadelphia: Porter and Coates.

Humphries, Jane. 1976. Women: Scapegoats and safety valve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8, no. 1(spring): 98 - 121.

— . 1977. The working class family, women's liber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The case of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9, no. 3(fall): 25 - 41.

Hutcheson, Francis. 1749.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 5th ed. Philadelphia: Joseph Cruickshank, 1788.

— . 1755. *A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2 vol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8.

Hutchison, Terence. 1988.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 - 1776*.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yse, Richard. 1971. Richard Cantillon, Financier to Amsterdam, July to November 1720. *Economic Journal* 81, no. 324(December): 812 - 25.

Ignatieff, Michael. 1978. *A just measure of pain: The penitentia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 - 1850*. New York: Pantheon.

Inglis, Brian. 1971. *Povert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Institut National d'Etudes Demographiques. 1966. *Pierre de Boisguillbert ou la naissanc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2 vols.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Etudes Demographiques.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Redevelopment. 1977. *Papua New Guinea: Its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James, Patricia. 1979. *Population Malthus: His life and tim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James, R. Warren. 1965. Introduction to *John Rae, political economist: An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a compilation of his main writings*. 2 vol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Jefferson, Thomas. 1787. Notes on Virginia. Extracted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Henry William Spiegel. New York: Chilton, 1960.

—. 1788. Letter to Thomas Diggs. 19 June 1788. In vol. 13 of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edited by Julian P. Boy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 1817. Forward to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by Destutt du Tracy. Detroit: Center for Health Education, 1973.

—. 1950 - . 25 February to 31 October 1785. Vol. 8 of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edited by Julian P. Boy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ensen, Joan M. 1980. Cloth, butter, and boarder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12, no. 2 (summer): 14 - 24.

Jevons, William Stanley. 1972. *Biography and personal journal*. Vol. 1 of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edited by R. D. Collison Black and Rosamund Koenigkamp. London: Macmillan.

Johnson, Arthur. 1909.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mall landown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Johnson, Samuel. 1774. *A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 Vol. 9 of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edited by Mary Lascell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Jones, Eric L. 1988. *Growth recurring: 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alm, Per. 1770 - 71. *Travels in North America, 1748 - 1750*. Edited by J. R. Forster Jr. 3 vols. London: Warrington.

Kaplan, Steven L. 1976.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2 vol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Kautsky, Karl. 1899. *The agrarian question*. Translated by Pete Burgess. London: Zwan, 1988.

Kawakasu, Heita. 1986.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cotton good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versus India and East Asia." In vol. 2 of *The emergence of a world economy, 1500 - 1914*, edited by Wolfram Fischer et al.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Kelley, Florence Finch. 1906. An undertow to the land; Successful efforts to make possible a flow of the city population countryward. *Craftsman* 11 (December): 294 - 310.

Kemp - Ashraf, P. M. 1966. Introduction to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Thomas Spence. In *Life in litera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Gallagher*, edited by P. M. Kemp - Ashraf and Jack Mitchell. 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Kent, Nathaniel. 1775. *Hints to gentlemen of landed property*. London: J. Dodsley. In Kress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1072, item 11247.

Ketton - Cremer, R. W. 1965. Johnson and the countryside. In *Boswell, Johnson, and their circle: Essays presented to Lawrence Fitzroy Powell*, edited by Mary Lascelles et 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eynes, John Maynard.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Macmillan.

—. 1938. Adam Smith as student and professor.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3 (February): 33 - 46.

—. 1963. *Essays in biography*. New York: W. W. Norton.

Kiernan, Victor. 1991. Modern capitalism and its shepherds. *New Left Review*, no. 183 (September/October): 75 - 94.

Kindleberger, Charles. 1976.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dam Smith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Essays in honour of Adam Smith*, edited by Thomas Wilson and Andres S. Skinn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1984.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no. 2(April):103 - 24.

King, John. 1981. Utopian or scientific?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icardian socialists. Typescript,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Kingston - Mann, Esther. 1980. A strategy for marxist bourgeois revolution: Lenin and the peasantry, 1907 - 1916.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7, no. 2(January):131 - 57.

Kippis, Andrew. 1842. *The life of sir James Steuart Denham of Coltness and Westshield*. Edinburgh: Maitland Club.

Knox, William. 1769. *Controvers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her colonies*, reviewed. London: J. Almon.

Koebner, Richard. 1959. Adam Smith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1, no.3:381 - 91.

Kolko, Gabriel. 1978. Working wives: Their effect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 *Science and Society* 42, no. 3(fall):257 - 77.

Kroos, Herman E., and Charles Gilbert, eds. 1972.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 Hall.

Kropotkin, Peter. 1901.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 . 1906. *The conquest of brea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2.

Kuczynski, Jürgen. 1967.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McGraw - Hill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Kuznets, Simon. 1965.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Lancaster, Kelvin John. 1966. 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4, no. 2(April):132 - 57.

Landes, David S. 1987. What do bosses really do?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no. 2 (June):585 - 623.

Lascelles, Mary. 1971. Introduction to *A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 by Samuel Johnson. Vol. 9 of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slett, Peter. 1971. *The world we have lost; 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age*. New York: Scribners.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zonick, William. 1978. The subjugation of labor to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10, no. 1 (spring):1 - 31.

Lee, Sidney, ed. 1879.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 58.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Lee, Susan Previant, and Peter Passell. 1979. *A new economic 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Lemon, James T. 1967.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eighteenth - century Americ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roduction and trade; The situation among farmers in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Agricultural History*. 41, no. 1 (January): 58 - 70.

Lenin, Vladimir Ilyich. 1893. *On the so - called market question*. In vol. 1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70.

—, 1894. *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vol. 1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70.

—, 1898. *The handicraft census of 1894 - 1895 in Perm Gubernia and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In vol. 2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70.

—, 1905. *Petty -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socialism*. In vol. 9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70.

—, 1907. *The agrarian program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905 - 1907*. In vol. 13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70.

—, 1908.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Russia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vol. 15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70.

— . 1913. The land question and the rural poor. In vol. 19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70.

— . 1921a. *Report on the substitution of a tax in kind for the surplus grain appropriation*, March 15. In vol. 32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70.

— . 1921b. *Report of the Moscow Gubernia conferenc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In vol. 33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70.

— . 1921c. *The tax in ki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policy and its conditions*. In vol. 32 of *Collected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 70.

— . 1974.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Leontief, Wassily W. 1966. *Input - output econom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Roy Ladurie, Emmanuel. 1974. *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 Translated by John Da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eslie, T. Cliffe. 1888. *Essays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9.

Letter to editor. 1757. *London Magazine*, no. 26 (February): 87.

Levy, Hermann. 1966. *Large and small holdings*. Translated by Ruth Kenyon.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Levy, S. Leon. 1970. *Nassau W. Senior, 1790 - 1864*.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Lewis, William Arthur.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22, no. 2 (May): 139 - 91.

— . 1958. Unlimited labour: Further notes. *Manchester School* 26, no. 1 (January): 1 - 32.

— . 1976. The diffusion of development. I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Essays in honour of Adam Smith*, edited by Thomas Wilson and Andrew S. Skinn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ist, Friedrich. 1841.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Jena: Gustav Fischer, 1950.

Locke, John. 1698.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Edited by Peter Laslett. 2d ed.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Longfield, Mountifort. 1834.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delivered in Trinity and Michaelmas terms, 1833*. Dublin: Richard Millikan and Sons; reprinted in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Mountifort Longfield*, edited by R. C. D. Black.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1.

Lowe, Joseph. 1823. *The present state of England in regard to agriculture, trade, and finance*. London: Longmans,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Luxemburg, Rosa. 1968.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acpherson, C. 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Property as means or end.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economic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dison, James. 1787. Appointment of representatives in the legislature. In vol. 10 of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edited by William Hutchinson and William Rach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

—. 1962 - .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Edited by William Hutchinson and William Rach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gnusson, Lars. 1987. Mercantilism and "reform" mercantilism: The rise of economic discourse in Sweden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 no. 3 (fall): 415 - 33.

Magubane, Bernard Makhosezwe. 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e and class in South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Main, Jackson Turner. 1965.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ital, Schlomo, and Patricia Haswell. 1977. Why did Ricardo (not) change his mind? On money and machinery. *Economica* 44, no. 176(November): 359 - 68.

Maitland, James, eighth earl of Lauderdale. 1804.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public wealth*.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Malthus, Thomas Robert. 1803.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Edited by Donald Winch.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820.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vol. 2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ited by Piero Sraffa.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 . 1836.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a view of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51.

— . 1966. *The travel diaries of T. R. Malthus*. Edited by Patricia Jones.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76.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Text, sources, and background criticism*. Edited by Philip Appleman. New York: W. W. Norton.

Mandeville, Bernard. 1723. *The fable of the bees*. Edited by F. B. Kay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Mantoux, Paul. 1961.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 outline of 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Mao Tse-tung. 1937. On contradiction. In vol. 3 of *Selected work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 . 1945. Policy work for liberated areas. In vol. 4 of *Selected work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 77.

— . 1947. Greet the new high tid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vol. 4 of *Selected work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 77.

— . 1955a. The debate on the co-ope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current class struggle. In vol. 5 of *Selected work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 77.

— . 1955b. Editor's notes from socialist upsurge in China's countryside. In vol. 5 of *Selected work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 77.

— . 1956. On the ten great relationships. In vol. 5 of *Selected work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 77.

Marcus, Steven. 1974. *Engels, 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Marglin, Stephen. 1974. 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6, no. 2 (summer): 33 - 60; reprinted in *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firm: A reader*, edited by Louis Puterma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arshall, Alfred. 1927.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volume*. 8th ed. London: Macmillan.

Martineau, Harriet. 1837. *Society in America*. In *Reading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Felix Flugel and Harold Faulkne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Marx, Karl. 1842.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Rhine province assembly, third article; Debates on the law of thefts of wood. In *Marx and Engels, 1835 - 1843*. Vol. 1 of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 1845. On Friedrich List's book,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 *Marx and Engels, 1844 - 1845*. Vol. 5 of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 1847.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 185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vol. 1 of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 1973.

—. 1853a. "Elections - Financial clouds - 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 and slavery." In *Marx and Engels, 1851 - 1853*. Vol. 11 of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 1853b.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In vol. 1 of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 1973.

—. 1858. The Chinese trade figures. In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edited by Schlomo Avineri.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8.

—. 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 , 1865. Wages, price, and profit. In vol. 2 of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 1973.
- , 1963 – 71.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 1965. *Precapitalistic economic forma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 1967. *Capital*. Vols. 2 and 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 1970.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 1974. *Grundrisse*. New York: Vintage.
- , 1977. *Capital*. Vol. 1. New York: Vintage.
- , 1981. *Capital*. Vols. 2 and 3. New York: Vintage.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6a. Feuerbach: Opposition of materialist and idealist outlook. In vol. 1 of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 1973.
- , 1846b. The German ideology. In *Marx and Engels, 1845 – 1847*. Vol. 5 of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 , 1942.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 1973. *Marx/Engels werke*. Berlin: Dietz.
- , 1975.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 1985. *Letters: Marx and Engels, January 1860 – September 1864*. Vol. 41 of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 Marx, Leo. 1964.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sukawa, Shichiro. 1965. An essay on the historical uniqueness of Petty's labor theory of value.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5, no. 2 (January): 1 – 11.
- Matthaei, Julie. 1982.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Mayer, Margit, and Margaret A. Fay. 1977.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nation – state. *Kapitalstate*, no. 6 (fall): 39 – 90.
- McCoy, Drew R. 1982.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McCulloch, John Ramsey. 1824. Political economy. In John MeVickar, *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 . 1825. Evidence given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reland.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8:8 11 - 35.

— . 1841. *State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policy and 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the proposed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Edinburgh.

— . 1845.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select publication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4.

— . 1848. *A treatise on the succession to property vacant by death: Including inquiri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primogeniture, entails compulsory partition, foundations, &c. over the public interests*.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 . 1854. *A treatise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determine the rate of wages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McGregor, Pat. 1992.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holdings in pre-famine Irel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9, no. 4 (October): 477 - 93.

McKendrick, Neil. 1961. Josiah Adams and factory discipline. *Historical Journal* 4, no. 1:30 - 55.

McNally, David. 1988.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93. *Against the market: Political economy, Market socialism, and the Marxian critique*. London: Verso.

Medick, Hans. 1988. Industrialisation before industrialisation? Rural industries in Europe and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5, no. 3:371 - 84.

Meek, Ronald L. 1963.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76.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77a. New light on Adam Smith's Glasgow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In Smith. *Marx, and after: Ten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 1977b. Smith, Turgot, and the four stages theory. In *Smith, Marx, and after: Ten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 1977c. Smith and Marx. In *Smith, Marx, and after: Ten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 1977d. The development of Adam Smith's ideas o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mith, Marx, and after: Ten ess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Meillasoux, Claude. 1972. From reproduction to produc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o economic anthrop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1, no. 1 (February): 93 – 105.

Melotti, Umberto. 1977.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Macmillan.

Mendels, Franklin F. 1972.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no. 1 (March): 241 – 61.

— . 1975. Agriculture and peasant industry in eighteenth-century Flanders. In *European peasants and their markets*, edited by William N. Parker and Eric L. Jon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erivale, Herman. 1841. *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1839, 1840, and 1841*.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Merrington, John. 1976. Town and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edited by Rodney Hilt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Michl, Thomas. 1993. Adam Smith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effort. In *Economics as worldly philosophy: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economics in honour of Robert L. Heilbroner*, edited by Ron Blackwell, Jaspal Chatha, and Edward J. Ne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ill, James. 1826.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James Mill: Selected economic writings*, edited by Donald Win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Mill, John Stuart. 1848.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Vols. 2 and 3 of *Collected works*, edited by J. M. R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Millar, John. 1806. *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or an inquiry into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give rise to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in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society. 4th ed. Edinburgh: Blackwood.

Mirabeau, Marquis de. 1756. *L'Ami des Hommes*. Paris.

—. 1763. *Philosophie rurale*, vol. 1. In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798, item 9836.

Mirowski, Philip. 1982. Adam Smith, empiricism,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4, no 2 (summer): 178 - 98; reprinted in *Against Mechanism: Protecting Economics from Science*. Totowa, N. 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4.

Mitchel, John. 1847. *Irish political economy*. Dublin.

Mitchell, Broadus. 1957 - 62. *Alexander Hamilton*.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Mokyr, Joel. 1983. *Why Ireland starved: A quantitative and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Irish economy, 1800 - 1850*.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1990. *The lever of riches: Technological creativity and economic prog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ntagu, Lady Mary Wortley. 1966 - 67.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ontgomery, David. 1979. *Workers' control in Americ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work, technology, and labor struggles*.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Moore, Wilbur. 1951. *Industrialization and labo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55. Labor attitudes toward industrial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no. 2 (May): 156 - 65.

Morely, Derek Wragge. 1954. *The evolution of an insect societ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Morgan, Edmund. 1975.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W. W. Norton.

- , 1976. *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Moser, Arthur. 1966. *Getting agriculture moving: Essentials for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Mossner, Ernest Campbell. 1954. *The life of David Hum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Mossner, Ernest Campbell, and Ian Simpson Ross, eds. 1977.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un, Thomas. 1664.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In *A select collection of early English tracts on commerce*, edited by John R. McCulloc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unsche, P. B. 1980. *Gentlemen and poachers: The English game laws, 1671 – 183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rphy, Antoin F. 1986. *Richard Cantillon: Entrepreneur and economi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yers, Ramon H. 1980. *The Chinese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 Nallet, Henri, and Clause Servolin. 1978. *Le paysan et le droit*.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 Economie et Sociologie Rurales.
- Needham, Joseph. 1969.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Nef, John U. 1932.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2 vols. Freeport, N. Y.: Books for Library Press.
- Nelson, Frederick J., and Willard W. Cochrane. 1976.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ederal commodity program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28, no. 2 (April): 52 – 64.
- Newsinger, John. 1996. The great Irish famine: A crime of free market economics. *Monthly Review* 47, no. 11 (April): 11 – 19.
- Nietzsche, Friedrich. 1954. *Thus spoke Zarathustra*. In *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i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king.
- Nordhaus, William, and James Tobin. 1972. Is growth obsolete? I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edited by Milton Mo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ouglass C. 1966.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 - 1860*. New York: W.W. Norton.

Nurske, R. 1953.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Nutter, G. Warren. 1976. *Adam Smith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O'Brien, D. P., and A.C. Darnell. 1978. Torrens, McCulloch, and the "digression on Sismondi": Whose digression?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Durham.

O'Brien, Patrick K., and Keyder Caglar. 1978.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 - 1914: Two path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O'Connor, Feargus. 1845. The land plan . . . In *Class and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edited by Patricia Holli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 1848a. Free trade and the land plan. In *Class and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edited by Patricia Holli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 1848b. A treatise on the small farm system and the banking system. *Labourer* 3:54 - 100.

O'Connor, Michael J. L. 1944. *Origins of academic econo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Garland, 1974.

Ogg, F. A., ed. 1906. *Personal narratives of travel in Virginia, Maryland, Ohio, Indiana, Kentucky, and of a residence in the Illinois territory, 1817 - 1818*. Cleveland.

Olwig, Karen Fog, and Kenneth Olwig. 1979. Under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park ideology. *Antipode* 11, no. 2:16 - 25.

Ommen, Rosemary E. 1986.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he Scottish clann in the old - world and new.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2, no. 2 (April): 121 - 41.

On agriculture and rent. 1827. *Quarterly Review* 36, no. 51:391 - 409.

Owen, Robert. 1813. Second essay on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In *A new view of society and other writings*, edited by G. D. H. Cole. London: Dent, 1949.

—, 1857. *The life of Robert Owen*. London: Effingham Wilson.

Panzer, John C., and Robert D. Willig. 1981. The economics of scop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no. 2 (May): 268 – 72.

Pascal, Roy. 1938. Property and society. *Modern Quarterly* 1, no. 2 (March): 167 – 79.

Peffer, William. 1891. *The farmer's side; His troubles and their remedy*. New York.

Pennant, Thomas. 1771. *A tour in Scotland*. Chester.

—, 1772. *A tour in Scotland*. 2d ed. London: B. White.

—, 1774. *A tour in Scotland*. 3d ed. 2 vols. Chester.

Perelman, Michael. 1977. *Farming for profit in a hungry world; Capital and the crisis in agriculture*. Montclair, N.J.: Allanheld, Osmun.

—, 1987. *Karl Marx's crisis theory; Labor, scarcity, and fictitious capital*. New York: Praeger.

—, 1988. *Keynes, investment theory, and the economic slowdown; The role of replacement investment and q - ratios*. London: Macmillan.

—, 1991a. *Information,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economics of high technology*. London: Macmillan.

—, 1991b. Energ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Ethics and agriculture; An anthology on current issues in world context*, edited by Charles V. Blatz. Moscow: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Pesciarelli, Enzo. 1989. Smith, Bentha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asting ideas on entrepreneurship.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1, no. 3 (fall): 521 – 36.

Pessen, Edward. 1973. *Riches, class, and power before the civil war*.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Pettengill, John. 1981. Firearm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 neo-classical model.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3, no. 2 (summer): 1 – 10.

Petty, Sir William. 1662.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In vol. 1 of *The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edited by C. H. Hull. Cambridge, U. K.: 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9;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3.

— . 1683. Another essay on political arithmetick. In vol. 1 of *The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edited by C. H. Hull.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9;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3.

— . 1687. A treatise of Ireland. In vol. 2 of *The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edited by C. H. Hull.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9;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3.

— . 1690. Political arithmetick, 1690. In vol. 1 of *The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edited by C. H. Hull.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9;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3.

— . 1691. Verbum Sapienti. in vol. 1 of *The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edited by C. H. Hull.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9;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3.

— . 1927. *The Petty papers; Some unpublished papers of Sir William Petty*, edited by the Marquis of Lansdowne, 2 vols. London: Constable.

Philipponneau, Michel. 1956. *La vie rurale de la banlieu Parisienne: Etude de geographie humain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Plath, Raymond Arthur. 1939. *British mercantilism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 land-poli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latteau, Jean - Philippe. 1978. *Les economistes classiques et le sous - developement*. 2 vols. Namur, Belgium: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mur.

Pocock, J. G. A. 1971.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New York: Atheneum.

— . 1985a. The mobility of property and the rise of eighteenth - century sociology. In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5b. Hum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dying thoughts of a north Britain. In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lard, Sidney. 1965.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8.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part I: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Vol. 7 of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edited by Peter Mathias and M.M. Posta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lexfen, Sir Henry. 1700. *Discourse of trade*. London: John Baker.

Ponce, I. 1870. *Traite d'agriculture pratique et d'economie rurale*. Paris: Librairie Agricole de la Maison Rustique.

Postan, M.M. 1966. England.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1 of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edited by M.M. Posta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stlethwayt, Malachy. 1751.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of the celebrated monsieur Savary*. 2 vols. London.

Pownall, Governor. 1776. *A letter from governor Pownall to Adam Smith, L. L. D., F. R. S., being an examination of several points of doctrine, laid down in his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dited by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and Ian Simpson Ro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rezzolini, Giuseppe. 1967. *Machiavelli*.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rice, Richard. 1783. *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means of making it a benefit to the world*. London.

Primack, Martin. 1966. Farm capital formation as a use of farm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 - 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no. 3 (September): 348 - 62.

Prothero, Iorwerth. 1969. Chartism in London. *Past and Present*, no. 44 (August): 76 - 105.

Puckle, James. 1700. England's path to wealth and honour. In *A collection of scarce and valuable tracts*, edited by John Ramsay McCulloch. London, 1814.

Quesnay, Francois. 1757. Grains. In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edited by Ronald I. Mee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1758. *Tableau economique*. In *Quesnay's tableau economique*, edited by Marguerite Kuczynski and Ronald Meek.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2.

Rahbano, Ugo. 1895. *American commercial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Rae, John. 1895. *The life of Adam Smith*.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Rae, John. 1825. Sketches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manufactures and of the policy which has regulated their legislative encouragement in Great Britain and in other countries. *Canadian Review and Literary Journal*, no. 3 (March); reprinted in vol. 1 of *John Rae, political economist: An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a compilation of his main writings*, edited by R. Warren Jam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 1828. Letter to the honourable Mr. Stanley, on the relative claims of the English and Scotch churches in Canada. *Religious, Literary, and Statistical Intelligencer* (August); reprinted in vol. 1 of *John Rae, political economist: An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a compilation of his main writings*, edited by R. Warren Jam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 1834. *Statement of some new principles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reprinted in vol. 2 of *John Rae, political economist: An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a compilation of his main writings*, edited by R. Warren Jam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 1862. Letter to R. C. Wylie, March 1862. In vol. 1 of *John Rae, political economist: An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a compilation of his main writings*, edited by R. Warren Jam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Ransom, Roger, and Richard Sutch. 1977.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shid, Salim. 1992. Charles James Fox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4, no. 2 (summer): 493 – 97.

Rattner, Sidney, James Soltow, and Richard Sylla. 1979. *The evalu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Basic Books.

Ravenstone, Percy. 1824. *Thoughts on the funding system and its effects*. London: J. Andrews, 1966.

Ray, Rajat Kanta. 1988. The bazaar: The changing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genous section of the Indian economy before and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5, no. 3 (July – September): 263 – 318.

Raymond, Daniel. 1823.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2d ed. Baltimore, Md.: F. Lucas Jr. and E.J. Coale.

Redford, Arthur. 1926. *Labour migration in England, 1800 - 1850*.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Reid, Douglas A. 1976. The decline of St. Monday *Past and Present*, no. 71 (May): 76 - 101.

Rendall, Jane. 1978. *The origins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Review of Sir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1767a. *Critical Review* 23 (May - June): 321 - 29, 411 - 16; and 24 (July): 24 - 32.

Review of Sir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1767b. *Scot's Magazine* 29 (April): 199 - 201.

Review of Sir James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1767c. *Monthly Review* 36 (May - June): 365 - 78, 464 - 76; and 37 (July): 116 - 25.

Review of American husbandry. 1776. In *American husbandry*, edited by H.J. Car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Review of Steuart's Works. 1806a. *Literary Journal* 1, no. 3 (March): 225 - 35.

Review of Steuart's works. 1806b. *Monthly Review; or Literary Journal, Enlarged* 50 (June): 113 - 21.

Review of cottage industry by William Cobbett. 1823. *Edinburgh Review* 38, no. 75 (February): 105 - 25.

The reviewers reviewed in 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political register. 1767. *Political Register and Impartial Review of New Books* 1, no. 2 (June): 121 - 28.

Ricardo, David. 1822. *On protection to agriculture*. In vol. 4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ited by Piero Sraff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51 - 73.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ited by Piero Sraffa. 11 Vol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h, F.E. 1967. Colonial settlement and its labour problems. In vol. 4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urope, edited by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bbins, Lionel Charles. 1939. *The economic basis of class conflict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 1958. *Robert Torre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lassical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Robertson, A. J. 1971. Robert Owen, cotton spinner: New Lanark. In *Robert Owen, prophet of the poor: Essays in honour of the two-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edited by Sidney Pollard and John Salt.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on, William. 1769a. *A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 from the subversion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reprinted in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 A historical outline from the subversion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Felix Gilbe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 1769b.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fifth*. 3 vols.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 1884.

—. 1777.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n *The works of William Robertson, D. D.*, 12 vols, London, 1817.

—. 1781.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2 vols. London: T. Cadell.

Robinson, Edward A. C. 1932. *The structure of competitive indust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Robinson, Harriet H. 1898. *Loom and spindle, or life among the early mill girls*. Kailua, Hawai'i: Pacifica Press, 1976.

Rodbertus - Jagetzow, Johann Karl. 1851. *Soz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Berlin.

—. 1899. *Das kapital*. Reprinted as vol. 2 of *Aus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Carl Rodbertus - Jagetzow*, edited by H. Schumacher - Zarchlin, A. Wagner, and T. Kozak. Berlin: Puttkammer und Mühlbrecht.

Rodney, Walter. 1974.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Washington, D. 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stein – Rodan, Paul. 1943.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 – 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53, nos. 210 – 211 (June – September): 202 – 11.

Ross, Eric. 1973. *The leviathan of wealth: The Sutherland fortun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Rothschild, Emma. 1992. Adam Smith and conservative economic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5, no. 1 (February): 74 – 96.

Rotwein, Eugene, ed. 1955. *David Hume: Writings on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Routh, Guy. 1977. *The origin of economic ideas*. New York: Vintage.

Rude, George. 1980. *Ideology and popular prote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udkin, Olive D. 1966. *Thomas Spence and his connection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Rule, John. 1987. The property of skill in the period of manufacture. In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work*, edited by Patrick Joyce.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umford, Count. 1795. Of food: And particularly the feeding of the poor. In vol. 5 of *Collected works of Count Rumford*, edited by Sanborn C. Brow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1970.

Ruskin, John. 1866. *Crown of wild olives*. Vol. 1 of *Works of John Ruskin*, edited by E. J. 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 New York: Library Edition, 1903 – 12.

Sachs, William S. 1953.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in the northern colonies before the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3, no. 3 (summer): 274 – 90.

Salvemini, Gaetano. 1954.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8 – 1792*. London: Jonathan Cape.

Samuel, Raphael. 1973. Comers and goers. In vol. 1 of *The Victorian city*, edited by H. J. Dyos and Michael Wolff.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Samuels, Warren. 1966.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Cleveland, Ohio: World Publishing.

— . 1973. Adam Smith and the economy as a system of power.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31, no. 2 (October): 123 - 37.

Samuelson, Paul A. 1989. Ricardo was right!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 no. 1:47 - 62.

Say, Jean - Baptiste. 1821. *Letters to Malthus on several subject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ause of the stagnation of commerce*. Translated by John Richter.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 . 1843. *Cours Complet d' économie politique*. Brussels: Societe Typographique Belge.

Say, J. B. 1880.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C. R. Princep. 4th e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4.

Schlesinger, Arthur. 1945. *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 Book Find club.

— . 1986.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Schoenhof, Joseph. 1893. *The economy of high wages*. New York: G. P. Putnam.

Schor, Juliet B. 1991.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ultz, Theodore.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1968.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ing value of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0, no. 5 (December): 1113 - 22.

Schumpeter, Joseph A. 195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d.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uyler, Robert Livingston, ed. 1931. *Josiah Tucker; A selection from hi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riting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Livingston Schuyl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chwartz, Herman M. 1994. *States versus markets: History, geograph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citovsky, Tibor. 1976. *The joyless economy: An inquiry into human satisf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ott, William R. 1934. Adam Smith and the Glasgow merchants. *Economic Journal* 44:506 – 8.

— . 1965. *Adam Smith as student and professor*.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Seligman, E. R. A., ed. 1910. Introduction to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y Adam Smith. London; Everyman's Edition.

Highland Thomas Douglas. 1805.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with a view of emigration*.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and Orme;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1969.

Semmel, Bernard. 1970.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n, S. R. 1957. *The economics of Sir James Stew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nior, Nassau. 1827. Letter to Charles Poulett Thompson, 28 March. In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s*; reprinted in *Selected writings on economics; A volume of pamphlets, 1827 – 1852*.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 . 1831. *Three lectures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 preface on the causes and remedie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59.

— . 1832. *A letter to lord Howick on a legal provision for the Irish poor*. 3rd ed. London; John Murray.

— . 1836. *An 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51.

— . 1841. Grounds and objects of the budget. *Edinburgh Review* 73 (July): 503 – 59.

— . 1868. *Journals, conversation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Ireland*. 2d ed. 2 v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 . 1871. *Journals kept in France and Italy*. 2d ed. 2 vols. London; Henry S. King.

— . 1928.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social economy*. Edited by S. Leon Levy. 2 vols. New York; Holt.

Shannon, Fred. 1945. A post mortem on the labor safety - valve theory. *Agricultural History* 19, no. 1 (January): 31 - 37.

Shaw, A.G. 1966. *Convicts and the coloni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Shireff, Patrick. 1835. *A tour through North America*. In *Reading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ited by Ernest Ludlow Bogart and Charles Manfred Thompson. New York: Longmans and Green, 1927.

Sinclair, Sir John. 1803. Observations on the means of enabling a cottager to keep a cow by the produce of a small portion of arable land. In *Essays in miscellaneous subjects*; reprinted in *The Annual Register* 45 (1805): 850 - 57.

Sismondi, Jean - Charles - Léonard Simonde de. 1827.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Calman - Lévy, 1971.

Skinner, Andrew S. 1966. Introduction to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y Sir James Steuart.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6. Adam Smith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community; An essay in applied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7, no. 1 (January - March): 59 - 78.

—, 1981. Sir James Steuart: Author of a system.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8, no. 1 (February): 20 - 42.

—, 1993. Sir James Steuart: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1, no. 1: 1 - 43.

Sklar, Martin J. 1988.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 - 191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licher van Bath, B.H. 1960. The rise of intensive husbandry in the low countries. I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Papers delivered at the Oxford - Netherlands historical conference, 1959*, edited by J.S. Bromley and E.H. Kossma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Smelser, Neil J.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application of theory to the British cotton indus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mith, Abbot Emerson. 1927. *Colonists in bondage: White servitude and convict labor in America, 1607 - 17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mith, Adam. 1755 - 56. Letters to the editor of the *Edinburgh review*. In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P.D. Wightman and J.C. Bry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 1759.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 1762 - 63.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Edited by John M. Lothian. London: Thomas Nelson, 1963.

—, 1790a. The principles which lead and direct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In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80.

—, 1790b. Of the nature of that imitation which takes place in what are called the imitative arts. In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80.

—, 1937.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 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ited by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2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7.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dited by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and Ian Simpson Ro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78.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ited by R. L. Meek, D. D. Raphael, and P. G. Ste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mith, E. Peshine. 1853.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Garland, 1974.

Smith, John. 1616. A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 In vols. 4 and 5 of *The English scholars' library*, edited by Edward Arber. Birmingham, U.K., 1884.

Smith, J. Russell. 1925.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geography*. 2d ed. New York: Henry Holt.

Smith, Sydney. 1819. Game laws. *Edinburgh Review* 31, no. 62 (March): 295 - 309.

—, 1821. Spring guns and man traps. *Edinburgh Review* 35, no. 69 (March): 213 - 34.

Smith, Thomas C. 1966.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Atheneum.

Smith, Vernon L. 1992. Economic principles in the emergence of humankind. *Economic Inquiry* 30, no. 1 (January): 1 - 13.

Smollett, Tobias. 1766. *Travels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Edited by James Morris. New York: Praeger, 1969.

Smout, T.C. 1969.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560 - 1830*.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Smuts, Robert W. 1959. *Women and work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ohn - Rethel, Alfred. 1978.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London: Macmillan.

Soltow, J.H. 1959. Scottish traders in Virginia, 1750 - 177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2, no. 1 (August): 83 - 98.

Spence, Thomas. 1807. *The restorer of society to its natural state*. 2d ed. London.

Spengler, Joseph J. 1959. Adam Smith's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part 2.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6, no. 1 (July): 1 - 12.

—. 196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efferson, Madison, and Adams. In *American studies in honor of William Kenneth Boyd*, edited by David Kelley Jackson. Freeport, N.Y.: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Spenser, Edmund. 1591. Complaints; Mother Hubbard's tale. In vol. 7 of *The works of Edmund Spenser: A Variorum edition*, edited by Edwin Greenlaw et al.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2 - 49.

Spiegel, Henry William. 1960. *The rise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 Philadelphia: Chilton.

Sraffa, Piero. 1951.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ited by Piero Sraffa, 11 vol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alin, Josef. 1928.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grain problem; Speech, 9 July 1928. In vol. 11 of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 1929. The right deviation in the C.P.S.U.(B);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ontrol commission of the C.P.S.U.(B) in April 1929, In

vol. 12 of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Stark, Werner. 1944.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in relation to social development*. London: Kegan Paul.

Stearns, Peter N. 1974a. National character and European labor history. In *Worker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cent studies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edited by Peter N. Stearns and Daniel J. Walkowitz.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 1974b. Working-class women in Britain, 1890 - 1914. In *Worker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cent studies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edited by Peter N. Stearns and Daniel J. Walkowitz.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Steuart, Sir James. 1767.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Vols. 3 - 4 of *The works: Political, metaphysical, and chronological*.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 . 1769. *Considerations on the interest of Lanark*. In vol. 5 of *The works: Political, metaphysical, and chronological*.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 . 1772. *The principles of money applied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Bengal*. In vol. 5 of *The Works: Political, metaphysical, and chronological*.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 . 1966.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ited by Andrew S. Skinner.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evens, David. 1975. Adam Smith and the colonial disturbances. In *Essays on Adam Smith*, edited by Thomas Wilson and Andrew S. Skinner.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wart, Dugald. 1811.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L. L. D. In *The Works of Dugald Stewart*. 5 vols (London: T. Caddell and W. Davies); reprinted in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 . 1855.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Edited by Sir W. Hamilton. 2 vol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8.

Stigler, George. 1951.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

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3 (June): 185 - 93.

Strauss, Eric. 1954. *Sir William Petty: Portrait of a geniu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Suffield, Edward, III (Baron). 1825. *Considerations on the game laws*. London.

Suggestions on the propriety of reintroducing British convict labour into British North America by a Canadian. 1824.

Sward, Keith. 1972. *The legend of Henry Ford*. New York: Atheneum.

Sweezy, Paul. 1980. Japan in perspective. *Monthly Review* 31, no. 9 (February): 1 - 14.

Swift, Jonathan. 1723 - 24. The drapier's letters. In *The drapier's letters and other works*, vol. 10 of *Collected Works*, edited by Herbert Davi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9.

—. 1726. *Gulliver's travels*. In vol. 2 of *Collected works*, edited by Herbert Davi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9.

—. 1729. A modest proposal for preventing the children of poor people in Ireland from being a burden to their parents or country; and for making them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k. In vol. 12 of *Collected works*, edited by Herbert Davi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

—. 1731. The answer to the craftsman. In vol. 12 of *Collected works*, edited by Herbert Davi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

Taper, Bernard. 1979. Miniaturizing agriculture. *Science* 80 1, no. 1 (November).

Taplin, William. 1792. *An appeal to the representative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respecting the present destructive state of the game and operative spirit of laws erroneously said to be framed for its increase and preservation*. London. In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1500, item 15143.

Tatham, W. 17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land navigation*. London: Robert Faulder. In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1648, no. 17736.

Taussig, Michael. 1979. Black religion and resistance in Columbia. *Marxist Perspectives* no. 2 (summer): 84 - 117.

Tawney, Richard H. 1926.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stud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47.

Taylor, John. 1818. *Arator: Being a series of agricultural essays, practical and political, in sixty - four numbers*. Edited by M. E. Bradford. Indianapolis, Ind.: Liberty Classics, 1977.

Taylor, Paul S. 1972. *Georgia plan, 1732 - 17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search.

Teichgraber, Richard F., III. 1986. "Free trade" and moral philosophy: 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Temin, Peter. 1971. Labor scarcity in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 no. 2 (winter):251 - 64.

Temperly, Howard. 1977. Capitalism, slavery, and ideology. *Past and Present* 75 (May):94 - 118.

Temple, William, 1758. *A vindication of commerce and the arts*. In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712, item 9321.

— . 1770.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 London

Therborn, Goran. 1976. *Science, class, and society: On the formation of soci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Thick, Malcolm. 1985. Market garden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In 1640 - 1750: *Agrarian change*. Vol. 5 of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edited by Joan Thirs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irsk, Joan. 1967a. Enclosing and engrossing. In 1500 - 1640. Vol. 4 of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edited by Joan Thirs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67b. Farming techniques. In 1500 - 1640. Vol. 4 of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edited by Joan Thirs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78.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homas, Brinley. 1980. Towards an energy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8, no. 1 (March): 1 - 15.

— . 1985. Food supply in the United Kingdo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dited by Joel Mokyr.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Thomas, Gabriel. 1698.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account of Pennsylvania and of west New Jersey*. Harrisburg, Pa.: Aurand Press, 1938.

Thomas, Keith. 1964. Work and leisure. *Past and Present*, no. 29 (December): 50 - 66.

Thomas, Sir William Beach. 1936. *Hunting England: A survey of the sport, and of its chief grounds*. London: B.T. Batsford.

Thompson, Edward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 . 1967. 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56 - 97.

— . 1971.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50 (February): 76 - 136.

— . 1975. *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 of the black act*. New York: Pantheon.

— . 1991. *Customs in common*. New York: New Press.

Thompson, Noel. 1977. Ricardian socialists/Smithian socialists: What's in a name? Research paper,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 1984. *The people's science: The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of exploitation and crisis, 1816 - 183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T. Perronet. 1808. Letter to miss Baker, June 6. In *General T. Perronet Thompson, 1783 - 1869*, edited by Leonard G. Johns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7.

Thornton, William Thomas. 1869. *On labour: Its wrongful claims and rightful dues*. London: Macmillan.

Thweatt, William O. 1974. The digression of Sismondi: By Torrens or McCulloch?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6, no. 4 (winter): 435 - 53.

Tigar, Michael E., and Madeleine R. Levy. 1977.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Tobias, J. J. 1967. *Crime and 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Tocqueville, Alexis de. 1848.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 . 1858.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Stuart Gilbert.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55.

Tollison, Robert D. 1984. Adam Smith as regulator.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Bulletin* 6, no. 1 (summer):38 – 39.

Tomlinson, Jim. 1986. Democracy inside the black box? Neo – classical theories of the firm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Economy and Society* 15, no. 2 (May):220 – 50.

Torrens, Robert. 1808. *The economists refuted*. London: S. A. and H. Oddy.

— . 1817. A paper on the means of reducing the poor rates and of affording effectual and permanent relief to the labouring classes. Appendix to *Colonization of South Australia*. London, 1935.

— . 1828. *Substance of a speech delivered by colonel Torren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Longmans, Rees, Orme, Brown, and Green.

— . 1833. *Letters on commercial policy*.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8.

— . 1835. *Colonization of south Australia*. London: Longman, Rees,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

— . 1839. *Three letters to the marquis of Chandos on the effects of the corn laws*. London: Longman and Co.

— . 1842. *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 Sir R. Peel, in the budget: A series of letters on financial, commercial, and colonial policy*.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Townsend, Joseph, 1786. A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 by a well wisher to mankind. In *A select collection of scarce and valuable economic tracts*, edited by John R. McCulloch.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Tribe, Keith. 1978. *Land, Labour, and economic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 1979. Introduction to de Cisenoy. *Economy and Society* 8, no. 1 (Febru-

ary): 1 - 8.

Triffin, Robert. 1940.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rollope, Anthony. 1929. *Hunting sketches*. Hartford, Conn.: Edwin Valentine Mitchell.

Trotsky, Leon. 1932.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overthrow of tzarism and the triumph of the soviets*. Edited by F.W. Dupee. New York: Doubleday.

Tsuzuki, Chushichi. 1971. Robert Owen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Robert Owen, prophet of the poor: Essays in honour of the two -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edited by Sidney Pollard and John Salt.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Tucker, Josiah. 1758. *Instructions for travellers*. Dublin: William Watson. In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712, item 9323.

—, 1776a. *Four tracts on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subjects*. 2d ed. Gloucester.

—, 1776b. *A series of answers to certain objections against separation from the rebellious colonies*. Gloucester.

Tully, Alan. 1973. Patterns of slaveholding in colonial Pennsylvania; Chester and Lancaster counties, 1728 - 1758.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6, no. 3 (spring): 284 - 305.

Turgot, Anne Robert Jacques. 1766.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A select collection of scarce and valuable tracts*, edited by John R. McCulloch.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Tuttle, William N., Jr. 1967. Forerunner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Nineteenth - century British conservatives and the frontier thesis. *Agricultural History* 41, no. 3 (July): 219 - 27.

Tyron, Rolla Milton. 1917. *Household manufactur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40 - 1860*.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Urquhart, Robert. 1996. The trade wind, the statesman, and the system of commerce; Sir James Steuart's vis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3, no. 3 (autumn): 379 - 410.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97.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1979*. Washing-

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icker, Ray. 1981. Portable workplaces: Computer terminals allow more people to work at home instead of commuting. *Wall Street Journal*, 4 August, 46.

Viner, Jacob. 1927.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In *The long view and the short*.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 1965. Guide to John Rae's life of Adam Smith. In *The life of Adam Smith*, by John Ra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1968. Man's economic status. In *Man versus socie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Six points of view*, edited by James L. Cliffor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2. *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An essa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Library.

von Laue, Theodore H. 1963. *Serge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 New York: Atheneum.

Wakefield, Daniel. 1804. *An essay on political economy*, 2d ed. London: F.C. and J. Rivington.

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829. Letter from Sydney: The principle town of Australasia.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ward Gibbon Wakefield*, edited by M.F. Lloyd Pritchard. Glasgow: Collins, 1968.

—. 1831a. Letter from P— to Lord Howick, no. iii. *Spectator* (8 January).

—. 1831b. Facts relating to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in the metropolis. In *Collected works of Edward Gibbon Wakefield*, edited by M.F. Lloyd Pritchard. Glasgow: Collins, 1968.

—. 1831c. *Swing unmasked, or the causes of rural incendiarism*. London: Effingham, Wilson. In Kress - Goldsmith collection, reel 2543, no. 2672.

—. 1834. *England and America*. Boston: Harper and Row.

—. 1835. Commentary to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y Adam Smith. 6 vols. London: Charles Knight.

—. 1836. Response to question 610. In *The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disposal of public lands in British colon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 1841. Letter to the colonization commissioners, June 2, 1835. Appendix to

The report on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outh Australia, parliamentary papers.

— . 1849.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in letters between a statesman and a coloni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4.

Walecki, Andrzej. 1969.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lker, Kathryn E., and Margaret E. Woods. 1976. *Time use: A measure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of family goods and servic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the Family of the American Home Economics Association.

Wallace, Robert, 1809. *A dissertation on the numbers of mankind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Edinburgh: Archibald Constable.

Wallas, Graham. 1919. *The life of Francis Place*. 3rd ed. New York: A. A. Knopf.

Walpole, Horace. 1937 - 74. *The Yale edition of 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Edited by W. S. Lewis. 38 vol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alsh, Vivian, and Harvey Gram. 1980.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general equilibrium: Historical origins and mathematical struc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re, Norman Joseph. 1924. *The industrial worker, 1840 - 1860*. Boston: Houghton - Mifflin.

— . 1931. The physiocrats: A study in economic ration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1, no. 5 (December): 607 - 19.

Waterman, Anthony M. C. 1998. Reappraisal of "Malthus the economist," 1933 - 1997.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0, no 2 (summer): 293 - 334.

Weber, Max. 1921.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 . 1923.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Translated by Frank Knight.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Webster, Daniel, 1879. First settlement of New England: A discourse delivered at Plymouth on the 22nd December 1820. In *The great speeches and orations of Daniel Webster, with an essay on Daniel Webster as a master of English style*, edited by Edwin P. Whippl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and Rivington.

Weiller, Jean. 1971. Preface to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by Jean - Charles -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Paris: Calman - Levy.

Weld, Isaac, Jr. 1800. *Travels through the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and the provinces of upper and lower Canada, during the years 1795, 1796, and 1797*. 4th ed. 2 vols.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 1968.

Wells, Roger A.E.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rural proletariat and social protest, 1700 - 1850.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6, no. 2 (January):115 - 39.

Wermel, Michael. 1939. *The evolution of classical wage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estern, J.R. 1965. *The English milit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story of a political issue, 1660 - 1802*.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Wetzel, W.A. 1895. Benjamin Franklin as an economis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September).

Weulersse, Georges. 1910. *Le Mouvement Physiocratique en France, de 1756 a 1770*. 2 vols.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 1968.

—. 1959. *La Physiocratie a la fin du regne de Louis XV, 1770 - 1774*. 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Wheelwright, E.L., and Bruce McFarlane. 1970. *The Chinese road to socialism: Econom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Whitney, Lois. 1924. Primitivistic theories of epic origins. *Modern Philology* 21, no. 4 (May):337 - 78.

Wicksteed, Philip H. 1910.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vol. 2 of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selected papers and reviews on economic theory*, edited by Lionel Robbi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33.

Wieser, Friedrich von. 1927. *Social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A. Ford Hinrich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Wight, Andrew. 1778 - 84. *Present state of husbandry extracted from reports to the commissioners of the annexed estates*. 4 vols. Edinburgh: T. Caddell.

Wilensky, H. 1961.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free time." *Social Problems* 9:35 - 56.

Wilentz, Sean. 1984.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es, Richard C. 1968. The theory of wages in later English mercantilism.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1, no. 2 (April):113 - 26.

Wilkinson, Olga. 1964.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York: East Yorkshire Local History Society.

Williams, Samuel. 1809. *Natural and civil history of Vermont*. 2d ed. 2 vols. Burlington.

Williams, William Appleman. 1966.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Quadrangle.

Williamson, Jeffrey G., and Peter H. Lindert 1977. Long - term trends in wealth inequality. Discussion pape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Madison, Wis.

Willis, Karl. 1979. The role in parliament of the economic ideas of Adam Smith, 1776 - 1800.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1, no. 4 (summer):505 - 44.

Wilson, Thomas, and Andrew S. Skinner, eds. 1976.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Essays in honour of Adam Smi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inch, Donald. 1966. *James Mill: Selected economic writ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75.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lon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78. *Adam Smith's politics: An essay i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sman, Jon D. 1989. Straightening out the backward - bending supply curve of labour: From overt to covert compulsion and beyon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 no. 1 (March):94 - 112.

Wittfogel, Karl. 1931. *Die Wirtschaft und Gess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Wittkowsky, Georgy. 1943. Swift's modest proposal: The biography of an early Georgian pamphle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 (June - October):75 - 104.

Wordie, J. R. 1974. Social change on the Levenson - Gower estates, 1714 - 1832.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7, no. 4 (November):593 - 605.